

社会科学的哲学原理

-论农业风险与人类行为

十月（著）

Updated 2022-07

Contact us at :

<https://www.weibo.com/kickstar>

<https://twitter.com/kickstarchow>

Find our courses at:

<https://space.bilibili.com/529574992/channel/series>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X7X51QvhYEUttO49APuMjg/playlists>

目录

自序.....	8
导读.....	9
导论：柳叶刀与手术台	11

对 K-R 模型的理论批评。

(上卷) 逻辑：国家为什么繁荣	21
-----------------------	----

第一章：农业风险与 K-R 模型	22
------------------------	----

从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角度，去表述农业风险这一自然因素，如何影响了人类的社会行为。

第一节：地理不重要?	23
------------------	----

在经济发展问题上，反对阿西莫格鲁及其伙伴们对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否定。

第二节：治乱循环的人口动力学	28
----------------------	----

从中西的历史人口变化差异，引入农业风险的差异性，以及生育与家庭这一社会行为与形态的差异性（狭义的 K-R 策略倾向）。

第三节：农业风险与人类行为	36
---------------------	----

以科耶夫的历史哲学为参照，修正“主奴关系”概念，构造以农业风险为变量的社会行为与形态的差异性理论（广义的 K-R 策略倾向）。经济发展作为嵌入在社会行为与形态之中的一部分被合并解释。整个的理论称为“K-R 模型”。

第二章：资本主义起源再解释	42
---------------------	----

以 K-R 模型为工具，结合张五常佃农理论，重新解释以罗伯特·布伦纳的工作为基础的资本主义起源论述，并由资本主义起源与否引出社会秩序的差异性概念（K-R 社会秩序）。

第三章：农业风险的经济分析	51
---------------------	----

从经济学的角度，去延伸对农业风险问题的理解。

第一节：佃农分析，张五常与斯密的对和错.....52

从张五常对斯密佃农分析的批评入手，重申被张五常所回避的“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这一原理，并结合 K-R 模型，指出在新制度经济学当中没有清晰结论的制度变迁原理。

第二节：诺斯的制度变迁之惑.....56

以诺斯的学术观点为例，结合科斯定律与 K-R 模型，说明新制度经济学在制度与制度变迁这一主题上的局限。

第三节：杨小凯：交易条件和后发劣势.....59

结合 K-R 模型，对于杨小凯的交易条件解释做出修正，并由此修正杨小凯对于经济发展史的解释。作为举例，对关于“后发劣势”的通行看法做出了修正。

第四章：农业风险的社会分析.....64

从社会学的角度，去延伸对农业风险问题的理解。

第一节：父权，女权与战争形式.....65

对马文·哈里斯的演化论运用的修正。从 K-R 模型的角度解释农业部族母系继承与父系继承的起源，并解释父权制，女性地位和战争形式的历史图景，以及文化制度的所谓传统，所谓路径依赖的本质含义。

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70

以 Hajnal 线与 Todd 图为例，说明 K-R 模型视角下的经济发展史，并结合 Todd 图指出 K-R 模型的验证思路。

终章：纲举目张.....76

第一节：K-R 模型与其亲缘理论的异同.....77

跨学科研究的必要性所在，并对人类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领域内与 K-R 模型相近的理论做出评论。

第二节：土豆对谈录：从秩序演化看普遍历史.....80

如题，从 K-R 模型的角度看世界史，解释文明道路的分歧与演变。这一部分篇幅比较大，结合对历史的看法，展开讨论了 K-R 模型的

含义，可以作为理解 K-R 模型的参考。

第三节：“最有挑战性”的问题.....114

以国富国穷相关的问题做为线索，总结 K-R 模型对社会与经济发展的理解，“Institution matters”可以归结为“Geography matters”。

（下卷）历史：现代世界的缘起.....118

第一章：小分流..... 119

以既有理论为依托，呈现新范式。

第一节：斯密的现场记录.....120

以国富论的记载为起点引出问题。

第二节：张五常的洞察与迷惑.....122

重申风险规避对交易费用的决定作用，以经济学的形式呈现新范式与既有理论的连接。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129

以《资本论》所表述的资本概念为核心，呈现新范式的本质规定。

第四节：圈地运动与公地悲剧.....136

在经验历史与理论寓言之间的辨析。

第五节：盈利型租地农场 or 糊口式小农户.....140

农业道路，乃至历史道路的分岔从何而来。

第六节：潜水艇三明治..... 146

前现代国家的治理困境及其原因。

第二章：大分流..... 149

解构大分流问题。

第一节：中国研究的悖论与危机..... 150

以黄宗智的表述呈现社会经济史研究的范式危机，包括，但并不仅限

于中国研究。

第二节：在新范式下反思中国研究.....170

以新范式解决黄宗智所表述的“悖论”现象，化解所谓的范式“危机”。

第三章：分流.....179

在新范式的观照下，表述文明发展史上的分流及其根源。

第一节：文明起源的农业门槛.....182

以中国文明的起源为例，表述文明起源对于农业生产之抗风险能力的苛刻要求。

第二节：夭折的文明源流，农业的脆弱性.....186

以夭折的早期中国文明源流为例，表述农业生产条件的不确定性。

第三节：迟滞的文明源流，社会分工的剩余条件.....188

以赤道地带的文明源流为例，表述社会分工的农业剩余条件。

第四节：古文明的历程，囚徒困境与兴衰起伏.....197

以古代中国文明的历程为例，表述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低合作性（高冲突性）的竞争状况，以及这种竞争状况对于古文明历程之周期性兴衰的决定性推动。

第五节：现代文明，远离 ENSO 的农业奇迹.....209

以古代英国文明的历程为例，表述农业生产确定性所带来的和平环境，以及这种和平环境对于现代文明之分工演进的决定性推动。

终章：百川归海.....215

解释过去，了解现在。在新范式下思考文明合流对于世界秩序的意义。

第一节：和平秩序与繁荣.....217

现代文明与和平秩序。

第二节：绿色革命，从分流到合流的转折.....219

回顾欧亚大陆的近代史，表述绿色革命以来古文明的道路转折。

第三节：和平秩序的扩展	224
-------------------	-----

现代化合流与大同之道。

附论：自由主义理论的范式缺陷	228
----------------------	-----

基于农业风险与人类社会的互动，指出自由主义理论由于对自然力作用的缺乏认知而造成的理论构建上的想当然。

第一节：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229
-------------------------	-----

K-R 模型指出了社会秩序的本质规定性，并由此否定了作为哈耶克社会理论基础的两分社会秩序模型。

第二节：驳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231
--------------------------	-----

科学的发展是分工发展的一部分，因而不是随机的和无规则的，由此波普尔对历史预测以及理论历史学和历史决定论的否定是不成立的。

第三节：论柏林《两种自由概念》	233
-----------------------	-----

两种自由依据群己权界而对立和依存，而群己权界的确立是有现实依据的，柏林对两种自由之对立性的过分关注只是一种思想上的狭隘。

附录 1：主奴辩证法，英雄与末人，科耶夫	234
----------------------------	-----

K-R 模型参考了科耶夫历史哲学的形式，科耶夫的大部头著作难读，这是一篇演讲稿，作为读者了解科耶夫历史哲学的参考。

附录 2：参考书目	246
-----------------	-----

各个领域内与本书主题相关的书目。

自序

农业风险与人类行为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本书的主题。虽然这是我长时间的兴趣所在，但是本书能够完成和出版，完全离不开各位共同作者和朋友们的帮助与鼓励。没有和主教的探讨，就不会有作为开端的《治乱循环的人口动力学》，没有桂老师的指导，就不会有作为理论尝试的《农业风险与人类行为》，没有霍爷的鼓励和支持，就不会有作为理论发展的《资本主义起源再解释》以及其后的进展，没有和卡师及朋友们的研讨，就不会有澄清方法与边界的《土豆对谈录：从秩序演化看普遍历史》，另外，还要感谢主教的《主奴辩证法，英雄与末人，科耶夫》为 K-R 模型所提供的借鉴，桂老师的《柳叶刀与手术台》对 K-R 模型所做出的批评，尤其要感谢 Julia 融会 K-R 模型与杨小凯的分工演进理论，为这一主题开拓了新视野。正是大家的思考和帮助，使 K-R 模型从干巴巴的几句话开始，生长出细致立体的新形象。

每一样事物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这本书也是。它是互联网时代的产物，它的起点和历程，都和互联网相关联，这本书的共同作者和贡献者，看前面提到的名字，你可能也猜到了，大家都是直接或间接的网友，为这些思考贡献了评论意见的早期读者，也是如此，这本书的作者署名“十月”，就来自于共同作者们的微信群“十月小组”¹。一群普通人，借助于互联网的力量，“众筹”了这本书，借助于集体协作，完成了超越个体能力的工作。

最后，特别要感谢王曦老师和华伟的奔走，这本“无门无派，来路不明”的书就要面世了。它所讨论的主题如此宏大，百倍千倍篇幅不能穷尽所有的细节，所以当下的目标，并不是完成这一主题，而是树立起新的逻辑框架。我们把围绕这一主题的工作视为一个开源工程，本书就是这个项目的第一次发布，本书中的每一个章节，也就是这一逻辑框架的一个 Stub。希望有心的研究者们能够参与进来，在这些 Stub 的基础上，作出更为丰富和高超的发展与发掘，推动这一主题下的研究迈上更高的台阶，朋友们和我对此抱有信心，并期待这一天早日到来。

周夫生²，2021 年 3 月

¹ 这个群名是对英国马克思主义学派群体“九月小组”的调侃和致敬。

² 作者微博：<https://weibo.com/kickstar>，踢星星。

导读

本书主题有关的思考，起因是很简单的。有史以来的文明古国都和中国一样，在近代以来的发展中历经了种种波折，与此相对，先进国家的历史在过去五百年间走过了截然不同的道路。东西方的历史差异性如何解释，这是一个问题。各种答案不断出现，也不断被推翻，各有启发，但还是没有把道理讲透彻，不能给出一个完整清晰的解释图景。

本书的核心，是对于社会差异性及其背后原因的探讨。人类的社会行为与经济活动是一体的，社会行为与形态的差异和经济发展的差异也是一体的，基于这一理解，本书建立了一个以“风险”概念为核心的模型，我们称之为K-R模型³，去沟通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各门类的原理，围绕“制度和制度变迁”这个主题，把经济学的和非经济学的，比如历史政治社会的各种讨论，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整体的图景。

在经济学当中，对制度和制度变迁问题探讨的比较深入的，要数新制度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的分支，新制度学派对经济发展问题的终极回答就是诺斯的“*Institution matters*”（制度很重要），但是诺斯，以及新制度学派的张五常，巴泽尔等等，并未能就制度的形成和演变得出清晰的结论，虽然可以说，张五常已经是无限地接近了这个结论，但是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传统的束缚，他并未迈出最后一步。到了阿西莫格鲁这样的后学手里，统计的技艺更加进步了，而思想的能力反而是退化了。迄今为止，在包括新制度经济学在内的整个主流经济学当中，制度的解释仍然是一种西方中心主义的路子，制度有善恶，有“可信承诺”和“国家机会主义”的区别，而对于这种差异性，并不能提供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就像左大培在杨小凯的“后发劣势”演讲会上所讲的，“你要回答政府的机会主义从哪里来，否则我们就只能把这个问题解释为人种差异”。推论下去，这其中就隐含着一种盎格鲁萨克逊民族能发明先进制度，而亚非拉民族只会搞政府机会主义的种族与文化歧视。在本书中，K-R模型为一个社会的风险水平建立了尺度，并论证了制度对于这一风险水平的依赖关系，基于张五常的思路，K-R模型认为制度是任一合约的隐性补充条款，进一步的，制度就可以理解为一种以风险适应为核心的合约安排，现实世界中，围绕“制度”这一“合约安排”的政府行为本身也有量入为出的尺度约束，并不存在无限度的风险处置能力。因此，既然制度，以及围绕这一制度的政府行为的根源系于一个社会的风险水平，那么一个无约束而放之四海皆准的所谓“best practice”，

³ 由于这一模型中的“风险”概念，其构成是基于粮食生产的，朋友们也就把这一模型直观地叫做“粮食论”，但是，这一模型并不讨论通常意义上的粮食问题，它的核心概念是因粮食生产而来的“风险”，而非粮食自身，因此，叫它“风险论”更名副其实。不过为了避免名字带来的先入之见，本书就通称它为 K-R 模型。

在理论上是不存在的。在 K-R 模型的视角下，政府行为的所谓机会主义，就源于一个高风险水平下的社会所能支持的较低限度的风险处置能力，而所谓可信承诺则反之。由此，本书提出的 K-R 模型就融合了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中长期争论的“地理决定论”和“制度决定论”，为“*Institution*”，制度，以及围绕制度的政府行为，提供一个新的，中性的解释。它为后发国家的状况提供一种更现实，也更富于同理心的解释，并且，既然它指出了制度存在的依据，也就指出了制度变迁的原理，也就为这些国家如何摆脱其处境提供了新的启发。

本书上下两卷的内容安排，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原则，依次是新范式的逻辑表述，以及对这一逻辑的历史运用。上卷的名字，《国家为什么繁荣》，是对达龙·阿西莫格鲁及其伙伴们的调侃（他们的观点表述在《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下卷的名字，《现代世界的缘起》，则是对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的致敬（他有一部《现代世界的诞生》，认为现代世界起源于英格兰）。总的来说各章节的篇幅都不大，因为本书建立的还只是一个逻辑框架，各个方向上还未能进行细节上的深入研究。希望它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为未来的研究者提供一个新视角，新思路。

导论：柳叶刀与手术台

数年前与星师在网上认识，当时他正在思考建构一种理论，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形成动力和过程。简单地说，今天我们看到的社会形态，粗略地分，欧美、东亚、南亚、中东、非洲、俄罗斯等，为什么呈现出不同的组织方式和社会结构？进一步地，在东亚内部，在欧洲的日耳曼三国英法德，甚至还能进一步区分出显而易见的社会形态差异。让星师感兴趣的问题是，是什么原因促成了这些形态的演变和定型？一定有一种根本的动力，持续驱动各种社会角色和力量的运动，并在不同强度上产生冲突和交互，最终这种长时间的运动过程促成了与这种动因相适应的形态。

星师最终提出了一种基于粮食生产的解释模型，他将之抽象地命名为“K-R 模型”，而笔者将试图通过本文来尝试对“K-R 模型”进行一次评述和批判。

一、 K-R 模型——基于粮食产量波动的社会演化论

所谓 K-R 模型，是一个以粮食生产为基本视角的社会分析理论，它的基本论点包括如下三个部分：

- 1) 粮食产量的波动是决定社会风险的核心要素；
- 2) 不同强度和模式的核心社会风险，亦即粮食产量波动，决定了社会形成何种策略去应对这一风险；
- 3) 相对高风险地区 and 相对低风险地区的人类社会长期在选择作用的推动下演变，形成了两种不同策略倾向，星师借用了生态学的概念，将其命名为“K 策略倾向”和“R 策略倾向”。

以上三个部分，就形成了 K-R 模型的基本框架，我们有必要对其进行进一步的梳理，以便对它的批判最终能准确而深入。

1) 粮食产量波动与社会风险。

K-R 模型的根基在于粮食产量，但产量本身不足以引起社会形态的变动，能够引起变化的动力，是粮食产量的波动。按星师的观察，粮食产区按照产量波动的模式，可以分为稳定高产区、稳定低产区、频繁波动区和长周期波动区。产量上的静态特质和风险并不直接等同，与直观感觉相悖的是，高产区和低产区只要其产量的变化曲线是平滑的，就都属于低风险区。其次，产量变化的周期长短和震荡幅度是决定风险强度的真正指标。换言之，高速且大振幅的波动曲线下，社会风险远远大于稳定的低产区，也大于变化周期长且曲线平滑的波动地区。

笔者同意这种分类的基本方法。现代社会在进行风险管理时，对风险类型进行分类的基本方法也是通过风险发生的概率和影响后果的大小两个向度来进行矩阵划分的，高概率大后果和低概率小后果的潜在风险被明显地划分在不同的风险门类之中。星师用波动这一指针可以轻松地划分出粮食产量及其波动曲线的矩阵分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简明高效的办法。

结合历史实证来考察，稳定低产区如中世纪暖期之前的西北欧，欧洲人到达之前的北美，粮食产量不高但也不会产生巨大的波动，如果环境不发生根本变化，或者没有新的技术生产力被引进，该地区的粮食产量不可能在一个有限的历史时限内获得大幅度提升。一方面，由于其产量本身处于低位，无法累积大量人口，也就降低了饥饿的风险，另一方面，低人口水平下无法积累很多财富，也使得这些地方长时间无法形成有效的中央政府或者甚至是有持续影响力的公共权力拥有者。在这样的低风险地区，未能达到支持复杂社会的力量阈值，无法组织起大规模的运动和交互，最终演化而形成分散和小规模的国家或人口集群。在另一端，稳定高产区例如中世纪暖期以后的西北欧，大航海之后的北美殖民地，粮食产量高而且波动曲线平滑，因此形成了另一种低风险区。粮食稳定高产区的优势显而易见地在于它足以支撑密集人口下的长期社会稳定。社会成员和组织对低风险的适应，使得他们最终选择温和并长远的行为方式，加上粮食丰富带来的密集人口，无论从实证上怎么解释，或者说他们不为稻粱犯愁，或者说他们有充足选项可供选择，最终形成理论上的必然结果就是，这种社会形态很快地成熟，建立起有效的公共权力，并通过温和的方法来矫正公共权力组织的行为或对其进行修补。按照 K-R 模型的基本原理，这种类型的社会中驱动冲突的力量很弱，没有足够的能量去造成社会组织的大规模撕裂，因而推动了社会形态向复杂度提升的方向演进。

大类型的第二种，也就是产量波动地区。尽管我们可以将产量波动继续按照波动频率和振幅进行细分，但无论根据那个基准进行选择，波动意味着风险，粮食产量的波动区域，也就是社会风险的高水平区域。实证地看，例如东亚大陆地区，粮食产量在两到三百年的周期上会大幅度的变化，长期的大振幅将意味着社会在长历史阶段上的倾覆性剧变，针对土地和粮食的抢夺引发战争、杀戮或者其他更为暴烈的手段；而南亚次大陆地区，短周期上的大振幅将意味着在微小时空上的社会冲突将会快速高频地持续发生。总结地看，振幅大小将决定社会变化的强度，而波动频率将决定社会运动的性质，无论哪一种尺度，都是因为粮食产量的波动为社会运动提供了冲突性的动力，使得社会有可能趋向足以引起社会倾覆的临界点。

有了前面这个社会风险来源的基础思路，那么接下来就是说，社会将会根据其面临的风险作出策略选择以应对这种风险。如果说星师的定义里，社会风险源自于粮食产量变化，那么所有社会策略的选择就是为了应对这种变化。低风险地区由于变化小，应对变化带来风险的动力也就对应地小，于是首先是缺乏必要，进一步的就会缺乏能力，结果就是社会冲突的驱动较弱而应对也弱，这会形成一种策略；相反地，高风险地区冲突驱动强而应对也强，会形成另一种策略。

按照 K-R 模型，粮食风险高企的社会中，为了对抗时时可能到来的社会变化和不确定性，社会组织和个体会选择冲突倾向的策略，因此高风险社会难以形成细致和稳固的社会分工，反过来低风险社会中，社会组织和个体会选择合作倾向的策略，有助于社会分工在足够长的时间里累积演变。星师把高风险下的对抗策略倾向称为 R 策略倾向，相应地，低风险下的合作策略倾向称为 K 策略倾向。

至此，粮食论关于社会变化的动力和规律的核心理论模型就算构建完成了，概括地说，一种基于粮食风险的社会演变理论在雏形上完成了：

高农业风险：低妥协高对抗社会关系，封闭社会结构，高生育率，自给自足经济

低农业风险：高妥协低对抗社会关系，开放社会结构，低生育率，分工交换经济

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活史策略概念，定义人类行为的两分策略倾向：

R-策略倾向：适应于高风险环境的策略倾向，例如低妥协高对抗社会关系，封闭社会结构，高生育率，自给自足经济等等

K-策略倾向：适应于低风险环境的策略倾向，例如高妥协低对抗社会关系，开放社会结构，低生育率，分工交换经济等等。

2) 解释的有效性和简洁性

理论是用来解释世界的，而社会理论就是用来解释社会的。“理论是一种狂热的迷思”，罗素的这个论断并非要描述理论构建者的情绪状态，而是说理论来源于对现象的合法抽象，抽象正是罗素所意图借用的审美意义上的“迷狂”状态。因此，从自在的对象到可以解释对象的理论，必然具备这样几个条件和特质：

A) 对于现象观测和分类，

B) 将观测到并分类的现象进行模式归纳，

C) 将这些归纳后的模式重新应用到被观察对象。

这三个条件决定了一个理论必然有如下特质：

- A) 理论的诞生取决于观察者的视角，观察者的视角决定了被观测对象的分类方法和标准。因此合法的理论一定不是全知全能地从上帝视角重述对象，更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解释对象自身。任何一个社会理论能否合法的构建，取决于观察者的选择性尺度，而这些尺度的根源在于观察的视角本身，这既是理论成立的前提条件，也决定理论有效性的限度。
- B) 理论不是对现象的直观描摹，而是在对现象进行准确描摹的基础上进行的抽象和分类——只有抽象才能进行分类，只有分类才能建立模式。例如，我随机地观察一万片树叶，如果我不对这一万片树叶进行某种抽象，那么它们就永远是这些杂乱无章的树叶，它们与我们的认识和理性毫无关联。但一旦我开始进行某种方式的抽象，比如颜色、形状、大小或者干枯程度等，那么我就可以基于这些抽象进行分类。当我们按照我们的理性所规定的标准进行了分类之后，我们才能进入理论构建的关键环节：模式归纳。所以模式，是我们对分类后的对象进行纯粹理性规定的环节，而不是对象所呈现的样子，也不是对象本身。继续以树叶为例，我们可以把它们分为针叶和阔叶，甚至更简单地红叶和绿叶。怎么分都可以，但分类之后的命名是我们对观察对象进行了抽象、分类之后根据我们事先所规定的标准进行概念创造，也就是模式的归纳。到这里，模式开始形成了，形成了模式之后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的核心和雏形已经出现，但这一模式是否成立还需要第三步，重新应用回对象之中，看是否能够重复发生。
- C) 如果说做到刚才的步骤已经能建立一个理论体系的基本框架，那么这一理论最终是否能够成立还需要进行最后的步骤：验证。因为我们的分类条件是理性主观规定的，那么这个主观的规定是否能够穷尽对象，以及内在的逻辑上是否具备一致性，是理性不能单靠自己就能做到的。将理论应用回对象中进行验证，是当具备了这些规定的条件后，对象是否能按照理论的规定和框架重复地发生所预计的结果。这一点不难理解，实验和实践是检验理论的最终标准，但比这个更重要的是，在重复发生的检验过程中理论模式是否简洁，将是这一理论能否成立的“最后一公里”。例如，以现代社会的计算能力来看，以地球作为运动中心的“地心说”实际上也能

给出一个太阳系各行星与恒星运动的可用模型，但运算量过于庞大，即使能够具备解释的效力，也不便于使用这一理论进行研究，历史上，到了哥白尼时代，当时运算能力就已经不足以继续支撑这个理论模型去精确匹配当时的观测。

综上所述，一个“好的”理论建构起来，首先方法上必须合法地遵循理性的方法规则，现代也常常称之为“科学”方法，用合法的步骤建立起内在的逻辑统一的概念体系，这样可以保证具备基本的解释效力；其次是要检视理论体系是否具备易于计算的模型，也就是简洁性。

根据这个标准，K-R 模型可以解释一些历史和社会变化的现象，具备一定的解释效力，同时这个理论选择粮食生产这个基准解释要素，可以使得模型变得十分简洁。甚至由于粮食产量是一个可以精确计量的变量，因此乐观地看，甚至可以建立一个可以进行量化分析的数学模型起来，一种理想的状态是可以通过粮食风险的变化，在十年到二十年，至多数十年的尺度上进行社会风险的预测。

这样来说，K-R 模型具备了一个“漂亮”理论的形式化条件，是否符合观测事实可以检验，具备了高度的有效性和简洁性。我常常猜想星师计算机行业的知识背景可能影响了他的 K-R 模型的构建，要知道一个好的程序员不仅要让程序跑得通，更得让算法简洁以节省资源发挥算力。

但是将 K-R 模型放置回现实的历史和社会中去的时候，我们发现几个明显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可能使 K-R 模型或者成为一个完成度远远不够的毛坯理论，或者使得它成为一个缺乏现实意义的“理论陈列品”。

粮食满足的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需求，即生存需求的最基本要素。从人的需求层次来看，粮食需求是最底层的需求。毫无疑问的推论是，底层需求的满足程度和状态足以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越底层，越根本。因此粮食风险成为影响社会变化的动力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那么当星师把粮食风险作为单一要素来进行社会运动分析时，一定会出现的问题在于：

- A) 由于排除掉了其他层级的影响要素，因此对于社会变化或者社会运动的解释时效性会削弱甚至丧失。例如，笔者曾经和星师争论的，财政收入、土地制度或石油的产量与储量对社会格局和稳定产生的影响。这些变化在最近的十年或者数十年尺度上频繁发生并且产生了重大影响，但在 K-R 模型中这些因素都被排除在外了，这势必使得 K-R 模型对于数十年来的重大社会运动和变革缺乏直接的解释效力。

- B) 由于同样的因素，社会变局受粮食产量波动的影响，也不是绝对敏感的。实证地看，粮食风险变动的因素至少包括自然地理因素这样的不可抗力因素，和基于一定风险阈值产生了适应性的策略或制度之后，对抗风险的能力的加强或者减弱，以及粮食储备等等要素。如果加上贸易这一对粮食储量产生巨大影响的数值变量，那么区域上的粮食风险对抗能力会产生非常大的弹性。这些弹性即使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一个区域的风险属性，至少也会在时间尺度上将社会变化和风险积累的周期延长或缩短。所以，当前的 K-R 模型对于社会历史的解释可以说是在千年尺度上的，变化的过程可能是百年尺度上的。这个尺度上的社会理论对于眼前的现实社会变迁缺乏实证意义。对于政策的制定者而言，能够考虑五十年的影响已经十分长远，更大尺度上的预计往往只能图个热闹。
- C) 类型的转变。如果我们还是实证地考察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样本和国家，我们会发现为数不少的社会从 R 系社会形态变化到了 K 系社会形态，例如日本，包括还在高速发展的中国，也正在迅速从 R 系社会向 K 系社会转变。甚至在一个更大的尺度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所有的社会都曾经是 R 系社会，只是后来分别发生了转变？而在这种转变中，以日本为例，粮食风险对一个 R 系社会形态的国家来说，从来都是首要的风险，通过工业化和有效贸易，可以将原本的风险容纳能力大幅度扩充，直到在一个合适的历史时期中超越风险周期律，从而将社会形态根本上改变，但粮食风险并没有从根本上消失。所以从发展的阶段上去分析时，风险上升和下降的变量增减使得 K-R 模型需要去大幅增加运算量。当然，即使内在逻辑因此而受到影响，一个极有感召力的结论将是，如果人类社会有一天实现粮食生产的完全工业化，亦即通过人造光源替代阳光，在工厂车间里生产粮食而彻底避免自然因素的影响并摆脱土地的限制，那么人类社会的根本风险也就消失了，“社会大同”可以预见。但现在的理论框架下，运算的复杂导致内在逻辑需要进一步说明。

3) 宏大叙事与纯文本研究

基于前一节的论述，我们认为 K-R 模型至此为止尚是一个完成度非常低的理论框架之雏形。但是这并不影响星师由于其选择粮食生产这个独特视角而产生漂亮理论的可能性。不夸张地讲，在当下这个年代，随手攒出一个或几个关于社会的理论体系并非难事。一方面近百年以来各种社会研究和理论早已泛滥，随手摘抄甚至都能生造出几个所谓的理论体系来；另一方面，各种材料和数据的大量积累并能通过现代科学手段

简便地获取，也给各种研究者大开方便之门。也正因如此，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大量充满宏大叙事的野心，与之相伴随出现的另一倾向则是从文本到文本的纯粹文本研究。

古希腊时期的哲学思考，从神话与宇宙论时期，到系统化的伦理学，如果说这个时代的哲学思考原始地发生了人对未知的思考和对于所谓智慧的质朴之爱，这种思考的发达无论经历了何种实证的历史起伏，不得不承认的是，到康德时期形成了空前成熟的大一统哲学体系。康德的成就在于首次完成了对于理性自身边界的划定并规定了理性自身获得知识的方式，以至于后世认为其成就可以绕过却无法超越。黑格尔继承了康德批判哲学系统之后，试图创立自己的大一统体系，然而这正是哲学结束的开端。黑格尔以来，无数思想者都试图创立一个可以作为元解释的根本理论以解释一切，这一野心涵盖包括物理学、伦理学、认识论、历史学、社会学等等一切人类知识。由于这一野心实在过于庞大，二百年来它对于职业哲学家和民间大师的诱惑几乎是同样的强烈。然而试图涵盖一切知识的理论体系，由于其自身过于庞大，所以需要的逻辑支撑点就必然繁多，概念体系也被定义得繁杂不堪，所以从常识来看，体系越大，错漏也自然越多。这个常识般的判断被 20 世纪的天才数学家哥德尔简洁地表述为：一个逻辑体系要么是不完备的，要么是不自洽的。所以宏大叙事的理论尝试，最终得到的往往沦为一个大而无当的“思想陈列品”，除了观看把玩，别无他用。

而正是思想陈列品太多，又带来了另一种倾向，20 世纪以来的社会科学家们在形式上规定了详细学术规范，却在方法上默许了从纯文本中提取信息进行琐碎抽象的研究范式。它的实际作用在于给职业学者和阅读量足够广博的研究人员提供了充分的话语门槛，你试图对他们进行批评时，他们会冷静地抛出一句“请将我参考的资料全部阅读完毕之后再发言”，然而对于实际地去解释现象世界却缺乏能力和兴趣，当上了“高级精神摆件”或者是“掌握群众”的应声筒。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在中世纪为作为神学的婢女而艰难存活，而在表现形式上日益繁盛的现代，其实它也成为了某种“现世”需要的婢女，其生存地位相比于中世纪并无根本的改观。又一次，社会科学眼看着自然科学突飞猛进，现代物理学甚至已经达到或是超越了人类理性的边缘，社会科学和哲学是需要新一次革命的。

当然从实体上看，社会科学的难处在于，我们观察的是我们的行为和人类群体自身，这使得这种观察变得不稳定，因为除了观察者的视角限定之外，对于人的行为的观察和实践也可能改变着观察的对象。当我们的社会共同体拿某个理论范式去观察或干预某个群体时，一旦“理论”掌握了群众，社会行为的模式和取向可能就发生了一些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讲，K-R 模型试图从一种传统的、保守的唯物主义立场上去来观察人

类社会的演变，这是一种科学化的倾向。但是它将人的选择的弹性排除在历史演进的曲线之外，这会让 K-R 模型难以深入到百年以内的历史尺度上，这将是 K-R 模型取得进步的根本困扰。

星师在构建 K-R 模型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引证了演化论作为理论模型的基石。演化论的优越之处在于，可以动态地解释社会演变的过程和结果，可以使历史在往不同方向发生变化时，都能获得合理的说明。但是演化论自己的问题还层出不穷，至今也受到多种批评。最明显的悖论在于，演化论认为演化是“无方向”的。这个特点在现象层面描摹是合理的，但是社会和哲学理论需要去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恰好就是“方向性”，总而言之，合法的科学理论不能接受“无方向”这个基本结论。所以演化论也好，K-R 模型也好，都需要进一步解释，当何种条件出现时，社会将向何种方向发生演变，这才是恰当的问题。恩格斯在其未竟的著作《自然辩证法》中也曾经兴奋地介绍和引用了“演化论”的观点和思想。但是最终他没有继续写下去，可能的一种原因在于，这和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辩证发展的基本观念恰好是背离的。

总结来看，哲学和社会基础理论需要新的“哥白尼革命”，这种“理论革命”的能量正在积累，尤其我们看到，最新的物理学研究已经刷新了“因果关系”和“确定性”这种最基本的认识论前提，数学研究和人工智能也通过“相关性”来改进了那种基于“因果性”的预测和运算，尽管距离依旧遥远，我们希望 K-R 模型也能在大量摄取前人研究的数据、资料、文本的基础上突破自身的限度，毕竟虽然笔者批评了从文本到文本的研究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文本不重要，民间研究者要想突破职业学者所设置的藩篱，也尚须自己的努力去超越它。

二、 K-R 模型的限度与边界

K-R 模型在已经具备的良好基础上，未来会如何发展？应该如何发展？如果像前文所说，成为一种能解释一切的元理论对职业学者和民间研究者都具备几乎同样的诱惑力的话，那么星师和未来有兴趣和他一起致力于理论的成长和完善的研究者们，需要警惕这种自我设定的“伟大”方向。

实际上，形而上学的终结不是一个新的论断，康德以来就不断有人在重复提出这个问题，康德终结了形而上学，黑格尔马克思终结了形而上学，尼采终结了形而上学，直至海德格尔或者现象学终结了形而上学。本文不想去详细讨论形而上学在何种程度上被谁终结了，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一个基于粮食生产这种具体要素而构建的社会理论更有价值的方向是朝向科学化的道路前进。继续在形而上学的道路上研究，不仅难以获得期待的理论价值，而且在现有的理论解释效力还比较粗糙和完成度还比较低的前提下，很容易滑向环境决定论甚至虚无主义。

而二十世纪以来社会理论发展的另一个明显趋势是摒弃形而上学的空洞概念，依靠数学并广泛联合物理、生物学等现代科学学科体系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产生具体的实证的社会理论。在这个趋势中，经济学率先因为其和数学的天然关系取得最大幅度的发展，甚至形成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经济学对于社会理论的渗透和入侵甚至以自己来冠名，例如制度经济学，法律经济学，社会经济学。而实际上人们要研究的是制度，法律或者社会，经济学理论只是工具而已。这种越俎代庖的冲动使得经济学到现在，一方面取得了很多成就，另一方面如杨小凯所说，“还处在炼金术的时代”，总想预测点什么，但也总跟神棍也相差无几。

K-R 模型和经济学有天然的联系，毕竟这是基于粮食产量变化的社会博弈和运动，但 K-R 模型一定不是粮食经济学或者农业经济学或者土地制度与产权经济学，而是用经济学的方法、数据、和既有理论来支撑和强化与粮食生产有关的社会理论，不是研究粮食产量或价格或者土地交易制度，而是将粮食产量的波动抽象成基本社会风险之后，研究这个风险对于整体的社会运动的驱动，以及社会各群体的响应和反作用，所有的信号与反馈，压力与策略，社会群体意识与记忆，都是基于这个基本风险下的对抗和妥协。

所以 K-R 模型更紧要的任务，首先还是在内在的逻辑上完善自身，其次通过更多的数据资料和数学分析的研究，开始建立数学模型，最终可以通过数据的采集、分析、挖掘和综合形成可执行的数学模型。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不仅能通过 K-R 模型来研究一个社会或者国家的基本经济社会政策的制定指针，我们还能通过它来预判世界各国的社会风险。可以预见，如果有一天能够将这样的数学模型应用到“一带一路”国家的社会风险预测，将会为我们国家这一重大国策和战略的顺利实施提供有效工具。

笔者坚持认为并建议星师，实证科学的方向选择下，一个理论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并且这个理论有效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有确定的区间。也就是说，一个理论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解释特定的问题，尤其在今天，我们并不急于寻求可以解释一切的元理论，倒是对于解决具体问题的思想、算法和理论模型有着迫切的需要。K-R 模型应该为社会理论的科学化倾向做出努力，这一努力本身也是在为未来的“形而上学”存储能量。就像 K-R 模型本身所认为的一样，是基于实证的社会条件的变化才促成了社会思想的演变，当这种条件产生甚至成熟之前，对于元理论的尝试无一例外都会归于失败。

在和星师的交流中，笔者曾经用了一句街头俗话来比喻理论的限度和边界，一把杀猪刀当然可以用来杀猪宰羊，但是你要这样的刀去做手术，那结果一定是在“理性的规定”中悲剧收场。而一把精确的柳叶刀（手术刀），可以灵妙地解决应有的问题，但是同样地，柳叶刀只好用在手术台，却并不好杀猪。更牢靠的手术台和更精准的手术刀，是 K-R 模型无可回避的要务。这时，当我

们再次回到罗素“狂热的迷思”这一喟叹，K-R 模型的研究者们或许需要狂热投入的方向就明确了许多。

桂淳，2019 年 5 月

(上卷) 逻辑：国家为什么繁荣

“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马尔萨斯，1817），但是这一原因究竟何在，长期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1991年，美籍华裔历史学家黄宗智发表了《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一文，从经济社会史研究的角度，指出了这一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困难所在：源自斯密和早期马克思的两种范式存在着缺陷，从而给相关研究带来了众多困惑。本卷尝试借鉴达尔文演化论，在后期马克思思想的基础上构建新的范式，来作为解决“国富国穷”问题的逻辑起点。

第一章：农业风险与 K-R 模型

有七只母牛从河里上来，又美好又肥壮，在芦荻中吃草。随后又有七只母牛上来，又丑陋又干瘦，与那七只母牛一同站在河边。这又丑陋又干瘦的七只母牛吃尽了那又美好又肥壮的七只母牛。

《圣经》创世纪 41:2

第一节：地理不重要？

自亚当斯密以来，关于国富国穷的思考，就持续地吸引着人们的关注。1776年斯密发表了《国富论》一书，该书的英文名字，《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就表明了这个主题，数十年后的1817年，马尔萨斯在给大卫李嘉图的一封信中写道：“探寻国富国穷的原因，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重中之重。”，两百年后的今天，探寻仍在继续，有关这一主题的最晚近成果，是由大名鼎鼎的阿西莫格鲁教授和他的合作者们⁴，也就是合称AJR的三位名校教授作出的。而我们在这里要指出的是，虽然我们和AJR一样，同意诺斯的名言，“Institution matters”，但是AJR的研究对于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否定，是不能够成立的。

AJR的研究结果被写入了《国家为什么失败》这本书，首先我们来回顾一下书中用来否定地理因素重要性的第一个举例。在书的开篇，名为“格兰德河经济学”的第一章第一节中，AJR对位于格兰德河两岸，但却被一道围墙隔开，分别属于美国和墨西哥的两个诺加雷斯市做出了比较：

如果你站在围墙旁边往北看，你会看到亚利桑那州的诺加雷斯，位于圣塔克鲁兹郡境内。这里的家庭平均收入约三万美元。大多数十几岁的少年男女都在学校念书，大多数成年人都有高中学历。尽管有许多人批评美国医疗体系多么不足够，此地居民相对来说算上颇为健康，预期寿命以全球标准来看都算高。许多居民年龄超过六十五岁，享有联邦医疗保险计划的保障。这只是由政府提供，被许多人视为理所当然的服务之一，还有例如电力，电话，污水处理系统，公共卫生，与该地区其他城市和美国其他地方连接的道路网，以及同样不可或缺的治安等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市民可以从事每天的活动，无需害怕生命危险和其他安全威胁，也不必担心随时遭遇盗窃，被征用，或其他什么事情会危及他们在事业上和住家上的投资。

而相比之下：

几英尺外的围墙南方情况却大不相同。墨西哥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居民虽然生活在该国相对富裕的部分，但是此地家庭的年平均收入只有亚利桑那州诺加雷斯的三分之一。大部分索诺拉省诺加雷斯市的成年人没有高中学历，许多青少年不在学校就读。母亲必须担心很高的婴儿死亡率。落后的公共卫生条件意味着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寿命不及北方的邻居。他们也无缘利用许多公共设施。这里道路状况极差，治安水平更是低落。犯罪率很高，在此地创

⁴ Daron Acemoglu，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获得者，MIT 伊丽莎白与詹姆斯·克利安经济学讲席教授，Simon Johnson，前 IMF 首席经济学家，MIT 斯隆管理学院教授，James Robinson，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立实业是高风险的活动。不只是可能遭匪徒劫掠，还要取得各种许可证和贿赂许多人，光是开业就已经不容易。索诺拉省诺加雷斯的居民每天得与政治人物的贪渎和无能共同生活。

这是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一道界河所分割的两地，在地理上不能更接近和相似了，两地人民也有着共同的祖先与历史文化，但是两地之间的发展水平有着巨大的差别。由此作者推断，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两个诺加雷斯所分别拥有的美国与墨西哥的不同制度，而两种制度的渊源，则被上溯到北美殖民地和拉丁美洲殖民地的开端时代。由此，制度的差异，被归结为殖民地制度形成史的差异。

然后我们再来看书中用以否定地理因素重要性的第二个举例。在名为“北纬三十八度线经济学”的第三章第一节中，AJR 又对分属三十八度线两侧的南韩北韩做出了比较。看起来与第一个举例同样对比鲜明：

南韩人民的生活水平类似葡萄牙和西班牙。而国名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北韩生活水平和下撒哈拉非洲国家相似，只有南韩平均生活水平的十分之一而已。北韩人的健康情况甚至更恶劣，北韩人的平均预期寿命比三十八度线以南的亲人少十年。根据卫星摄影的夜晚灯光密度资料所画出的地图，以戏剧化的形式显示南北韩的经济鸿沟，北韩因为缺电几乎一片黑暗，南韩则处处亮光。

乍一看，这两个举例非常的有说服力。还有什么比两个地理上紧密相连，同文同种而又一分为二的城市或国家之间的悬殊对比，有更强的说服力来否定地理因素重要性呢？

但是，这类举例只是作者所喜爱的统计学与心理学上的花招而已，它们并不足以否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自农业时代以来，地球上有文字记载或者考古中被发掘的文明，已经是数十个甚至是数百个了。在因果关系错综复杂的社会发展领域，要否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少数几个极端案例的效力是令人怀疑的。当然会有人说，一个否定事例，就足以否定一个全称判断，我们姑且认可这种逻辑，那么 AJR 奉为典型的这两个举例，就果然像他们设想的那样，否定了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吗？

不是的。

制度，是一个内容庞杂的概念，AJR 的边界举例中所体现的显性“制度”，尤其是政治力量的外在显现。格兰德河两岸的两个诺加雷斯，它们的不同制度来自两个政治力量，这两个政治力量分别源自美国与墨西哥的核心地带，来自双方不同的殖民地历史道路。同样的，对峙在三八线两侧作为冷战前沿的南韩北韩，塑造它们的不同制度的政治力量，也分别来自冷战双方，美国与苏联的核

心地带，来自双方大不相同的历史道路。无论是格兰德河两岸的美国和墨西哥，还是冷战前线两边的美国和苏联，它们的政治现实与起源，都不能被论证为地理无关，恰恰相反，在美国与墨西哥的历史与现实差异上，在美国与苏联的历史与现实差异上，地理因素都是不能被忽略的决定性存在。

当然，AJR 这三位作者并不认同地理因素在各文明的制度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有多大作用。在这两个边界举例之外，他们还用众多的历史举例，来论证各文明的制度形成与演变的过程中，那些“微小而随机的偏移”，是如何导致了巨大的差异最终产生。书中的此类举例太多，不值得一一详述了，就让我们看看 AJR 对制度如何形成与演变的总结性描述：

没有两个社会创造出相同的制度，它们都会有独特的习俗，不同的财产权制度，不同的分享猎物或从其他群体劫掠财务的方式。有些社会承认老年人的权威，有的不承认；部分社会很早就发展出政治集权，但其他的社会则没有。社会不断发生经济和政治冲突，并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解决，原因是社会有历史差异，个人的角色不同，或只是随机因素。这些差异在开始的时候都很小，但它们不断累积，制造出一个制度漂移的过程。就像两个孤立的物种群体会在一个遗传漂移的过程中，因为随机的遗传突变不断累积而慢慢漂离，两个原本类似的社会也会在制度上逐渐漂离。不过制度漂移和遗传漂移一样没有预设的道路，甚至不见得是累积的；经过几个世纪的时间，它可能导致明显的，有时候很重要的差异。制度漂移造成的差异尤其影响重大，因为它们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

确实，通过把制度形成和物种形成两个过程的类比，AJR 给了我们一幅形象的图景。但是这个图景足够严谨，足够否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吗？

不是的。

如果 AJR 能够对达尔文以来的演化论多一些真正理解，而不是只知道一些皮毛，他们就会记得，演化论有两个要点：“物竞”与“天择”。作为随机突变的累积产物，遗传漂移确实是没有预设方向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遗传漂移的过程与结果是完全随机，各向同性的，因为遗传漂移在“物竞”之外，还要受到到另一个演化法则的约束，那就是“天择”。特定的自然环境，将对随机的和无定向的遗传突变是否能够生存下去作出裁剪约束，并不是所有的漂移可能性都能得到同样的生存机会，而这自然环境，就以地理环境为基础。人类作为生命世界的一部分，并不能自外于演化约束，制度的突变可以是随机的和无定向的，但是一个社会的制度如何演化，同样要受到这个社会所在的，以地理环境为基础的生存环境的裁剪约束。那些“影响社会在关键时期对经济和政治环境改变的反应方式”的“制度漂移”，正是这种生存环境裁剪约束的产物，正是被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结束关于演化理论的讨论，让我们再回到 AJR 论述的基础。这一论述基于 AJR 的一系列论文，其核心是 2001 年发表于期刊《美国经济评论》的《发展差异的殖民地起源：一项经验研究》⁵。在这篇影响广泛的“实证”论文中，作者们建立了“殖民者死亡率—移民活动—早期制度—现存制度—当下经济绩效”这样的一个逻辑链条，事实上，这一逻辑链条的起点，殖民者死亡率，与热带的疾病，气候等紧密相关，本身就是与地理环境高度相关的因素，并且，所谓的“路径依赖”，也就是现存制度与早期制度之间高度一致的继承关系，又如何能认定其中没有地理因素在起作用呢？毕竟这前后相继的早期制度和现存制度，也都发生在同一个地域上，这样的“高度一致的继承关系”，也完全可能由地理上的前后一致所造成。因此，这一论文的逻辑链条在其起点上和推演中，都无法排除地理因素的重要性，AJR 却能够以此类研究为依据，去在结论上否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这其中的逻辑，只能成“谜”了。无论这些研究中的数据收集有多丰富，回归分析有多漂亮，都不能挽回这其中的逻辑缺陷，AJR 的立论基础是空洞的。

抛开 AJR 们的象牙塔玄想，让我们面对现实世界及其历史过程，任何一个文明的过去与现在，都无法摆脱地理因素的巨大作用。诚如 AJR 所言，热带地区有新加坡这样发达的城市国家，但是同样众所周知的是，这里的经济体发达程度普遍还不能与其他地区比肩。温带地区有起源最久的各古老文明，但是这些曾经辉煌的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落后了。而过去五百年中兴起的先进国家，更是普遍位于比各个古老文明更加高纬度的地理位置上。现实世界及其历史过程中地理因素的巨大影响，是凭着常识理性就能够分辨的，并不需要什么奇绝的思考。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科学中最直白最朴素的根本观念，但是其重要性却因为平淡无奇而常常被忽视，而背离了这种根本观念，离开了具体的物质生存环境去研究人类社会，AJR 们念念不忘的“制度”就成为悬空虚置的无根之物。一手挥舞着“经济学逻辑”，一手挥舞着“回归分析”，用背离现实存在与历史经验的“科学建构”去否定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只能够再一次提醒我们这样的老生常谈：“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当然，AJR 对于广纳式和榨取式两种制度的研究，是精彩而富于启发的。尽管这一研究没有什么理论上的创造性，还是推动了与社会发展相关的思考，不失其现实意义。但是作为旁观者，我们仍然认为，一个更加深刻的论述，才是更加根本的推动力量。

⁵ 另外两篇论文是 2002 年发表于《经济学季刊》的“财富逆转：地理因素和制度对现代世界收入分配的作用”，以及 2005 年发表于《美国经济评论》的“欧洲的兴起：大西洋贸易，制度变化与经济增长”，观点与方法与第一篇相似，这里不再深入探讨。

现在，让我们回到斯密和马尔萨斯这样的先驱者们两百年前的提问上。国富国穷的原因究竟是什么？尽管社会发展领域的因果关系如此错综复杂，使一代又一代伟大的学者和思想家束手，我们还是要坚定的给出自己的论述：

归根结底，地理因素才是国富国穷问题的逻辑起点。

一个好的论述，将会创造广阔的思辨空间，为简单而一致地解释普遍的事实开辟道路。像阿西莫格鲁教授们那样，用边界两侧的贫富反差来否定地理因素重要性这样鸡贼的事，我们是不屑于做的。我们并不急于深入每一个细节去表白自己的正确，而是要在广泛比较的方法基础上展开新的论述，以期建立稳固的新范式，帮助未来的研究者们去创造社会科学的新高度。

接下来，就让我们展开新的论述。

第二节：治乱循环的人口动力学

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须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内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受着两种生产的制约：一方面受劳动的发展阶段的制约，另一方面受家庭的发展阶段的制约。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比较的。只是各人的分析理论不一，比较向度相异。

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自序

治乱兴替此起彼伏，可算是人类历史上最引人瞩目的现象，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研究。因着对这种现象的观察，战国时代的中国人已经发明了“土木金火水，五德终始”这样的循环论历史观，这一观念与几千年来中国历史相印证，成为深入人心的“下意识”。相比之下，现代社会所起源的欧洲，纵观其历史，虽然也有着节律性的兴衰，像是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所讲的“地中海的深呼吸”，又或者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布伦纳所讲的“两阶段农业大循环”，但是其治乱起伏的显著性却远较中国为弱。进一步的，最近几百年来，现代化进程起源于英格兰并且走向全世界，这一进程给人的典型印象，也并非“循环”，而是“进步”。

各个地区的传统观念对于其自身的历史道路都有所解释。五德终始，上帝的救赎，都是“自古以来”的久远观念，我们当然可以深挖故纸堆，从古人的角度出发，做“同情之理解”，但是对于增进我们的知识这一目的，这种办法帮助有限，尤其是过去一百年来，全世界各个地区的发展也已经日渐远离了其历史传统，面对这种“时运变迁”，传统观念的解释力就更显得薄弱了。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们对不同地区的历史道路异同做出了进一步的研究，这些研究的焦点，往往是西方的兴起，对其他地区的关注是次要的，它们对于西方以外地区的历史道路解释各有精彩之处，但也各有片面性的缺陷。中国人当然更加关心中国社会的历史道路，对此做出的最近而又最直接的研究，就是金观涛与刘青峰从系统论和辩证法出发的论文《中国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该文把中国社会的历史道路特征归结为特定社会结构的后果，但是和前述各种传统观念与近代以来的各种西方思想一样，这一解释过于特殊化，在增进我们对于普遍历史的理解方面进展有限。一个好的论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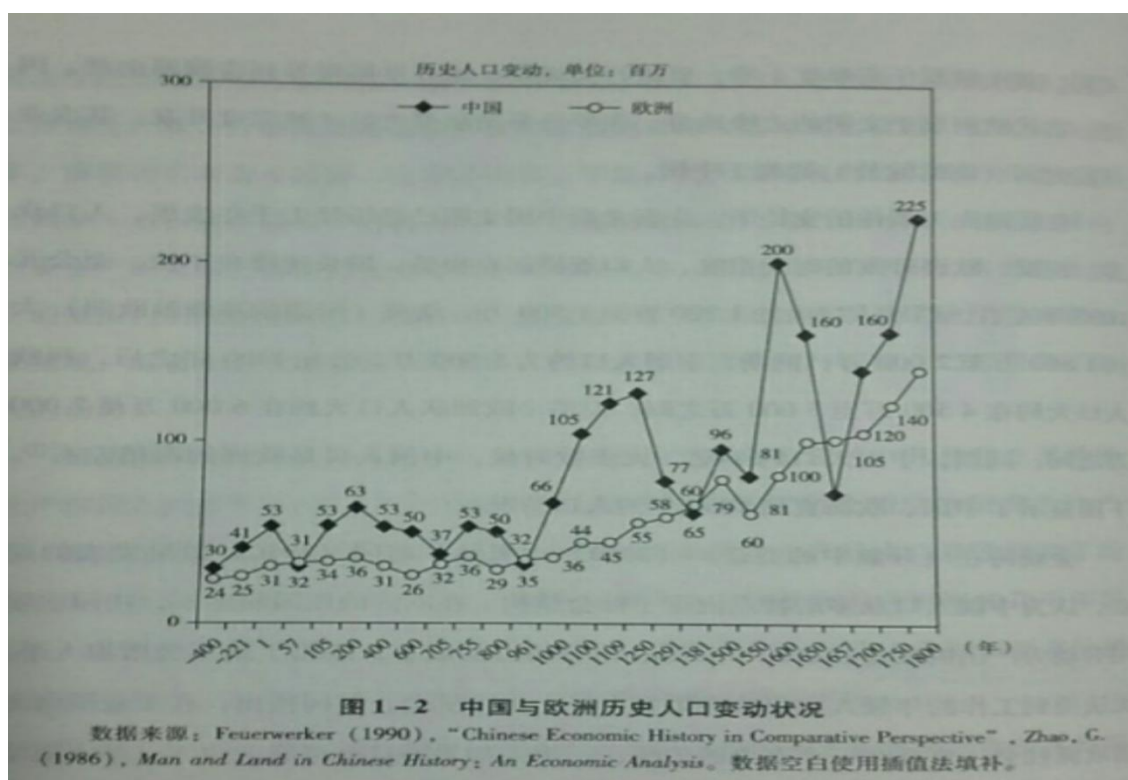
要能够简单而一致地解释普遍的事实，以此为准绳，无论是各种传统观念，还是前述中西方的各种历史解释，都还有着显著的缺陷。

幸运的是，最近几十年来，科技文化知识的暴涨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工具，新的视角，新的可能性。贤者有言，“所有的社会科学研究都是比较的”，对于新知识的追求，推动我们大胆地跨越学科边界，在范围更加广阔的比较中，去寻找治乱循环问题的启发。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人类学家马文·哈里斯在《文化唯物主义》一书中提出，为了更好地考察人类社会，在充分认识物质生产的重要性之外，更要充分认识人类自身再生产的重要性。本文就借鉴这一起源于恩格斯的思想，运用来自生态学与演化论的知识，以中西差异为起点，来试论历史上的治乱循环。

中西历史上，虽然程度不同，但都不缺少残酷的社会动乱。中国人固然有“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的感怀，欧洲人也不曾忘记对于天启四骑士的恐惧。从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开始，人口的几何级数暴涨与食物的算术级数增加之间的不匹配，和社会动乱从理论上被联系起来。这一理论虽然不尽完善，但是为后人提供了一个思考的起点，提示我们人口，食物，以及治乱之间的关联性。

中国历史上的治乱兴替，有两个特殊之处需要特别关注，一是它的显著性，数千年来以王朝兴替这样的形式周期性地反复发生，二是它的残酷性，转折期间总是伴随着数量巨大的非正常人口死亡。一张图胜过万语千言，我们就从下面这张图上直观感受一下：

Feuerwerker(1990),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Zhao,G. (1986), *Man and Land in Chinese history : An Ecomonic Analysis*. (摘抄自刘海影《中国巨债》第一章, 第十页)

如上图中的直观展示, 在中国历史上, 伴随着治乱循环这一节律的, 是治世人口的迅速增加, 和乱世人口的剧烈衰减。与欧洲历史上相对缓慢的人口涨落, 恰好成为鲜明的对比。那么, 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殊之处, 究竟因何而来呢?

人类历史是独一无二的, 我们无法创造一个实验室, 去重现和操纵一个社会的历程。但是, 作为生物群体的一员, 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又不是独一无二的, 以其它生物做比较, 人类社会的人口, 也就相当于其他生物的种群数量。随着现代生物学知识的积累, 我们知道这种生物种群数量剧烈涨落的现象, 并不罕见。实际上, 在某些生物种群中, 种群数量的周期性剧烈涨落, 甚至是一种常态。

生态学研究, 已经对生物种群数量的剧烈涨落, 用所谓的生活史策略理论, 提出了解释, 也为我们理解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天人之际”, 提供了启发。生活史策略, 可以理解为生物在长期演化过程中形成的对生存环境的适应性响应, 经过数十年来的丰富发展, 它已经包含了相互关联的一系列理论。在这里不去深入生态学本身, 作为借鉴, 我们只对生活史策略理论中最基本的概念, K-R 策略, 做一个简单介绍。

R-策略: 某些生物, 生活在不可预测的多变环境中, 比如存在周期性气候灾变的地区, 在选择压力下, 呈现出生率高, 发育快, 寿命短, 个体小等特征, 比较缺乏保护后代的机制, 竞争力弱, 但具有很强的扩散能力。

K-策略: 某些生物, 生活在可预测的稳定环境中, 比如气候灾变比较罕见的地区, 在选择压力下, 呈现出生率低, 发育慢, 寿命长, 个体大等特征, 有较完善的保护后代机制, 扩散力较弱, 但个体竞争力较强。

生态学的研究告诉我们, 生活在不可预测的多变环境中的 R-策略者, 其种群数量是经常激烈变动的, 突然爆发, 又猛烈下降, 正类似我们在上图中所看到的中国人口变化。而相应地, 生活在可预测的稳定环境中的 K-策略者, 其种群数量则是缓慢变化而相对收敛的, 正类似上图中的欧洲人口变化。

对比中国人口与欧洲人口的历史变化, 启发我们把 K-R 策略推广到对人类社会的观察当中。那么, 我们又如何理解中西历史上的这种人口变化对比呢? 我们能够说中国人是 R-策略者, 而欧洲人是 K-策略者吗?

从生理特征来看, 答案是否定的。在生理层面上, 相比于其他生物, 所有人类都可以说是典型的 K-策略者。人类一次通常只生育一个后代, 而后代有着漫长的幼儿期需要悉心照顾, 所以终其一生也不可能抚养太多孩子。相比于

其他生物，人类的寿命也是相对较长的，体型虽然不突出，但是在现代生物世界里，也不算是“小”的那一类。最后，作为生物链顶端的物种，人类在生态系统中的竞争力则是毫无疑问的。生理特征是稳固而普遍的，中国人与欧洲人在这方面上并没有什么不同。

但是，人类之所以能够高踞生物链的顶端，是因为他强大的适应能力，而这种适应能力，不仅来自于生理特征，更来自于行为复杂性。人类利用语言文字等手段，创造了复杂性远超其他动物的社会行为，简言之，就是人类有文化，有制度，依赖于个体之间的分工合作，使人类的适应能力突破了个体能力的局限。那么，在文化制度层面，中西之间的差异又能给我们什么启发呢？

从历史与社会的研究中，我们得知中国与欧洲在文化制度上存在若干持久的差异。中国较多诸子均分，一夫多妻。普遍早婚早育，育龄妇女婚姻也比较充分，而欧洲较多长子继承制，一夫一妻，普遍晚婚晚育，也存在部分育龄女性不婚的状况⁶。两者相比较，中国的文化制度倾向分散土地等资源，造成更快的人口增殖与家系壮大。而欧洲的文化制度则倾向于集中土地等资源，以增强个体的财富与竞争力。

而 K-R 策略两分的本质，就是有限资源下，追求群体数量还是追求个体竞争力这两种倾向之间的权衡。从这个角度看待中国与欧洲的社会生活差异性，那么我们不难在婚姻继承等文化制度上看到这种权衡的直观表现，并分辨出类似于 R-K 策略对比的差异性。由此，我们推广对 K-R 策略的理解，把优先推动群体数量的文化制度，归类为 R 策略，把优先增强个体竞争力的文化制度，归类为 K 策略。

从生态学的研究中，我们知道种群的 K-R 策略，是在对生存环境的适应中演化而来的。相应地，在人类族群的文化制度中表现出的 K-R 策略倾向，是人类以其社会行为的复杂性，来弥补生理能力在适应生存环境变化上的局限而来的。和其他物种一样，正是不同的生存环境，造成了人类族群对 K-R 策略倾向的不同选择。

对于人类而言，生态学上所谓的可预测的稳定环境与不可预测的多变环境，也就是造成 K-R 策略倾向的环境分类，它的现实含义是什么呢？相比于其他生物，人类对于生存环境的适应性，由于制造工具与利用资源的能力而达于极致，从沙漠到雨林，从极地到赤道，地球上没有其他生物可以像人类一样，能够适应并生存于差别如此巨大的各种环境中。但是人类仍然和任何一种生物一样，依赖于生存资料而存续。对于植物来说，生存靠的是阳光雨露。而人类，和其他动物一样，生存的首要资料就是食物与水。人类文明史随着农业时代而开启，粮食从此成为人类最主要的食物来源，牲畜是草原上的粮食等价

⁶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物，也可以简化归并到粮食这一概念中，由此，从文明的初起直到今天，环境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最集中的体现就是粮食生产的稳定性与可预测性。

中国所在的东亚区域，粮食生产依赖于季风降雨，而季风区气候并不稳定。季风较强的年份，带来的水汽多，降水也多，容易引发洪涝。较弱的年份，带来水汽较少，能形成的降水不多，容易引发旱灾。同时，季风强弱的变化还伴随有地区间降雨平衡的问题，一个区域降雨较多，与另一个区域降雨较少往往同时发生，所以在中国，南涝北旱或南旱北涝，又常常是非此即彼的跷跷板。这种经常性且不规则的年度季风变化，给粮食生产带来短时段上大范围区域内的不稳定性与不可预测性。

此外，这里还存在着以数百年为间隔的长时段上的气候快速变化。通过地质钻探考察生物痕迹，相关的科学研究发现东亚地区存在着时间长度分别为三百年左右与一百多年的大小气候周期。在特定周期中的气温下降阶段，平均气温可在不足百年的时间段中下降超过1摄氏度。直观上，我们可能不易理解这一变化幅度对粮食生产有多大影响，那么可以参考一下持续了数百年，并使得使欧洲北部农业繁荣起来的中世纪暖期。这一时段里欧洲北部的平均气温较之前也只是上升了1摄氏度左右。不足百年内平均气温下降超过一度，这一变化的速度与幅度，在前现代生产条件下，足以在东亚的大范围区域内造成持续而剧烈的粮食减产。

这种短时段上较高的粮食生产不确定性，以及长时段上灾难性的粮食持续减产，迫使人类对其做出适应性的回应，由此就解释了中国地区文化制度中的R-策略倾向。

那么不稳定的气候环境是如何推动了文化制度中的R-策略倾向呢？

气候变化的不确定性，是各种时段，各种幅度的不可预测变化之叠加，有着极为复杂的模式。对人类行为策略的影响，也有着极其复杂的后果。既是由于对这种复杂性的认识有限，也是为了简化叙述，这里只讨论前述较为显明，也较为两分的短时段与长时段上粮食生产的变化。

短时段上的气候不稳定性，将导致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的变化，围绕其风险的斗争，将降低对粮食生产进行资源投入的效益，进而降低了粮食生产的收益和积累。反过来，这种局面，又限制了对粮食生产做资源投入的能力。粮食生产的这种低效益低投入，阻碍粮食生产效率的提高，而最终，粮食生产效率的低下，加上不稳定气候环境导致的粮食生产波动，以及前现代条件下薄弱的运输与储备能力，使得粮食供应的安全边际非常低，生活在这种状况下的人类无法摆脱高风险的生存状态。

财富积累的困难，加上高风险的生存状态，使得依靠财富增加生存优势的策略选择，并不占优。而较多的后代，较大的亲缘群体，更有机会在这种生存

环境中把家系延续下去。由此在各种生存策略的权衡当中，占优的倾向是更多的生育，而非更多的财富积累。这是短时段上的农业风险对文化制度中 R-策略倾向的推动作用。

对这种高风险生存状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在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比较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起源研究中，做了最好的表达，下面就直接引用他，作为参考：

专业化在很多方面都与农民追求经济保障的目标相冲突。鉴于农业收成的不可预测性，专门化就意味着要冒彻底失败的风险。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会因为供应量的减少而上涨。消费者因此可用于购买粮食以外的消费品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因此会造成其他消费品价格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农民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这样的剪刀差之中，即一方面要花高价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非食物产品，这就减少了他们的收入。而当这样的剪刀差趋于极端，就会导致歇业，这可能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等灾难性后果。农民不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避免市场依赖和专门化风险，而更倾向于将“安全第一”和“生存型生产”作为再生产规则，即继续多样化的自给自足式生产，只在市场上交易自己生存需求之外的物质剩余。

农民的疾病和养老保障需求，也与专门化趋势相逆，因为他们的这一诉求具有本质上的“不经济”性——特别是为了确保家庭中有孩子能给自己养老送终，父母不得不生养更多的孩子以组建一个大家庭。但若是农民家庭依赖和服从竞争（即从事专门化生产）的话，这样的策略就不可行了，因为抚养更多的孩子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即抚养孩子的花费要比孩子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益高得多，并导致农民经济单元的非竞争性。因此为保险起见，就必须专门避免专门化和承担由此造成的生存竞争。此时的明智选择，又是“生存型生产”。

而农民细分其份地之举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为了给家中（将来可能给父母养老）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以延续家族香火。和养育很多孩子一样，家庭份地的细分也是不经济之选，因为它会减小份地的面积并自然地导致经济效益的降低和竞争力的消弱。但农民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和家族延续而细分土地，有鉴于此（再加上其他的理由），他们再次规避专门化，而选择“安全第一”的再生产规则。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为了对家中的儿子有利，父母一般不只是以细分土地的方式来为儿子组建新家庭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会尽早筹办此事以便让儿子早点结婚。为了使这样的做法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农民不得不避免市场依赖和专门化。

鉴于上述农民所选择的再生产规则，总体来看，农民会选择生存型生产，早婚，多生育孩子和细分田产，而这些都会规避专门化和引起(边际效益递减

的)人口扩展。早婚和多子导致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又带来定居点扩展和田产细分,定居点的扩展继而造成更差的土地变成耕地,而田产细分则导致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比的下降。这两种长期发展趋势共同造成了中世纪农业的必然趋势,即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其表现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以及工农业产品贸易(相对价格)逆差。

这是一种与自足式增长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由于农业人均产出的减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1700年前并没有超过12%~15%。或许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当人口的增长越过某个临界点之时,就会导致饥荒,疾病并限制家庭规模。欧洲人口增长大约于1300—1350年以及1560—1620年间达到了极限,并随即引发14和17世纪“总危机”。这说明在1100—1750年间,不是稳定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被一些短暂的停顿所打断,而是两个“农业大循环”,其标志就是长期的人口增长和人均边际产出的下降,接下来就是以长期的人口停滞,衰减直至衰竭为特征的相反趋势的出现。(布伦纳,《从历史到理论: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见汉译布伦纳论文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第五章)

而对于中国农民来说,除了这种与欧洲相似的,短时段上的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之外,还有更加糟糕的状况在等着他们。如前文所述,在短时段上的气候不稳定之外,中国地区还存在着长时段上的气候快速变化,会造成大范围区域内持续而剧烈的粮食减产,最终造成大量失去粮食供应的人口。围绕这些人口的生存危机,将引发剧烈的无政府混乱与流民战争,混乱与战争又反过来推动进一步的粮食减产,由此,以粮食短缺为核心的政治困难与军事危机互相推动,社会秩序迅速走向崩溃,这正是在中国古代的动乱时期反复出现的历史过程。

在这种“玉石俱焚”式的普遍混乱中,在前现代的动员条件下,拥有较强的个人竞争力,比如财富技艺等,对于个体乃至族群的生存帮助有限。小到家庭,大到族群,如果是相对于其他人的R-策略者,那么它的人口基数会比较大,在前现代的动员条件下,生存机会将明显增加。现代人对前现代动乱无法直观体会,可能难以理解这一点,网上有份“南斯拉夫平民内战城市生存报告”,描述了这种无政府状态的现代版,可供参考。这份报告会提示我们,在一个人与人互为敌的无政府环境中,亲友团体之间的互相支持,对于生存下去有着多么巨大的帮助。由此,周期性发生的长时段上的气候快速变化,与短时段上的气候不稳定叠加,共同形成对R-策略倾向的反复推动,迅速扩张人口的R-策略,就会成为中国地区各族群的普遍选择。

那么,这种普遍的R-策略倾向,又会给人类自身的生存发展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R-策略迅速扩张人口的倾向，将推动与这一倾向相一致的土地利用方式。快速扩张的人口，会推动开荒以扩大耕地面积，也会推动在单位耕地上投入更多劳动以提高边际产出，最终导致人地比和人口总数的上升，导致粮食供应的安全边际降低。最后，但也可能最糟的是，前现代条件下的农业技术进步，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有限，这样的技术进步不能实质性地降低农业风险，与人类的 R-策略倾向结合，使得人口水平提得更高的同时，粮食供应的安全边际降得更低，从而强化了下一波粮食危机的普遍性和严重性，在新一轮的粮食大范围持续减产期间，将导致更加彻底的无政府混乱与更大规模的流民战争，而这反过来又将进一步强化文化制度中的 R-策略倾向。

从上面的讨论可以推出我们的结论：

高水平的粮食生产不可预测性与 R 策略倾向互相强化，锁定了中国社会从文明初起直到绿色革命之间数千年的历史道路，以波浪式的人口增长与渐次加深的社会危机为特征的治乱循环，就是这一历史道路的直观呈现。

第三节：农业风险与人类行为

人们用以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方式，首先取决于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需要再生产的生活资料本身的特性。这种生产方式不仅应当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来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表现他们生活的一定形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

人类对于彼此之间历史社会差异性的意识，源远流长，比比皆是。远在古典时代，亚里士多德已经在《政治学》一书中描绘了希腊，日耳曼，以及东方世界（埃及叙利亚波斯）的不同社会特征，希腊人把本土之外的北方族群称为“野蛮人（Barbarian）”，我们中国人也长期来自视为上国，以区分于周边的“蛮夷”族群。随着大航海时代以来东西方世界日渐频密的各种交流与日渐拉大的发展差距，这种差异性意识变得更加明确了，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一书中鼓吹基督教日耳曼世界为“世界精神的顶峰”，又评论中国为“没有历史”的停滞，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根据“从身份到契约”的变迁，区分了进步性社会与停滞性社会。那么，有史以来就互相联系和交流的各个人类族群，它们的历史社会道路为什么会有如此不同的走向呢？

不同的视角，导向不同的解释，历史社会差异性的起因被先贤们解释为神意，种族，地理，文化，偶然性等等，不一而足。每一种解释都给我们带来启发，但是也没有哪一种解释能够简单一致地覆盖普遍的历史社会经验。历史学的研究，现代社会的历程，已经为历史社会差异与变迁的比较研究积累了繁多的材料，相应地，先贤们对这一问题也已经有了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不再继续添加素材，又或者是注释前人，而是借助于来自哲学，生态学以及演化论的启发，以自然环境与人类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为核心，来论述自然环境对于人类历史社会的影响。希望它能够作为考察历史经验的参照，为研究历史社会差异与变迁提供新的视角。

作为一种抽象论述，我们将力图简化表达，以便突出分析框架。

一，农业风险与社会关系

历史，是一切人类行动的总和，不同的历史社会道路，最终呈现在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动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每一个人的每一个行动，都依托于特定的社会关系网络而实现。因此，社会关系的性质，就成为历史社会道路的约束，考察社会关系的差异性，就成为考察历史社会差异性的一个视角。

首先，我们来论述“主奴关系”这一概念，并用它来抽象表述社会关系。主奴辩证法是一个源于黑格尔哲学体系的概念，自称“右派马克思主义者”的法国哲学家科耶夫对这一概念做了发挥，使它成为自己的历史哲学论述基石。我们借鉴科耶夫历史哲学的形式，以演化论的视角，将主奴辩证法修正为“主奴关系”，并使用它作为论述的起点⁷。

主奴关系，在这里理解为人与人之间的博弈关系。在主奴关系中，双方既对抗且合作，主奴关系是不对等的，主奴关系的成立，也就是所谓“承认”，是对抗的结果，但是“承认”其本身即是一种默式合作。

主奴双方作为生命个体所追求的，都是同一个事物，也就是演化意义上的存续优势。主奴双方对于死亡有着同样的拒斥，主人并非仅仅是不惧死亡地追求奴隶的承认，奴隶也并非仅仅是因畏惧死亡而承认主人。强者以藐视死亡的勇气追求主人地位，要求对方“承认”，是一种博弈手段，为的是谋求相对优势。弱者甘居对方之下，“承认”对方，是一种特定认知下的权衡，因为作为次优选择的相对劣势胜过死亡。对抗的双方成为主人或者奴隶，同样是追求存续优势之权衡下的偶然结果。

主奴关系成立的前提是食有余，否则，狭路相逢的双方，唯一的理性选择就是逃避对方，又或者冒着生命危险去杀死对方，双方没有共同生存的基础，也就不会有主奴关系的成立。农业时代之所以开启了文明进程，其原因就在于粮食剩余的出现，使得冲突的双方可以在某种利益安排下共同生存，彼此有了互相妥协的余地，而非注定你死我活，主奴关系由此成立。文明社会中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是这种主奴关系的具体表象。

农业时代以来，人类依赖于粮食而生存，而粮食依赖于自然环境而生产。粮食生产对人类存续的影响重大，普遍而持续，成为人类存续风险的基准因素。人均产出少而稳定性差，会推高人类的存续风险，反之则会降低人类的存续风险。这种源自粮食生产的存续风险，我们称之为农业风险。粮食的产出及其稳定性，就构成了农业风险的核心。在前绿色革命的漫长历史时期，决定这一风险的根本力量，是自然环境的属性，而非人类的能力。自然环境有各种属性对粮食生产发生影响，而气候是其中主要的因素，气候及其变化有相对稳固的特征，人类生产粮食的技能相对稳定，两者的结合，就造成特定模式的粮食生产波动，构成了特定模式的农业风险。

主奴是合作的，双方通过合作而受益，应对源于自然的农业风险，提升了双方的存续机会。主奴又是不平等的，主人所得利益较大，存续机会较多，而奴隶所得利益较小，存续机会较少。对存续优势的追求，将推动主奴双方去追求较大的利益份额，并引发彼此对抗。主奴关系是社会关系的抽象表达，主奴

⁷ 科耶夫的大部头著作阅读起来会比较费心费力，可以参考本书附录 1：《主奴辩证法，英雄与末人，科耶夫》有所了解。

之间的这种对抗带来的存续风险，就具体蕴含在各种社会关系之中，我们称之为秩序风险。

为了简化论述，简化对风险的考察，在这里我们放弃对风险模式的深入研究，只粗略判定风险水平的高低。

为了在利益分配中争取更多份额，采取高对抗强度的策略，在减少农业风险的同时，会增加秩序风险。当它所带来的（秩序）风险增加超过（农业）风险减少时，将是得不偿失的。为了降低秩序风险，采取低对抗强度的策略，在降低（秩序）风险的同时，也会减少在利益分配中的所得，从而增加（农业）风险，当它带来的（秩序）风险减少低于（农业）风险增加时，也将是得不偿失的。由此，在特定水平的农业风险下，主奴双方中的任何一方，为了追求存续优势，都需要在农业风险和秩序风险这两种负担之间做出权衡。

高水平的农业风险下，较小的利益得失，就能造成很大的存续优势改变。采用低对抗强度的策略，可以降低秩序风险负担，而由此所增加的农业风险负担，可能带来存续优势的急剧衰减，从而得不偿失。因此，在选择压力下，低对抗强度的策略将会被抑制，社会关系将体现出低妥协性的对抗特征。

在低水平的农业风险下，较大的利益得失，也只会造成较小的存续优势改变。采用高对抗强度的策略，可以减少农业风险负担，而由此所增加的秩序风险负担，也可能带来存续优势的急剧衰减，从而得不偿失。因此，在选择压力下，高对抗强度的策略将会被抑制，社会关系将体现出高妥协性的合作特征。

综上所述，无论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以内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由于无意识的选择压力，农业风险的水平，都会成为塑造社会关系的基准因素。

二，农业风险与社会结构

在考察社会关系与农业风险之间的关联后，我们进一步考虑社会关系的复杂性。

人类的高度智能，使人类行为在对抗与合作中表现出高度的多样性与灵活性。人类个体在生存竞争中并非单打独斗，而是依托于共同体而存在，在共同体内外彼此对抗与合作。大大小小层层叠叠的共同体，就构成一个错综复杂的网络。这样一个网络中的各个共同体之间的关系，以及各个共同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关系，就成为社会关系的特殊化与具体化。

社会结构的本质，就是各个共同体的存在形式及其内外关系。共同体内的个体，彼此的对抗性较低而妥协性较高，以合作形成集体力量，在与共同体外部的对抗中争取优势。农业风险越高，越推动人类之间低妥协性的对抗策略。低妥协性的对抗策略，推动人类强化“敌我之分”，推动内部妥协和外部对抗更

加强烈的共同体分化，形成样式更加单调，边界更加清晰而彼此更加拒斥的共同体存在，我们称之为封闭的社会结构。农业风险越低，越推动人类之间高妥协性的合作策略。高妥协性的合作策略，推动人类“创造性解决冲突”，推动内部妥协和外部对抗更加弱化的共同体分化，形成样式更加多变，边界更加模糊而彼此更多流动的共同体存在，我们称之为开放的社会结构。

综上所述，农业风险对社会关系所施加的约束，使农业风险成为塑造共同体特性与相互作用的基准因素，进而也就成为塑造社会结构的基准因素。

三，农业风险与人口再生产。

家庭是人类自身“再生产”的基础。生育较少的后代，以便他们获得更多资源，强化个体竞争能力，抑或生育较多的后代，每个后代分得资源较少，但是总括可以承受较高的个体死亡概率，是两种提高存续优势但互相矛盾的生育策略。在有限资源的约束下，人必然要在两种生育策略之间做出权衡。

低水平农业风险下，社会关系体现高妥协性的合作特征，人类个体存续风险低。生育多，家系大，人均资源少将降低个体竞争力，会遭遇因竞争力低下而迅速推高的秩序风险。由此，迅速扩展人口的高生育策略，意味着存续高风险，将会被选择压力所抑制。

高水平农业风险下，社会关系体现低妥协性的对抗特征，人类个体存续风险高。生育少，家系小，人均资源高将提升个体竞争力，但不能有效抵消广泛的对抗所带来的秩序风险。由此，提升个体竞争力的低生育率策略，意味着存续高风险，将会选择压力所抑制。

综上所述，无论是由于人类认知能力以内的“两害相权取其轻”，还是由于无意识的选择压力，农业风险的水平，都会基于它对社会关系的影响，而成为生育策略的变化依据。

四，农业风险与经济形式

存续风险，是人类行为的根本制约，因此，农业风险作为影响人类存续风险的基准因素，它也成为塑造人类经济行为的基准因素。

在粮食生产衰退的年份，粮食价格上涨而供应减少，粮食以外的其他产品成本抬升而消费下降。在高风险农业条件下，粮食生产将发生频繁而不可预测的波动，这种粮食价格上升与其他消费品价格下降，将是反复发生的大概率事件，对非粮食产品的生产将会造成经常性的双重打击。进一步的，高风险农业条件下，以低妥协性对抗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会推高交换过程中的风险，高生育策略下的婚姻家庭制度，会妨碍资本的积累。这些源于高风险农业的因素，都会阻碍专业化分工与交换的发展。因此，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就会成为稳固的存在。

低风险农业环境下，粮食生产长期稳定，相应的，粮食的供应与价格也长期稳定，粮食价格也是劳动力价格的基准，使得粮食以外的其他产品成本与价格稳定。进一步的，低风险农业条件下，以高妥协性合作为特征的社会关系与社会结构，会降低交换过程中的风险，低生育策略下的婚姻家庭制度，有助于资本的积累。这些源于低风险农业的因素，都会推动专业化分工与交换的发展，进而推动技术进步与资本积累，从而使社会化大生产成为可能。

综上所述，农业风险，经由对于社会产品的成本与价格的双重影响，经由对于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以及生育策略的影响，成为塑造不同社会经济形式的基准因素。

五，农业风险下的人类行为

至此，我们论述了农业风险对社会关系，社会结构，生育策略和经济形式的影响，归纳如下：

高农业风险：低妥协高对抗社会关系，封闭社会结构，高生育率，自给自足经济

低农业风险：高妥协低对抗社会关系，开放社会结构，低生育率，分工交换经济

由此，借鉴生态学中的生活史策略概念，我们定义人类行为的两分策略倾向：

R- 策略倾向：适应于高农业风险环境的策略倾向，例如低妥协高对抗社会关系，封闭社会结构，高生育率，自给自足经济等等

K- 策略倾向：适应于低农业风险环境的策略倾向，例如高妥协低对抗社会关系，开放社会结构，低生育率，分工交换经济等等

六，停滞性社会与进步性社会

人类争取存续优势的活动，在适应于农业风险的同时，也在不断改变着农业生产条件，进而改变着农业风险水平。不同的策略倾向，分别适应于不同水平的农业风险，对农业生产条件有着不同的影响，长期迭代累积，将会造成越来越大的历史社会差异性。

高水平农业风险推动 R-策略倾向，高生育率会提升迅速提升人口水平，减少可耕地剩余，在耕地有限的情况下推高人地比。单位土地上更多的人力投入，所带来的边际效益递减，会减少人均剩余。进一步的，适应于高水平农业风险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经济形式，与人口因素共同作用，对资本积累，分工交换和技术进步造成阻碍。长期而言，这将使高水平农业风险自我巩固。

社会的低信任，低资本，低技术积累与运用，将会使社会最终陷入停滞。这种“停滞”不是静止不变，而是一种无发展的循环运动。

低水平农业风险推动 K-策略倾向，低生育率会维持人口数量相对于环境承载能力的收敛状态，保留可耕地剩余，保持较低的人地比。人均拥有较多耕地，将会保持较高水平的人均剩余。进一步的，适应于低水平农业风险的社会关系，社会结构与经济形式，与人口因素共同作用，有助于对资本积累，分工交换和技术进步的推动。长期而言，这将使低水平农业风险自我巩固。社会的高信任，高资本，高技术积累与运用，将会推动社会持续进步。这种“进步”也不会是均匀直线式的，而是扰动下的累积发展。

综上所述，农业风险水平的两分自我巩固，在社会变迁上形成类似于“右墙原理”的路径限制：虽然社会是时时扰动演变的，但是在低水平农业风险的环境下，社会进步不会遭遇严重破坏，而在高水平农业风险的环境下，社会进步将会遭遇最终封顶。由于每一个社会的生存环境都有着相对稳定的自然特征，因而其面对的农业风险水平也相对稳定，加以农业风险与人类行动互相作用下的这种自我巩固，就规定了不同社会的不同历史社会道路。

七，这些都是真的吗？

一个论述的真假优劣，被三个因素所影响。首先，它的基本假设是否合理，其次，推理演绎是否合乎逻辑，最终，它的结论是否符合事实。

本文论述的基本假设，是在观察与思考的基础上对历史经验所做的抽象与构建，是否做到足够好，请读者批判。假设之上的推理演绎是否合乎逻辑，则是一个相对客观的问题，请读者批评。而结论是否符合历史与现实，则需要实证的研究。

农业风险与人口政治经济等各种社会现象的一致性是否成立，需要深入的计量考察。虽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但是随着计量方法在各社会学科如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等等领域的长足进步，这样的实证研究在理论上是是可以实现的，初步的工作，就可以基于 Hajnal 线和 Todd 图的计量研究开始⁸。当然，在实证研究充分实现之前，这一论述的真假优劣，就要仰仗各位读者去做理性的判断了。

⁸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和 Todd 图新解》，计量各地区的农业风险与家庭结构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一致性，就可以对 K-R 模型作出验证。

第二章：资本主义起源再解释⁹

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

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卷，费尔巴哈章

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称作对分佃农的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拉丁文中叫做 Coloni Partiarum（分益佃农），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废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作什么。

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篇，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与世界各地绵延了数千年的传统社会相比，以资本主义兴起为源头的现代社会，算得上是崭新事物了。即使像艾伦·麦克法兰那样，把英格兰的“个人主义起源”前推到十三世纪，那么从现代社会的种子萌发到现在，也不足千年。工业革命标志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崛起，它所引发的巨变在同一个时代里就已经引起了世人的瞩目，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里写到，“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李鸿章这样的传统社会精英，面对跨海越洋而来的西方力量，更是发出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兴叹。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革是如此巨大，以至于某些现代学者，比如经济史学者格利高里·克拉克，干脆就认为它是世界历史上唯一重要的事情，十八世纪前和十八世纪后的区分，就是世界历史上唯一重要的区分。但是，十八世纪前的各种“传统社会”，果真是可以忽略其差异，而视为一体的吗？

⁹ 这篇文章不是对资本主义起源的完整论述。马克思主义学派政治学者艾伦·M.伍德在《资本主义的起源》一书中，以罗伯特·布伦纳的工作为基础，综述了有关资本主义起源的各种观点，本文即是对其中若干主要观点的评论，并借由这些评论引出 K-R 模型对于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新看法。资本主义起源是一个引起了长期争论的复杂问题，这篇文章的目标有限，只是试图指出一个 K-R 模型下的新视角，还缺少一个完整而贯穿始终的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由此可能造成理解上的困难，请读者必要的时候参考艾伦·M.伍德的原文本。

让我们回到问题的起点，再次思考资本主义起源。

资本主义起源的经典论述开端于经济学祖师——亚当·斯密，并且在古典政治经济学，启蒙运动有关“进步”的论述和各种近代史论述中反复出现，马克思主义学派的政治学者艾伦·M·伍德称之为“商业化模式”。在这种论述下，从人类历史的开端起，理性个体就为了谋求自身利益而参与到交换行为当中。以生产工具进步为表现的技术发展，使得分工与交换这两种相辅相成的行为日益发达，日益专业化，于是，商业活动在悠久的历史中逐渐成熟，并且从政治和文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等同于商业社会的资本主义作为进步的最高阶段，也就自然出现了。在这种论述下，资本主义和早期社会形态相比，并没有质的不同，更多的是一种量的累积，是市场的扩大以及经济生活商业化特征的加强。

以商业化模式论述为基础，十九世纪以来众多的社会学家，历史学家，比如马克思，韦伯，布罗代尔，皮雷纳，都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做出过各自的研究和阐发。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各种后起理论，比如人口学模式，世界体系论，依附理论等等，也都可以视作商业化模式的延伸。诸如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迈克尔曼的历史社会学研究等等，也都与商业化模式有着思想上的亲缘关系。而卡尔波兰尼的《巨变》，则是少有的一个挑战商业化模式的异数，但是这一挑战并不彻底。

如前所述，源于斯密的“商业化模式”影响巨大。但是，资本主义起源论述却不只有这一种，另有一种与“商业化模式”大不相同的，源自马克思的论述。马克思在他的早期作品中追随了斯密的思路，但是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马克思开辟了新路，表述了全新的原理，即“资本”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而非财富本身。根据这一原理，简单的财富积累并非资本主义起源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是一种社会产权关系转型：

货币与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值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力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级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

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而这种转型是发生在英国乡村的独特的历史过程：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王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通的历史时代通过不通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

在马克思之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历史研究，都建立在马克思本人对斯密的“原始积累”这一概念的批判之上。历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多布-斯威齐论战，以及七十年代的布伦纳论战，马克思主义学派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的诸多面向做了深入的澄清，揭示了商业化模式及其亲缘论述的内在缺陷。具体而言，在这些论述之下，就阶级间的收入分配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言，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效果。这足以使人质疑这些论述中因果逻辑的合理性，并严重削弱了这些论述的解释力。但是，尽管成功地批判了商业化模式，马克思主义学派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解释，还是有进一步深化的余地。本文即是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研究成果作出进一步解释的尝试。

首先我们来看资本主义起源问题上最近，也是最重要的成就，马克思主义学派史学家罗伯特·布伦纳对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布伦纳分析了中世纪欧洲大陆的主体人口，农民，为什么不能像斯密所设想的那样，也正如资本主义英国所发生的那样，以专业化生产参与分工交换，既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又在市场上买入生活资料，从而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专业化在很多方面都与农民追求经济保障的目标相冲突。鉴于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专门化就意味着要冒彻底失败的风险。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会因为供应量的减少而上涨。消费者因此可用于购买粮食以外的消费品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因此会造成其他消费品价格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农民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这样的剪刀差之中，即一方面要花高价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非食物产品，这就减少了他们的收入。而当这样的剪刀差趋于极端，就会导致歇业，这可能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等灾难性后果。农民不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避免市场依赖和专门化风险，而更倾向于将“安全第一”和“生存型生产”作为再生产规

则，即继续多样化的自给自足式生产，只在市场上交易自己生存需求之外的物质剩余。（布伦纳，《从理论到历史：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

基于布伦纳这一分析，我们以最简单直白的逻辑作出以下推断：既然同样是人口主体的英国农民没有像他们在欧洲大陆的同类这样，受困于“多样化的自给自足式生产”，而是敢于放弃“安全第一”和“生存型生产”的再生产规则，以专门化生产依赖于市场交换而生存，从而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那么英国的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是很低的，专门化的风险是可以承受的。也就是说，在英国，因粮食歉收而造成的“剪刀差”，也就是粮价上涨的同时其他消费品价格下跌，不足以威胁专门化生产者的生存发展。

这一逻辑推断，可能会立刻引起疑问，农业自古以来“靠天吃饭”，而“天”是不可预测的，英国可以例外吗？的确，农业生产高度依赖于自然环境，尤其依赖于气候环境。气候变化是高度不可预测的，即使是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准确预测几天后的天气变化都是一件困难的事，遑论过去。但是关于农业生产，有一点应当引起我们注意，那就是虽然预测“天”的变化世界各地都一样困难，但是气候变化本身在世界各地有着不同的模式，这就造成了不同水平的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由此进一步表达我们的推断如下：自然环境，尤其气候环境，带给世界各地的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是不一样的。这里存在一个尺度，足够高的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将使得农民面临布伦纳所讲的困境，也就是“专门化就意味着要冒彻底失败的风险”，而相应地，足够低的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则使农民免于这种困境，也就是说，以专业化生产参与分工交换，既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又在市场上买入生活资料，从而逐步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些农民来说是可行的。

直接地从历史资料上去比较世界各地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是相当困难的，因为广泛地获取各地的农业产出记录很难，除了英国的历史文献保存状况较好外，世界各地的经济史材料完备性都远远不及，越是落后地区越是如此。另外，从气候变化推断农业产出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特别是对气候变化的详细记录也是非常晚近的事，要获取更多资料就需要各种复杂的科学手段。所以我们在这里采取一种替代的方法，借用制度经济学对农业制度的分析，以经济史上的农业制度记载，来表明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在不同地域之间的差异。

在国富论中，斯密有一句话谈到英国与欧洲大陆的农业制度：

继古代奴隶耕作者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称作对分佃农的一种农民。这种农民，在拉丁文中叫做 *Coloni Partiarum*（分益佃农），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废止，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他们叫作什么。（亚当·斯密：《国富论》第三篇，第二章 论罗马帝国崩溃后农业在欧洲旧状态下所受到的阻抑）

这句话中的“分益佃农”，指的是广泛存在于法国的支付分成地租（share-cropping）的农民。事实上，分成地租远远不只是盛行于法国，可以说，除了英格兰，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着分成地租的身影。是定额地租，还是分成地租，就成为英格兰与其他文明区域在农业制度上的显著差异。那么，这个差异性的背后是什么样的原因在起作用呢？

1969年，经济学家张五常发表了他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这篇论文以台湾土地制度及其改革变迁为材料，论证了佃租制度和农业风险之间的关系。这里的农业风险，也即是布伦纳所谓“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以张五常的话语来表达，地主与农民之间的租佃关系，是一个合约，定额地租还是分成地租，分别是结构不同的合约安排。不同的合约结构，有着不同的执行费用，制度经济学通常称之为交易费用，出于对风险的规避，合约双方将在交易费用不同的合约安排之间做出选择。作为一种合约安排，分成地租的交易费用，要高于定额地租合约，出于订约双方的利益最大化，采用交易费用较低的合约安排，当然是一种优选，但是欧亚大陆上的佃租双方之所以舍弃交易费用较低的定额地租合约安排，而选用交易费用较高的分成地租合约安排，其原因就在于由于厘清地租价格的困难。而这困难，即是农业风险，或布伦纳所谓“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所造成。相应地，地租价格容易厘清的情形下，佃租双方就会采用交易费用较低的定额合约，这就是发生在英格兰的情形，这就意味着此地农业风险足够低，也就是“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足够低。

归结前文的逻辑推断如下：

英国和以法国为代表的欧亚大陆之所分别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或困守马尔萨斯停滞，其根源分别是足够低或足够高的农业产出的不可预测性。

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的影响力，遍及农业时代以来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对农民是否以专业化生产参与分工交换的影响，只是这种影响力展现的冰山一角。按照张五常所表述的价格不确定性与合约安排的关系，价格不确定性越高，相应的合约安排就有着越高的交易费用。粮食生产是农业时代以来人的生存基础，而人的劳动是一切社会产品的前提。所以，粮食产出的不可预测性，首先导致粮食价格的不确定性，继而导致劳动力价格的不确定性，进而导致所有社会产品的价格不确定性，最终影响所有合约安排而成为一切交易费用的基准。由于制度（法律，风俗，礼仪，宗教等等）的合约安排性质¹⁰，与制度相关的交易费用，我们就称之为“制度费用”。前述“交易费用基准”，也就成为“制度费用基准”。这一“制度费用基准”的影响力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最基础而直接的土地制度，经济制度，延及政治制度，军事制度，乃至风俗

¹⁰ 在这里我们遵从张五常的思路，任一具体合约都是不完全的，制度隐性地补足了具体的合约而使之完全化，因此隐性地，制度也就是任一合约安排的一部分。

文化，意识形态，无所不包。所有这些因素，最终也都在走向资本主义还是困守马尔萨斯停滞的道路分歧上发生作用。

进一步的，不同的文明区域，有着不同模式的农业风险，粮食产出的不可预测性有高有低，形成了不同的制度费用基准，塑造了不同的文明道路，这种道路分歧与农业风险的关联，也出现在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学家巴林顿·摩尔的研究中。巴林顿分析了英国，日本，法国，德国，俄国与中国不同的现代化道路，认为这种道路差异，源于各国农业（粮食）商品化进程的差异。而所谓的农业（粮食）商品化进程（严格来说，本土化贸易中的粮食商品化进程），即是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的一个表现，因为较高的不可预测性，即意味着较大的粮食价格波动，按照前述布伦纳的说明，从而造成粮食与粮食以外的消费品的价格剪刀差，同时对粮食和粮食以外消费品的供需两方形成遏制，阻止粮食市场的扩大，进而导致较为落后的粮食商品化进程，与此对应，较低的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即意味着粮食价格的稳定性，从而促进专门化生产者的出现和发展，推动粮食市场扩大化，进而导致较为先进的粮食商品化进程。

在前文论述的基础上，后文对资本主义起源问题若干面向上的争议作出进一步的解释。为了简化论述，我们用 K-R 策略倾向这样一个相对概念对各个地区的社会秩序做一个绝对化的归类，后文当中，当我们说某种社会秩序是 K 策略倾向（K 系）或者 R 策略倾向（R 系），就是以人类在资本主义起源时代的全球社会体系作为总体，以现代人的后见之明，把资本主义起源地，以 Emmanuel Todd 所定义的 Absolute Nuclear Family 家庭结构为特征的英国荷兰等北海沿岸地区的社会秩序归类为 K 策略倾向（K 系），把非资本主义起源地，以 Absolute Nuclear Family 以外的家庭结构为特征的欧亚大陆及其他地区的社会秩序归类为 R 策略倾向（R 系）¹¹。

第一，首先回到本文开头的问题。工业革命，乃至资本主义之前的各个早期社会，不可以像格里高利·克拉克那样，视之为无差别的一体。

不同早期社会，尽管彼此可能有着太多的共性，一眼看去都差不多，但是“草蛇灰线，伏脉千里”，K-R 策略倾向不同的社会秩序下日积月累的差异，为它们进入现代社会的次第打下了基础。并且，尽管早期社会之间的这种差异是细微的，但是它们朝向不同趋势的演变并非无迹可寻。艾伦·麦克法兰的《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一书，向我们展示了中世纪晚期英国社会在各个方面均属独特的累积变化，尽管作者可能过于热爱祖国，评价英国历史不够冷静，但是这本书仍然是认识 K 策略倾向的社会秩序如何自我巩固的好材料。英格兰个人主义的兴起，就是个人脱离土地，脱离大家庭，自由劳动，自由迁徙，组建新的原子化家庭这样一个趋势的逐步深化。相比之下，布伦纳所描绘的马尔萨斯

¹¹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停滞下欧洲大陆农民的生活，广泛适用于整个欧亚大陆，是理解 R 策略倾向的社会秩序如何自我巩固的最佳参考。这种历史过程下，个人越来越依赖于细分的土地，依赖于大家庭的支持，依赖于传统社区而不是自由劳动自由迁徙，不是个人主义的兴起，而是走向个人主义的反方向。

第二，关于资本主义起源，源于斯密的商业化模式，和源于马克思的社会产权关系论，是可以在新的逻辑框架下相容的。

一方面，正如商业化模式的设想，加之于生命个体的演化压力，确实会推动人类走上专业化的分工交换道路。但是一个社会能在这条道路上走多远，则依赖于该社会所处自然环境为其限定的，因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而来的制度费用基准。过高的制度费用基准，将会为分工交换的发展设定极低的天花板，最终阻止该社会的资本主义起源。商业化模式及其亲缘思想，在解释资本主义起源中之所以遇到困难，也就是前文中所讲的，“在这些论述之下，就阶级间的收入分配以及长期的经济增长与生产力发展等方面的问题而言，相同的因素在不同的国家会产生非常不同的，有时候甚至是相互对立的效果”，其原因即是商业化模式的资本主义起源论对于不同的社会秩序类型不加区分，默认地将其论述建立在根植于低制度费用基准的 K 策略倾向秩序之上。

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学派的设想，资本主义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产权关系。并且，资本主义不只是一种社会产权关系，它是 K 策略倾向的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自我巩固，是根植于定额地租制的制度费用基准的进一步降低，是在这种进一步降低的制度费用基准上建立起来的一整套新的社会秩序，它与英国的传统社会秩序之间不存在断裂，它不是一个需要特殊解释的非自然存在，而是与传统社会秩序前后相继的自然演变。同时，这样的社会秩序有其特殊性，它与处在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根植于分成地租制的，在较高的制度费用基准上建立起来的欧亚大陆传统社会秩序，的确存在着断裂。以马克思论述的英国乡村产权关系转型为例：

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

这样一个过程，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英国现象，历史上的欧亚大陆统治者，绝不会主动的驱使农民离开土地，相反，他们竭力维护农民与土地之间的依存关系，因为在一个粮食生产无法稳定从而粮食市场也不可能发达的社会中，失去了土地依靠的大批农民将无法得到食物保障，从而首先成为“流民”，进而成为“乱民”。这里的统治者如果纵容类似于“圈地运动”那样的驱离行动，推动农民与土地相分离，就等于自掘坟墓，为自己的统治提前敲响了丧钟。

第三，关于前资本主义社会秩序下，布伦纳所谓的“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也即马克思所谓的“经济以外形式的剥削”，在英法两国的不同演变。

中世纪的法国和英国同为封建制下的日耳曼国家，它们的封建主义秩序有着共同的起源和广泛的相似。“以政治性构成的财产”，是英法两国贵族的共同起点，相应地，作为贵族领地上的农业劳动者，两国农民的起点也相似。但是从封建主义没落，到资本主义兴起的这一时间段中，两国的社会发展历程是不同的，这种不同也体现在“剥削方式”的不同走向上。在法国，随着地方贵族的权力在互相攻伐中没落，绝对主义君权兴起，贵族们越来越聚集在集权君主的周围，参与到官僚体制中。他们在领地上所拥有的政治性财产削弱了，但是他们以官僚体制的官员身份，从集权君主对农民的赋税中分肥，获得新的政治性财产。农民逐渐从贵族领地上获得了自己那小片土地的财产权，法律和习俗保护他们支付给贵族很少的地租，这使他们从贵族手上有所解脱，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又落入集权君主的赋税重压之下。英国的情况，则与法国形成了鲜明对比。英国贵族早于欧洲其他国家实现非军事化，他们的领地不具有独立小国的属性，他们在其领地上的政治性财产持续削弱，他们也是官僚体制的一部分和集权君主的同盟，但是他们并不以官僚体制内的身份，在集权君主的赋税收入中分肥，以获取替代性的政治性财产。与法国贵族相反，在历史演变中，他们的主要收入最终既不是领地上的政治性财产，也不是以集权君主的赋税分肥为形式的政治性财产，而是来自于出租土地获得的“竞争性地租”¹²。

英法两国之间的这种历史过程的差异性，标志着在不同的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下，两国的社会秩序在朝着相反的方向自我巩固。在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较高的法国，贵族和农民之间，贵族和贵族之间的矛盾，都在持续的冲突中激化，贵族在其领地上的政治性财产削弱，是在农民和君主的压力之下退却，但是同时他们又聚集在中央集权的官僚体制中，在向农民施加的赋税重压中获取分肥，这是一个贵族阶层在社会冲突的压力之下抱团的过程，通过“集体”行动，获取作为个体的贵族去单独面对农民反抗时所不具备的力量。而这种官僚集团对小农的强力压榨，和其他因素一起，阻止了法国农业生产率的提高，抬升了农业风险，使得法国的社会冲突情形更加恶化了。在英国，农业产出不可预测性很低，基于此，英国社会的制度费用基准也很低，而政治性财产（“经济以外形式的剥削”）是诉诸暴力来获取的，它的制度费用较高，既然英国贵族和领地上的农民能够以较低制度费用的“经济形式”的合约达成一致，对利益的追求就会使得英国贵族和农民都不会轻易诉诸暴力，在“经济以外形式的剥削”上互相对抗。没有高强度的对抗，英国贵族也就无需牺牲其领地上的既有权益，抱团聚集在集权君主周围，以官僚体制内的赋税分肥为生，英国农民也接受“竞争性地租”，而不是诉诸以暴力斗争为基础的“法律和习俗”来最小化地租付出。进一步的，这种弱对抗高妥协的社会秩序，鼓励了农业生产率的提高，降低了

¹² 土地出租，价高者得，由此种状况下获得的地租收入即称为“竞争性地租”。

农业风险，又使得整个社会的制度费用基准进一步降低，从而为资本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第四，关于欧洲的前资本主义贸易与英国本土日用消费品贸易的不同性质。

欧洲的前资本主义贸易，以跨区域的奢侈品贸易为特征，英国也是这一贸易网络的组成部分，东欧与西欧之间的粮食贸易则是这个贸易网络的附属，也有着跨区域的特点。而英国以粮食为核心的本土日用消费品贸易的兴起，则成为孕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源头。

这种差异性的背后，同样是不同水平的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所导致的不同社会历程。欧洲大陆粮食产出的高度不可预测性，即导致社会产品价格的高度不确定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这种不确定性还存在着上升趋势。奢侈品贸易对价格波动的承受力更强，因此传统的贸易网络无法摆脱这种以奢侈品为主为小众服务的特征，增长能力有限，结构趋于僵化。欧洲大陆的城市及其所谓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即是这一贸易网络的产物，所以，以根本而论，城市资产阶级（市民阶层）既非资本主义的产物，也非资本主义的源头，而是旧世界的一部分。相比之下，英国的粮食产出不可预测性很低，因此在歉收时节，粮食与其他消费品之间的价格剪刀差是可以承受的。于是，稳定的粮食产出，最终造就了以土地为代表的资产，以粮食为代表的日用消费品以及雇佣劳动三者的价格稳定性。资本主义企业的特征，即是雇佣劳动，企业家一方面以工资购买劳动使用权，另一方面以利息购买资本使用权，并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利。租地农场主一方面以定额地租得到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以工资获得雇工劳动，并在市场上出售粮食获利，因此，作为一种经营方式的租地农场正是资本主义企业的原型，并且，租地农场带来的农业生产率提高，进一步增强了粮食价格的稳定性。随着时间推移，前述的资产，劳动与消费品市场三者的价格稳定性，推动了农民脱离土地，从事专门化生产，在市场上出售产品并且在市场上购买粮食。这样的群体日益壮大，供应和需求互相推动，使得以粮食为核心的日用消费品市场的日益兴旺，也即资本主义以农业资本主义为源头而发展壮大。离开这种以粮食价格稳定性为基础的资产，劳动与消费品价格稳定性，无论租地农场还是手工业工场都无从成长，农业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乃至工业革命都无从发生，这就是整个欧亚大陆的情形。

最后要说明的是，农业风险决定文明道路这一论述，是一个基于概念和逻辑的，高度抽象与简化的理论框架。它不能代替具体的研究，而是提供一种研究工具，提示一种研究路径。资本主义起源的研究面向很多，在这里没有能力一一探讨，完整而深入的资本主义起源新论述，要留待未来的研究者们丰富和完善。希望本文对于读者的思考有所启发，那将是它最大的价值。

第三章：农业风险的经济分析

“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无不准此递加。”（清·乾隆）

第一节：佃农分析，张五常与斯密的对和错

风俗与法律是市场合约结构的一部分。

张五常：《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第三章，合约的一般理论

张五常在《经济解释》第四卷《制度的选择》一书中，否定了英国历史上曾经存在过分成地租制度，并对英国之所以不存在分成地租制度作了解释，但是从他在《佃农理论》一书中所表述的原理，“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来看，这个解释是有疑问的。我们来引述书中这一段：

一七七六年，斯密在他的《国富论》的卷三第二章，分析法国的佃农制度时写下的话，对后人的影响甚久：

“佃农永远不会从他们的储蓄拿钱出来改进土地，因为什么钱也不出的地主要把产品的一半拿去。（政府或教会）从农产品抽取十分之一已经对改进土地有非常大的阻碍。抽取百分之五十的税必然有效应更大的障碍。”

这可见把佃农分成作为政府抽税看的根深蒂固的传统源自斯密。但斯密可不是针对佃农制度的无效率而下笔。他的处理是用一整章来追溯土地使用制度的发展，目的是申述较为有经济效率的制度会逐步淘汰效率较低的。整本《国富论》都有适者淘汰不适者的味道，影响了后来的达尔文，而后者提出的“自然淘汰”是今天好些学者认为是人类最伟大的思想贡献。这里牵涉到一个重要的哲学问题，让我从斯密的土地制度的演进观说说吧。

首先，斯密说佃农制度在英国很久没有被采用，不知要怎样称呼，是他以法国为例的原因。他继续说在佃农之前的奴隶制度更没有经济效率，因为一个没有资产的奴隶只管吃，不管做。斯密之见是为了增加土地使用的效率，佃农替代奴隶。跟着的推论是：佃农制度还是效率不足，所以慢慢地，一个固定租金的制度取代了佃农分成。斯密跟着说，虽然固定租金优于佃农分成，但前者的合约期限过于短暂，农民没有安全感。他于是说，有永久年期的租约最有效率，而这种租约只在英国存在。言下之意，是英国当时的农地使用制度优于欧洲的其他国家。

我们要怎样看斯密的制度进化分析呢？有两点。第一是他说的事实不对。考查英国的历史我找不到佃农制度曾经在该国存在，不仅是很久以来没有。我得解释，是这不存在可不是因为无效率，而是因为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长约会导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

高，所以佃农制度不被采用。无论在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有关佃农的监管困难我会在第五节补充。转看奴隶的问题，我们没有证据奴隶只管吃不管做。事实上，福格尔及巴泽尔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追溯关于奴隶的历史资料，得到的结论是奴隶的生产力客观，而且主人虐待奴隶的故事多属虚构。

斯密最严重的错是他认为佃农制度会遭淘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不仅佃农合约存在，分成合约的普及可见于石油工业，百货商场，而如果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很多律师在某些案件会跟顾客以分成算账。再者，上文指出，中国的县际竞争制度也是分成制。

第二点更麻烦。不管斯密在事实上的错，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的方向走是合理的：说在局限约束下人类会争取利益极大化顺利成章。然而，昔日集体农庄的出现，导致饥荒遍野的，不可能是一个提升利益的制度。斯密当年回顾历史跟我们今天回顾历史不同。我们回顾，单是二十世纪就好几次有人类自己炮制出来的大灾难，深化一点足以毁灭人类的。斯密认为人类的自私会给社会带来益处，我同意，但我也认为人类的自私可能提升交易或社会费用，推到尽头人类有机会毁灭自己。我不同意这些年经济学者以博弈论来解释人类的灾难，因为该理论无从验证，但人类可以有自我毁灭的倾向是明显的。是的，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例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

如果我们说人类自我毁灭也是自然淘汰的结果-人类不适于生存-那么斯密与达尔文之见很容易变为套套逻辑，说了等于没有说。但自然淘汰这个观点显然重要，在生物的进化中有着无数实例的支持，只是引进人类的经济制度与互相残杀的演变，我推不出是哪些制度费用的怎么样转变会导致两个各走一端的不同效果。（《经济解释》增订版，第四卷，制度的选择，第四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第二节，从斯密的佃农分析说起）

K-R 模型与张五常表述在《佃农理论》当中的“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这一原理相一致¹³，也认同他对于英国历史上有无佃农分成的考查结果，事实上，张的考查结果，也就是英国历史上并没有佃农分成，正是符合 K-R 模型之推论的。从 K-R 模型的角度看来，考虑到特定自然环境中农业风险的相对稳固性，普遍的分成地租制度和普遍的定额地租制度是不会前后相继地存在的。分歧在于对于此一事实的解释：

我的解释，是这不存在可不是因为无效率，而是因为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

¹³ 见《佃农理论》第四章，《交易的费用，风险的规避与合约的选择》。

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长约会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高，所以佃农制度不被采用。无论在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经济解释》增订版，第四卷，制度的选择，第四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第二节，从斯密的佃农分析说起）

如果说“长约会导致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太高”从而解释佃农分成的不存在，那么从这一解释推断，相应地，用（习俗上）很少超过三年的短约（不会使得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显得太高），就可以解释分成佃农分成的存在了，但是这一解释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为佃农分成的监管费用较高，即使是短约，采用定额地租而非佃农分成也同样可以降低监管费用，那么欧亚大陆上的佃农分成又为什么普遍存在呢？事实上，监管费用（交易费用）与租约安排（长短，分成与否）是合约这同一事物的AB两面。以监管费用解释分成与否，是一种没有现实意义的同义反复。张在这里的解释混乱，是从《佃农理论》中的解释立场上倒退造成的。在那里，采用佃农分成的原因，并不是与合约长短或者监管费用高低，而是出于对农业风险的规避。

在《佃农理论》中，张对佃农分成的解释，核心是“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之所以佃农分成是合理的存在，就在于对不可预知的农业损失的规避，使得租佃双方无法采用交易费用更低的定额租约。相应的，对英国历史上佃农分成的不存在，与《佃农理论》更一致的解

释，就应该是英国不存在农业风险，或者至少这一农业风险的水平相当低。而张本人对“风险”这个“不能够向窗外一望便知”的概念相当排斥，按照他自己的回忆，在《佃农理论》的写作中，几次三番把“风险规避”丢出去，而又不得不几次三番捡回来。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排斥在他的意识是根深蒂固的，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张终于埋藏了“风险规避”，而一概只谈“交易费用”，《制度的选择》与《佃农理论》的不一致，应该就根源于此。

从K-R模型的角度看来，对“风险”这一“不能够向窗外一望便知”的概念的这一“规避”，倒是正说明了“风险规避”这一倾向在人类心智中的重要性。对“风险规避”的抹杀是不必要的，甚至是由此抹杀了一个重要的分析视角，因为抛弃“风险规避”而一概只谈“交易费用”，就在逻辑上割断了人类行为与其生存环境的联系，从而使得人类行为成为了悬空虚置的无根之物。因此《制度的选择》中的这一解释造成了新的疑问，相比《佃农理论》反而是退了一步，让佃农分成问题变得更加模糊不清了。

让我们坚持《佃农理论》中“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这一原理，由此张在前文中表述的第一点，英国不存在佃农分成，究其根本，就在于英国不存在农业风险，或者这一农业风险的水平相当低。这一结

论不但简单清晰，而且是可以计量实证的。进一步的，张在前文中表述的第二点：

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例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我推不出是哪些制度费用的怎么样转变会导致两个各走一端的不同效果。（《经济解释》增订版，第四卷，制度的选择，第四章，从佃农分成到中国制度，第二节，从斯密的佃农分析说起）

也可以在 K-R 模型下得到简单清晰的解释。

K-R 模型的原理，与“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一致的。粮食生产有自然环境造成的不可预测因素，也就是农业风险，决定了长约还是短约，定额还是分成等等这样的农业制度。而以粮食为代表的农产品，是农业时代以来人类生存的基石，农业风险经由粮食价格，劳动力价格，直到一切社会产品的价格而传递到整个社会生活当中。由此对于一切社会产品价格不确定性的“风险规避”就决定了整个社会中方方面面的“合约安排的选择”，一个社会的种种制度安排可视为具体合约安排的隐性条款，由此也就被这一“风险规避”所决定。因此，农业风险水平，就成为交易费用的基准，成为制度费用的基准，或者说制度安排的依据。农业风险水平的变化，就成为解释张五常前述第二点问题的逻辑起点。农业风险水平的下降，就可以导致合约或制度安排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反之，农业风险水平的上升，就可以导致合约或制度安排朝着增高交易费用的方向走。所以，“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的方向走是合理的；说在局限约束下人类会争取利益极大化顺利成章”。这两句当中，以第二句为逻辑起点，前一句并不一定能够成立。人类固然是争取利益极大化的，但是在“高风险”生存环境这一局限约束下，人类个体争取其利益极大化的行为可能是互相冲突，而不必定是互相协作的，而经济效率的提高有赖于互相协作而不是互相冲突，考虑到世界各地的自然环境所造就的农业风险水平是不同的，并且同一个地方的农业风险水平虽然相对稳定，但是特定时期的农业风险仍然可以朝着更高或者更低的方向变化，因此“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较高的方向走”并不是必然的。

需要说明的是，农业风险水平的改变，是，也仅只是合约或制度安排改变的逻辑起点，其中仍然有着复杂的变化过程有待研究，希望能有更多的研究者深入这一主题，以揭示出更加清晰的制度变迁的图景。

第二节：诺斯的制度变迁之惑

打从我立志要成为经济学者的那一天起，我就清楚地知道自己要走的方向。我一开始就探索是什么因素造就了经济的富庶或贫困，因为在我看来，只有做到了这点，接着才能谈如何改善经济的表现。

《我的学术生涯—诺斯》

尽管有关于国富国穷的这一问题的最近几篇著名论文来自 AJR，但是关于制度与制度变迁，AJR 并没有提出什么新思想，他们的论文还是基于道格拉斯·诺斯的一系列工作。本文就来探讨一下诺斯的制度变迁理论。

诺斯是一位新制度经济学派的学者，而新制度经济学是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基础上成长起来的，尽管诺斯也表示新古典经济学有必要增加与经济社会变迁有关的制度维度和时间维度，但是在制度变迁问题上，他的核心工作仍然以新古典经济学的范式为前提，并由此陷入了持久的困境。

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如何解释同处欧洲，历史与现状有共通之处的英国（以及荷兰）与法国（以及西班牙意大利德国）之间的道路分歧，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困难。这些国家曾经同样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困守，而在十四世纪到十七世纪这新一轮马尔萨斯周期的演变中，前者克服了马尔萨斯危机，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后者却失败了，继续受困于马尔萨斯陷阱而不能自拔。

诺斯在他的早期工作中，以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价格理论解释这一时期的制度变迁过程，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中描绘出“人口增长-土地边际递减-相对价格变化-调整所有权形式-制度变迁”这样一条逻辑线索。但价格理论并不能一致地解释所有权形式的调整和有效率的经济组织的形成，这一解释只是对英国荷兰是可行的，但是同样面对价格的相对变化，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制度变迁相比于英国荷兰却是不同的。为了弥补这一缺陷，诺斯在逻辑链条中引入了国家力量，英国荷兰的国家力量成功地调整了所有权形式，促成了有效率的经济组织形成，走向了持续的增长，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国家力量却未能成功地调整所有权形式，低效率的经济组织继续存在，使得这些国家继续在马尔萨斯陷阱中困守。在诺斯所发明的国家理论中，统治者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而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得创制有效率产权与统治者的追求相悖，因此国家力量为了自利而保持低效率经济组织的存在，进而阻碍经济增长，这就解释了以法国西班牙等国为代表的，人类历史上广泛存在的状况。如此一来，法国西班牙等国相比于英国荷兰的道路分歧得到了解释，但是英国荷兰的制度创新又成为有待解释的例外。于是，不得已的诺斯又把眼光投向国家力量以外的自愿团体和个人，设想一个国家中，统治者之外的选民对统治者施压，可能导致规则变更，并且以英国和荷兰的历史材料为基础进行了实证的研究，但是成果有限。茫然之余，诺斯把注意力投向人的信念，人对历史与现实的认知，投向文化，

投向意识形态，最终走向了“信仰转变为制度，制度转变为经济的演进方式”这一“文化决定论”式的结论。

尽管这些努力并非完全无效，甚至也颇有启发，但是终其一生，诺斯并未能在制度变迁问题上取得一个清晰的图景。究其根本，是因为诺斯的核心工作仍然基于以“个体效用最大化”为核心的新古典经济学范式，不管是统治者的租金垄断最大化，又或者是利益团体与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都是新古典经济学基本假设的表现。人的行为是其行为逻辑与生存环境互动的结果，人心四海如一，单单依靠个体效用最大化的逻辑本身，无法解释差异性的人类行为。尽管诺斯在他的后期思想中，把注意力投向了信念，认知，文化，意识形态等等，初步摆脱了理性人假设，但是这仍然是把过多的注意力投向了个体的人自身，而未能充分地重视和理解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更不用说充分地重视和理解人与环境之间的互动。由此，英国荷兰与法国西班牙等国的道路差异，对于诺斯而言，就永远是一团迷雾，漫长的思考，只是从一个困惑走向另一个困惑，from lost to lost。

制度变迁是一个细节非常繁多的主题，这里我们没有余力去深入各个细节，以下的讨论只是尝试指出，如何基于K-R模型去看待诺斯的困惑。它并不试图替代具体的研究工作，而是希望能够给这一主题的研究者以借鉴。

正如前文所述，诺斯注意到了交易费用对调整无效率产权的阻碍，在这里，让我们引用诺斯原文来强调一下，他在《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1990）书中有一段话：

在《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North, 1981）一书中，我放弃了以效率来考量制度的视角。统治者从其自身利益出发来设计产权，而交易费用则使得典型的无效率产权普遍存在。这就可以解释为何古已有之且一直广泛存在着的产权并没有带来经济成长的现象。

诺斯注意到了交易费用的阻碍作用“古已有之”，“广泛存在”，但是他并未意识到，在“古已有之”的各种传统秩序下，人与人的互动模式是可以大不相同的，各种传统秩序下的“无效率”产权并不都是一样的，各种传统秩序下的交易费用（制度费用）是可以大有差异的，进一步的，这种差异是可以引发道路分歧的。

现在，我们从K-R模型的角度来看英国荷兰与西班牙法国等国的道路分歧。这两方的国家力量，利益团体和个人，其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逻辑并没有不同，不同的是双方的生存环境，以及由人与生存环境互动而来的社会秩序。由K-R模型的推断，和Todd图的展示¹⁴，可以有把握的说，英国荷兰的社会秩序，是人与低风险农业互动下产生的K策略倾向的秩序，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

¹⁴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社会秩序，则是人与高风险农业互动下产生的 R 策略倾向的秩序。并且，从 Todd 图上各文明区域的传统家庭结构对比中可知，英国荷兰的传统家庭结构以“Absolute Nuclear Family”为主，处于 K-R 策略连续区间上 K 策略倾向最强的一端。诺斯看待法国和西班牙的失败是“这两个专制君主国家在被卷入的争夺政治统治的斗争中不能创建一套提高经济效率的所有权”，看待荷兰和英国的成功是“创造出了能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从而提高了经济组织的效率”。这些都是正确的观察，但是缺少了对双方社会秩序差异的本质性理解，就很难说明白这一成一败究竟原因何在。K-R 模型指出，K 策略倾向的秩序是建立在较低的交易费用基准上的，而 R 策略倾向的秩序则反之，相应地，处于 K-R 策略连续区间上 K 策略倾向最强一端的英国与荷兰，它们的社会秩序则是建立在最低的交易费用基准上的，法国与西班牙则不是，由此这一成一败并不费解。科斯定理的一种表达告诉我们，无论产权的初始配置如何，只要交易费用为零，那么产权配置就可以由无效率配置调整到有效率配置。英国与荷兰有着 K 策略倾向最为强烈的社会秩序，也就意味着这里的交易费用是最低的，即使这交易费用不为零，也意味着克服它来对无效率产权做出调整要越过的门槛最低。从英国的历史来看，原本附着在土地上一层层不可交易的封建义务，在普通法体系下通过“拟制”而相对和平地解决了其交易问题，最终达成了资本主义式的“有效率的土地所有权”，这一过程和结局是 K 策略倾向秩序下交易费用较低的成果。而法国西班牙等国的 R 策略倾向社会秩序则意味着这里的交易费用是居高不下的，对产权的调整意味着剧烈的搏斗，而背离其风险环境的“有效率的”产权制度也不能凭空而立。法国在暴力流血的大革命中最终摆脱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确立的却不是“有效率的”资本主义式的土地所有权，而是小农对土地的绝对所有权，这一过程和结局是 R 策略倾向社会秩序下交易费用高企的后果。

作为总结，这里要强调指出的是，诺斯对制度变迁的早期解释中，所谓“（统治者）创造和实施有效率的所有权”，“（统治者）创造降低交易费用的制度”等说法，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有误导性的。无论有效率还是无效率的所有权，又或者减少还是增加交易费用的制度，都是一定交易费用基准上的秩序演化之产物，都不是社会成员中的任何一方能够单纯凭借愿望和蛮力来“创造和实施”的，它们只能是特定风险秩序下多方博弈与妥协的产物。而诺斯在对制度变迁的后期解释中，对所谓“信念”，以及表现这种“信念”的所谓“文化传统”的强调，则可以视作一种遁词，把无可解释的矛盾丢进了一个未知的理论黑洞中去。正如 K-R 模型所指出的，文化制度的所谓传统，所谓路径依赖，都不是偶然的虚空的产物，而是根源于人类生存环境的风险特征的相对稳固性。只有建立在这一新的认识基础上的深入研究，才能揭示出更为清晰的制度变迁图景。

第三节：杨小凯：交易条件和后发劣势

我个人感觉，如果以化学的发展来比喻，整个经济学的现状应该相当于过去炼金术的阶段。经济学离现实还很远，离真正能解释现实还很远。

《重申经济学的古典思想---经济消息报记者访杨小凯》

本文以杨小凯与其合作者的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为基础，讨论杨小凯对于交易条件的解释¹⁵，由此重新解释世界各国经济增长的次第，并修正“后发劣势”这一概念的含义。

首先我们引用《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一书对这一增长理论的描述。

这种分工内生演进的模型由杨小凯和博兰最先发展，称为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这种增长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更高的解释力。

这种模型下的分工演进过程是这样的：在初始阶段，人们对各种生产活动都没有经验，所以生产率很低，因此他们付不起交易费用，只好选择自给自足。在自给自足生产中，每个人慢慢在每种活动中积累了一些经验，生产率就慢慢改进，使得他能负担得起一点交易费用，于是选择较高的专业化水平。通过市场自由择业和自由价格机制，这些自利决策的交互作用使得整个社会的分工水平提高，市场也就因此出现。由于升高的专业化水平反过来加速了经验积累和技能改进（或人们常说的专业人力资本的增加），使生产率进一步上升。此时每个人在权衡专业化将来的报酬和当前增加的交易费用后，认为可以付更多交易费用，因此反过来又会进一步增加专业化水平。这样，良性循环过程（或人们所说的正反馈过程）就会出现。这个过程使分工演进越来越快，产生所谓经济起飞现象（即人均真实收入加速增长或增长率上升）。

当分工演进的潜力因人口规模或与制度有关的交易条件的限制而耗尽时，分工演进减缓或停止，学习过程不再被分工演进所加速，所以社会进入减速经济增长阶段（所谓成熟增长阶段），人均真实收入增长率下降。这里有两点特别值得注意。第一，选择专业化的决策，实际上是选择商业化和买多卖多或者买少卖少的决策。例如，50 岁以上的中国人都有这种经验，20 世纪 50 年代，大多数城里人买布自己做衣或请裁缝做衣；到 70 年代，大多数城里人都是买成衣，而很少再买布做衣。50

¹⁵ 关于新兴古典内生增长理论，请参考杨小凯《发展经济学》的中文版第 13 章，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

年代，中国乡下还有很多农户自己纺纱织布做衣；到 60 年代，乡下人越来越多地买布做衣，而到七八十年代乡下人也开始买成衣了。这个过程就是人们专业化水平越来越高的过程。

第二点要注意的是随着分工演进出现的三种经济增长模式。在自给自足或低分工水平时，边干边学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在分工水平不高时只能产生减速增长，因为在固定活动中，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总是有限的。当分工开始演进得越来越快时，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与分工加速经济积累的效果二者交互加强，所以产生了经济起飞现象。当分工演进的潜力耗尽后，经济增长只能有一个熟能生巧的动态效果，没有分工演进交互作用的累积效果，而熟能生巧的潜力在固定专业化水平下总是有限的，所以产生了高分工水平但无分工演进时的减速经济增长。（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第 10 章，分工的自发演进和社会组织实验）

“这种增长模型比传统增长模型和罗默的新增长理论有高得多的解释力”，杨小凯没有夸大其词，“斯密-杨格式模型”称得上是迄今为止最好的经济增长模型。下面我们就在这“斯密-杨格式模型”的基础上，结合 K-R 模型视角来讨论经济增长相关的问题。

斯密-杨格式模型下的经济增长，和交易费用，交易条件这样一些概念息息相关。我们引用杨小凯的关于这一模型的部分表述如下¹⁶：

如果交易条件参数 k 和专业经济的程度 α 足够小，动态均衡从 $t=0$ 开始永远是自给自足。（《发展经济学》第 13 章，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定理 13.1）

如果 k 和 α 不是太大也不是太小，分工会从低水平一直演进，直到完全分工。对于这样的 k 和 α 的中间值，交易条件越好，分工的演进就越快。（《发展经济学》第 13 章，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定理 13.1）

斯密-杨格式模型的经验含义之一是趋异和趋同现象的共存。斯密-杨格式模型意味着增长的三个阶段会按顺序发生：工业化以前的增长，加速增长和起飞，以及成熟的增长。增长率最开始下降，然后上升，最后又下降。这与罗斯托（Rostow, 1960）对经济增长的三个历史阶段的描写相符合。当交易条件参数 k 增加时，人均真实收入的增长率增加，当然 k 的变化对于加速增长和对分工的内生演进并非必需。这个均衡的动态比较特性可以用于解释不同国家增长率的不同，因为国家之间不同的关税体系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相关产权

¹⁶ 完整的模型表述请参考杨小凯的《发展经济学》第 13 章

体系，以及不同的地理条件都意味着国家之间的 k 值不同。因此，那些 k 值很大的国家会早一些进入起飞阶段。（《发展经济学》第 13 章，分工的内生演进产生的经济发展）

历史地看，在任何一个社会的起点上，它的专业经济程度都是很低的（ α 足够小），如果它的交易条件又很差（ k 足够小），那么它将永远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前现代经济状态下。如果它足够幸运，交易条件参数 k 和专业经济程度 α 都能够达到不太小的数值，从而进入分工演进的经济加速增长和起飞历程，那么交易条件参数 k 的大小，也对于经济起飞的早晚和经济增长的速度至关重要。而这个交易条件参数 k ，则取决于这样一些因素：“不同的关税体系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相关的产权体系，以及不同的地理条件”。

让我们从 K-R 模型的角度来探讨一下交易条件参数 k 的取值。杨小凯表述的影响交易条件参数 k 的因素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不同的关税体系和开放程度，不同的制度安排，不同的法律体系和相关的产权体系”这样一些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将这些因素归类为抽象的“制度安排”，也就是“*Institution*”的种种具体表象，另一类是“不同的地理条件”，其重要作用即是对交通运输成本的影响。

首先，K-R 模型指出的是，所有的抽象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作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载体，广义上的合约，根据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这一原理，都是以农业风险作为其基准的。也就是说，影响某个国家的交易条件参数 k 取值的第一类因素，都以该国生存环境下特定的农业风险为基准¹⁷。

进一步的，一国的交通运输成本，在不可更改的地理因素之外，也受到该国科技水平的影响。而科技知识的进步，本身又是社会分工演进的一部分¹⁸。因此，影响一国交易条件参数 k 取值的第二类因素，也间接地以该国的农业风险水平为基准。

由前面的讨论，我们推演出以下结论：决定一国经济发展道路的交易条件参数 k ，其取值影响因素都直接或间接地以该国的农业风险为基准。风险规避决定合约安排的选择，低水平的农业风险成就了低交易费用的制度，达成较好的交易条件，高水平的农业风险则反之。因此，不

¹⁷ 关税体系和开放程度还会涉及到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而一国的地缘因素依赖于它国的地理因素，因而这一基准的影响力在间接上仍然是成立的。

¹⁸ 参考本卷附论第四节《驳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同国家的不同农业风险水平，就成为该国经济能否摆脱自给自足，以及起飞早晚与增长速度的基准因素¹⁹。

杨小凯建立的新兴古典经济学开创了经济学理论的新阶段，一直以来都受到了高度评价，但是“交易条件参数”作为该理论最重要的基础概念，也因为缺少“现实性”而令人迷惑，并因此引起了某些理论上的混乱，例如著名的“后发劣势”之辨。而 K-R 模型描述了基于农业风险的社会秩序演变，为“交易条件参数”这一概念的现实化提供了借鉴，也为此类理论混乱带来新视角。接下来我们就在 K-R 模型的视角下来探讨一下“后发劣势”。

杨小凯在 2002 年的一次讲演中，引用了来自美国经济学家沃森的概念，“后发劣势”，我们引用杨小凯的表述如下：

他（沃森）提出的英文名称叫“Curse To The Late Comer”。就是“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发展比较迟，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模仿发达国家。模仿有两种形式，一种是模仿制度，另一种是模仿技术和工业化的模式。由于是后发国家，所以可以在没有基础制度的情况下通过技术模仿实现快速发展（所谓后发优势）。为什么说“诅咒”呢？就是说落后国家由于模仿的空间很大，所以可以在没有好的制度的条件下，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模式的模仿，取得发达国家必须在一定的制度下才能取得的成就。特别是落后国家模仿技术比较容易，模仿制度比较困难，因为要改革制度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因此落后国家会倾向于技术模仿。但是，落后国家虽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长期发展可能失败。

围绕杨小凯这一论述，在当时和后来都引起来众多的评论和争议。“后发劣势”本身不能说是一个错误的观察，但是迄今为止的各种评论和争议，还未能穿透问题的本质。在 K-R 模型的视角下，所谓“后发劣势”，归根结底是一个“地理困境”，后发国家之所以“后发”，就是因为较高的农业风险水平与较差的交通运输状况所带来的不利的“交易条件参数”。尤其是某些国家较高的农业风险该如何解决，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仍然是一个根深蒂固的难题。一个后发国家克服不利的地理因素，达成经济起飞，获得良好的经济增长，它所要跨过的技术与投入门槛，比起先进国家要高很多，结果就是，一方面，即使跨过了这个门槛，对农业风险的

¹⁹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历史上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增长速度和起飞早晚，都可以与各国不同的传统家庭结构建立对应关系，而根据 K-R 模型，不同的传统家庭结构正是不同的农业风险水平的表象。

克服也往往是不彻底的，不稳固的，另一方面，在可见的未来，仍然要持续地为克服农业风险，改善交通运输而支付巨大的代价。正是因为这双重的困境，“后发劣势”将会是这些国家的一个长久的考验。一些后发国家的经济发展出现反复，也就是落入所谓的“中等收入陷阱”，其根源就在于此。这并不是“制度模仿比较困难”这样一个表面化的论断，因为制度是以农业风险为基准的，在其根本上是不可能“模仿”而只能“自生”的。要彻底摆脱“后发劣势”，也许要等到下一次农业革命，人类有办法摆脱自然农业之后才能实现²⁰。

最后要说的是，K-R 模型对于交易条件的现实性解释只是一个开端。K-R 模型与斯密-杨格式模型增长模型的结合，有机会成长为最完整也最现实的经济史解释，期望未来的研究者们能够跟进这两种模型的互相借鉴，深化杨小凯所开创的工作，使我们能够进一步理解经济增长的方方面面。

²⁰ 这一农业革命大概率需要一次能源革命为先导。

第四章：农业风险的社会分析

对于马克思的伟大原则，文化唯物主义持如下说法：客位行为的生产方式和再生产方式，盖然地决定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客位行为的家庭经济和政治经济又盖然地决定行为和思想的主位上层建筑。为简洁起见，可以把这一原则称为基础结构决定论的原则。

马文·哈里斯：《文化唯物主义》第三章，文化唯物主义的理論原則

第一节：父权，女权与战争形式

每种生活方式都被难计其数的神话和传奇所遮掩，而这种表象往往会使人误入歧途，把目光转向荒谬绝伦，超越自然的境地中，这种虚假的外衣给予人们一定的社会地位和使命感，但同时，它们又将社会生活真实的一面隐藏了起来。

马文·哈里斯：《母牛·猪·妖巫－人类文化之谜》

罗马法律学中，有着任何一套人类制度中最长久著名的历史。它所经历的一切变化的性质，已经在大体上得到很好的肯定。从它的开始到它的结束，它是逐步地改变的更好，或向着修改者所认为更好的方向发展，而且改进是在各个时期中不断地进行着的，在这些时期中，所有其余的人类的思想和行动，在实质上都已经放慢了脚步，并且不止一次地陷于完全停滞不前的状态。

亨利·梅因：《古代法》第二章，法律拟制

K-R 两种策略倾向的区分，在有文字典章的文明国家历史中，更容易分辨一些。而那些生活在前文明国家时代的原始部族中，是否也同样存在着这种策略倾向的分别呢？

在马文·哈里斯的《文化的起源》一书中，有一些原始农业部族的材料，为我们的分析提供了基础。下面我们首先从这本书里面摘录一些片段：

我的观点是，所有这些男女不平等的习俗实际上是战争和男子垄断兵器造成的副产品，战争使得社会组织以父亲，兄弟，儿子为其核心。这就导致了父亲-兄弟利益集团对资源财富的控制以及这些集团之间交换姐妹和女儿的行为（即父系社会，随父共居制度和新娘身价），导致了把妇女作为男子勇敢的报酬的分配制度以及由此引起的一夫多妻制度。出于必须牺牲妇女以酬答男子的需要，也出于给大男子主义的全部心理意识提供一种超自然正名的需要，社会自然形成了一种局面，让妇女干贱活，让她们在仪典中处于卑微屈辱的地位。

.....

事实上，母系继承制度与尚武好战精神的结合绝非偶然形成的，因为这种状况是普遍存在的。我们若是还没有确信战争导致了父系继承-随父共居的心理状态，那么就会合乎逻辑地断定，战争也导致了母系继承-随母共居的心理状态。对于这一左右为难的问题，唯一的解释自然是：世上存在着不同类型的战争。母系氏族所进行的战争往往和亚诺玛莫人

那样的父系氏族所进行的战争有所不同。威廉·迪尔瓦第一个指出，母系氏族专门打“对外战争”，这就是说，组织起人数众多的袭击队伍，深入到远方敌人的地域，这些敌人从语言到人种都和进攻者不同。而雅诺玛莫人这类父系氏族部落则正相反，他们的战争是所谓“内部战争”，因为在这种战争中，只有小股的袭击者进攻邻村的敌人，这些敌人和进攻者语言相同，甚至可能是同宗同祖，三代之内的血亲-因此这种战争被称之为“内部战争”。

母系继承制度和外部战争的内在逻辑关系如下：男子婚后加入了随母共居式的易洛魁人氏族集体，他们来自不同的家庭和村庄。他们居住地点的变化使之不得只根据其父亲，兄弟，儿子的利益来考虑自身的利害；与此同时，这种状况使他们经常接触邻村的男子。这促成了邻村之间的和平安宁，并为这些人联合组成大型战争集团以攻击数百英里以外的敌人奠定了基础。比如由 500 名以上的战士组成易洛魁人军队从纽约出发攻击伊利诺斯那样远的目标。迪瓦尔还认为，当父系氏族受到母系氏族这种有组织集团的攻击时，它必须很快以同样的方式组织起来，否则就会被消灭；这样，适用于前述逻辑的实例就更多了。

.....

母系继承制对易洛魁人的缓解作用在政治领域比在婚姻家庭领域中显得更强，更异乎寻常。就我所知，在所有能获得可靠资料的村落文化之中，没有一种文化像易洛魁人文化那样接近于政治母权制。然而，易洛魁妇女政治决策人的地位并没有在男女之间建立起平等关系。易洛魁人的主妇有权选出和罢免被选进最高统治机构-议事会的男性长者。她们通过议事会中的一位男性代表可以影响决策，对决定战争和结盟的行动施加压力。公职的任命要通过妇女，妇女的职责就是任命参加议事会的成员。但妇女本人不能参加议事会，在职的男性对主妇的任命有否决权。朱迪恩·布朗在考察了易洛魁人的性别等级制度后得出结论说：“这个民族并不像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是母权社会。”但她又加了一句：“主妇们是灰衣主教。”这句话没说到理上。妇女一向在幕后比在前台显得更有影响力。真正让人不解的地方是她们很少走上前台的事实，我想，只有根据战争行为才能解释这一事实。（马文·哈里斯《文化的起源》第六章，大男子主义与恋母情结的起源）

细心的读者将会注意到，马文·哈里斯在前面解释战争与继承制关系的过程中出现了逻辑困难。让我们总结马文·哈里斯的论述如下：

马文·哈里斯首先认可

1) 战争导致了大男子主义和父系继承，随父居住。

然而

- 2) 好战尚武与母系继承的结合，以易洛魁人为例，也是普遍情况，尽管母系继承的氏族自身并不是普遍情况。

这样一来，2) 就对 1) 提出了挑战。于是更细节的事实被引入进来：

- 3) 如果我们把考察局限于农业部族的话，那么母系氏族，比如易洛魁人，所从事的是“外部战争”，而父系氏族，比如雅诺玛莫人，从事的是“内部战争”。

然后，

- 4) 马文·哈里斯以易洛魁人的母系继承生活方式来解释了“外部战争”。

并且

- 5) 以某个母系氏族的存在所造成的外部战争压力解释其他邻近母系氏族的存在。

最后，

- 6) 以易洛魁人为例，说明了大男子主义在母系氏族中较为淡化，尽管母系并非母权，但是无论是家庭还是政治生活中，这里的女性地位都比较父系氏族为高。

这里隐含了“外部战争”与“母系继承”两者之间的循环因果。当然，读者或许可以容忍这种逻辑困难，毕竟，循环因果问题，在社会理论领域太常见了，读者见怪不怪，以至于这些理论往往可以对自身的逻辑困难视而不见，继续堂而皇之的宣扬自己，比如社会发展理论中所谓的多元决定论。但是所谓循环因果，通常就意味着这一“因”—“果”不是实质性的因果相继，而是同一个过程上的伴生现象，真正的因果关系在两者之外。

回到本文的开头，让我们以 K-R 模型的视角来看待农业部族的战争模式，以及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在这两种具体的文化表现上，母系氏族相比于父系氏族，都更多地体现了较为妥协的社会关系，也就是说，母系氏族比较父系氏族，表现出了较强的 K-策略倾向。父系氏族则反之，表现出了较强的 R-策略倾向。根据 K-R 模型中农业风险决定秩序类型的原理，虽然战争对母系氏族或者父系氏族的形成都产生着影响，但是这两中秩序之间差异的根本原因，并不来自于与战争模式的不同，

而在于各自生存环境下所获得的农业收成的稳定性。马文·哈里斯的举例中，作为母系氏族代表的易洛魁人当年生活在北美，今日的美国纽约州一带，而作为父系氏族代表的雅诺玛莫人生活在帕里马高原，委内瑞拉与巴西边境一带。美国的繁荣和委内瑞拉的动乱，大可视为这种旧日对比的现代痕迹。

部族时代的农业生产信息可能保留的很少，今天可能也很难去复原了。但是我们仍然可以尝试从母系氏族和父系氏族的地理分布来对 K-R 模型的解释做出初步的验证²¹。期望未来的研究者能够跟进这一工作，它将为 K-R 模型提供确证或者提出挑战，丰富我们对早期农业社会的认识与理解。

最后，作为早期文化起源问题的扩展，我们把前述两种继承制度与两种战争方式的对比，放到整个的人类历史中看待，那么欧亚大陆上父权制的演化，近代女权主义的兴起，以及留存至今的内乱与外战的对比，都可以视作父系继承与母系继承这两种氏族文化从古至今的延续与对比。

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告诉我们，历史上，各个文明地区的父权制强弱及其延续是有差异的。罗马史以其严酷的父权制为开端，相比于罗马人，日耳曼人的父权制则是一种“腐败”的较弱形式，英格兰更是缺少宗法制这一父权制伴生物的传统，当来自于欧洲大陆的，起源于宗法制的，禁止同母异父的兄弟相互继承的条款（来自诺曼底习惯，同母异父兄弟不可互相继承，因为在宗法制下这两者并不是亲属）传入的时候，英格兰法官不能恰当的理解其原则，把它解释为一般地禁止半血统继承，并把它推广到了同血统兄弟，也就是同父异母的兄弟。父权制，以及它的伴生物，宗法制，在西方是逐渐消退的，在东方则得到了长久的保存。在共和国到帝国的时代变迁中，罗马的父权制逐渐削弱，女性地位逐渐上升，尽管蛮族加之于罗马的民族征服与法律混合打断了这一趋势，在欧洲范围内造成父权制的抬头和女性地位的下降，但是这一倒退在近代史上再次逆转。而在世界范围内，父权制，以及宗法制，在阿拉伯印度中国等地则有着最广泛的渗透和最缓慢的消退。在另一个极端上，我们从人类学家这里知道，在母系继承制度下的北美印第安人族群里，父权制也最为薄弱。尽管美国作为殖民地文明，与当地印第安文明

²¹ 请参考人类学家 George P. Murdock 和后继者所制作的一份部族文化数据与地图集，<http://eclectic.ss.uci.edu/~drwhite/worldcul/atlas.htm>，这会是一个好的起点。按照 K-R 模型，母系农业氏族的分布区域，应该和 Todd 图上属于“Absolute Nuclear Family”的地理区域相一致。关于 Todd 图，请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没有直接的文化传承关系，标志着女性地位上升的现代女权运动仍然在这里以最大的力量兴起。

相应的，与父权制和女性地位相关联的战争形式，也表现出了相似的分布和延续特征。历史学家已经注意到了东西方的战争形式在自古以来就存在着差异，近代以来长期困扰东方国家的那种为争夺水源和土地而发生的无处不在的微型内战，和早期西欧军队在各殖民地的征服与今日美国海军在各大洋的游弋更是形成了鲜明对比。

总结起来，父权制，女性地位，战争形式这样一些文化制度的特征，其彼此之间的一致性，以及历史时期上的前后一致性，是成立的。但是这个图景中，有一个地方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一般来说，文化制度上的延续性，所谓“传统”，所谓“路径依赖”，直观地被认为与承载这种文化的人类族群前后相续的文化继承相关联。但是，美国作为后起的北美殖民地文明，它和北美印第安人文明，是没有文化上的继承关系的。而两者在父权制，女性地位，战争形式这样的“传统”上仍然能够一致相续，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另类的提示，结合 K-R 模型的原理，我们的结论是非常明确的：

文化制度的所谓传统，所谓路径依赖，作为前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继承关系只是一种表象，其本质则是人类生存环境之风险特征的相对稳固性。

第二节: 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我是统计学家，是“余弦学者”，如果你觉得这个说法有趣的话。

《阿拉伯革命的根源—镜报记者访问伊曼努尔·托德》

Hajnal 线:

匈裔英籍经济学家 John Hajnal 发现，将圣彼得堡和意大利的里雅斯特连接起来，线左边的结婚率和生育率较低，有很多女性晚婚甚至一直单身，而线右边恰恰相反。这就是所谓的 Hajnal 线。

Todd 图:

法国人类学家 Emmanuel Todd 曾经提出过一个惊世骇俗的理论，即国家/地区的意识形态与其历史上的家庭组织结构和婚配策略高度相关。将这一对应关系表现在地图上，就是所谓的 Todd 图。

Todd 区分了以下七种主要的家庭形式:

1. Absolute Nuclear Family (绝对核心家庭): 自由择偶, 强制性外婚, 继承权不特定 (经常以遗嘱的形式), 儿子婚后不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 盎格鲁-萨克逊世界、荷兰、丹麦。代表性意识形态: 基督教, 资本主义, 自由意志型自由主义, 女权主义。
2. Egalitarian Nuclear Family (平权核心家庭): 自由择偶, 强制性外婚, 继承权在兄弟间平等分配, 儿子婚后不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 法国北部, 意大利北部, 西班牙中南部, 葡萄牙中部, 希腊, 罗马尼亚, 波兰, 拉丁美洲, 埃塞俄比亚。代表性意识形态: 基督教 (天主教), “自由、平等、博爱”型自由主义。
3. Authoritarian Family (权威家庭): 父母择偶, 极少堂亲通婚, 继承权不平等, 遗产转移给一个儿子, 儿子婚后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 德国, 奥地利, 瑞典, 挪威, 比利时, 波西米亚, 苏格兰, 爱尔兰, 法国周边地区, 北 (巴斯克) 西班牙, 葡萄牙北部, 日本, 韩国, 犹太人, 吉普赛人。代表性意识形态: 法西斯主义, 各种分裂主义和自治 (反普世主义) 运动。
4. Exogamous Community Family (外婚大家庭): 父母择偶, 无堂亲通婚, 继承权在兄弟间平等分配, 儿子婚后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 俄罗斯, 南斯拉夫, 斯洛伐克, 保加利亚, 匈牙利, 芬兰, 阿

尔巴尼亚，意大利中部，中国，越南，古巴和北印度。代表性意识形态：共产主义，社会主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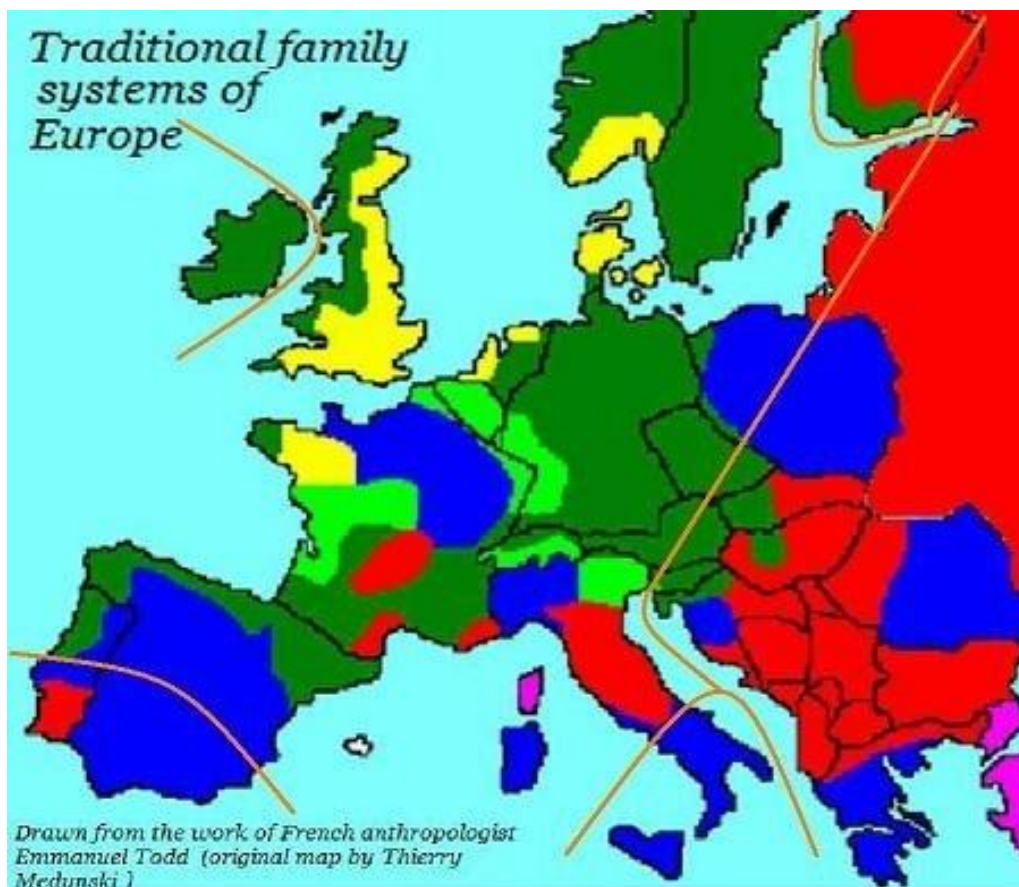
5. Endogamous Community Family（堂亲婚大家庭）：习俗性的频繁堂亲通婚，继承权在兄弟间平等分配，儿子婚后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阿拉伯世界，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代表性意识形态：伊斯兰教。
6. Asymmetrical Community Family（表亲婚大家庭）：禁止堂亲通婚，但倾向于表亲通婚，继承权在兄弟间平等分配，儿子婚后与父母同住。代表国家/区域/文化：印度南部。
7. Anomic Family（无规范型家庭）：自由择偶，强制性外婚，表亲通婚可行甚至频繁，继承权不确定，儿子婚后理论上不与父母同住但实际同住。代表性意识形态：佛教，基督教，共产主义，不确定。

顺着 Todd 的思路，有很多有趣的观点可以探讨，例如，Nuclear Family（“核心”核心家庭，父母加孩子）与工业革命、现代资本主义的关系，堂亲通婚与当代穆斯林世界的关系，盎格鲁撒克逊式资本主义与莱茵模式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分野等等²²。

欧洲范围内的 Emmanuel Todd 的家庭系统地图，可以在下面这个链接里找到：<https://weibo.com/1401081271/I059c6Ynu>，图中的线即是所谓的 Hajnal 线。还有世界范围内的 Emmanuel Todd 的家庭系统地图，可以在下面这个链接里找到：<https://weibo.com/1401081271/I058ZouOT>。

我们也把前述欧洲和世界范围内的这两张 Todd 图依次展示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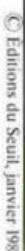
²² 以上关于 John Hajnal 和 Emmanuel Todd 理论的简述，引用自 @innesfry 的微博，可以在以下两个链接中找到：
<https://weibo.com/1821945517/EB6FfFryH>，
<https://weibo.com/1821945517/EB7hbdHL>，Todd 的理论可在他的两部书《The explanation of ideology: Family structures and social systems》和《The Causes of Progress: Culture, Authority, and Change》当中找到，但是这些书还没有中译本。



- Absolute nuclear family ['Unstable']
- Egalitarian nuclear family ['Unstable']
- Authoritarian family ['Stem']
- Community family (exogamous) ['Patriarchal']

- Authoritarian family (incomplete) ['Stem']
- Community family (endogamous) ['Patriarchal']

- Adult children don't live with parents, no strict equal-inheritance custom.
- Adult children don't live with parents, strict equal-inheritance is customary.
- One adult child (and his family) lives with parents, others move out; no strict equal-inheritance custom.
- All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live with parents, strict equal-inheritance is customary.
- Mix of ● and ●
- All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families) live with parents, strict equal-inheritance is customary, cousin-marriage is prevalent.



从 K-R 模型的视角，我们对 Hajnal 线和 Todd 图当中体现出来的传统家庭结构与经济社会制度的对应关系做出以下评注²³：

资本主义起源地英国，以及资本主义发达的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荷兰，丹麦，都有着大片的黄色区域。这个状况符合 K-R 模型对资本主义的看法，因为继承权不特定，儿子婚后不与父母同住，意味直系家族成员的生活很少互相依赖，说明这一区域的风险水平比其他区域低。风险水平最低，就意味着最低的交易费应基准，最好的交易条件，所以这些区域成为资本主义起源地，也就是经济增长最快起飞最早的地方，并且长期来看经济绩效也是最好的。

莱茵兰模式的资本主义区域（也包括了日本），以大片的绿色为主。虽然曾经有过爆发，但是长期经济绩效并没有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世界，这种状况和 K-R 模型对这个区域的风险看法相符合，继承权不平等意味着风险水平比均分继承制区域低，但是遗产交给一个儿子并且儿子婚后与父母同住，说明这里的风险水平又比盎格鲁撒克逊区域为高。历史上，这里是继盎格鲁萨克逊之后经济起飞的地区，但是这里的长期经济绩效要胜过盎格鲁撒克逊世界并不是一件容易事。

法国看起来是各种风险策略混杂的区域，从黄到粉，变化多端，虽然有西北部的低风险水平的地区，使得它的资本主义经济起源较早，但是总风险水平被其他地区拖累，可能比莱茵兰模式的资本主义区域还要高，长期经济绩效可能比莱茵兰模式还要低。梅因在《古代法》一书中提到，法国在许多地方上有着各自不同的习惯法，这一与众不同的状况为罗马法的推行既带来了很大的困难，也带来了很大刺激，这种局面和地方上风险水平变化多端是一致的，可能也是法国象中国一样集权官僚制相对发达的原因。

另外，德国全境都是绿色，但是据约翰希克斯的《经济史理论》说，德国的农业制度，在易北河两岸是不同的。易北河东岸的制度，更接近东欧，是更高风险水平的标志，但这条易北河分界线没有体现在 Todd 的图上。其中的原因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这将会是一个重要的追问。

²³ 对地图上的色彩描述，以欧洲范围内的 Todd 家庭系统图的色彩标注为参考，分别是：绝对核心家庭=黄色，平权核心家庭=蓝色，权威家庭=绿色，外婚大家庭=红色，堂亲婚大家庭=粉色，欧洲范围的 Todd 图上也标注了一些浅绿色区域，这里的家庭结构是平权核心家庭和权威家庭这两种家庭结构的过渡型。表亲婚大家庭，无规范型家庭，非洲型家庭这三种家庭结构分别存在于印度南部，东南亚和美洲丛林，以及撒哈拉以南非洲，可以在世界范围内的 Todd 图中找到，但没有出现在欧洲范围的 Todd 图中。

沿地中海北岸，以蓝绿为主，但是也出现了法国南部和意大利中部的大面积红色区域，甚至还有科西嘉岛这一小块粉色区域，相比于蓝绿为主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传统“日耳曼”地区，地中海沿岸高风险标志明显，加上 Hajnal 线，这和马克思对日耳曼，古典古代，亚细亚三种“资本主义以前的生产方式”的划分，隐约有暗合之处。意大利中部的红色，初看起来有些刺眼，毕竟这里是古代罗马兴起的地方，是西方世界的源头，但是联想到古罗马一再出现的由债务奴隶问题导致的社会斗争，以及罗马公民作为“农民与战士”那种对外征服的热情，也还是一种合理的情形。

又，阿拉伯地区的习俗性堂亲内婚制，与印度南部地区的习俗性表亲内婚制，两者都更加强调血缘纽带，看起来都是强烈的高风险策略，但是，两者是不同类型的风险策略吗？如果是，那么两者又对应于什么样的风险差异呢？表亲内婚制相比于堂亲内婚制，是否标志着更高的风险呢？这也是有待于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最后，通行于东南亚丛林和岛屿的“无规范”（anomic）型家庭制度，以及通行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特殊的“非洲系”家庭制度，与较低水平的农业发展程度有着怎样的关联，也需要进一步的研究。

总结起来，所谓的“惊世骇俗”，只是由于现有的各种社会理论对于 Hajnal 线和 Todd 图当中的信息无从解释。从 K-R 模型的角度来考查 Hajnal 线和 Todd 图，国家或地区的意识形态与其历史上的家庭结构和婚配策略出现对应关系，就不再是什么“惊世骇俗”，反而合情合理。意识形态与家庭结构，婚配策略，都是对于农业风险的适应性建构，黄绿蓝红粉，就构成从 K 至 R 农业风险依次升高的策略连续区间，这一次第，也是历史上经济增长与工业化起飞的次第，直至今日，处在这一连续区间上高风险一侧的区域，比如印度，阿拉伯地区，东南亚丛林岛屿国家，撒哈拉以南非洲等地，还没有充分工业化。测算黄绿蓝红粉各种区域所对应的农业风险水平，结合杨小凯提出的斯密-杨格式经济增长模型，对照各区域的经济发展历程，将会对 K-R 模型提出确证或挑战，这是非常有价值的计量实证，有待于未来的研究者们深入²⁴。

²⁴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下设的空间经济研究中心

<http://www.spatialeconomics.ac.uk/SERC/about/default.asp> 发表于 2008 年的一篇论文“Family Types and the Persistence of Regional Disparities in Europe”

<https://ideas.repec.org/p/cep/sercdp/0009.html>，基于 Todd 图，对于欧洲各国传统家庭结构与持久性地区间差异进行了详细研究，在这篇论文的基础上再进一步，对农业风险进行计量，就可以构成对 K-R 模型的一个实证研究。对于进一步的研究，以下两篇来自乌特勒支大学全球经济史中心的论文也会有所帮助：1) “Testing Todd and Matching Murdock: Global Data on Historical Family Characteristics” <https://ideas.repec.org/p/ucg/wpaper/0072.html> 2)

终章：纲举目张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中这样极有洞察力地写道：“虽然我完全相信此书观点的真理性……，但是对于观点与我完全相反的博物学家，我并没有期望能使他们信服，它们的心目中已充满他们的观点去观察到的事实……但是我有信心面对未来，面对那些年轻的、正在成长的博物学家，他们将能毫无偏见地去看这个问题上的两种观点。”

托马斯·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

“Towards an ethnographic understanding of the European Marriage Pattern:
Global correlates and links with female status”

<https://ideas.repec.org/p/ucg/wpaper/0067.html>)

第一节：K-R 模型与其亲缘理论的异同

《人类简史》这本书的历史学水准，可能并未得到普遍的承认，而其中的历史思想，却为某些历史学家所赞同。它认为历史是不可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并且也是不可预测的，学习和研究历史，是为了“理解我们现在所处的情况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如果我们能够放宽学科视野，那么作为一切社会系统之起源与演变的整体，历史固然是不可试验，实验，不能反复发生，并且某种意义上也确是不可预测的，但是这些并不意味着历史就是无规律的，我们现在的处境中就不包含着自然的，或者说必然的性质²⁵。而 K-R 模型所关注的社会形态的起源与演变，就是指向这种规律性，指向这种必然性的基本理论研究。

社会形态的起源和演变，是社会学科各门类共通的基本理论问题。在不同的学科门类中，它可以有着不同的表现主题，在诺斯那里是西方的兴起，在巴林顿·摩尔那里是现代化道路，在亨利·梅因那里是从身份到契约，在罗伯特·布伦纳那里是农业资本主义，在艾伦·麦克法兰那里是英格兰的个人主义起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现代社会科学的各门类，大都借鉴和移植了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和体系，但是相对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仍然是处于比较早期的发展阶段，正因为这种阶段上的不匹配，这种借鉴和移植的效果不完全是正面的。一方面，“分科而学”，“术业有专攻”，细化了我们对于社会的认识，另一方面，这些学科之间的壁垒，以及学科之内的“专攻”，也对基本理论问题的研究带来了妨碍。因为社会系统的整体性，也因为历史记录的面片面，扭曲，残缺，也就是某种意义上的不可靠，这种学科内外的“专业化”，将使关于这一共通的基本理论问题的思考陷入到“过拟合”的困境当中去²⁶，这也就是迄今为止，各学科门类在这一共通的基本的理论问题上进展有限的根本原因。由此，融会贯通各学科的知识 and 理论，以避免这种“过拟合”陷阱，就成为必然的要求。

要以各学科门类的融会贯通来避开这种“过拟合”的陷阱，K-R 模型就不只是要跨过学科边界去考量广泛的知识素材，更要跨过学科边界去借鉴各种既有理论成果。它要覆盖任一时间地点的历史事实，也要覆盖这一历史事实的任一学科角度，但是它不会依赖于任一历史事实，也不会依赖于任一学科角度。它不会是石头缝里蹦出来的另类事物，但也不会受限于既有的理论成果。事实上，现代社会学科各门类当中，都有着和它关系非常密切而又有所不同的亲缘理论，在众多方面，它们彼此之间都只是一纸之隔。本文就尝试部分地简述 K-R 模型与这些理论之间的异同，作为读者理解与思考的辅助。

²⁵ 关于这种宏观系统的起源与演变的研究，生物学对于地球上的生命演化史的研究，已经给了社会科学极好的示范。人类对于生命演化的干预能力是极其有限的，但是这并没有阻止达尔文以来生物学的巨大进展。

²⁶ 过拟合，计算机学科术语，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对局部材料考量过细，而对全局资料考量不足，因此造成理论的片面性，达不成揭示普遍性规律的目标。

- 一，在人类学领域中，K-R 模型与马文·哈里斯的文化唯物主义有着一致的理论原则。和马文·哈里斯一样，K-R 模型认同唯物主义的文化观念，在重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基础上，进一步地重视人与环境的互动，以及基于这种互动的人口再生产因素。双方的差异，则在于如何理解和运用演化理论去具体地考察人与环境的互动过程。相比于 K-R 模型，马文·哈里斯对于演化论的理解和运用有着明显的目的论倾向，并因此妨碍了他深入理解风险因素对人类行为之影响。
- 二，在历史学领域中，K-R 模型认同罗伯特·布伦纳对对于传统的“商业化模式”资本主义起源论述的批评，认同他对欧洲大陆农民生活方式的描述，认同他关于欧洲大陆为何受困于“马尔萨斯停滞”的分析，认同他对英国所走过的特殊的资本主义起源道路的考察。进一步的，也认同他认为英国特殊的阶级关系在资本主义起源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的观点。K-R 模型与布伦纳观点的差异，就在于 K-R 模型对于资本主义起源的考察，没有止步于英国这种特殊的阶级关系，而是遵循物质决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方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把这种特殊的阶级关系的起源，追溯到了英格兰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以及基于这种特殊环境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从而深化了布伦纳的观点
- 三，在经济学领域中，K-R 模型受到张五常佃农理论的启发。张五常后来把交易费用的概念表述为制度费用，并得到了科斯的认同，K-R 模型认同张五常这一表述的隐含意义，把制度看作是一种广义的合约安排。并且，根据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所表述的“风险规避影响合约安排之选择”，认为由于农业风险经由粮食价格，劳动力价格，社会产品价格这样一个链条的传递，最终整体性地塑造了社会制度。在这一点上，K-R 模型对张五常的表述做出了推广，为自然环境对社会制度的影响做出了一种经济学形式的表达。
- 四，在社会学领域中，K-R 模型与巴林顿·摩尔的现代化道路研究是一致的。巴林顿·摩尔的研究认为，世界各地不同的农业商品化进程，是影响该地现代化道路的关键因素。K-R 模型确定了农业风险对人类经济活动的作用方式，也就确定了农业风险与农业商品化之间的关联，从而把农业商品化进程，表述为农业风险的因变量，并且，把农业风险的影响力进一步地延伸到了现代化道路之外的，普遍的社会秩序演化，对巴林顿·摩尔的理论作出了扩展。

经过几百年来持续发展，社会学科各门类的累积已经浩如烟海。虽然本书的共同作者们分别来自法学，史学，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等不同的学科背景，但是爬梳 K-R 模型与既有知识与理论的关系，依然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

力，相信未来的研究者还会在 K-R 模型与既有知识与理论之间发现更多的链接，从而有助于融合不同的知识领域，为社会科学构建出更加清晰一致的理论图景。

第二节：土豆对谈录：从秩序演化看普遍历史

参加人：踢星星（星师），卡师，桂老师，Diva，由踢星星记录整理

桂老师：我先讲几句。和星师认识，就是因为他这个粮食论。当然了，那个时候还没有上升到“论”。

卡师：嗯，开始的时候，还只是一些看法啦。

桂老师：是的，而且还不是听他本人讲的。我是看到了微博上的网友，在讲历史与社会的时候，引用了他这个粮食论的核心的观点，来解释社会形态的变迁。他当时还没有讲到社会形态的分类特征，主要还是在讲朝代的更迭这个主题，认为这里真正起作用的，是粮食生产这样的一个要素。

卡师：一种唯物主义的思路。

桂老师：是的，这就是他当时所讲的东西。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嗯，这个观点其实非常有意思啊，于是我就关注了星师的微博。他的微博那时候就真的就像是呓语一样啊，一会儿 R 系，一会儿 K 系的。

踢星星：哈哈，是的，很碎片，很发散。

桂老师：对，所以我起初就只能连蒙带猜。好在他那个核心部分的逻辑，我实际上是能够 touch 到的。是粮食生产这样的核心要素，在最终决定着社会形态及其变迁，就是一个社会形态为何产生，从上一个形态的崩裂，再到下一个形态的诞生，这样一个历程是什么缘故。但是当时所能看到的表达，好多真的是像呓语一样。R 系社会，R 系生物，K 系社会，K 系生物，然后中间时不时还会把另外一些人拉出来给批评一顿。

踢星星：对，穿插几段批判，调剂一下。

桂老师：那个时候批评别人，主要还是在谈阿姨（刘仲敬），姨学谈的多。对吧。

踢星星：是的，当时刘阿姨很火，很令人惊奇。

桂老师：星师老是说自己是刘阿姨黑粉。黑粉呢，其实是网上很通行的一个词，就是我又粉你，但是我又不同意你的观点。

DIVA：这很正常啊。

桂老师：对啊，但是这个事后来被钱博士批判，钱博士说你要黑就黑，要粉就粉，哪有什么黑粉这种没逻辑的事，嗯，这是插曲了，我们还是回到正题。当时我就经常向星师提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那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概念

代表什么，那个概念代表什么。星师也很高兴，他终于有了第一个粉，哈哈，随着我跟星师交流得多了，我提的问题也越来越深入，后来星师就约着我在线下见面了。

踢星星：我很激动啊，终于有人来问我了，我也有粉了嘛。于是我就兴高采烈地带着一箱李大大的橙子做礼物，去见桂老师了。

卡师：他碰瓷成功，应该这样说。他就老在人家的门口碰瓷，最后你就发现了他。

桂老师：对对对，典型的碰瓷。哈哈哈。

卡师：他又碰阿姨，又碰局座（@局外人 C），又碰什么奇奇怪怪的人，这是典型的中式碰瓷学啊。碰瓷也是有套路的嘛，我发现你的碰瓷才能了，也很奇特啊。

踢星星：我就是这么一路碰瓷碰过来的。

DIVA：哈哈哈，原来这样子啊。

踢星星：我来插一句，这个事呢，要特别感谢两个人。第一个是主教，第二个是桂老师。主教爱聊聊学问，有一次我们聊起来德哥的一本《汉晋胡汉佛教论稿》，谈起来佛教向汉地传播的过程与降雨线南北摆动的关联，就讲到了降雨线摆动不只是影响了佛教传播，更是塑造中国文明特征的根本力量。但是那个时候呢，聊起来嗨，聊完就算了，也没有接着再往下去深入。后来我偶然听了刘海影在季风书店推介自己新书《中国巨债》的一个演讲，提到对历史上的中西社会的生育文化差异，也就是 Hajnal 线该如何解释的问题，于是第一次想到要写点什么。不过当时写出来的，太粗糙太雏形了，用桂老师后来的评论，只能叫“读书笔记”。这段时间里，我遇到桂老师，感谢桂老师指导，告诉我如何改进，要写成什么样才称得起是理论。在这个过程中，又从主教那里抄来了科耶夫的历史哲学做底本，用演化论做了修正，做出了适用的逻辑套路。

桂老师：后来星师就跟我讲了很多他在这个理论上的一些系统性的构想。一次次的被我打击，一次次的被我否定，奉劝他“不要走那条路”。

DIVA：就是说，该怎样有实力地吹牛。

桂老师：哈哈，是的。就是怎样把这个牛吹的更完善，更实际一点。星师你原来的问题在哪里呢？当时你在微信群里跟大家聊这个，钱博士和马导，他们总把你往科学方法论上去引。钱博士名门正派，讲究学术规范，讲究套路严谨，马导，他毕竟是研究量子物理的，所以有这么一套经验主义认识论吧，他的这个科学方法论修为还是比较高的。所以那时候你就被引导了，总希望从零开始，来奠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这个路你肯定是走不通的，这也是为什么我

总劝你，多写零散的小文章，容易起步。先写下去，尽可能的阐述你的观点，逐步发展出一个理论体系。如果你想从零开始一个类似于马克思康德那样的体系，那挑战太大，这条路可能你这一辈子走不完。

卡师：写多了零星小文章，是不是也会有问题，比如失去焦点。

桂老师：是的，所以后来我就建议，第一，在内在的逻辑上面，你还是要紧盯自己的问题来写，不能从别人的文本出发。从别人的文本出发，那你只能讨论他的意见。还是要从基本的问题出发，就是不讲原来我说过的那个现象啊，杂多啊，康德那一套德国古典主义的构建方式，而是首先你要提出一个真实的问题。我跟星师聊过，从学理上讲，一个好的问题被提出，比你如何去回答它是要重要的。星师提了一个好问题，那就是粮食生产和社会形态的这种关系，它是个什么情形。这个问题，用星师他自己的话，就是为什么他们英美是那个样子，而我们中国是这个样子。一个很基本，很真实也很好的问题就出现了。那么接下去你要去做的是什么呢？首先，就是描述他们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这是你的理论的根本。

踢星星：是的，比较的根本，就是如何定义你所要比较的对象。因为你定义的方式，就隐含了你比较的指向。

桂老师：然后，你就开始追问，之所以“他们是那个样子，我们是这个样子”，为什么？那么你就要去讲是什么样的东西在产生作用，直接了当地讲，那就是粮食生产在起作用。准确来讲，是粮食产量的波动在起作用。在各种影响人类社会的风险当中，它作为最底层的风险存在，影响了，甚至可以说，决定了其他的那些社会要素。然后我们具体地考察这个最底层的风险存在，归纳它的属性，或者说模式的矩阵，罗列各种情况，比如持续高产，最好的情况，像一些现代西方国家。持续低产，最糟的情况，像早期的印度和南部非洲，它们甚至无法稳定地支撑一个中央政府。

踢星星：对，其他的，比如高产而不稳定，或者不甚高产但稳定，也各自有其特征。

桂老师：粮食产量有大幅波动和小幅波动，长周期波动和短周期波动，由此出现了不同的风险属性，或者说风险水平。不同的风险水平，就带来了不同的社会形态。

卡师：但是，等一下，问题已经出现了。粮食生产这四个字，给人的第一印象是，粮食生产？那不就是袁隆平老先生研究的那个农学之类的东西嘛？种粮食，它怎么就跟社会形态连接起来呢？一眼看上去是连接不起来的。

桂老师：确实，粮食生产与社会形态，很多人是联系不起来的。就包括很多咱们群里参加过讨论的人。他们会认为，粮食，不就是那个吃饭嘛。

踢星星：是的。李大大第一次听我说起，就只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孙律师也是，每次讲起粮论就会笑：“粮食！粮食！”，就是说大家很容易把它理解为吃的粮食本身，而不是粮食生产这样一个社会活动，以及由此展开的一个社会活动的链条。

桂老师：包括我，最初接触这个理论的时候，也是这样的。那时候还没有跟星师去深入交流这个理论的硬核部分，就会觉得，粮食，那谁都知道很重要啊，“无农不稳，无工不富”嘛。

DIVA：为什么不呢？这样想是很正常的啊。

卡师：是啊，民以食为天啦，谁都知道啊。

桂老师：深入交流后，就理解了这个理论它其实是讲粮食产量的波动，fluctuation，这样一个概念。它的重点是波动，Fluctuation，而不是粮食，Food。

DIVA：桂老师这是英语老师的感觉出来了。

桂老师：哈哈，对，哲学家的感觉出来了。

卡师：进一步的，这个问题的关键，还不止于是波动，Fluctuation，而是粮食产量的波动，必须是当成一个自然现象才能讲清楚。如果你从人类的生产能力这个角度来讲，是讲不通的，因为人是控制不了粮食产量的波动的。

桂老师：没错，这更是关键的关键。更进一步的，如果把粮食论再往前再推一步，工业的这个经济周期，人一样的控制不了，抵御不了。

踢星星：这个是我没有想明白的，因为不知道工业周期是怎么来的，似乎也没有现成的理论可以讲明白。

桂老师：现成的理论当中，也确实大家都讲不明白，就是比如这 10 年一个小周期，50 年一个大周期，这样的所谓现代经济。这个扯远了，我们先打住，回到粮食产量，回到卡师的问题。刚才卡师说了，粮食产量实际上是靠天收的。十年大旱，你产个鬼的粮啊，十年大涝，你产个鬼的粮啊。如果这个灾害持续时间再延长，就更是如此了。

卡师：是啊，如果水太少，或者水太多，哪里还有粮啊。但是想一想，建水库算不算一个补救的办法呢？

桂老师：确实，建水库，能够在对抗水旱灾害方面获得一定的弹性。那么这弹性有多大呢？我了解过的，我家在湖北，附近有水库，恰好有一个亲戚是水利局的局长，我就问他这个水库能够抗多大的灾，答案是两年，连续两年没问题，灾害再持续下去，水库的作用就很有限了。卡师提的这个问题，我曾经

Challenge 过星师，就是比如说，在中国历史上经常会出现重大水旱自然灾害，也不是总会导致社会形态发生相应程度和烈度的变化。后来和星师研讨下来，就是这个理论所讲这个粮食产量的衰减周期，它可以很长，起码以十年为周期，甚至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这样数十年的持续，比如明末那种状况。

卡师：也就是说人力能够做到的，也就是应对几年的危机，危机一直持续下去就无能为力了。两年的大旱没事，如果是十年大旱百年大旱，就没戏。

桂老师：对。根本没戏，水库该干照样干。

卡师：那肯定啊，水这种东西本来就很难储存的。

桂老师：正如刚才卡师说的，粮食生产靠天收。那既然是靠天收了，你肯定抵御不了太大太久的灾害。所以当你把粮食生产和环境条件放在一起互相参照的时候，就能理解英美的社会为什么是那个样子了。就因为他们的环境条件是那样一个相对稳定的状况，因此粮食产量也相对稳定，而不是剧烈变化，所以社会形态也就自然而然就是那个样子了。我们这个社会又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们的环境条件决定，粮食产量是在长周期内短周期内都会明显波动的，逐年变化之外，一般认为是还有两三百年的这样一个长周期，有的时候命不好，可能就百多年。

卡师：有两个层面的思考，第一，就是我们的环境条件就是这样了，第二，就是我们这个环境条件下诞生出来的“工具”也就是这样了。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发展水平，和我们这样的自然环境很配合啊。

踢星星：这种环境条件与社会发展的配合，也会出现极端的例子。比如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由于环境条件的局限，加上与欧亚大陆隔绝而难以引入技术资源，它的上升之路被封死了，因而最后只有以大规模的人祀这样一种骇人的应对方式生存下去。

卡师：玛雅人也有水的问题，他的生存环境处在森林地带中，没有大河。地下全是石灰岩构造，水很容易经由地下河流走，对缺水的抵御能力很差。

踢星星：是的。面对大旱造成的缺水，玛雅文明甚至无法生存下去。它最终是因为干旱而崩溃消失的。

桂老师：所以好，前面这段讲了以后，这一部分我就不再细说了，现在再来看社会形态。我们这种社会形态，它的构成，它的这种策略，属于个体的生物性策略，或者属于集体的这种社会性策略，它是用来干嘛的？它是用来适应这个风险水平的。同样一个策略，在不同的风险状态下，它所产生出来的适应能力是不一样的。在这种特定的长周期波动和短周期波动所造成的，属于我们这个社会的风险水平面前，我们这种社会形态的构成与策略的适应性，生存效率，可能相对来讲是最高的。

卡师：所有的社会，都在它自己那个环境条件下，达到了适应性与生存效率的最高度，一定是这样的。

桂老师：一定是磨合到这样一个程度。它适应它所面对的这个风险环境，生存效率是最高的。如果这个风险环境变了，风险更高，或者更低，那么它应对这个变化后的风险环境，它的生存效率反而会降低。

卡师：所以是不能看扁任何一个社会啊。一个社会一定是达到它最有生存效率的状态。印度有印度的社会，非洲有非洲的社会，都是适应的结果。

桂老师：是的。所以我同意星师的一个观点，现在我们的社会形态所达到的，真的已经是我们历史上最好的状态。

卡师：那是因为我们有了古人所不具备的新工具嘛。

桂老师：对，在新工具的帮助下，我们已经是达到了历史最好状态。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可以说，你想让我们达到更高的文明程度，R 系变成 K 系，这个是非常有难度的。现在工具条件好，你可以很蓬勃，但是飞跃式的进化很难。

踢星星：是的，克服环境风险，是有条件要求的。彻底的克服，不光需要更强大的力量，也需要更多的时间。

桂老师：而相比于我们的 K 系，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今年 9 月份我去了一趟加拿大，然后从加拿大过境去了趟美国，在五大湖区看了看。当时就觉得，OMG，人家为什么叫 K 系呢，你把那湖周围的生存环境看一看，你就能全身心的体会到那种生存状态。

DIVA：哈哈，桂老师的心情我们感受到了。

桂老师：对，那么大的淡水湖，那样好的气候条件，那肯定够 K 系嘛。他那种低风险环境之下，OK，他就可以做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事情，他的选择余地很大。

卡师：应该说有这样的环境状况，总会有人做一些不囿于生存的事情，不是他要勉强去做，而是他自然而然就有条件去做。就像香港的土豪一样，他们有钱了，可以开车到中环给大家撒钱，干什么都可以，我们就只有坐下面看他们做，而他们真的有这样做的 option。

桂老师：是啊。我们动不动就是要对抗环境风险，而且适应这种环境风险而形成的社会，它自身也蕴含着因这种适应性而来的秩序风险，困境是多方面的。

卡师：这里我打岔一句。星师你前面跟 Julia 不是谈过“阶段论”，一说到阶段论，这个问题就开始变麻烦了。可是要是只谈类型，不谈阶段，那就变回泛泛而谈了，永远只有你是 K 我是 R，我死定了，永远只有这个样子。

踢星星：是的，K-R 模型作为一种类型论，它是有局限的。K-R 分出了社会类型，那么每一个类型自身，都有一个发展历程。这个发展历程中的不同阶段，我是没有仔细去谈过的。这里面有几个要点。第一个就是说，既然区分了 K 和 R，那么 K 和 R，在我们这个理论的逻辑当中，它有一个有关于演变过程的特点，那就是它会自我巩固。具体来说，就是 K 系社会形态的风险会在演变过程中越降越低，直到收敛到某个极限，而 R 系社会形态的风险会在演变过程中越升越高，直到收敛到某个极限。而这个正反馈式的演变过程中，环境风险与社会形态之间的适应与推进，是会出现若干个阶段的。那举个例子说，比如我们看中国历史，先秦是一种状态，秦汉以后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唐宋以后肯又有新的变化。

卡师：如果我们说全部古代中国历史都是 K，或者都是 R 那就没有话说，对不对？

踢星星：K-R 模型本身没有详细讨论阶段性变化的历程，但是它不否定，乃至肯定了这种历程，因为正反馈式的演变逻辑，本身就蕴涵着阶段性变化的必然。全部古代中国历史，它都是 R 类型，但是 R 作为类型特征，不否定它在阶段上的变化。秦汉之前，诸侯国还是常态，尽管血亲封建的特征比较明显。从秦汉到唐宋，人均耕地还未曾跌落到十亩以下，尽管大一统日渐巩固，某种程度的贵族政治还是存在的。唐宋之后到明清，水田耕作技术发展了，南方日渐开发，单位土地可以投入更多劳动力来获取更多的边际产出，结果是人口规模的上限大幅上升，人均耕地则进一步跌落到了两三亩。贵族政治趋于消亡，官僚政治趋于极端。

卡师：是啊，比如先秦就没有民变这种东西嘛。我们天天谈阿姨，就是因为阿姨讲的那些东西和粮论，好像有关系啊。

踢星星：是的，后一个阶段的动乱相比前一个阶段的动乱，有着更加残酷的特征，并且伴随着更大规模的人口损失。先秦，唐宋以前，唐宋之后到明清，不同阶段有着不同形式的动乱，标着社会压力更加增大，相应地，政治的中央集权性质也在更加强化。这种变化历程，就是源自斯宾格勒的那个词语，“费拉化”，它显示着一个社会风险更加升高的趋势。这样的趋势，本身也是 R 系社会秩序的一种内在性质，K-R 模型对秩序风险的这种正反馈式自我巩固是作出解释的。

桂老师：对。

踢星星：关于这个历程，K-R 模型只能对它的趋势作出解释。而这个历程本身的各种细节，限于能力和精力，我是没有仔细去研究过的。这其中有些疑问，如果你没有新的技术进步，那么 R 系社会秩序的历程，它将发展到哪一步为止？是不是在一定的技术条件下，它发展到了一定程度就不会再变化，而是进入一种停滞状态？又或者它还会持续跌落，陷入某种像阿兹特克那样的骇人境地？比如说我们的技术条件停留在唐宋之前的时代，因为不可能在单位土地上再投入更多劳动力去获得那一点边际产出，那我们是否永远停留在这种人均耕地十亩以上的状况，而不可能进入明清这种社会秩序，又或者，我们会走向另一种未知的，甚至是像阿兹特克那样可怖的社会秩序呢？我倾向于前者，但是并不太能肯定。

卡师：这个问题我说一句。我这样想，K-R 模型，对于某些历史状况是不敏感的。要把对这些状况敏感的地方找出来，那就不是 K-R 这个理论工具可以做到的。需要另外一些东西，另外一种工具，才能行得通。比如唐朝是这个样子，宋朝明朝又变成那个样子，要对这种变化敏感。

踢星星：是的，解释这种变化，需要的工具，不止于 K-R 模型，这里面会引入更多因素。第一个是生产能力。比如说唐宋之前和唐宋之后的异同吧，这期间水田的耕作技术发生了变化，新的稻作技术条件下，在单位土地上投入的劳动力更多了，人均耕地更少了，这是一个很大的变化，也是造成社会变迁的重大因素。

卡师：对啊，因为稻作农业新技术的推广，整个南方都开发了。

踢星星：第二个是动员能力。你的耕作技术，生产方式没有变，但是你的动员能力变化了，社会也会出现大的变化。比如说青铜时代到来，出现了商这样的早期文明，商之前和商之后，它的生产能力有变化吗？应该没有，那时候大家都拿那个木头的石头的工具在田里耕作，变化不大的。但是之前没有典型的文明国家，而之后有了古典型国家的出现，那么这当中最大的因素，就是青铜武器带来的动员能力跃升。

卡师：嗯，国家变化了。而国家为什么会变化，这个就 K-R 模型解释不了。

踢星星：是的。同样是 R 的历程上，动员能力的变化可以引起了阶段性的变化，生产能力的变化也可以引起阶段性的变化。动员能力增强了，就更加能够把风险转移给一部分人，那么维持国家形态的能力就增强了，社会崩溃的门槛就抬高了，所以动员能力的变化，对于“国家”的变化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直接的。生产能力改变了，那么由于它对粮食产出的影响，造成了整个环境风险的变化，对社会秩序的影响又是另外的情形，这种影响可能没有动员能力带来的影响那样直接，但是更为深远。

卡师：那么国家变化的这些因素从何而来，就是个新问题。

踢星星：对，这又是另一个问题。归根结底，新事物来源于人类的发明创造，同时，它又来源于不同文明区域之间的互相影响。你比如说阿兹特克吧，它地处中美洲，跟其他的文明区域是不搭界的，所以它的阶段变化跟别人没有关系，是一个封闭的孤立的历程。直到欧洲人闯入，打破了这种封闭和孤立。在这种封闭和孤立状态下，它的发明创造是很艰难的，技术天花板是很低的。但是欧亚大陆上，各个文明区域从远古时代开始，就是可以互相传播技术的。“别人家”的发明创造经由各种途径被引入进来，引起了自身的变化。我们做个比较，满清倒台后的动乱，与大明倒台后的动乱，有多大区别呢？区别就是说，有了从西方引进的技术，有了机关枪迫击炮，有了铁路电报，动员能力增强了，所以对社会秩序的控制能力也增强了。在大清崩溃后的数十年战乱中，没有像明末清初那样，损失一半人口，而是在远少于明末清初那样的人口损失的情况下，走过了社会变迁的历程。按照《中国土地制度史》那本书的统计，过去的每个时代结束的时候，基本都要损失一半人口。但是最近这一次，人口损失在幅度上要小很多，虽然损失数字也很惊人。

卡师：也还是死很多人啊。

踢星星：是的，数字还是很惊人的。但是相比过去的时代，应该说还是少了很多。这其中就是动员手段的跃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就是维持秩序的能力比以前更强了。从前，比如说太平天国在广西造反了，等地方官明白过来这事有多大，八百里加急飞书北京，各种环节和路途的耽误，北京城才知道消息，可能十数天数十天已经过去了，在此之外，又不能及时了解前线的情况，可能给予广西的军令还没有发送到前线，应该接受军令的地方军队已经垮台了，可能被调集去前线支援的湖南军队还没有集结好，反叛军队已经从广西上来了，已经从最初几万人的叛军，沿途挟裹人民而变成了几十万人的叛军，地方上已经无能予以镇压。但是进入到二十世纪，中央政府知道哪里造反了，调集军队予以镇压，把叛乱扑灭在萌芽状态，那是很快的。

桂老师：嗯，马上就到了，快得很。

踢星星：是的。举个例子说，如果在民国大旱的时候河南叛乱，这个事情一发生，当地的军政力量，即使不能立即予以镇压，以先进的火器和相应的军事训练，也能支持几天以待援助。这个消息，当地军政官员上报给南京的中央政府，可能二十四小时就送达了，打电报求援嘛，那多快啊。镇压的军令，那可能四十八小时之内就下发了，调集的军队可能是沿着陇海线京广线搭火车来的，几天之内，军队就在离叛乱很近地方下了火车，并且还携带着机关枪迫击炮，武力充沛。所以这个叛乱初起，还没有来得及酿成数十万人的大动乱，它就已经被军队包围和镇压了。这个能力，过去是不存在的。而这种能力从哪里来的？依靠的是从西方引进的新技术。所以这种因为技术传播而来的动员能力提升，对于阶段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

桂老师：是的，是这样一种情况。

踢星星：前面说过，影响阶段变化的另外一个情况，就是生产能力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更为重要，因为它的变化，甚至会进一步造成类型的变化。比如说绿色革命，可以说，它带来的是“五千年未有之变局”。在整个的古代历史上，生产能力的变化，从来都不能够撼动社会的 K-R 类型。你是 R 还是 R，你只是能增产而已，增产但你还是不能摆脱风险。比如唐宋之后，水田耕作技术的发展带来南方的开发，明清之际又引入美洲作物，从人口总数，经济总量，开发面积来看，这像是繁荣和发展，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人均土地在减少，生产率在下降，风险在升高。某种意义上，这非但不是繁荣与发展，反而是衰落与倒退。而绿色革命这样的生产能力提升，在种子农药化肥等技术进步的合力推动下，粮食产量增加得足够高，足够快，迅速翻了好几倍，再加上铁路运输汽车运输，电话电报等各种工业时代的手段，各种能力的提升使得农业风险被有效遏制，今天的社会所面临的风险环境，不再是过去那种典型的 R 系形势，风险趋势逆转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也就改变了。

卡师：所以说，不同文明区域诞生的技术手段，漂流到别家的文明上，又有可能有新的东西了，阶段就是这个意思了。

踢星星：是的，不同的文明区域，各自有着自己的风险环境，各自造就了不同的适应方式，表现为不同的生产或动员的技术手段。不同的文明区域互相传播技术，这就又引起了新的变化，生产能力的变化，动员能力的变化，自身都有相当复杂的作用过程，再加上彼此之间的相互影响，问题就变得加倍的复杂了。当我们谈论“阶段”的时候，所有这些因素都会凸显出来，所以这个文明历程的问题，是没有办法简简单单几句话就说清楚的。

卡师：这整个的理论逻辑中，慢慢地会开始有点地理的东西出现。所有各种不同的 R 类型，他所有的特征都是不同的。

踢星星：是的。不同的文明区域，它的特征是适应于它所处的那种风险环境的，我们前面又讨论过农业的“靠天吃饭”，所以文明特征的背后，确实是地理因素在起着巨大的作用。

卡师：我再说一句话。五千年变局，清朝人是刚刚看到一点端倪，但是他们没有感受到。看到和感受到，是不一样的。全部平头百姓都感受到这个大潮了，这个事情已经是大发展，趋于完成了。不是发生中，而是已经变了，变完了，才有这种遍及于每一个人的事情。

桂老师：对。

卡师：我们眼前看到的是新的时代。刘阿姨的问题，就是他老是看古书，他一开口就是张献忠李自成啊。这个问题，当然我没办法说什么了，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桂老师：关于阿姨呢，卡师我觉得你说的有一点是对的，就是他老是张献忠李自成。他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呢，就是说他可能是某种意义上的借题发挥。二个呢，就是从学理上面来讲的话，阿姨认为我们的类型和阶段其实并没有发生变化。

踢星星：他是典型的斯宾格勒那个调调吧，所有文明都是同样一个历程，春夏秋冬。只是早晚快慢而已。

卡师：如果阿姨说自古都一样的，就没有变过的话，那他跟我们当然是不会是同一个立场。但问题是，怎样变，也可以是不同立场。不是说知道有变化了，就大家都一样立场了。变不变，是一个立场，但是怎么变，又是另外一个立场。

踢星星：是的。所以阶段论也是一个新的分歧点啊。怎样的阶段，怎样的历程，也是个大问题。所以，卡师你的三五和粮论，它可能是怎样结合起来的，这还是一个大问题啊。

卡师：三五，我今天可以说一点。我跟星师这几天讲过，我以前只是自己想，没有跟人讨论过这些问题的，所以不知道怎么写一个文章来表达，因为我以前没有跟人谈过。星师你不一样，你跟桂老师谈太多了。桂老师你发掘了他这个碰瓷人以后，你们就有东西研讨出来嘛，对不对。那没有人发掘过我，我自说自话不行。

桂老师：哈哈，你是没有人来碰瓷。

卡师：是啊，我没有这个碰瓷人的经验嘛。我们回到正题上来，阶段这个东西是很麻烦的。星师你一天到晚说阿姨是斯宾格勒调调，那么你有没有想过，阿姨这个调调也是阶段论啊。阶段论也有很多种，关键在于，你怎么说清楚你的阶段究竟是一个什么东西。第一，阶段它的 implication 可以很简单，就是有生有死，有一个过程。这个 implication，就是“决定论”啊，有这个开始，就必定有这个终点，这个 implication 就是一个麻烦，你怎么能用一个决定论的东西，套路到历史分析里面呢？这是不对的。如果你要解决这个问题，你就要重新用那个黑路的想法，历史是黑路，你不能说这个社会就是走在死路上，我现在已经看到以后，你们死定了，这种话不是历史分析啊。如果你要分析，你只能说这个路是黑的，但是这里总会有一条路。第二，总有一条路，你就只能比较这条路，把已经走过的路拿出来比一比。我们当然资料很少，星师你也说过，很多路走过了也还是黑的，也还是昏昏沉沉的，不知道那究竟是什么，但是路总是有走过，拿走过的路来比较，也就只有这样。比如，你说以前有贵

族制，现在我们也有贵族制啊，又比如，赵鼎新说战国时代跟欧洲巴洛克洛可可时代很像，对啊，绝对是很像啊。大家都知道赵鼎新是社会学家，但他是个科学家出身呀，他会随便拿一点东西来比较吗？而且那么认真地写文章去批评许田波，所以这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些“路”可以比。为什么呢？同类的东西才能比较嘛，它们是同类的东西，对不对？

桂老师：是的，在同质的基础上才能比较。

卡师：对，这个讨论就回到“类型”上去，不是不同的类型，而是相同的类型，才有对阶段的分析，分阶段的比较。我们要把同类的东西放在一起比较，这是对的，但问题就回到了什么是同类，什么是异类，或者说，同的是什么类，才能拿来比较。这个问题就麻烦了。

踢星星：我同意。不过，什么是同类，什么是异类，这个区分很难是确定的。我这么说，当你要做比较的时候，你说是同类才可以，这是没错的。但是问题的关键就在于，分类的方法是无穷尽的，你总有办法把它分成一类，这里面是有着某种任意性的。

桂老师：对。比如男人跟女人都是人，你这样分类，那男人女人也就是可以比较的一组对象。

踢星星：是的。像许田波跟赵鼎新他们两位的争论，评论为什么秦汉之前的中国，春秋战国这样一个乱局中的“多国体系”最后能够大一统，而欧洲近代早期，从意大利战争中的威尼斯条约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三百来年的“多国体系”，同样是互相攻伐的一团乱局，最终却没有走向统一。他们认为时空遥远的两者可以比较的依据是什么？从形态上来讲，他们觉得是可以比的，两者都是互相攻伐的多个国家构成的“体系”，中国和欧洲，也是大小相当的地理区域。我们换个角度，不按文明区域来分，而是从粮论来讲，按文明类型来分，划分为 R 系文明和 K 系文明，虽然 R 策略和 K 策略的对比是一个相对概念，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历史地给它们之间划出一道绝对线来。按照现代人的后见之明，英国和欧亚大陆走的不是一条道路，那我们就用英吉利海峡来划线，这条线的两边，是两种文明秩序分别的自我巩固。从英吉利海峡往西去，在英格兰地域上，以定额地租制为基础的 K 策略倾向秩序是自我巩固的，往东去，在欧亚大陆地域上，以分成地租制或村社制为基础的 R 策略倾向秩序也是自我巩固的。这样，我们把英格兰为代表的文明归类为 K 系文明，相对的，整个欧亚大陆，从西往东，按照环境风险的高低不同分三六九等，都归类成 R 系文明。R 系三六九，不完全一样，但它们总归是属于同一种类型的。那么这样一来，我就把欧洲这个时代，和先秦这个时代，都归类为 R 系文明。在这个分类体系下，它们是类似的文明类型下类似的历史阶段，这样就在某种意义上把它们等同起来了。就是说只要是 R 系文明的区域，尽管它们历程不完全一样，他都有类似的这么一个由分裂走向统一的历史阶段。

卡师：这里是有一个历史开端的问题。

踢星星：对，只是说西欧这个地方呢，由于地理环境的原因，它的开发比较晚，因此这里的“多国体系”兴起的也比较晚，另一方面，它所面临的环境风险也较弱，因此它的动乱也没有达到中国那种强度，所以，走到绝对主义的各民族国家兴起这个阶段后，它的统一进程就停下来了。它最终没有成为一个大一统。

桂老师：对，环境风险还是比较小的，不够 R。

卡师：但是，要知道它们也有统一啊，查理五世的功业不是统一吗？也是统一。查理五世的功业，也可以跟汉武帝比啊，绝对可以啊。德国诸侯看查理五世就是汉武，一样的，要抄我家啊。

踢星星：是的，其实在西欧各绝对主义国家兴起，从大批的封建诸侯互相攻伐到形成民族国家，它的这个历程跟秦汉兴起是一样的，只是地理规模上小了一号，战事规模和破坏就不显得那么触目惊心。绝对主义的民族国家，就是一种在较小的区域上和较弱的程度上实现的秦汉制，小一统中央集权。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并不是说欧洲和我们有什么“本质”的不同，在文明类型论的分类体系中，欧洲和我们是一样的，从整个欧洲的地理区域上去看，它只是斗争爆发比较晚，斗争强度上也比较弱的中国。然后在这个情况之下，就有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不同文明类型之间的互相影响，阻止了欧洲在这条大一统的路上继续走下去。

卡师：对啊，应该说，英国不只影响了中国，更是影响了欧洲。

踢星星：应该说，如果没有英国这样一个另类国家给欧洲以压力，那么像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这样的人，以及造就他们的形势，欧洲迟早也会走进大一统的终局，即使这种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程度较中国可能会弱一些，可能会更接近历史上的罗马帝国一些。

卡师：希特勒，已经是英国人以后的事情，美国人来了。

踢星星：对，就是说撇开欧洲以外的因素，它其实也会大一统。如果我们把赵鼎新许田波对欧洲考虑的所谓“近代早期”的时段拉长，从威尼斯条约，到二战结束，而不是拿破仑战争结束，那么这个时段的长度类似春秋战国的五百年。一战二战，也被合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第一次三十年战争，第二次三十年战争，德国都是战争的核心因素，欧洲这么打下去，它也会统一的。如果不是先是英国人，后是美国人这样的一些局外人插手，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他们的功业都不一样了，欧洲统一的结局是完全可以想象的。为什么欧洲也能统一？我举个法国的例子来说明，它跟中国有什么“本质的”两样吗？法国在封建崩溃之后，也是盛行小农制，像中国一样，农民的土地也在不断地细

分，它的一切社会问题都跟中国类似，处在同一个演变轨道上。如果欧洲的历史进程不是被英美影响的话，这样发展下去，它的结局可想而知。

卡师：对啊，法国就是另一个河北啊，不是吗？巴黎就是北京，一样的。大一统就是这样一回事。

桂老师：哈哈，对，也差不多。

踢星星：是的，所以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不管是许田波讲的，还是赵鼎新讲的，都还不彻底。他们认为中国的春秋战国和欧洲的近代早期可以比，是因为两者在“多国体系”这样一个形式上是一致的，而他们关注的焦点，又是在于某种本质意义上的“不同”。就是说，之所以在大一统这个问题上结果不同，是因为欧洲和中国不一样，某种本质上的不一样。用许田波的思路来讲，就是欧洲各国在作出策略选择时，没有那么马基雅维利主义，没有把事做绝，而先秦各国呢，就拼了死命的要互相攻伐，互相杀戮。

卡师：对，底线太低了，用某些人的说法，就是我们没有底线。

踢星星：对，没有底线。用赵鼎新的思路来讲，叫社会结构的不同，是结构性因素制约了欧洲各国的策略选择，也就是它们并不是可以任意行动的。这些说法，都不能说错，都是某种层次上的正确观察和总结，但是用我们的思路来讲，会进入到更深入的层次上。就是说，这两段历史进程，谈不上有多少“质”的区别，更多是“量”的差异。像前面说的，许田波和赵鼎新关注的这两个历史进程，在中国是春秋战国五百年，在欧洲是威尼斯条约到拿破仑战争结束这三百年，如果把欧洲这段历史进程的结束时间定为“希特勒战争”的结束呢？时间跨度更接近了，双方也有了更多类似现象，可以引发我们思考。比如对犹太人的大屠杀，比如鲁登道夫的总体战，这些都要求我们再思考，双方在策略选择和社会结构上的差异，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不可逾越的？换一种思路，按照文明类型论来看，也可以说，双方的这段历史进程，更典型的是共性，而非差异。之所以结局不同，欧洲内部的因素还在其次，更根本的还是因为英美国家的影响，使得欧洲没有得到足够的机会和时间，来呈现其类似于秦汉大一统那样的终局。

卡师：就是说欧洲比较惨，它遇见了英国。

踢星星：哈哈，应该说是比较幸运，它遇到了英国。

卡师：还是反过来嘛，查理五世拿破仑希特勒不能统一欧洲了。应该是反过来说嘛，英国美国这些个坏蛋弄的我们不能统一啊。

踢星星：是的，如果你以大一统为“功业”，那它是比较惨。第一，这个区域的R 系属性还不够强，第二，它还碰到一个又一个 K 系属性的邻居，offshore balancer，碰瓷人。

桂老师：它不够 R，它那个风险波动太平缓了，在它那个冲突的时间段上，就不足以让它去产生一个大一统。要继续冲突下去，累积出“大一统”所需要的那种冲突强度，需要的时间太长了，来不及了。

踢星星：是的，风险属性较弱的冲突，还不足以把整个欧洲社会碾碎，也就不足以再由此整合起来。

卡师：它已经走到了查理五世这个时代，然后突然间就爆炸了一个英国这么一个超新星。神圣罗马帝国，已经是很稳当的事情了，让你英国破坏掉了，就这么简单。

踢星星：所以回过来讲，就是像欧洲人自己说的，布罗代尔讲地中海的深呼吸，布伦纳讲西欧的兴衰两阶段，欧洲它并不是没有治乱循环，它也有啊，只是变化要平缓很多，不会出现像东亚那样剧烈程度的大动乱。

卡师：太容易搞定了，所以我其实就是说，三五就是这么个简单的事。就是把各个文明走过的老路全部拿来，一锅煮，比一下，会发现其实大家走过的历程都差不多。

桂老师：其实是这个意思，阳光之下并无新事。

卡师：而且帝王将相的故事也都在这个里面了。斗争这个游戏，这个动员，用生物学的理论分析一下，也可以啊。你不要把它当成帝王将相的舞台，你就把它当成猩猩的斗争，猩猩争老大，那就是生物学，为什么一定要把它分析成那些哲学呢？什么谋略啊，什么马基雅维利啊，拿破仑希特勒啊。

踢星星：哈哈，是的，我们是唯物主义者，不要讲那些个虚的。猩猩没有哲学，但是猩猩一样要当老大，一样要斗争。

桂老师：哲学，包括后来的科学，它是另外一个层面的东西，跟我们谈的这个斗争，或者是社会冲突，他倒是没有太大关系。谋略呢，那是在斗争当中所产生的选择问题，谋略对斗争有影响，但它也只能在一个很小的限度之内去改变。

卡师：这是的，外国人博弈论已经弄的很严密了，但是博弈论没有历史成分。你博弈论再厉害，桥牌也不一定会胜出的，对不对？这是两码事。

桂老师：是的，你的斗争和冲突，最后靠的是什么？靠的是那个最终的实力对比。那最终实力对比来自于哪里呢？举个例子说，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能是谁动员的更早。比如中国历史上战乱时期的游牧民族和农业民族之争，为什么游牧民族大概率的胜出呢？游牧的生产方式更脆弱，在气候变化中更早地陷入混乱，而农业民族要晚一步。所以当游牧民族在内部冲突过中暴力秩序成型，农

业民族才刚刚陷入混乱，那么这个近在咫尺又已经整合好的暴力秩序，它就以一种更好的动员状态来跟你斗争，就在冲突中占了先机。

踢星星：是的，这就是咱们曾经讨论过的，阿姨那个秩序输入论的另一种解释。

桂老师：一考虑到类似于秩序输入论的这些个东西呢，历史进程的模型会变得更加复杂。

踢星星：是的，所以不可能一次性的把它做全了。就是像桂老师说的那样，一片一片地做，一段一段地做。讲清楚一个问题是一个问题。

桂老师：对，研究这种超级复杂的问题，就是先写零散的文章。想到哪个问题了，哪个问题想成熟了，我就写一篇。哪个问题觉得之前的想法可能还有补充，我就再写一篇。又想到了新东西了，我就再写一篇新的。不要去搞那个宏大叙事，那是不能成功的。硬写，就很容易流于空疏无物。

踢星星：我也曾经试过把粮论这种类型论的思考，写到一篇文章里，用一个逻辑过程整合起来。几经尝试后发现，我就是没有办法把所有的东西都逻辑连贯地安排在一起，它总有些东西是突兀在外面的。

桂老师：搞不定的，那样下去，你也要搞三卷本的。

卡师：不要这样，写出来也不好看。那不是搞得像写资本论了。资本论，我是真的读过。资本论其实是挺有趣的，他不是什么哲学书，如果你拿它观察英国社会的话，他写的很不错的。

踢星星：伟人啊。我们说起过伟人这个话题，有些人的确是不一般，不服不行。比如说马克思，你仔细读下去，就会发现他确实很了不起。资本主义起源，太多人研究过，可是研究来研究去，最敏锐的还是马克思。他是独具慧眼地把这个问题的研究焦点定在了英国的乡下。其他同时代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个关键吧？同时代的人，乃至后来的人，太多人都把欧洲这个中世纪城市经济理解成了资本主义起源的关键。

卡师：这么理解很正常啊。

踢星星：对，很正常，城市资产阶级嘛，商业繁荣嘛。但实际上你如果把这个问题的研究透彻，那马克思是最正确的。他第一个把这个研究方向看清楚了。城市里头这个市民阶层，本质上，他们以及他们的活动，跟资本主义起源没有关系。自古以来就有这些人物，其实我们中国也有啊，那西门庆不就是这号人嘛，布尔乔亚，市民阶层，生意人。

DIVA：那为什么非得要取这么个典型啊，哈哈

踢星星：这不就是典型的商人嘛，市民阶层嘛，开个药铺做个生意，跟官府拉点关系，那跟法国贵族不是一样的吗？生意之余，到官府里谋个职銜。

桂老师：对，基本的小贵族，小资产阶级，都是这个情况。

卡师：今天应该其实应该谈谈资本主义，这个最麻烦。

DIVA：我还以为你想说，今天我们应该谈谈金瓶梅了，这是一部伟大的文学著作啊。

踢星星：哈哈，那我们的路数就对了，就文艺起来了。

卡师：现在是在打着灯笼在找资本主义啊，找来找去，就找来一批商人，给他们捧场，把他们当成资本主义的代表。问题是，我想来想去，这其实是不对的，资本主义不是他们这些东西啊，资本主义不是做生意。这麻烦很大了，社会是已经改变了，但大家不知道它究竟是变成了什么东西，你可以有资本家，但他们不一定就能让你拥有资本主义。

桂老师：OK，那么卡师你所说的资本主义是什么呢？资本主义不是做生意，这点我是同意的，高度的同意。

卡师：对啊，资本主义是什么？不是做生意，那么就要问为什么不是呢？

桂老师：就是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只有当资金变成了资本以后，形成了资本这个东西以后，才有了资本主义。用马克思的话来说是这样。

踢星星：我理解这里面的关键，就是说钱这个东西，什么时候只是货币，又什么时候才是资本？你拿钱放高利贷，那就不叫资本主义，对吧？那么高利贷什么特征呢？高风险高利率，因为很可能收不回来，所以利率要很高，用作损失准备。能赚一票就猛赚一点，赚不了要么暴力讨债，要么认栽。像是黄世仁要喜儿抵债，又或者西班牙君主赖意大利商人的账，都意味着这种经济活动里面有很强的暴力性，“超经济性”。那么相反的，利率降低，降到足够低，意味着这时候放债的风险很低，可以低利率放出去，获取虽然不是暴利，却也是安稳省心的收益，不会让借贷双方陷入超经济的搏斗，换到另一方面就是说，从生产经营中获取收益还债是靠谱的，借来的钱可以安心地投入生产，因而就会有大量的货币投入到这种生产经营中来，这就是资本，这就是资本主义了。

卡师：嗯，应该就是说，钱可以安心地投入再生产了。

踢星星：是的，所以我理解，货币成为资本的前提，就是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足够低，可以安心地把货币投入进去。没有这个投入再生产的过程，那就不是资本主义。比如意大利的那些商业城市，它商业很发达，也被很多人认为是

资本主义起源地，但是它的那些大商人赚的钱，很多时候都是拿去购买了城市附近的土地，大商人也往往是大地主，这个又跟我们中国的情况很相似，购买土地获得佃租收入是一种避险行为，那么这就意味着生产经营过程中的风险还是不够低，就不是真的资本主义。从这个角度来看问题，我们就可以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定义它是 K 系社会秩序的高阶段，或者说，低风险秩序的高阶段。这也还是太抽象，但是这样做的好处，可以先把资本主义这个概念大概地框下来。首先它是个整体的社会秩序，不把它定义为某种片段的局部的东西，它最根本的一个特征，就是低风险。但是只有低风险的，不一定是资本主义，比如说北美印第安人虽然生产力落后，但还是比较和谐的，在殖民者到来之前，他们也没有帝国，他们的部落联盟很松散，部落之间没有很强的争战，部落之内与部落联盟之内也没有很强的等级压迫。

卡师：他们偶尔出现一个帝国，然后又消失掉了，就好像亚马逊森林那些东西一样的。

踢星星：北美洲应该是没有的，你说的那应该是中美洲，中美洲已经靠近赤道了，环境已经非常不稳定，像阿兹特克那样。

卡师：美洲人的历史也已经时间很长了。我相信北美也会有过国家，能够盖起金字塔那样子，但是它消失掉了，它偶尔出现一下，然后又没有了。

踢星星：或者说，至少它不是常态，这本身就是意味着在北美那一大片土地上，社会秩序的帝国属性不强。印第安人的社会由一些松散的部落联盟构成，属于一种低风险秩序的低级阶段，根本还没有先进的文明能够稳定存在。但是我们说文明之间是互相影响的，欧洲人带着工具和技术过来了，新的生产力和动员能力，在同样的这个地域上，和低风险秩序结合在一起。

卡师：问题是，他们是不是把资本也带过来了，

踢星星：不需要带资本吧？当初殖民者到美国的时候，他们只是被送来“殖民”，落地生根，养活自己，然后建立商栈，把那个地方的海狸皮之类的东西运回英国，是从事贸易起家的。为什么英国人能够在那里站得住脚，是因为这些殖民者生活在北美，但他跟母国之间有强烈的贸易联系，能够源源不断地从这种联系中获取力量。这种贸易不是以金，银这种东西为主的，运回母国的东西很平凡，可以是烟草棉花这种日常生活用品，英国可能就是最早的大众消费市场发展起来的地方，因而它能够稳定地支持这种贸易。到后来殖民地还出产粮食输送给欧洲嘛，这是更加典型的大众消费品了。所以这个地方你不用带资本来，你只要有人带着工具和技术来，加上这里的低风险秩序，剩余就会转化为资本，资本主义就可以在这里发展起来。

桂老师：首先要肯定，资本输入还是输入了的。

踢星星：嗯，这样理解也行，毕竟殖民者是带着工具和技术来到北美十三州的，这些工具技术，乃至武器，都可以理解为初始资本。

DIVA：那资本主义，最基础的应该是说，以私有制为核心嘛。

卡师：Diva，你是学法律的嘛，你怎么讲。

桂老师：听听 Diva 怎么说。

DIVA：资本不是一个法律的概念，它最基础的界定，就是私有财产。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最大的差异，是在于你是不是有资本，而资本是一个私有化的东西。你原来是佃农，租种别人的土地，那你没有资本，未来你比方说成了一个小作坊主，或者说你成了一个拥有小型农场的人，那么你是有资本的嘛。为什么在美国它产生了资本主义，是因为美国那地方 free 啊，没有大领主，没有大庄园主，这么大面积的土地，大家都拿到了属于自己的私有财产。

踢星星：这么解释不严谨的，英国可是有大领主，英国是资本主义起源地啊。

DIVA：英国有，但是英国为什么有资本主义，是因为它的工业革命造成的，就是大家脱离了土地，小作坊主遍地了，英国是一个小店主的国家。

踢星星：还是不严谨的，工业革命比资本主义起源要晚。

DIVA：是，但是那是在于它的纺织业兴起，脱离了土地的农民，他不再成为流民，而是产生现代手工业，人都跑到了城市里面。

桂老师：圈地运动。先有圈地运动，使农民脱离了土地。

踢星星：对，这是对的，这正是英国例外的特殊现象。它的农民离开土地之后，并没有成为流民然后可能成为暴徒。虽然有那么一些，也被济贫法给收容了，整个社会承受得起。

桂老师：是，它没有成为暴徒，也就是前面我们讲到的动员能力足够，形成了有力的政府，有足够的力量去维系秩序。用我们的话说，它足够的 K 嘛，政府在这个时候站在了资本这一方，而不是以劫富济贫消灭资本为代价来维系秩序。不过，这样一路讨论下去，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前面我们讲阶段，现在又有资本这样一个要素进来了，再讲下去，就真写成资本论了，可以先打住。另外一个，我认为就星师的 K-R 模型来讲，能够讨论到两样东西去和粮食紧密关联的，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土地制度。到这里以后，不能再外延了，再外延下去，这个模型支持不住。要讨论资本主义，那得是另外一件事，需要独立去讨论。

踢星星：对，深入讨论资本主义的成长过程，会进入细节问题，会有 K-R 模型之外的新因素冒出来，需要引入更多因素来构建新模型。

卡师：我的本意是讲中国的问题，还没有说到美国啊，我们这是已经跑到哪里去了嘛。

DIVA：哈哈，我们都讲到世界范围去了。

卡师：我们讲回到中国。当然我说改变，五千年之变局，中国变成什么，跟资本主义有关系吗？

踢星星：我的理解它是有关系的。我的理解是这样，在绿色革命之前，中国跟法国的早期经历是类似的。你看法国人在受到英国的压力之后，它也要发展先进的产业，那么它是在法国巴黎周围，在国王的特权之下，聚集了一批产业工人，聚集了一批先进产业。但是这些先进产业并没有渗透到法国各地的乡村去，它是浮在传统的法国社会之外的，局部的东西。这样的体系是很脆弱的，如果不能以低价从农村获得粮食，那它就无法生存下去。大革命前夕法国农业大灾，巴黎工人没饭吃，就是大革命一再激进化的催化剂。大革命的后果，实际上以城市为核心的动员力量是通过消灭封建贵族，保护小农制的种种法令，把法国社会做了一个分层，通过强化的中央集权，人为创造了一个局部的低风险环境来维系先进产业。

卡师：这就是最早的特区啦。

踢星星：对，在一个整体的高风险区域内，模拟出来了一个局部的低风险环境，这里工人们得到承诺，你们总是有饭吃的，你们的未来是有的保障的，你们可以安心钻研生产技术，把枪炮造好，把马车战船造好。

卡师：让一部份人先富起来，就是这个意思，其实完全一样的。

踢星星：那么这种形势的极端状况，就是俄国的情形，要全面发展新产业，全面工业化，是力所不及的，因此只能在局部社会，一小部分人当中去发展新产业，实现工业化，这是一种片面的资本主义，模拟的资本主义，无根的资本主义，斯宾格勒所谓的“假晶”。我为了应对英国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德国的竞争压力，为了应对日本的竞争压力，我必须这么干，必须创造一个局部低风险区域来工业化。那么相应的，另外一部分人，农村居民，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这种风险的水位在不同的人群之间是有一个断裂的，这个断裂呢，就要用动员力量去维持它，如果这个断裂不能维持，风险在整个社会中传递，各群体彼此竞争之下，社会秩序就崩溃了。俄国革命本身就是这种崩溃的例子。

卡师：阿姨就老是说这个断裂，说这个成本会一直高到负担不了这个断裂。他所有的理论就是说，这个成本太高了，总有一天这个外面这个汪洋大海会把这个小岛淹没，大洪水就是这个意思。

桂老师：对，大洪水就是这个意思。

踢星星：对于过去来说，阿姨说的没有错，但是绿色革命之后的情形是不同的。80年代全国普遍出现了乡镇企业，乡镇企业是从农村里成长出来的，与当年英国工业革命兴起的情形一样。那么乡镇企业意味着什么？那就是绿色革命使得风险的水位降下去了，风险普遍降低了，使广大的农村都升到了风险水位的上面。以前是用政权的力量，在城市里隔离出来一个低风险区域，现在这个低风险区域扩展到了城市以外的广大地区。

卡师：香港化。整个中国像是一个小小的香港那样。原来所谓的香港，就是香港岛九龙那么一点点，加上后面的新界那个大得多的农村，其实可以想象以前的中国都是类似的，一点点城市加上广大的农村。那现在我就住在新界，新界现在跟香港岛比也不差的，没什么天壤之别。

踢星星：是的。就是说，阿姨的理论现在不能够成立。阿姨说的大洪水，就是你把坝往上筑，水位也在上涨，水越积越多，总有一天你拦不住嘛。在绿色革命之前，确实就是这样子，过去的王朝的动员能力是有限的，但是人口在不断的增殖，土地在不断的细分，而抗风险的能力并没有增加，那么迟早有一天要出事，这是铁定的结局。但是现在呢？不一样，现在你那个水库里的水位，他不是铁定上涨的。它虽然有波动，但总的来说，实际上是在降下去了。水位的趋势是下降，不是上涨。

卡师：所以说，农村都没人住了，哪里来的洪水啊。比如你到香港的农村看看，都是老人啊，不然就是空的，没人。

桂老师：大陆的农村也都是这样。就是我刚才准备讲这个的，你先讲了。

踢星星：农业的产量足够高嘛。虽然现在农民的土地还是面积不大。

桂老师：嗯，单位产量变高了。

踢星星：对，单位产量变高了，而且机械化程度上升了。我们的机械化方式跟西方的不一样，因为我们没有大农场，那么我们的机械化方式是什么呢？我看到有个报道讲这个，政府参与组织的一大批农业机械，从南往北，按照这个成熟日期的差异从南往北为农户做收割与播种这样的农业机械化服务。相当于分散的小农把自己的生产承包给了一个大系统，而这个大系统，是政府参与协调下的个体的拖拉机手，收割机手，等等联合组织起来的。到了收割季节，会有成百上千的这种服务者和机械从南向北移动，政府会去协助维持这个系统的运转，给这些拖拉机收割机开放通道，提供燃油，给这些人提供生活便利等等。

卡师：就好像从河南去新疆去割棉花一样啊。

踢星星：对，是这个道理，政府来协调和组织它。就是说它肯定不是 K 系社会，K 系社会有不同的历史路径，不是这样子的。但是呢，它又不是过去那种宿命的 R 系社会。

卡师：因为新工具到来了，发挥了我们的积极性，能动性。

踢星星：对，新的技术条件赋予了过去的 R 系社会以新的可能性。大洪水不是注定的。

卡师：那当然，如果用我的理论来说，你把各个民族的历史阶段比较一下，你就会发现，你不可能刚刚到那个阶段就乱了，又或者刚刚到这个阶段就太平。它不会的，它总是黑路嘛，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都会有。假如这个时候发生了灾荒呢？又或者这个时候外星人打过来了呢？你怎么知道这种事情会不会发生。不过，问题是尽管有着那么多不同，或者灾荒，或者太平，但是阶段还是会有阶段的特征。就是这个文明的三五和那个文明的三五比较一下是很有趣的，它们当然不会一样，什么细节都不会一样的，但是它们还是会有类似的阶段特征。星师你说查理五世跟汉武帝是同一个三五，对，但是它们不可能一样啊。

踢星星：它们的“基底”不一样。

桂老师：等一下，补一下课，卡师讲的“三五”是什么具体的意思，我要补一下课。

卡师：没错啊，我就在这里。

踢星星：阶段论，是一种阶段论。

卡师：啊，没这么简单。阶段论阿姨就说了，我就不再说了。

桂老师：对，听正主儿解释。

卡师：三五，就是有三有五嘛。如果要查三五本来的意思，就要去看史记了，我不多讲那个了，又不是要追随太史公。三五，就是三百年五百年。三百年来自黄帝，但那不是历史是神话。最普通的三百年是什么呢？就是轴心时期，在古代就是大希腊，中国的战国时代。如果是欧洲的话，最典型的倒不是查理五世，欧洲分好几块，如果是地中海，就是从拜占庭灭亡一直到意大利建立那一段，那是属于地中海自己的战国时代，如果是北欧，就是所谓日耳曼地区，那就应该是大约十三到十五世纪，差不多吧。Anyway，三百年是说轴心，轴心是什么呢？就是兴起。五百年，就是大一统了，大一统一般来说都是五百年，找来找去，我都看不出来有什么例外，大部分都比五百年短一点，比五百年长的也是有的，但也差不了多少。

桂老师：对的，是有这么一种相似性。

卡师：其实那个有关三五的年表我整理好了，全部都搞定了。但是我不是说三百年五百年是什么神秘数字啊，那个我不谈，谈神秘谈易经，有什么好说啊。

问题是比较，想比较才搞年表嘛。你要是一定要找出铁定的“规律”，比如说，乱是一起乱的，和平是一起和平的，那个是没意思的。外星人打过来了，那怎么办？陨石打过来了，地球上的生命就可能全部没有了，然后还有三五吗？不行嘛，没有决定论铁律的，你不能那样讲，你只能比较那个形态。当然，你可以质疑，这是不是套套逻辑呢？你用形态定义了三五，又用三五定义了形态。我只能说，任何理论，它的逻辑到最后应该都是这样子的嘛，已经到了基本假设这一层，就没有办法再往下说该是哪个定义哪个了。形态跟阶段本来就是一个基本假设，你不能说谁定义了谁。这又是一个理论问题了，打住了，我们回到刚刚讲三五之前的那个话题。

踢星星：前面我在说，阿姨的大洪水论是不成立的。

桂老师：对，就是说大洪水不一定来，历史是黑路。

卡师：是啊，未来是什么，当然不知道了。黑路嘛，黑路才是真理啊，对不对？阿姨是个有趣的人，就是因为他想法太多嘛，这事情很少见嘛，没人什么人这样想这样做，对不对？都不敢的。

桂老师：他的那个逻辑呢，我倒认为并没有失效。就是星师你刚才说的风险的降低啊什么的，并不一定导致他的逻辑失效。风险是多层次的，最底层的风险缓解了不等于一切 OK。

卡师：对。但问题是明朝不是亡于大洪水，是亡于党争啊。大洪水不一定有那么大的力量嘛，比如大洪水要把宋朝给淹掉了，它也没有亡啊，它不是跑到杭州去活下来了。我以前就说过了，秦桧是很厉害的，状元啊。他发明了道学，把高宗变成了圣人，他创造了一种意识形态价值啊。这么厉害的人物，我们就天天骂他，吐他口水。

桂老师：哈哈，确实是一个很优秀的人才，字也写得好。

DIVA：相比之下，真的就是太冤枉秦桧了，放过了高宗。

桂老师：他有一套很高明的自己的意识形态理论，然后也成功地把高宗捧到了那个位置上。

卡师：党争才有趣啊。怎么说呢，党争是三五表现的最强烈的一个形态特征，K-R 模型是不会表现党争的。

桂老师：K-R 模型不进入历史事件这个层面，它只讲到制度层面，比如土地制度就完事了。

卡师：但是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党争这个事是很有趣的啊。

踢星星：K-R 模型是很抽象的，用 K-R 模型来讲，就只会讲到斗争的激烈程度。它只会说 K 系社会秩序，那像英国一样，斗争的程度是不激烈的，容易妥协的，比如“王在议会”，比如“议会至上”，就是这种妥协性的表现。

桂老师：同意星师，还是我们前面说的，K-R 模型，关键就是风险曲线的波幅和它的波长吧。K 系社会秩序，就是说它这个波动烈度不够。总的来说，就是结合星师现在用的这个交易费用的这个概念工具，再讲到这个土地制度这里，其实就很好。不能再往下讲了，再往下，就讲到别的事去了。比如不能讲经济学，不能讲政治学，那都是社会科学了，也不能讲环境本身，那是气象学，气象史了。

踢星星：是。就是刚才那句玩笑话，我们讲到“社会科学的哲学原理”就结束了。仅止于哲学原理，不能去替代社会科学往下讲。K-R 模型就是一个连接器，把围绕人类社会的各样因素链接起来就 OK。

卡师：英国党争还是很厉害的，而且，英国的优越也是因为地理学嘛。

桂老师：是，环境这一部分要说到的。粮食论，一定是往下一层是环境地理，往上一层是土地制度，交易费用，以及由此而来的效率问题。

踢星星：是，具体地讲下去，那就是杨小凯的数学模型了。K-R 模型不能代替他们讲经济学，只能说跟他们连上了。

卡师：人家不要你啊，为什么他要连接你？

踢星星：嗯，连接，那还是需要的。在交易费用这个争议问题上，经济学目前的各种理解都还是有欠缺的。张五常说，科斯也同意他，交易费用就是制度费用。这很对，但是继续往下说，社会是一个整体，制度是涵盖方方面面的表征，那么这种表征，或者说“制度费用”的根源是什么呢？张五常没有追问下去。杨小凯建立了交易条件到分工演进的数学模型。交易条件，是一个交易费用的关联概念，交易条件越好，分工与专业化越发达，交易条件越差，自给自足就越强烈。他指出了一系列达成好的交易条件的因素，比如说交通运输，城市化，产权制度，这些都很正确，可是只有这些认识还不够，为什么呢？就是在杨小凯看来，经济要繁荣，只要循着这些个看似直观的因素各个去改进就可以了，但是回到刚才所讲的，社会是一个整体，它不是各种因素的随意组合，比如把英美的产权制度搬到非洲就可能行不通，这些因素的改进，未必就能够像杨小凯期望的那样简单直接地去落实。在这个问题上，现在的经济学理论没有指出一点，那就是制度费用也好，交易条件也好，这些相互关联概念是有根的，它们根植于一个社会生存于其中的环境风险，而不是一种任意性的存在。换句话说，推动经济发展的若干因素不是可以简单地予以个别改变的，更不是放松管制就一定会自动改善的。不能厘清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解释社会

的“整体性”，就不能解释制度与制度之间的差异，进一步的，也就不能解释制度的变迁。

卡师：只有核弹是来到我们这里就适用，哪有还有别的什么可以适用。

踢星星：是的，所以问题是某些办法它为什么不适用。K-R 模型至少能告诉你制度是有根的，外来的制度与本土的风险环境不匹配。

卡师：根据这个思路，资本主义有没有根？

踢星星：资本主义概念，我们是重新定义过的嘛，就是建立在非常低的交易费用基准上的一种社会秩序。历史地讲，这个低的交易费用基准，就来源于定额地租制，因为定额地租制就意味着稳定的粮食产量，意味着低风险。生存环境的低风险性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根了。和经济学家相比较，就是这么一点点东西，是 K-R 模型多讲出来的。张五常已经讲过了，交易费用就是制度费用，杨小凯也讲过，交易条件问题决定了社会能否持续分工演进。但是历史地讲，宏观地讲，这个制度费用，交易条件从何而来，他们是没有讲明白的，或者说，这些概念的“现实性”不充分。而 K-R 模型用一个环境风险的因素，也就是所谓的“根”，把这些个概念一致起来了，现实起来了。这样一来，既简化了宏观图景，也更好地解释了事实。

卡师：来了能适用的，当然不只是核弹啦，还有特区，特区也是一个核弹哪。罗湖和深圳一切开，那就有一个香港，那也是特区啊。所以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有没有一个核弹，可以让中国变英国那样？

踢星星：我想，如果能达到足够的技术水准，那就能够做到。

卡师：是啊，我们发明了太阳了，就搞定了所有事情。太阳就是一个核弹，你想一下。

踢星星：是的，绿色革命就是这样一个核弹，实际上我认为它就是。

卡师：有根没根的问题，就跟核弹这个问题是一样的，你想一想。

踢星星：是的，你知道这个根在哪里，那理论上就可以改变。对不对？

卡师：你是说，最重要是我们没有搞清楚那个逻辑而已。问题是，核弹不用逻辑，核弹你运过来我们就搞定了。你不用搞清楚这个经济学，这个根，这个什么交易费用。

踢星星：这个可以不矛盾，我认为事实上正是如此，你看过去几十年来正是如此，人们可能并未理解绿色革命的作用如此重要，但是这也不妨碍绿色革命发挥作用。

卡师：摸石头啊，摸石头过河，还有各种各样的解释。

踢星星：所以，绿色革命这个核弹给了你，你就派了用场，至于你怎么理解，想象，构建这个过程，那是次要的。

卡师：你乱来都可以？

踢星星：怎么解释无所谓。但是你不会乱来，你没有那个选项，人类行为自有其逻辑，你还是会该干啥就干啥。

卡师：我讲斗争永远都会有的，一千年都会有的。应该说，就是有人做成了太阳，拥有了核弹，还是会有不一样的命运。

踢星星：这个我同意。条件变了，但是人类社会，历史，它是有路径的，你的路径已经在哪里了，它不会消失，过去的路径对于现在仍然是有决定性影响的。

卡师：所以历史永远是黑路。你就要准备手段去应付黑路，还是要修水库，还是要那些工具啊，没办法的。你不知道啊，那黑路英国也有啊，英国不会乱吗？英国也有准备好的。这也是一个新时代了，旧经验虽然不能取消，但是阿姨这种人，只能够想象一个过去，不能够想象一个未来。故事很好哇，我是读历史的，我当然对过去很有兴趣，你跟我一天到晚谈李自成，张献忠是怎么样子，我当然很有兴趣，但是以后会有这种人嘛？我看不会的，就是这个意思。

踢星星：条件变了。

卡师：没办法了，一切总是要变的。黑路，黑路是乱走的，但是黑路又是决定的，没办法了。历史哲学如果不先有一个前提，就是黑路，没有什么哲学。眼前的历史是新的嘛，哪有旧的历史。旧的历史，三百年五百年了，不再出现，很好。但你不吹点神秘的东西，大家就觉得你没有干货嘛，人就是这么讨厌。

（中场休息）

桂老师：好，我们继续“历史哲学”。

踢星星：卡师之前说，三五缺少一个批判性的目标。跟我以前写粮论的时候一样，自己说自己的，跟别人的都不搭界。

桂老师：我觉的，不搭界这个问题，容易解决。卡师的三五，到处都是目标可以批判。

卡师：我要找碰瓷对象，当然还得找，肯定要找。不过我碰瓷星师就不行，在星师面前碰瓷，是班门弄斧啊，他才是碰瓷专业户嘛，碰瓷人对碰瓷人不行的。

桂老师：星师来一句，大哥，拜托你你专业点好不好啊，哈哈。

卡师：我是周围都是目标，但是要碰瓷还是个问题。因为这样说吧，阶段这个东西，其实我刚刚说了，升起，就是衰落啊，有起就有落，我们人类能想象的阶段总是走向衰落了，不会说越来越好吧？天底下没有这样的阶段论，对不对？

DIVA：也不能这么讲啊，他其实是这样的一个一个一个的生长周期嘛，就是升起，衰落，然后再升起，然后再衰落。

卡师：问题是你过不了那个衰落那个点，已经过去了，你看不到后面了。

桂老师：我觉得卡师呢，你的这个三五，也有跟星师的粮论有类似的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的理论也好，任何一个理论，尤其是社会理论，它的这个边界其实是很窄的。当你试图去突破它这个边界，扩大理论的解释范围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问题变得复杂得不可讨论了。所以，这个边界要设在哪里呢？就是刚才你们讨论的那个阶段论，很早我跟星师我们也聊过，就是这个边界我们不碰它。一旦越过那个边界，比如说刚才你们谈资本主义的起源，其中类型和阶段是怎样的一个交互作用的变化过程，细究下去，那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东西变得极端复杂。

卡师：你就时间够长就可以啦。

桂老师：所以，我们把理论研究控制在边界之内，这样才能完成它。关于理论自身，第一呢，要有效，第二呢，要有好的视角。为什么我对星师的粮食论一直感兴趣，也愿意帮助他一起努力，尽可能去完善它，就是认为在前面这两点上，我们有机会做好。星师一直约我写篇文章，正好拿这个关于理论的思考做主题。

踢星星：是啊，抓紧把文章酝酿起来啊。

桂老师：现在你看，科学都这样发达了，社会科学，或者是这种社会人文的理论，还是那样落后，对不对？其实这也曾经是康德的感慨，也是他研究认识论的出发点。可是在他之后一两百年过去了，还在老样子。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他那个时代过去了以后，社会科学可能是变的更糟糕了。一个理论或者什么作品，要么是宏大叙事，干什么呢？反正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啥啥都给你包进来，漫无边际。要么呢，就是像星师所批评的，某些文化解释之类，从文本到文本，从空到空啊，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问题。它就是把文本拿来炫耀，有些人确实书读得很多，你没办法。从头到尾，他没有引出跟现实世界的关联，就把所有能找着的文本都拿出来，拼凑一遍，批判一遍，最后他自己啥也没说。从文本到文本这个事，如果说你是在研究一个学科史，那倒罢了，或者你是本教科书，那倒罢了。但是它也敢于宣称自己的东西为社会科学理论。

DIVA: 那不就是个概论吗?

桂老师: 就是他连论都没有, 概而不论, 他只是讨论文本。

卡师: 因为社会理论本来就是欧洲诞生的。欧洲是不够资本主义的地方, 他们也不明白, 只能观察啦, 文本上的观察。

桂老师: 对, 我觉得这就是现在某些所谓的理论的大问题, 它要么是宏大叙事, 万能理论, 什么都想包含进来, 要么就是从文本到文本, 虚无缥缈, 立不住脚。

卡师: aim small miss small, 我们这样说。你的 aim 就是一点点, 那你射击过去总还会有收获, 你的 aim 不知道到哪里去了, 那你永远射不中。

桂老师: 是的, 所以, 这两个现象, 分别导致了什么后果呢? 一个呢, 就是说无效。从文本到文本, 没有真实的问题, 那你一定是无效的解释, 无效的理论, 不是 miss small 而是 miss everything。另一个呢, 就是不简洁。宏大叙事, 包罗万象, 冗余太多因而效率过低。你看现代科学发展到今天, 理论一定是要简洁有力。尤其星师你们学的计算机科学, 一个简洁的算法, 才能够支撑大系统, 像原来星师讲的那样, 越是有效的理论, 它就应该越是简洁的。当然这个说法只是一个必要条件, 它不充分, 但是一个简洁的解释, 它才可能是普适的。一个理论, 一个解释, 一看无比的复杂宏大, 那它到底能有多大效力, 就太令人怀疑了。

卡师: 简单的好处, 是大家都知道的。问题是很多人所谓的简单, 其实只是换一个方式, 弄一个花招, 把同样的事物重复一遍, 等于是障眼法, 魔术啊, 魔法啊。

桂老师: 理论要简洁。咱们用计算机的这个术语表述, 就是核心算法一定要是简洁的, 你才能支撑大系统出来。我对粮食论一直感到很有兴趣的, 就是 K-R 模型中包含的算法足够简洁。

卡师: 码农才想得出来的。

桂老师: 哈哈, 对, 码农才想的出来, 足够简洁。我记得我们讲过嘛, 你说比如说宗教, 它有意思的地方在哪里? 比如说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到哪里去, 这种终极的问题, 第一, 你如果用理性用科学去回答, 会发现回答不了, 对不对? 第二, 你就算通过理性的方式硬要去解释, 就会发现我擦, 这个事情变得好复杂。但是宗教给你的解释极其简单, 比如我们说基督教, 问你你从哪里来啊? 上帝造的。你到哪里去啊? 你要是好好干上天堂, 你要是不好好活, 你给我下地狱。对不对?

卡师：我就跟星师说过，信教才读经，没有反过来的。你信教不要读圣经的，你信就信了，你不信就不是选民。

桂老师：是啊，反正它就是这么解释，这个解释的优势在哪里啊？简洁。但是它的有效性呢？没法说。原因就在于这个解释无法被证伪，也就无法被证明是错的，所以 OK，有没有效，你说了算，就是刚才卡师说的，信就行啰。因信称义，对吧。因为你无法证伪它，如果有一天它被证伪了，那这个恐怕就是另外一件事了。但是至少到现在为止，它无法被证伪。那行，那我就信他就行了。我是上帝造的，简洁。

卡师：那是传统嘛。我不是教徒，但我是认识教徒的。教徒呢，你跟他讲道理是没用的，他跟你讲道理也没用。不是说不讲理，而是他的理不是你的理，你的理也不是他的理，两个理不一样。

DIVA：大家讲的不是一个维度，不在一个频道说话，不在同一个理性空间。

踢星星：两个理论体系，基本假设不同。

卡师：对啊，我可以看圣经啊，可以读神学啊，但是你是教徒，我不是，我就不能跟你讲到一起去。

桂老师：我跟你一样，我也可以看圣经，也可以读神学。

卡师：圣经写的很好，但是教徒的理解不是我的理解。我叫神青（神经青年）嘛，但我就是觉得信教，还是算了，没有进入那一种状态。

桂老师：是的，写得很好，圣经也很好看。我最早看这些东西，就是大一的时候，被刘小枫给拉下水了，看了他那本《走向十字架的真》，就读了圣经，读了那些书。圣经是这样，当然更早比如说原始崇拜，再到后来诸如宗族观念，意识形态，其实都是同样的一个道理，解释要足够的简洁，越简洁才能够为更多的人所理解和运用。所以，粮食论呢，我认为首先它就是达到了一个基本的要求，足够的简洁。就是卡师说的，这是一个很好的，码农才能想出来的东西。我还看过网上的那位解释系主任，他从财政的角度去解释社会。从财政的角度能不能讲呢？也能讲，但是他的“算法”比星师这个还是要复杂。

卡师：学总呢？学总跟解释系主任是两个人。

踢星星：学经济学家，也是比较看重财政问题。他和系先主任倾向比较接近，因为我记得他们本来就是银行业出身，保险业出身。

桂老师：对，对系主任，我比较认可的就是他对于风险的分析方法，因为他搞保险出身嘛，在保险行业里面搞风险控制的，那是保险公司最核心的工作类型，专门研究风险。所以呢，他对于风控的理论掌握和经验实践都很丰富。视

野很开阔。然后用这些去看社会，看政治，看历史，那就是一个独特的角度。相比之下，宗师这个从粮食风险这个角度去看问题，我觉得更简洁。就把问题归约到了很单一的源。但是星师的这个东西，它的危险在哪里呢？任何一个理论，它只有在前提和条件是确定的情况下，它才是有效的，越过了适用边界，这个理论也就无效了。所以这就是我们要问的，你这个理论的边界在哪里？一旦越过了这个边界，理论就很容易失效，这也是社会科学为什么总是落后于自然科学的原因，因为太多的社会科学理论不能澄清自己的边界。康德写三大批判，不就是出于这个考虑嘛，他在讲起自己著作的缘起时说，自然科学已经发展到了什么什么程度，但是社会科学的研究还停留在蛮荒时代，然后我要改变这个状况，我要批判。

卡师：问题在哪里，他已经看到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大家都看到了。所有的努力就是要要把社会自然化，用自然的观点去理解人类世界，但是这种努力没有成功。

桂老师：不管怎么说，星师这个 K-R 模型，把条件边界限定清楚以后，我认为它在纯粹的理论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是有效的，这一点没有问题。

卡师：那我问一个关于我三五的问题，为什么衰落，一定会先有一个扩张的过程，然后再变成收缩，然后变成自闭，就是自我封闭。衰落为什么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桂老师：为什么衰落是必然的，是吗？

卡师：不是，我是问，为什么衰落会经过一个先扩张，再收缩，然后再造长城在外面，为什么总是这样子，你知道吗？

桂老师：这个我还没有思考过。

踢星星：这个问题上，粮论是可以作为一种辅助工具来解释的。R 系种群，它有一个种群数量循环变化的特征。如果我们是 K 系社会秩序，那人口数量应该是在某个线上收敛，趋于稳定。如果我们是 R 系社会秩序，就是环境风险达到了一定高度以后，人口数量将不会收敛，将会上下颠簸，就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先扩张然后收缩的历程。

卡师：然后就关起门来啊。我们造长城，这也是风险管理，就是经过这个颠簸以后的一个管理。最后沿着长城两侧划界，就变成敌我之争。

踢星星：对，这种收缩，封闭他是一种风险应对嘛。比如修长城，那是对长城以外风险的一种应对。但是这样一种应对，它在相当程度上是无效的。它更多的是一种被动适应，对风险作主动管理的成效非常有限。

卡师：不是，我不是需要它有效，而是它有这个倾向，有这个做法。

桂老师：对，用星师的 K-R 模型解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底层理论嘛，这方面是很有效的。

踢星星：关于 R 系社会秩序的人口颠簸，因为人类社会的 K-R 模型没有数学表达，没有图，确实不好理解，但是可以参考生态学的逻辑斯蒂方程，它是生物种群的数量变化的数学表达，是可以找到各种图示的。其中的 K-R 属性，是随着一个数值，就是种群增殖系数的变化而决定的。当这个数值明显高于某个确定的阈值的时候，种群数量就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达到峰值，然后衰减下来，这个过程反复循环。增殖系数越高，这个循环周期就会越来越失去规则性，最终成为无周期的随机颠簸，陷入一种“chaos”状态。如果这个增殖系数明显的低于那个确定的阈值，种群数量将在某个数值线上收敛稳定下来。这就是 K-R 本来的含义。从这个角度来讲，如果你把人口数量理解为人类的种群数量，那你可以说，扩张与收缩，其实是某些社会秩序下的正常现象。

卡师：额，明白了，那也是有关系啊。

踢星星：对，一种社会秩序的阶段变化，和它的类型属性是有关系的。不同的类型社会秩序，随着时间的推进，它会呈现出不同性质的阶段性变化。

卡师：对啊，我讲这个三五，这是老祖宗的智慧啊。黄帝三百年是古书上面写的，不是我发明的。问题是没人知道三百年是为什么，古人说三百年就是三百年了，说一百年就是一百年了，没有解释。为什么文明的兴起，扩张，成为“轴心”，会有这么奇怪的三百年节律。

踢星星：这个里面就有更复杂性的因素和道理了，我不能用 K-R 模型来讲了，因为 K-R 模型没有复杂到这种程度。生物学上讲逻辑斯蒂方程，它是更能够定量一些的，因为有一个数学公式出来，它会给你具体的周期。当然，它也是对生物世界的一种抽象，对人类社会更是只能作为一种启发。打个类比来说，如果你这个增殖率够低，嗯，就像英国人一样生孩子生的慢，那么这个种群数量，或者说人口数量就会靠近到某个线上，围绕这个线很微小的变化，不再是剧烈的震荡，那么三百年这样的节律就消失了。

卡师：你看不到，但它应该说是有的，只是太微弱看不出来啊。

踢星星：是的，微弱的变化。这个地方如果用 K-R 模型，或者用逻辑斯蒂方程，是可以给出一个粗略的解释的。但是为什么会有具体的这样大小的变化节律，人类社会的情况就比昆虫之类的生物种群那个情况更复杂了。

卡师：复杂永远是复杂的了。所以没有老祖宗不行，老祖宗比我们厉害啊，他们知道三百年，我们反而不知道了。

桂老师：老祖宗的那个三百年呢，可能是一个实证的观察。文明的兴衰，是很早很早就有的事。

卡师：那肯定是的啊，三五古代就有了，也不是我们独有的，为什么古代人不知道三五呢？任何人都会观察到这种兴衰。

踢星星：其实对于历史周期性的这种直觉印象，应该是很多地方很多时代的人共有的。比如说赫勒敦也讲文明的腐败与重生，年鉴学派也讲地中海的深呼吸，都是历史周期性。

卡师：对啊。如果我们只是观察人的话，这些前人的这些思考就变成了段子，最后就遗失在历史里面了，Lost in time，那就太辜负他们了。我们要观察自然，所有的一切都是研究的题材，自然是千秋万世的，人来来去去，只有定律长存。当然你要把兴衰自然化，那是很难啊。还有另外一点，星师说过，城市是动员的中心。我把三五泛泛的说，那么城市也会有自己的三五，虽然比起大的文明三五短多了。最重要的是城市的繁荣，会搬来搬去，不然驻马店永远都是中国中心啊，对不对啊？城市的三五也是有尽头的，然后要搬去到另一个地方，文明也是一样嘛，搬来搬去。这其实就是权力的转移啊。

踢星星：城市的三五，也是这种历史周期性的一部分。卡师你所讲的，和黑格尔讲的世界精神一个道理嘛。

卡师：是啊。我们的皇帝也搬来搬去啊，也就是这个意思，一样的。这不是神话，都是历史。

踢星星：世界精神的代表从这个民族移到下一个民族，这个区域搬到另一个区域，这样一个序列，是从各文明的三五上抽象出来的。比如说 R 系秩序的文明，它的盛衰循环，可能在人均耕地十亩的时候达到了一个发展的高峰，往后就是下坡路了，而另一个 R 系秩序的文明比如法国，那可能它的高峰在绝对主义兴起的时候才到来。那你看这个全世界范围内这种“世界精神”的三五呢，它实际上是在每个区域自己的三五上抽取出来的，把很多个区域放在一起看，那就有起有伏，对吧？

卡师：嗯，那就放在年表里面一起比。不过我就觉得绝对主义兴起的时候，已经算是衰落了，顶点就是刚刚说的，12 到 15 世纪差不多，差不多黑死病之前那个时代。

踢星星：是的，放在年表里面一起比，然后抽出在各文明的三五中抽出高峰来，把这些高峰连成一条线，就呈现出黑格尔所讲的“世界精神”的转移。当这个高峰来到西欧的时候，就像斯宾格勒说的，这是日耳曼人的时代了，其他人的高峰过去了。

卡师：他自己吹呗。

踢星星：哈哈，对，他自己吹吧。

卡师：倒不是了，要知道我读斯宾格勒是比任何人都多了，他是讲衰落的，欧洲是衰落的，衰落才变罗马帝国，他想象中的罗马就是在柏林啊。问题是这想象没有发生，柏林什么都不是了，黑路啊。他其实是很悲观的，看世界很暗淡，他不是说罗马帝国是好事情，罗马帝国是很悲哀的事实，但是他觉得罗马帝国就在这里，演变到罗马帝国无可避免。

踢星星：从某种意义上说，斯宾格勒的柏林构想本来是对的，如果没有美国人来插这一脚。希特勒的柏林建设宏图就会成为现实，它就是新罗马，就是新罗马帝国的中心嘛。

卡师：对啊，美国人来把大事坏掉了，就跟英国人把查理五世的大事坏掉一样。不然欧洲就要大一统了，就要统治世界了，这么可怕的事情。

桂老师：这个系统支撑不了那么多人，哈哈。到了那个时候，就说卡师说的，又要开始收缩了。

卡师：那个不叫收缩了。扩张与收缩那个不是我们想象的一个物体大小变化的意思。扩张就是我向外望，那个叫扩张，以后你来看去看没有尽头了，已经把整个世界都征服光了，那个就叫收缩。就是我扩张的时候好像没有尽头，但是其实有尽头，世界全征服光了。

桂老师：我大概明白了，到了尽头，那就开始向内嘛。

卡师：不是向内，现在是没有地方再扩张，好像美国去到了加利福尼亚，去到了三藩市了，没有了，冲出去了，那就应该修一个长城，防止太平洋那一端的日本人中国人冲过来了，就是这样子。

踢星星：我理解那是到顶了，停滞了。设想一个没有 K 系的世界，所有的地方都是 R 系，是不是最终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最终就会大家成为一个完整的 R 系实体，扩张到极限，然后陷入停滞。

卡师：你就说汉武帝，把中国的版图都征服光了，他还要到菲律宾去干嘛，开玩笑，台湾他都没有过去，哪里还能去菲律宾。

踢星星：他的动员能力支持不了那么大的国家。

桂老师：对，系统支撑不了这么大。

卡师：就像我们现在要征服冥王星木星一样，这么远的地方不可能啊，我们去不了，也不会想要去这么远的。火星已经太远，那个时候海南岛对中国就跟火星一样远。像交趾后来就闹独立，对不对，跟我们汉朝打仗啊。

踢星星：扩张，收缩，停滞，敌我，我对卡师所讲的三五有一些理解了，那我试试用类型论的视角来看三五。卡师前面说过，三五是什么？三，三百年，轴

心，兴起，五，五百年，大一统，盛极而滞。这其中大致就是一个欧亚大陆上的 R 系属性文明，从初兴到第一个人口波峰而后衰退的历程。前面我们讲到过，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变化，是社会演化的两类重大动力。古代历史上，这样的重大动力出现的机会并不多。农业的出现，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生产能力进步的起点，使文明成为可能。青铜器的出现，是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进步，带来古典文明的兴起，但是青铜稀少，主要用于武器礼器，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对生产能力的进步影响不大。然后铁器出现了，和青铜器不同，它能够大批量地生产，普遍地用作武器和农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同时造成了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的重大进步，由此引发的欧亚大陆上各古代文明的第一波高潮，所谓轴心时代，这也就是早期的三五之三，循着 R 系道路的宿命，在高环境风险下的人口迅速增长，社会斗争日趋激烈，社会结构日趋两极化，内部矛盾外部化，这就是轴心时代推动兼并与扩张的根本力量，最终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也就随之到来了，这就是早期的三五之五。但是铁器时代的动员能力终究是有限的，兼并与扩张达到了支撑能力的极限，随着粮食生产波动的而来的社会震荡之下，收缩将会到来，在此之后，就是一个 R 系古代文明漫长的颠簸历程，在颠簸中陷入停滞，在内与外的敌我之争中困守。当然，这是抽象的模型，真实世界中的变化远比抽象的 K-R 模型要复杂的多了。世界各地农业条件不同，随着气候的变化与联动，比如影响欧洲的中世纪暖期与唐宋之际的降雨带南移，和随之而来铁器农具的变化，比如西北欧的重犁与中国南方的曲辕犁，西北欧与中国南方这些区域在较晚的时候才进入农业繁荣期，由此带来一波有别于轴心时代的次级三五，造就了中世纪文明的高峰。中世纪以来的这一波次级三五，虽然它们自身仍然走在 R 系社会秩序的老路上，但是它们引发了不同的附带效应。唐宋以来，中国北方农业衰退，新开辟的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由于对于季风降雨的依赖和边际劳动投入的增加，带上了更强烈风险性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暖期使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农业兴起，除了这一区域自身风险性质较弱之外，更进一步的，在承接了来自欧亚大陆各古代文明的成果之后，英格兰这一完全的低风险农业区兴盛起来了。现代社会的道路，就是由伴随这一波次级三五而产生的，英格兰这一边缘但却是异质的 K 系社会秩序所开辟。过去的五百年中，以英格兰为代表的 K 系社会秩序在全世界日渐兴起，由此带来了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动员能力的飞跃，也带来了以绿色革命为标志的生产能力的飞跃，轴心时代以来的旧三五正在消亡，工业革命以来的新三五正在兴起，至今我们仍然身处这一历程之中。

（全部访谈结束。2018 年 12 月 20 日）

第三节：“最有挑战性”的问题

2005 年,《科学》杂志在它的创刊 125 周年纪念刊上发表了“未来 25 年间”有待解决的 125 个“最有挑战性”的问题,其中有五个可以被视作是对“国富国穷”这一政治经济学首要问题的深化与发展,它们是:

(<https://www.sciencemag.org/site/feature/misc/webfeat/125th/>)

No16: 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化的? (How did cooperative behavior evolve?)

No25: 马尔萨斯仍将是错误的吗? (Will Malthus continue to be wrong?)

No116: 为什么一些国家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停滞? (Why do some countries grow and others stagnate?)

No118: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密切相关吗? (Ar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freedom closely tied?)

No119: 为什么改变撒哈拉以南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成效不佳? (Why has poverty increased and life expectancy declined in sub-Saharan Africa?)

总结本书,在前面的各章节里,我们已经从历史,社会和经济多个视角,展开了有关于环境风险与人类社会之间相互作用的一个新论述。从这个论述出发,《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所依赖的三篇论文所强调的制度因素,其发生根源都可以追溯到特定地理环境下的农业风险,AJR 三位作者对地理因素重要性的否定也就不攻自破了。有破有立,虽然 K-R 模型还有待于深入各种细节,但是它已经表述了一个基本的逻辑框架,深化和发展了前人的研究和思考,也为回答《科学》杂志所提出的这五个有关于国富国穷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尽管自 2005 年已经过去了不少时间,幸而 25 年的期限还在,我们还是来得及简述对《科学》杂志这五个问题的总结看法如下:

1) 合作行为是如何演化的?

人类有一定的生存环境,也有一定的应对环境风险的能力,人类之间的合作行为就在生存环境和应对能力这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之下演化,而这种演化并不一定是对合作行为的单向增强。

人类掌控自然环境,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使人类获得了超越其他生物的高度复杂的合作行为。进入农业社会尤其是一个大事件,一方面,它使人类获取生存资料的能力更强了,在单位土地上可以供养更多人口,生产力的进步为早期社会的分工合作创造了可能,开启了文明时代,另一方面,可以在早期生产力水平下开发的农业地带有其地理上的特殊性,也使得生存资料供应的

稳定性下降了，围绕存续风险的斗争为分工合作施加了封顶的上限。这一上限的持久存在，在人类文明积累和自然环境变化两者的合力推动下被打破，现代社会的高度分工合作由此而来。

2) 马尔萨斯仍将是错误的吗？

人口论所讲述的原理并未在人类的世界里完全失效，而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见在未来是否还会成真，既有赖于人类应对环境风险能力的进步，更有赖于自然环境对人类的善意。

事实上，迄今为止，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只在英美国家，只在二战后被绿色革命所覆盖的地区，才是“错误”的。历史上的两次世界大战，撒哈拉以南非洲现存的发展困境，背后都有着马尔萨斯理论的影子。只有更加普遍的绿色革命，乃至更进一步的科技与生产力发展，才能够使人类真正免于马尔萨斯的悲观预言。

3) 为什么一些国家增长而另一些国家停滞？

在影响国家发展道路的各种原因中，地理因素的重要性尤为突出。各个国家迈上持续增长道路的历史顺序，就取决于克服不利地理因素的门槛有多高，机缘在什么时候出现。

根据杨小凯的经济学模型，经济持续增长与起飞，就是交易条件越过阈值而达成分工演进的自我加速。迄今为止，各个国家经济增长与起飞的次序，基本一致于 Emmanuel Todd 传统家庭结构图上所标定的从原子家庭到社区家庭的次序，根据本书所论述的 K-R 模型，这也就是农业风险从低到高的次序。也就是说，经济持续增长与起飞的门槛，由克服地理困境的门槛而确定，因为越过这门槛就意味着交易费用基准充分降低，意味着有可能达成经济增长与起飞所需的交易条件阈值。

4) 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密切相关吗？

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是社会秩序这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表象。两者互相交错，互相影响，但不能互相解释，因为那等同于一种循环因果。对农业风险的克服，才能够让两者互相推动的过程持续下去，达成一个合乎理想的收敛状态。换句话说，政治自由与经济自由是同一根藤上的两只瓜，尽管两者互相影响，但是它们彼此之间的影响力远不如农业风险这根藤对它们的影响力来的大。

5) 为什么改变撒哈拉以南地区贫困状态的努力成效不佳？

撒哈拉以南地区要走上经济持续增长与起飞的道路，首先就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来克服比其他地区更为不利的地理条件。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一方面要面对高原大陆和港口缺乏等因素所造成的交通运输困境，一方面要承受热带环境所带来的高水平农业风险，要改变这种局面，就需要巨大的投入来改善农业生产和交通运输。而正如杰弗里萨克斯所言，以 2002 年为例，美国给到当地人民手上那每人 6 个美分的援助，是不足以做到这一点的。

一直以来，各种历史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研究对于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都有所描述，但是相比较于 K-R 模型，它们或者对于风险因素在这种互动中的作用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未能为风险因素在这种互动中的作用方式给出一个简单而易用的模型。正是在这一点上，K-R 模型取得了进展，它的指向是明确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与停滞，就其起点而言，有着非人力所及的风险因素在起着巨大的作用，是地理环境而非人的意愿，决定性地影响了各文明在绿色革命之前的历史道路。而比较各个国家的发展史，无论是英美的资本主义兴起，还是中国的工业化腾飞，都启示我们这一判断：

一个国家要成功的发展，就必须有机缘克服不利的地理条件。以农业风险降低和交通运输改善为基础的交易条件好转，是该国摆脱停滞，经济起飞的前提。而好的交易条件是否能够保持和改进，则是增长能否持续的根本。

人类在生命世界里至高地位的虚幻想象，被达尔文的演化论所纠正，社会现象中的循环因果所造成的各种迷惑，也在 K-R 模型的解释下消退。这一论述有助于我们更加清醒地看待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处境，或许有人会认为它的指向造成了某种挫折感，但是相信这并不会削弱我们的勇气，而是会帮助我们更好的生存下去。

现在，让我们引用一句古语来回答这种挫折感，并结束本卷：

“真理使人自由”。

(上卷终)

（下卷）历史：现代世界的缘起

上卷以马克思和达尔文的思想为基础，构建了一个新的范式，来作为解决“国富国穷”问题的逻辑起点。本卷尝试结合众所周知的知识与理论，来呈现这一范式，并且，遵循“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理论原则，把这样一个范式运用到历史考察中去，展现一个“类型论”的历史观察角度。

第一章：小分流

马克思在他对“所谓原始积累”的批判中与古典政治经济学及商业化模式实现了彻底的分道扬镳。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创设的一般原理-具体而言，即财富本身并非“资本”，并且资本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被用于分析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根据这一原理，马克思认为简单的财富积累并非资本主义起源的决定性因素。古典政治经济学中所提出的“原始积累”之所以是“所谓的”

(so-called)，乃是因为在马克思看来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而不仅仅是某种财富或收益，因而单纯的积累本身也就无法催生出资本主义。尽管财富积累是资本主义得以产生并发展的明显的必要条件，但它却并非充分甚或决定性条件。实际上，是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最终促使财富转化为“资本”。

埃伦·M·伍德：《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阈下的长篇综述》第二章

第一节：斯密的现场记录

世界上的第一个现代经济，起源于英国。如果我们把英国定义为现代经济道路上的“先进国家”，那么相比于它，任何其他欧亚大陆国家，都是这条道路上的“后发国家”。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这一“道路分歧”，就是所谓的“小分流”。那么，英国这一“先进国家”，和欧亚大陆上的众多“后发国家”相比，它的道路特殊在哪里呢？这一道路分歧的发生，离开我们已经数百年了，在迄今为止的众说纷纭中，并不能有一个决定性的答案脱颖而出。为了获得更加真切的理解，让我们回到那位生活在“事发现场”的伟人，亚当·斯密的观察和记述中去寻求启发。

亚当·斯密在他的伟大著作，也是经济学的开端之作，《国富论》第三篇，“诸国民之富的进步”（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第一章，“论富之自然的进步”（of the natural progress of opulence）当中，描述了他心目当中财富增长的“自然”的顺序²⁷：

按照自然的顺序，进步社会的资本，首先是大部分投在农业上，次之，投在制造业上，最后，投在外国贸易上。这种顺序是极自然的；我相信，在各个有领土的社会上，都可以多少看见。在大都市成立以前，一定先开垦了一些土地；在有人愿投身于外国贸易以前，都市上，一定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

不过，这个自然的顺序，虽然在各个这样的社会，都不免在相当程度上发生，但就今日欧洲各国的情状说，这个顺序，却是就许多方面说，似乎完全相反。精制造业或适于远地贩卖的制造业，多由国外贸易引出。农业大改良，又是制造业及国外贸易生出的结果。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他们政府迫成的。他们原来的政府，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政府大大变革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郭大力，王亚南) (Chinese Edition) (第三篇，第一章，p. 286). 上海三联书店)

在斯密当时的观察中，我们今日所认为是现代经济道路上先进国家的英国，与那些欧洲大陆上的后发国家，它们的财富“进步”方式之间，有着极大的，乃至是“顺序颠倒”的分歧。这种先进与后发的分歧，在我们今天的“后见之

²⁷ 《国富论》第三篇，“of the different progress of opulence in different nations”，意为“不同国家的不同财富增长”。斯密的后辈，马尔萨斯曾经写信给李嘉图，认为“探寻国富国穷的原理，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中之重”。而《国富论》的这篇正是国富国穷问题研究的先声。它对斯密时代的国富国穷现象做了极好的观察记录，并对其原因作了初步的猜想，但是限于当时的工具和材料，斯密对于这一“重中之重”的问题，更多的是经验性的考察，并没有能够在理论上深入。这一篇在《国富论》当中，也只占去了 5% 的篇幅。

明”看来，也就是资本主义起源与否的分歧。在斯密的经验观察中，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是以农业进步²⁸为开端的。作为斯密心目中的“自然”状况，英国的农业进步培育了它的本地制造业，而后本地制造业的发展，又推进了远地贸易。而欧洲大陆的情况甚至是颠倒的，它们的农业并没有“自然”地进步，从而培育出本地制造业，反而是远地贸易推动了精制造业²⁹，才为农业的进步提供了刺激。但是，这种“反乎自然”的财富进步，是有它的负面代价的。斯密在描绘了欧洲大陆的商业制造业如何做了农业改良开发的原因，而不是结果之后，继续写道：

这种反乎自然的顺序，当然是迟缓不定的。试一比较以工商为国富基础的欧洲各国的进步，与以农业为国富基础的我国北美殖民地的急速的进步吧，你会知道，欧洲各国的进步，是多么迟缓啊。（亚当·斯密(Adam Smith).《国富论》（郭大力，王亚南）(Chinese Edition)（第三篇，第四章，p. 310). 上海三联书店）

当时的人，无法亲眼目睹后世美国的惊人发展。但是即使是在当时，英美国家这种由农业进步而“自然”发生的财富进步是如此惊人，已经使得欧洲各国迟缓不定的财富进步相形见绌。那么，这种跨过英吉利海峡的，先进国家的“自然”的进步，与后发国家的“反乎自然”的进步相比，为什么产生了这样巨大的优势呢？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对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这种差异，给出了一些描绘，但是他所熟知的是英国的情况，也就是所谓的“自然”进步，而对于海峡对岸的欧洲情形，他既没有亲身经验，也缺乏材料，因此并不能有太深切的了解，他可以描绘欧洲“反乎自然”的进步的成型，却不能指出何以英格兰式的“自然”的进步并未在欧洲发生。斯密所能够给出的，只是这样一个猜测：“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他们政府迫成的。他们原来的政府，使他们的风俗习惯，变成了这个模样。后来，这种政府大大变革了，他们的风俗习惯，却仍没有多大改变”。为了深入理解这一问题，我们需要在斯密的解说之外，另寻他途。

²⁸ 埃伦·M·伍德告诉我们，农业的“进步”，或者说“改良”，也就是英文的“improvement”，在斯密时代的英国语境下，它的含义并不是普遍意义上的农业方面的改善，而是耕种土地以获得收益，意指一种盈利性质的改善。它是顾准所谓“糊口经济”的反面，也是黄宗智所谓“没有发展的增长”的反面。-《资本主义的起源：学术史视阈下的长篇综述》第五章，资本主义产权的兴起与“进步”的伦理。

²⁹ 精制造业，适合于远地销售的高价值制造业，“奢侈品”制造业。

第二节：张五常的洞察与迷惑

要深入理解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财富进步的差异性，就要考察这种差异性的起点，农业的“自然”进步与否。对于久远的时代，我们现代人已经缺少了实地调查诸多材料的便利。因此，为着这种考察，我们首先试图从历史材料中有所发现。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告诉我们，不同的生产力发展，必然对应着不同的生产方式，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农业生产的进步是否“自然”发生这一分歧，必然也会在农业生产方式的对比上有所体现。这就指引我们，去考察英吉利海峡两岸，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农业制度的差异，而要发现这一差异并不困难，同样在《国富论》的第三篇，在“论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旧状态下农业的衰微”这一章当中，斯密就告诉了我们：

古代奴隶耕作制之后，逐渐出现了法兰西今日所称的麦太耶制 (Metayers)。这种制度，在拉丁文，叫作科罗尼·拔细里 (Coloni Partiarum)。在英格兰，这制度早已消减，所以，在英文中，我现在不知道它叫作什么。（亚当·斯密 (Adam Smith). 国富论 (郭大力，王亚南) (Chinese Edition) (第三篇，第二章，p. 291). 上海三联书店)

这种“麦太耶制”，本义是“对分制”，也就是我们今日所谓“分成制” (share-cropping) 的一个特例，五五分成³⁰。斯密告诉我们，在他那个时代，英格兰已经没有这种制度。而欧洲大陆上，分成制还是普遍存在的。在斯密心目中，从农奴制，到分成制，再到英国所盛行的定额长期租约，这是一个农业制度的进步阶梯。斯密本人是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一员，对于理性与进步的信仰，是那个时代的特征。因此，斯密把欧洲大陆到英格兰的农业制度差异，看成了进步的各个顺序阶段，这是毫不奇怪的。在这种历史观念之下，整个的人类历史，就是一个长长的进步阶梯，欧洲只是“落后”，而英国则是曾经“落后”的先进。差异是存在的，但是这并不妨碍各方都在同一个阶梯上进步，各方的差异，只是进步阶梯上不同台阶的展示，而历史道路的分歧，则是不存在的。正是在这样一种历史想象之下，英格兰的农业进步何以并未在欧洲大陆发生，在斯密看来也并未值得特别深究。于是，对于这样一个根本性的溯源问题，斯密就只是以一个猜想一笔带过了。

但是，先进国家和后发国家之间的农业制度差异，果真是如此简单，又如此不重要吗？在《经济解释》第四卷，《制度的选择》一书中，华裔经济学家张五常对于斯密心目中这一农业制度的“进步阶梯”，提出了挑战。

³⁰ 分成制本身是变化多端的，并不限于五五对开。张五常在《佃农理论》中曾经记载，根据他所看到的从 1932 年起的中国二十二个省份的调查资料，佃农分成制下，地主分成的比例可以高至 69%，低至 29%，法国的分成制度，同样也不限于五五对开的“麦太耶制”。

我们要怎样看斯密的制度进化分析呢？有两点。第一是他说的**事实**不对。考查英国的历史我找不到佃农制度曾经在该国存在，不仅是很久以来没有。……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年期短暂的农地租约在英国历史上没有记载。……无论西方或是亚洲，佃农可以续约，但每约很少超过三年。……

斯密最严重的错是他认为佃农制度会遭淘汰。今天地球上很多地方，不仅佃农合约存在，分成合约的普及可见于石油工业，百货商场，而如果没有政府或工会的左右，很多律师在某些案件会跟顾客以分成算账。……

第二点更麻烦。不管斯密在事实上的错，说制度的演进会朝着经济效率高的方向走是合理的，说在局限约束下人类会争取利益极大化顺利成章。然而，……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例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我推不出是哪些制度费用（交易费用）的怎么样转变会导致两个各走一端的不同效果（《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张五常，第二版，2014年，第四章，第二节）

张五常在他对斯密的挑战中，首先指出了佃农分成制在英国历史上并不存在。更进一步的，他指出了分成制不仅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佃农制度中长期存在，也在非农业的其他经济制度中广泛存在。由此，斯密把农奴制，分成制，长期固定租约制排成一个进步阶梯，认为后者必定依序代替前者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这些不同的制度各自有它存在的理由，可以，并且事实上也的确并行于世。但是对于分成制的起因与效率，张五常的解释在洞察之余，也出现了缺失。于是，更进一步的，与这种制度差异相关的制度变迁问题，也让张五常感到迷惑。接下来，我们就深入考察这些问题。

在张五常出版于1969年的博士论文《佃农理论》当中，有名为“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的第四章。在这一章中，张五常以中国的资料为例，考察了分成合约的产生原因。

对于为何存在着不同类型的合约安排，我们至少可以给出两个原因。首先是自然风险的存在，此处定义为自然界或者世界状态对产值的方差（或标准差）的影响。给定预期产出（签约各方的总收入）的方差为正，不同的合约安排意味着合约当事人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收入方差分布。在风险规避的假定下，人们会寻求规避风险，只要这样做的成本小于收益。规避风险可以采用多种方式，比如搜寻关于未来的信息（即使付出无穷大的成本也未必能够获得），选择风险较低的投资项目（包括资产多样化），或者选择将风险分散给其他人的安排-比如保险或者多种合约安排。……存在多种合约安排的第二个原因与不同合约所涉及的不同交易费用有关。交易费用不同是因为要素与产出的自然属性

不同，制度安排不同，不同的合约条款要求在合约执行与谈判中付出的努力不同。（《佃农理论》张五常，第四章，“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进一步的：

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实现分散风险而获得的收益最大化。（《佃农理论》张五常，第四章，“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就农业生产中的合约安排而言：

合约的选择取决于在分散风险所获的收益与不同合约涉及的交易费用之间的权衡。要解释在不同的地方存在着不同的合约选择模式，两种因素看起来都很重要。首先，农作物的不同自然属性及不同的气候类型常常导致产出在不同农业地区存在不同的方差。其次，不同的法律安排-比如强制性的或补贴性的农产品保险-既影响收入的方差，也影响签约各方所涉及的交易费用。（《佃农理论》张五常，第四章，“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进一步的，还有：

第三个因素：不同的市场安排对合约的选择也会产生影响。

.....

实际上，法国佃农制度中的承包商，中国的与固定地租相伴的免责条款，以及其他地区与分成地租相伴的最低保障条款，都是不同的市场做法，介于完全固定地租和完全分成地租之间，是一种中间性安排。其中每一种都涉及不同的风险分布与交易费用，因而拓展了合约安排的选择范围。（《佃农理论》张五常，第四章，“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如上所述，“合约安排的选择是为了在交易费用的约束下实现分散风险而获得的收益最大化”，这是张五常的一个了不起的洞察，但是，他没有能够进一步的分析决定了合约选择的这三个因素，并且，由此模糊了农业风险与交易成本之间关系。我们在这里补充如下：

首先是农业风险问题。农业风险是客观存在的，正如张五常所说，它来自于自然或现实世界的状况对农业生产所起的作用，不同的地理环境适合不同的作物，而作物的生物特性，以及该地理环境下的气候特征，都会对农业生产的稳定性造成影响，归根结底，它是一种自然与环境的因素。从根本上说，它是在人的掌控之外的，尤其是在前现代社会中，更是如此。

对于是否要把这样一个在人类掌控之外的因素纳入到理论考虑当中来，张五常是抱有深刻的反感的，因为考虑风险因素，就必须考虑统计推断，而张五常对于统计推断这样一种思维方法的意义和效力疑虑重重。虽然他也认识

到，“我认为我对新制度经济学影响最大的，还是一九六九年发表的《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但是在回忆《佃农理论》的写作时，他写道：

《交易费用，风险规避与合约的选择》一文，有两个方面的不良影响。第一个方面是“风险规避”-佃农分成可分担风险。当年，我自己的直觉，是合约的选择完全是交易费用的问题，与风险无关。在 68 年初的多个苦寒之夜，我三次除掉“风险”，但也三次加回去。……，要是今天重写该文，我可以心安理得地把风险除去。以风险作为选择合约的一个因素，大为不善，因为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这样，以风险为基础，我们是不能引申出可以被事实推翻的含意的。……（《“佃农理论”的前因后果》张五常，2000 年）

这是张五常对于人类的风险感知能力，或者说统计推断能力的极大误解。风险的确是包含着不可知因素，这是毫无疑问的，否则就不存在风险这回事了。但是，它并不就等于不可知，在人类的观照之下，它是介于可知与不可知之间的。“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不能望出窗外，就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张五常的这句表述并无疑问，对于风险及其变化，我们确实没有这种“向窗外一望而知”的能力，但是，为了满足生存所需，我们对于风险及其变化的感知能力，也不需要达到这种神一般的水准。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抛出一个硬币，我们的确无法判断它落下后是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也就是说，对于一个具体的风险（概率事件），作为平凡的碳基生命，张五常说的对，我们的确不能“向窗外一望而知”。但是，如果我们一次次的抛出硬币，凭着统计推断的能力，我们是知道它正面朝上还是反面朝上的机会是差不多的。也就是说，对于经常性发生的，有着稳固模式的风险，我们是凭着统计推断去认识它的，进而，对概率事件的长期记录作出统计推断，我们也可以知道“世界的风险是增加还是减少了的”，尽管它的确不是“向窗外一望而知”那样容易。而农业风险，正是这样一种可以被认识的风险。

关于农业风险，正如前文所述，张五常已经正确的表述了，它是由归结于地理环境的，生物的和气候的因素所造成的，因此，它是客观的。这些因素虽然不是永恒不变的，但是同一个地方，它的适用作物，它的气候特征，都是相对稳固的。每一年的农业风险（作物产量的具体变化），固然是不可知的，但是年复一年，我们就能根据经验加以统计推断，认识当地的农业风险（水平是高还是低），并且，如果风险状况发生了变化，风险水平增加了，或者减少了，那么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与实践，我们也同样能够根据经验而加以统计推断，从而对已有认识做出调整。这并不难，生物学研究告诉我们，猿类都有这个能力，甚至，2020 年 3 月份发表于《自然-通讯》的一份论文证明，鸚鵡（新西兰啄羊鸚鵡）也有着同样的统计推断能力去认识概率性事件（风险），并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这种风险，改善自己的生存机会。既然为了生存机会，“to be or not to be”，鸚鵡也能对风险作出统计推断，我们人类就更加不必怀疑自

身的这种认知能力。

总结以上分析，决定合约选择的第一个因素，农业风险，它既是客观的，也是可以认识的。进一步的，既然它是可以认识的，那么围绕它的理论假设也是可以验证的。

接下来，我们继续分析决定合约选择的第二个和第三个因素，法律安排，以及市场安排（市场惯例）。

关于法律安排对合约选择的影响，张五常在《佃农理论》当中用“强制性的或补贴性的收成保险”来举例。这不是一个好例子，因为这样的收成保险，在广大的历史时空上来看，是非常局限的，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特殊情况。普遍而言，法律安排永远是合约选择的存在之背景和约束，并不局限于任何特定的历史时空。而市场安排更是如此，“惯例习俗”是无所不在的。张五常也引用西斯蒙第来说明这一点：

（西斯蒙第：）习俗同样能处理所有的契约，可以补充条款中没有表明的项目。（《佃农理论》张五常，第三章，第一节）

但是，对于广泛意义上的法律和市场安排，在《佃农理论》一书中都没有更深入的分析。就法律安排而言，《佃农理论》举出的是特殊案例，就市场安排而言，在列举了从法国，中国到东南亚的几种状况之后，张五常这样说：

至于为什么在不同的市场安排条件下存在不同的中间性安排，我不打算探讨这个问题。（《佃农理论》张五常，第四章，“交易成本，风险规避与合约选择”）

所幸在多年之后的《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当中，张五常补上了《佃农理论》的缺失，扩展了前述西斯蒙第的见解，就法律安排与市场安排给出了进一步的解释：

风俗与法律是市场合约结构的一部分。（《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张五常，第二版，2014 年，第三章，合约的一般理论）

由此，影响合约选择的第二个因素，法律安排，以及第三个因素，市场安排，本身就成为合约安排的一部分。正如前面所表述的，同一个地方，它的农业风险状况是相对稳固的，长久生活在该地的人，依据对于这种风险状况的认知，可以适应性的对合约安排做出固化的选择，这就是市场安排（该地的习惯性市场做法）的来由。张五常“不打算探讨”的“法国佃农制度中的承包商，中国的与固定地租相伴的免责条款，以及其他地区与分成地租相伴的最低保障条款”这样一些因地制宜的“习惯性做法”，“中间性安排”，也就是各地不同的农业风险状况之反映，在各地之间，这些风险状况因应于不同的作物属性与气候

特征而变化。

进一步的，法律则是以更加明确和更加系统的方式，对“风俗习惯”做出确认和调整，因此法律安排，根本上和风俗习惯是同源的。法律安排和市场安排，无非是以不同形式出现的，适应于该地风险状况的合约模版，它们对于风险认知的不同层次上的抽象，互为补充。由此，前文中张五常对（在农业当中）决定合约选择的三个因素的列举，就可在根本上归结为第一因素，也就是农业风险。（在农业当中）决定具体的合约选择的，就是对该地风险状况的一般性的（反映在惯例和法律当中的）历史认识，加上特殊性的当前判断。而该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则是这种风险因素在合约安排中的表现。也就是说，一个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是因应该合约安排所适应的风险状况而决定的。这样，我们就走向了与张五常相反的思考路径，把交易成本归结为风险因素，而不是相反，也就是说，用一个“唯物论”的认识路径，代替了一个“唯心论”的认识路径。

在修补了张五常的合约选择理论之后，我们回过头来看张五常关于“制度进化”的疑惑：“一方面我们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显示着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是朝着减低交易费用的方向走；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例举倒转过来的增加交易费用的情况”。如前所述，我们已经分析了农业生产中，合约安排的交易成本决定于该安排所面对的风险状况，由此，就可以简单直接地做出以下推演：合约或制度的安排中的交易成本或升或降，即是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所依赖的风险状况有所恶化或改善。当然，这一推演会立刻引起疑问，因为前面我们所修补的张五常的合约选择理论，背景在于农业生产，而普遍意义上的“合约或制度的安排”当然不限于农业生产，那么这种普遍意义上的“合约或制度的安排”，或者说，“制度变迁”又是依赖何种风险状况呢？

农业产品，是农业时代以来人类生存的基石。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农业产品的作用是普遍，重要，而且持续的。农业风险，首先是确定了农业生产中的合约安排，或者说制度安排的选择。进一步的，就短时段而言，农业产品在供求两方面都是缺乏弹性的，供过于求，会造成价格的急速下跌，而供不应求，又会造成价格的急速上涨。就长时段而言，农业生产的不稳定性，还将强化人口扩张，从而恶化农业产品的供需风险。由此，农业产品的价格波动，会显著地影响劳动力价格的稳定性，而一切社会产品都由劳动创造，因此农业产品的价格波动，也就经由劳动力价格而显著地影响一切社会产品价格的稳定性。经验上，我们也知道一旦农产品涨价，整个社会的各种产品都会次序涨价而造成显著的通货膨胀³¹。而普遍意义上的合约或制度安排，总是有关于某种社会产品的交换。由此，农业风险也就显著地造成了一切社会产品的价格不确定性，从而显著地影响一切合约或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或者说，构成了一切

³¹ 这个价格传导过程早已为人所熟知。清代乾隆皇帝就曾说：“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无不准此递加。”

合约或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基准”。由以上分析简单地推演，农业风险状况的改变，也就是风险水平的上升或者下降，就会导致一切合约或制度安排的交易费用上升或下降。长久以来为人们所疑惑的“制度变迁”的根源，也就由此得到了解释。

第三节：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

在理论推演之后，我们来进入“历史与逻辑相结合”，在资本主义起源这样一个历史过程当中，结合经验材料，来分析《国富论》第三篇所提示我们的，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与“反自然顺序”之间的道路分歧。

《国富论》第三篇当中记载了英国与欧亚大陆之间的农业制度的差异。英国盛行的是长期固定地租制度，而欧亚大陆上从法国到中国乃至东南亚，盛行的是各种中间性安排的分成地租制度，它们所反映出来的，是不同地区上不同的农业风险状况。或者说，各地区不同的农业制度，都是人类行为对于各自所在地区的农业风险状况的适应性表现，由于作物属性和气候类型这些自然因素的相对稳固性，这种风险状况是也是相对稳固的，因此，正如张五常所发现的那样，农业制度的存在都是长期性的，它们并不会像斯密所想象那样，彼此之间按照“效率”的高低自然“进化”。

那么，这些长期存在的农业风险状态，以及相应的农业制度，在影响了普遍性的“合约与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又是怎样地影响了长时段上的经济增长，从而造成了如斯密所言的，财富增长在英美国家的“自然的顺序”与欧亚大陆上的“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之间的分歧呢？对于这种“道路分歧”，也就是资本主义起源与非资本主义起源的“道路分歧”，正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以及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罗伯特·布伦纳对农业资本主义的研究，做出了最具洞察力的描述。

首先让我们回到马克思。马克思讲述了一种有别于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李嘉图，等等）的，全新的“资本”原理，“资本”不是财富本身，而是一种具体的社会关系。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当中，马克思写道：“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生产关系）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有的社会性质”，由此，简单的财富积累并不是资本主义起源（也就是发生在英国的，斯密所谓的“自然顺序”的财富增长）的决定性因素，资本主义的真正起源，是一种社会产权关系的转型，正是这种转型，导致了财富的“自然”增长：

货币与商品，正如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一样，开始并不是资本。但是这种转化本身只有在一定的情况下才能发生，这些情况归结起来就是：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值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也就是劳动的出卖者。自由劳动者有双重意义：他们本身既不像奴隶，农奴那样，直接属于生产资料之列，也不像自耕农那样，有生产资料属于他们，相反地，他们脱离生产资料而自由了，同生产资料分离了，失去了生产资料。商品市场的这种两级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资本关系以劳动者和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之间的分离

为前提。资本主义生产一旦站稳脚跟，它就不仅保持这种分离，而且以不断扩大的规模再生产这种分离。因此，创造资本关系的过程，只能是劳动者和他的劳动条件的所有权分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一方面使社会的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产者转化为雇佣工人。因此，所谓原始积累只不过是生产者和生产资料分离的历史过程。这个过程所以表现为“原始的”，因为它形成资本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产方式的前史。（《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一节，原始积累的秘密）

这种转型，是发生在英国乡村的独特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写下了他对这种转型的观察：

在原始积累的历史中，对正在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起过推动作用的一切变革，都是历史上划时代的事情；但是首要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强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资料分离，被当作不受法律保护的无产者抛向劳动市场。对农业生产者即农民的土地的剥夺，形成全部过程的基础。这种剥夺的历史在不同的国家带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顺序，在不通的历史时代通过不通的阶段。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们拿英国作例子。（《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一节，原始积累的秘密）

这两种商品所有者（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的对立和接触，是有前提条件的。在这种对立和接触，也就是资本主义形式的分工合作当中，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以确定性的价格购买自由劳动者出卖的劳动商品，也就是支付自由劳动者在未来劳动成果中所占有份额在当下的贴现，以换取这价值不确定的未来劳动成果中的份额，他所谋求的，是未来的收益可能性。与此相应，自由劳动者以确定性的价格出售劳动商品，也就是放弃未来劳动成果中自己所占有的份额，以获取当下可用的贴现，他所谋求的，是当下的收益确定性。但是，如果不存在一个价格高度确定的生产和流通过程，那么这两方面的商品所有者在他们的分工合作中，双方所谋求的，未来收益的可能性或者是当下收益的确定性，都是不存在的，因为对于双方来说，这都是一场“久赌必输”的游戏。由此，我们就可以从马克思所阐发的，全新的“资本”原理上再进一步：

“资本”是一种基于高度的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的生产关系。

而这样一种“对立和接触”，之所以能够在英国发生，并且“具有典型的形式”，正是因为英国的特殊的农业风险状态。正如张五常的记述：“永久或近于永久的农地租约，在中世纪甚或更早的时期在英国普及”，英国自中世纪以来所盛行的长期固定地租制度，表示这里的农业风险水平极低，农业产出高度稳定。这种高度稳定的农业产出，为农业产品，乃至一切社会产品的价格确定性提供了保障。这是特殊的地理环境所决定的，事实上，有记载表明，在一个长达一百年的英国年度降雨量统计中，有 50 个年份变化低于 10%，80 个年份变

化低于 20%，只有 2 个年份的变化超过了 50%。正是这样的农业环境和农业制度相互作用，经过了一个漫长的演化过程，造就了资本主义农业和最初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以及与他们“对立和接触”的自由劳动者-农业雇佣工人。由此，我们再进行表述：

“资本”是一种基于低风险农业生产的社会关系。

马克思对这种低风险状态所孕育的“资本主义”起源过程做了如下的记述：

现在要问：资本家最初是从哪里来的呢？因为对农村居民的剥夺只是直接地产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说到租地农场主的产生，我们是能够弄清楚的，因为这是一个延续了许多世纪的漫长过程。农奴本身，此外还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处于极不相同的财产状况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经济条件下解放出来的。

在英国，最初形式的租地农场主是本身也是农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罗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过活动范围狭小一些。在十四世纪下半叶，管事被由地主供给种籽、牲畜和农具的租地农民所代替。这种租地农民的地位同农民没有多大的区别，不过他剥削更多雇佣劳动。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他筹集农业资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则由地主提供。双方按合同规定的比例分配总产品。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农场主，他靠使用雇佣工人来增殖自己的资本，并把剩余产品的一部分以货币或实物的形式作为地租交给地主³²。

在十五世纪，当独立农民和那些既当雇工同时又独自耕作的雇农靠自己的劳动而富裕起来的时候，租地农场主的境况和生产范围都同样是中等的。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开始的、几乎在整个十六世纪（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继续进行的农业革命，以同一速度使农村居民破产，使租地农场主致富。对公有牧场等的掠夺，使租地农场主几乎不费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数量，这些牲畜又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纪，又加进了一个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因素。当时，租约的期限很长，往往达 99 年。贵金属价值从而货币价值的不断下降，给租地农场主带来了黄金果。把前面已经指出的其他一切情况撇开不说，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资。工资的一部分变成了租地农场主的利润。谷物、羊毛、肉类，总之，一切农产品的价格不断上涨，不费租地农场主一点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货币资本，而他必须支付的地租，却是按照以前的货币价值签订在契约上的。所以，他是同时靠牺牲自己的雇佣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纪末，英

³² 马克思的这一描述：“他不久就成为分成农，半租地农场主”，“这种形式在英国很快就消失了”，正如前文中张五常所表述的，这是一个源于斯密的误解，马克思的这一描述，可能正是从斯密那里继承下来的。

国有了一个就当时情况来说已很富有的“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阶级，是不足为奇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四节，资本主义租地农场主的产生）

伴随着最初的资本主义--农业资本主义，和最初的资本家--租地农场主，以及与他们“对立和接触”的自由劳动者-农业雇佣工人的诞生，农业生产率得以持续改进，以脱离了土地的自由劳动者为消费主体的消费品国内市场也就因此而建立起来了，这就是斯密所谓的农业进步推动本地制造业这一“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也就是马克思所谓的“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马克思记述了这一过程：

我们已经知道，对农村居民断断续续的、一再重复的剥夺和驱逐，不断地为城市工业提供大批完全处于行会关系之外的无产者。这一奇妙的现象，使老亚·安德森在他的商业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预。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原始积累的这个要素。若弗卢瓦·圣伊雷尔用世界物质在那里的稀薄化来解释它在这里的稠密化，但是，与独立的、自耕的农村居民稀薄化相适应的，不仅仅是工业无产阶级的稠密化。虽然种地的人数减少了，但土地提供的产品和过去一样多，或者比过去更多，因为伴随土地所有权关系革命而来的，是耕作方法的改进，协作的扩大，生产资料的积聚等等，因为农业雇佣工人不仅被迫加强了劳动强度，而且他们为自己进行劳动的生产范围也日益缩小了。因此，随着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游离，他们以前的生活资料也被游离出来。这些生活资料现在变成可变资本的物质要素。被驱逐出来的农民必须从自己的新主人工业资本家那里，以工资的形式挣得这些生活资料的价值。国内农业提供的工业原料也同生活资料的情况一样。它变成了不变资本的一个要素。……

一部分农村居民的被剥夺和被驱逐，不仅为工业资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资料和劳动材料，同时也建立了国内市场。

事实上，使小农转化为雇佣工人，使他们的生活资料和劳动资料转化为资本的物质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时也为资本建立了自己的国内市场。以前，农民家庭生产并加工绝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费的生活资料和原料。现在，这些原料和生活资料都变成了商品；大租地农场主出售它们，手工工场则成了他的市场。纱、麻布、粗毛织品（过去每个农民家庭都有这些东西的原料，它把这些东西纺织出来供自己消费），现在变成了工场手工业的产品，农业地区正是这些东西的销售市场。以前由于大量小生产者独自经营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许多买主，现在集中为一个由工业资本供应的巨大市场。于是，随着以前的自耕农的被剥夺以及他们与自己的生产资料的分离，农村副业被消灭了，工场手工业与农业分离的过程发生了。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五节，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它持续了几个世纪，直到大工业时代的来临，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并建立完全的国内市场：

但是，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并没有引起根本的改变。我们记住，工场手工业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产生了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国历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现象所以会产生的一个原因，虽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国历史的人看到，从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多年起怨声不断（只是有时中止），抱怨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又看到，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主要原因在于，英国在不同的时代，有时以谷物业为主，有时以畜牧业为主，因而农民的生产范围也跟着变化。只有大工业才用机器为资本主义农业提供了牢固的基础，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和织布。这样，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场。（《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第五节，农业革命对工业的反作用，工业资本的国内市场的形成）

而相比于英国，盛行于欧亚大陆各国的，诸如“法国佃农制度中的承包商，中国的与固定地租相伴的免责条款，以及其他地区与分成地租相伴的最低保障条款”这样一些“中间性安排”的分成制，则表示这些地区的各种较高水平的农业风险状况。在农业产出不稳定，农业产品，乃至一切社会产品的价格确定性都无法保障的情况下，这些地区不但资本主义起源未能发生，并且在从先进国家移植现代经济的过程中也屡屡经受挫折。马克思所描述的“不但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更加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死人拉住活人”，就是对于欧亚大陆上后发国家社会发展的深刻总结。在这些地区，劳动与土地的分离迟迟无法完成，本地市场发育迟缓，无法像英国那样“自然”地成长为完全的国内消费品市场。有限的制造业则主要是所谓的“精制造业”，也就是为远地或国际市场而生产的，以奢侈品为主的制造业。一方面，这里没有资本主义化的农业生产方式（斯密所谓农业进步），不足以推动工业发展，另一方面，这种精制造业对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从土地上解放劳动者的农业进步的帮助，也非常有限。这就是斯密所谓的财富增长的“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对于这种欧亚大陆上的历史过程，美国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布伦纳，以法国为例，做出最好的描述：

鉴于农业收成的不可预测性，专门化就意味着要冒彻底失败的风险。在收成不好的情况下，粮食价格会因为供应量的减少而上涨。消费者因此可用于购买粮食以外的消费品的可能性就大为降低，因此会造成其他消费品价格下降。在这样的情况下，从事专门化生产的农民会发现自己被困在这样的剪刀差之中，即一方面要花高价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

非食物产品，这就减少了他们的收入。而当这样的剪刀差趋于极端，就会导致歇业，这可能意味着饥饿甚至死亡等灾难性后果。农民不能承受这样的风险，因此他们必须避免市场依赖和专门化风险，而更倾向于将“安全第一”和“生存型生产”作为再生产规则，即继续多样化的自给自足式生产，只在市场上交易自己生存需求之外的物质剩余。

农民的疾病和养老保障需求，也与专门化趋势相逆，因为他们的这一诉求具有本质上的“不经济”性——特别是为了确保家庭中有孩子能给自己养老送终，父母不得不生养更多的孩子以组建一个大家庭。但若是农民家庭依赖和服从竞争（即从事专门化生产）的话，这样的策略就不可行了，因为抚养更多的孩子不符合成本—效益原则，即抚养孩子的花费要比孩子能够给家庭带来的收益高得多，并导致农民经济单元的非竞争性。因此为保险起见，就必须专门避免专门化和承担由此造成的生存竞争。此时的明智选择，又是“生存型生产”。

而农民细分其份地之举也基于同样的原因，即为了给家中（将来可能给父母养老）的儿子提供物质支持以延续家族香火。和养育很多孩子一样，家庭份地的细分也是不经济之选，因为它会减小份地的面积并自然地导致经济效益的降低和竞争力的消弱。但农民却不得不为了生计和家族延续而细分土地，有鉴于此（再加上其他的理由），他们再次规避专门化，而选择“安全第一”的再生产规则。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为了对家中的儿子有利，父母一般不只是以细分土地的方式来为儿子组建新家庭提供物质基础，而且还会尽早筹办此事以便让儿子早点结婚。为了使这样的做法具有经济上的可行性，农民不得不避免市场依赖和专门化。

鉴于上述农民所选择的再生产规则，总体来看，农民会选择生存型生产，早婚，多生育孩子和细分田产，而这些都会规避专门化和引起（边际效益递减的）人口扩展。早婚和多子导致人口增加，人口增加又带来定居点扩展和田产细分，定居点的扩展继而造成更差的土地变成耕地，而田产细分则导致了土地—劳动力和资本—劳动力比的下降。这两种长期发展趋势共同造成了中世纪农业的必然趋势，即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其表现就是：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以及工农业产品贸易（相对价格）逆差。

这是一种与自足式增长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由于农业人均产出的减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即在 1700 年前并没有超过 12%~15%。或许最为关键的是，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当人口的增长越过某个临界点之时，就会导致饥荒，疾病并限制家庭规模。欧洲人口增长大约于 1300—1350 年以及 1560—1620 年间达到了极限，并随即引发 14 和 17 世纪“总危机”。这说明在 1100—1750 年间，不是稳定的经济和人口增长被一些短暂的停顿所打断，而是两个“农业大循环”，其标志就是长期的人口增长和

人均边际产出的下降，接下来就是以长期的人口停滞，衰减直至衰竭为特征的相反趋势的出现。（布伦纳，《从历史到理论：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见汉译布伦纳论文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第五章）

在这样的农业生产方式与人口再生产方式之下：

与英国相比，法国农业可以自由支配大量集中的农业劳动力（即秩序支付很低的工资），而没有为雇佣关系提供任何发展的机会；这很自然地会推动劳动密集型耕作方法的全面应用，而忽视了对资本以及可节约劳动力的技术的运用。没有可促使土地资本得到改善的刺激因素，地主也就没有理由停止对佃户的压榨。因此，即使有大量大规模，统一的农场存在的地区，其周围仍然有许多需要为了维持基本生存而将自己作为雇佣劳动力出租出去的小业主。农民土地所有制的强大势力，不仅于土地再细分（作为可分割的遗产）和在小块土地上迅速积累起来的农民人口密切相关，而且更重要的是，经济发展的滞后（工业及城镇经济），正是由业已建立的农民土地所有制的主导结构造成的-这种半农民，半无产阶级的农村格局，不同于英国的农业劳动力，后者几乎无处可去（渐增的土地压力意味着薪金水平的下降）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大加强了他们继续保留其小型土地的趋势。因此，农民的农业生产形成了另一个落后的恶性循环，并阻止了农业资本主义，甚至起外在形式（由大佃户使用雇佣劳动来耕种大规模统一的土地）的出现。（布伦纳，《欧洲前工业化时代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注 111，见汉译布伦纳论文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第六章）。

在这样一种历史进程之下，尽管法国人口在增长，土地单位产出在增长，但是斯密所谓的（盈利性质的）“农业进步”，马克思所谓的，体现为农业资本家-租地农场主和自由劳动者-农业雇佣工人之间的对立和接触的农业资本主义，在这里都无从发生。没有农业进步，没有农业资本主义，农业生产率持续低下，现代经济就不存在稳固的基础。欧亚大陆上持续不断的战争与革命，就是这样一种历史进程的产物。在“农业大循环”的阴影下，继“十四世纪总危机”和“十七世纪总危机”之后，欧亚大陆迎来了“二十世纪总危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³³。对于欧亚大陆来说，囿于它特定的农业生产条件以及由此引发的农业生产方式，农业生产率始终是低下的。最终，是普遍的绿色革命替代了英国式的农业资本主义，为欧亚大陆上的现代经济提供了基础。二战之后，伴随着绿色革命的逐步展开，欧亚大陆上纷纷扰扰了几千年的局面终于逐渐安定下来。中国的经济增长就是这一历史进程最为典型，而又最为宏大的体现。

³³ 有一种说法，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合称为“第二次三十年战争”，这个说法很好的体现了两次世界大战在历史进程当中的位置，某种意义上，它是“十七世纪总危机”的继承和重现，同样的，对于中国来说，更具体的，它也是明末战争的继承和重现。

第四节：圈地运动与公地悲剧

1833年，英国人威廉·福斯特·洛伊德（William Forster Lloyd，1794—1852）发明了一个有关于公共牧场的寓言。1968年，美国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1915—2003）对这个寓言做了发挥，写成了一篇名为《公地的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的论文，造成了广泛的影响。哈丁的论文要旨是这样的：“有一片公共牧场，每个人都可以在里面自由放牧。理性的牧人只有一个选择：多养一头牛，再多养一头……但是，这也是分享这片公共牧场的每一个牧人都会做出的选择。悲剧因此而起。在一个信奉公地自由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追求本人的最大利益，而整体会走向毁灭的终点。公地自由带来整体毁灭。”

有一个流行的神话，将英国圈地运动和公地悲剧的寓言附会在一起，并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产权学说加以解释，认为圈地运动的历史功绩，就是把过去“庄园公地”（common land）上为多人共同拥有的公共产权分割给个人，成为个人产权。在这个私有化的过程中，原来模糊不清的产权，变得清晰了。而产权清晰能够降低交易成本，进而有利于优化资源配置，推动了经济发展，英国的现代化即由此发端。

从1833年算起，这个似是而非的历史解释渊源已久。尽管它的早期形式并不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术语来表达，但是对私有权的这种崇拜是一脉相承的。私有权和公有权在这种叙事当中被对立起来，前者代表着历史的新方向，残酷却生机勃勃，后者只是历史的遗迹，温情却注定衰亡。

这种叙事的影响力巨大，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发挥着作用。研究者曾经花掉了很多精力，去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所有权究竟是公有还是私有。从历史记载上看，从远远早于西欧的时代开始，中国的土地所有权就开始私有化了。但是，私有化的土地所有权，却没有像西欧那样导向现代化。这样一来，历史材料就与叙事逻辑出现了矛盾。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为了将就私有权神话，有些研究者就倾向于认为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不是“真正的”私有，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既然是王土，那就是王有，国有。传统中国的农民中的自耕农都是“国家佃农”，自然也就不拥有“真正的”土地所有权，而所有兼并者的土地也还是王土，因此本质上不受法律保护。在这种解释下，传统中国的土地私有权就被消解了。但是，历史材料上关于土地买卖的材料也很古老、很充分，说传统中国的土地性质是私有，也并非讲不通。不同的解读倾向导致众说纷纭，在土地公有（国有）与土地私有的两级之间摇摆，造成了极大的混乱。

事实上，这种把私有土地解释为实质性国有的路数，对于西欧国家也是成立的。主权是最高所有权，即使是英国的土地，它的最高所有权也属于英国国王（女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对于英国一样成立。拥有自由土地的英国的自耕农也要向国家纳税，把这种赋税理解为一种货币化地租也未尝不可，他们不依附于贵族，但是依附于国王，把他们理解为“国家佃农”也同样成立。

由于最高所有权为主权者（国王或女王）所有，英国贵族或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也不是绝对的，同样有着被剥夺的可能，查查历史记载，丧失土地的世俗和教会贵族也比比皆是。因此，囿于公私对立的土地所有权分析，并不能解释东西方社会之间的差异。

进一步地说，现代化和私有化是一致的吗？也不是的。

圈地运动中的私有化，造成了更加清晰的产权，推动了资源的优化配置，进而推动了现代经济，这个神话看起来言之有据。但是，现代经济的典型特征是什么呢？是大生产，大生产的承载者是现代企业，它的典型形态是股份制，可能是多个人甚至是千千万万的人共有产权，它的成长过程是“逆私有化”，而不是“私有化”。如果说私有化推动了现代经济，而现代经济又推动了逆私有化，这样一个循环逻辑，只会让我们在“私有化推动产权清晰”这一叙事逻辑面前更加感到困惑，难道产权清晰的最终益处是带来了更多的产权模糊吗？因此，囿于公私对立的土地所有权分析，也不能解释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之间的差异。

要解决这些困难唯一的出路，就是抛弃这种神话叙事，澄清产权清晰的真义。

首先要明确一点，产权清晰不是私有化。因为从逻辑上讲，你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得到“绝对的”私有权。主权是最高所有权，即使你能够把私有化推向极端，拥有了罗马法意义上的所谓“绝对所有权”，从根本上，这个所有权仍然是你和主权，也就是和主权所代表的全社会共同拥有。只要你还是社会的一分子，只要你的所有权还存在，那么它根本上就还是一种“共同所有权”。也就是说，任何一种所谓的“私有权”，根本上仍然还是一种“公有权”。如果以共同所有者的多少来界定产权是否清晰，那么无论产权是你一个人所有，还是多人共同所有，在主权所代表的全社会面前，这一个或多个的人数都可以忽略不计。如果减少共同拥有人就是产权清晰，那么任何产权都永远也不可能清晰。因此，在公私对立的视角下讨论产权清晰，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产权清晰，究竟应该作何理解呢？

产权清晰的真义，是产权的价格确定。如果产权的价格是一个毫无疑义的共识，那么一旦出现了新的资源配置方式，让它有机会发挥更高的经济效益，就可以方便地通过产权交易改变它的所有者，从而可以把它投入到新的、更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中去。

这实质上就是对科斯定理的再解释。关于科斯定理，一向有多种表达，一种来自张五常的比较通行的说法就是：只要产权是清晰的（明确界定的），并且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那么无论将财产权界定给谁，市场运作的最终结果都是有效率的，也就是资源配置达到或接近于帕累托最优。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科斯定理的张五常表达是有歧义的。“产权是明确界定的”这个前置条件，和“产权界定给谁不重要”这个推论，就说明产权明确界定

的含义，并不是界定给某个人。因为既然结论是无论界定给谁都不重要，那么如果“明确界定”指的是界定给某个人，这就自相矛盾了。

因此，这里我们就要对产权清晰，也就是所谓产权是明确界定的，重新做出解释。这个解释很简洁，就是说，产权清晰（明确界定）和交易成本为零或者很小，其实是同义反复，其实就是价格确定性高的一体两面。也就是说，如果任何潜在的交易者对于产权价格都没有异议或者异议很小，那么，或者有争议它究竟是谁的，就可以方便地通过（法律）交易去明确地界定它归属于谁，或者已经明确知道它在谁的手里，就可以方便地通过（市场）交易去重新界定它归属于谁。换句话说，价格确定性就意味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交易费用为零或很小就意味着产权是可以界定的，这种界定行为本身也就是资源配置优化行为。

也就是说，产权清晰是产权可以被明确界定归属于谁的潜能，而不是已经被明确界定归属于谁的状况。

那么，什么情况下产权价格确定性会比较高，也就是产权清晰了呢？

还是让我们回到乾隆大皇帝的名言上：“天下无不食米之人，米价既长，凡物价、夫工之类，无不准此递加”。粮食价格是一切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基准，只要农业生产不确定，粮食价格就不确定，那么一切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就不能确定。关于这一切产品和服务的交易，就会因为潜在的交易者难以就它们的价格达成共识而遭遇障碍，由此，这个社会中的一切产权就都是不清晰的。

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理解，产权是否清晰，有一个基准度量，它是一个社会的农业生产确定性所决定的，该社会中所有产权共有的一个基准性质。脱离了社会环境，去单独讨论某个产权是否清晰，是一叶障目而不见泰山的迷失。在这个解释下，再来看英国历史和中国历史上的某些特殊问题，迷惑就迎刃而解了。

英国圈地运动中的所谓公地（common land），在庄园习惯法的管辖之下，并不是任意使用的，违反习惯法的行为会在庄园法庭上受到制裁。公地制度好端端地运行了几百年，从来不存在什么滥用而导致的公地悲剧。圈地运动的兴起，并不是因为有什么公地悲剧需要克服，而是由于生产的发展，使得公地有了改换用途并获得更多盈利的机会。由于英国农业生产的高度确定，社会产品和服务的价格也都是高度确定的，产权清晰是英国社会中所有产权的整体性特征。因此，调整公地产权，以达成更优的经济效率，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事实上，在英国圈地运动的过程中很少有暴力，绝大部分圈地都通过协议完成，顾及了各方利益，总体而言算是和谐的。圈地运动这个典型事例，就体现了科斯定理的真义：只要产权明确界定，交易费用低，不管资源在谁手里，甚至是有争议它究竟在谁手里，总可以通过交易去实现配置最优化。

英国现代化进程中股份公司的兴起，也是同样的逻辑。只要产权清晰，也就是产权价格的确定性高，那么就可以通过交易对这些资源进行重新界定、重新配置，从而获得更好的经济效益。至于这个重新界定、重新配置的过程，是像圈地运动那样搞私有化，还是像组建股份制公司那样搞逆私有化，并不重要，根据具体的盈利机会而定，都同样可行。

而欧亚大陆上的国家，则要面对相反的状况。由于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高，法国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中，获得了土地所有权的法国小农很难就土地价格与潜在的交易者达成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不断增殖，绝大部分农民拥有的土地反而日益缩小，法国的农业土地更加难以集中。进一步地，主权是最高所有权，任何产权都不免于主权通过税赋的利益分享，产权价格不确定，那么所有者和政府之间也就无法清晰地确定政府应得的税赋收益，就会造成彼此之间的争夺，法国经济也因此为赋税难题而困扰。所有这些农业的和非农业的不利状况汇聚在一起，各种因素都在阻碍着农业进步；相应地，法国股份公司的发展也大大落后于英国，所有这些根本因素和派生因素纠缠在一起，都在拖累大生产在法国的兴起。

传统中国有着与法国类似的情形，并且存在更为严重的农业生产不确定性问题，土地价格也就更加不确定，更加难以就交易达成一致。比如，中国小农不但拥有的土地很少，而且这很少的土地往往还分散在不同的地方，给耕作带来极大的不便。但是由于更为严重的价格不确定性，要把分散的小地块通过交易加以集中，也成为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政府与所有者在税赋方面的争议与争夺也就更为严重，这些与法国类似，并且更为严重的产权模糊状况也就成为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极大障碍。

第五节：盈利型租地农场 or 糊口式小农户

在那种水旱无常的粮食生产环境下，你的辛勤投入很可能因为不期而遇的灾害而打了水漂，但是在英国，粮食生产是稳定的，这意味你多一分投入就多一分收获还是靠谱的。所谓“信心比黄金还宝贵”，因此，改进农业生产方式与技术，增加资本投入，从而获得更多的收益，在英国是一种普遍的行为。无论是拥有大地产的领主，还是只有小地产的自耕农，各个阶层都积极投入到这种对农业进步的追求中来。在这样一个进步大潮中，有风险偏好的人，可以选择独立承担风险，谋求更多，有稳定偏好的人，可以选择规避风险，落袋为安。这两种选择各有利弊，但是可以互相配合，互相推动。在长期定额地租制的基础上，英国农业演化出了租地农场这种经营方式，租地农场主作为经营者，一方面向大地产拥有者租入土地，另一方面从小农中雇佣农工，这种特殊的、作为工业企业之先导的经营方式大发展，就成为英国农业革命的标志性特点。

农业生产并非流水线标准化的，规模效益有限，因此，租地农场并不能像大工业排挤手工业那样，完全地排挤家庭农场。到 19 世纪中期，租地农场在英国达到了极盛，这时期家庭经营为主的小农场（100 英亩以下）仍然占据农场总数的 2/3，不过，租地经营为主的中大型农场（100 英亩以上的）已经使用了 70~80% 的土地。雇佣劳动力也占到了农业劳动力总量的 80% 左右。

虽然规模有大小，效益有参差，英国式的租地农场和英国式的家庭农场一样，它们所追求的，都是英国人所谓的农业“进步”，也就是所谓的“improvement”，它的含义是改进生产，以求盈利。也就是说，英国农业的核心追求是盈利，而不是单位产出。在英国稳定和平的社会生活下，这是自然而然形成的，因为他们不追求耕战，也就不需要急吼吼地把收获都变成人口，堆积在有限的土地上。不过，相比于家庭农场，在租地农场这种经营方式中，对于盈利的追求是更加明确无误的。一个家庭农场或许可以为糊口而存在，而一个租地农场的产出远远超出了糊口的需求，它不盈利就一定会消灭，因为经营规模放大后，亏损起来也会难以承受。作为工业企业的先声，租地农场的生产经营方式也和工业企业有相通之处，它和现代企业一样有盈有亏，不是每一个都能活下去。但是，得益于英国高确定性的农业生产，以及随着而来的高确定性的物价和工资水平，这种扩大式的生产经营是有机会持续的，社会上总有它的生存机会，于是租地农场就逐渐地产生和发展起来。理解了租地农场的产生和发展，也就理解了工业企业的由来。因此，接下来我们就以租地农场为焦点，来考察英国由农业革命到工业革命的历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租地农场这种“英国特色”的由来，我们还要回到英国的变态封建主义讲起。

英国的封建制度，是跟随着诺曼征服从法国移植而来。但是英法两国的封建制度虽然出于同一个渊源，却很快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与欧洲不同，从欧

洲大陆移植来的封土换军役制度，在英国落地，却并未生根。这种制度在 1066 年诺曼征服后的第一个世纪中推行开来，但是很快地，在诺曼征服后的第二个世纪里，对国王的各种军役就开始被货币化的“盾牌钱”所代替，到了诺曼征服后的第三个世纪，爱德华一世在位期间（1272~1307），这种封土换军役的制度已经崩溃。国王不再依赖于贵族的军役，取而代之的，是国王用金钱去向贵族、自由民甚至是非自由民征募军队。

与封土军役制度的衰退相对应的是，在同一时期当中，英国也大量采用货币地租，到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货币地租已经在整个英格兰占优势。与国王一样，各级领主也不依赖于下级领主的军役，同样是一方面收取货币化的地租，另一方面用货币工资换取了脱离土地的随扈长期跟随在身边，“家内服役”。

发展至此，与法国封建制同根同源，而又有着“英国特色”的这种封建制，就被称为“变态封建主义”。农奴制的核心是劳役，而劳役是一种地租形式。因此，变态封建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就动摇了农奴制的根基，成为农奴制解体的先声。

农奴制之所以采用劳役作为地租，而不采用实物或者货币作为地租，是因为在生产水平低下的时代，领主向农民榨取劳役地租是最容易操作，或者说“交易成本最低”的办法。由于生产力低下，如果要提高动员水平，领主所要榨取的地租就会占去农民劳动成果的极大份额，归属农民的份额很少。因此，领主如果采纳实物地租，农民会用隐产瞒报等各种手段来逃避，领主就会陷入到与农民斗智斗勇的泥淖中去，收取地租就会遭遇极大的困难。而生产力水平低下的农业也不会产生多少剩余，商品经济无从发达，向农民索取货币地租就更不可能。这种情况下，要想提高动员水平，采用劳役地租压榨农民，领主虽然要支付劳动组织方面的管理费用，但是两害相权取其轻，总的算下来仍然是合算的。

中世纪的农奴制度，正是在农业衰退造成罗马崩溃这个前提下，欧洲因为普遍战乱而需要在生产力低下的状况下更多地动员军队而形成的。

诺曼征服的时代，11 世纪，二轮制耕作方式在英格兰仍然占优势，但是三轮制已经开始发展，到了 13 世纪末 14 世纪初，三轮制已经占有优势，虽然二轮制在 14 世纪仍然在很多地方与三轮制并存，甚至在某些地方幸存到了 18 世纪。三轮制相比于二轮制，土地利用率上升，还更节省人力畜力。同一时期的变态封建主义的发展，正和这种农业生产的技术改进相一致。这一时期的地租货币化，也被称为劳役折算（sold work），顾名思义，它主要是对农奴提供的劳役的折算，和农民领有的土地产出反而关联不深。由于改进后的农业生产提高了剩余，按劳役折算缴纳地租，领主所榨取的剩余，在总额不变甚至有所提高的情况下，农民保留的剩余还是可以有较多的增加；在总的产出中，领主的份额变小，农民的份额变大，农民乐于接受。相比劳役地租，劳役折算让领主节约了直接监管农民劳动的管理组织费用。同时，由于英格兰农业生产的确

定性，使得物价稳定，社会安定而少纷争，领主作为秩序维持者，对于贡赋的需求是有限的，就不那么迫切于压榨农民，在反抗面前容易妥协。劳役折算让领主和农民或者是增加收入，或者是减少开支，各有所得。于是，以劳役折算为内容的地租货币化就成为领主与农民之间分享农业进步成果的最优形式，盛行起来；相应的，旧的以劳役为核心的农奴制度就逐渐解体了。国王和他的封臣之间，也是一种租佃关系，国王手下的大贵族，也就是他的总佃户，所谓“tenants-in-chief”把军役折算成“盾牌钱”上缴给国王，和劳役的货币折算是同样的道理。

剩余的增加，货币化的普及，这一切都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农业进步就自然导向商品经济的进步。在这种稳定生产所决定的安定社会中，货币是可以信赖之物，各种租佃义务都可以用货币折算。与这种变态封建主义相一致，国王、贵族和农民之间虽然时有冲突，但是总的来说，在一个安定社会当中，各阶层之间的信任度颇高，彼此之间的冲突烈度要远远小于以法国为代表的欧亚大陆。在农奴制解体的过程中，这种不同于欧亚大陆的，低烈度冲突的社会环境，带来了特别的长期后果。

受益于稳定生产所带来的和平的社会环境，英国农奴制解体的过程是较为平稳、较为和谐的。在这个过程中，农奴摆脱了对于领主的人身依附，他们大部分人成为公簿持有农和契约持有农，法律身份已经和自由人相同，但是并没有获得土地的所有权，是佃农而非拥有土地所有者。相应的，领主不再拥有对农奴的人身权利，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土地所有权，仍然是大地产的所有者。

理论上，贵族所有的众多大地产，就为租地农场的出现创造了条件。因为大地产所有人可以在市场化的竞争条件下，剥夺小农户的租佃土地，将土地划分成中大型的农场，交给那些出价比较高的租地农场主，由租地农场主去组织农场上的生产，从而创造出数量众多的使用雇佣劳动的租地农场，这种可以称为农业企业的新事物。

不过，在英国这样一个和平的社会环境下，实行普通法的英国王室司法和庄园上的习惯法都对公簿持有农和契约持有农做出了相当的保护，使他们对租佃土地的占有相当稳固，在农奴制解体初期的16~17世纪延缓了中大型租地农场的发展。但是，与此同时，稳定的生产与和平的社会，对农业生产产生了持续的推动作用。随着生产力的持续提高，稳定而充足的粮食剩余，推动了农民离开土地，参与到农业之外的分工当中去，创造了繁荣的国内市场，越来越多的农民可以脱离农业去就业并生存。对于农民来说，失去租佃土地不再意味着致命的生存危机，而对于领主来说，土地产出的价值升高，而习惯地租的费率较低，领主利益受损，废除旧的习惯地租也越来越有诱惑力。在没有遭遇强烈反抗的情况下，公簿持有农和契约持有农对租佃土地的占有所受到的保护逐渐消弱，随着时间的推移，竞争性地租逐步代替了习惯地租，占农场大多数的家庭农场的规模也在逐渐扩大。特别是在领主的推动下，通过议会圈地运动，

大批土地的租金由市场化竞争产生，众多小农户失去了租地，使得规模超越家庭农场的中大型租地农场在 18~19 世纪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

以议会圈地最为密集的地区之一，英国米德兰南部为例，英国经济史学家罗伯特·艾伦（Robert C. Allen）统计了 1790 年该地区的 690 个村庄当中面积在 10 英亩以上的农场。在庄园土地上建立的农场中，100 英亩以上的中大型农场占据了农场总数的 60%，农场总面积的 91%；300 英亩以上的大农场占据了农场总数的 19%，农场总面积的 52%。而在非庄园土地上建立的农场当中，100 英亩以上的中大型农场占据了农场总数的 27%，农场总面积的 66%；300 英亩以上的大型农场占据了农场总数的 3.5%，农场总面积的 18.4%。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到，庄园上的大地产对于租地农场的推动作用显著的。

另外，从上面这个统计中还可以看出，非庄园地产上的中大型租地农场虽然较少，但是仍然是相当可观的。这也同样是得益于生产稳定、物价稳定的安定社会，因为在这种环境下，产权估价比较容易，交易费用较低，从而调整土地的产权关系，建造中大型农场也相对容易。因此，非庄园土地大部分为小地产这一状况，并未构成对建造中大型租地农场的绝对障碍。

随着英国农业的不断进步，生产力不断提高，为非农业人口提供的粮食越来越多，而且价格稳定，越来越多的人离开土地，成为专职的雇佣劳动者，租地农场这种企业化的经营方式在各种手工业生产中也推广开来。随着工业革命的展开，大生产企业逐步成长，使英国率先走进了现代社会。

而在以法国为例的欧亚大陆上，农奴制解体的过程则是极为不同的。

法国的农奴制，和英国一样，自中世纪末期以来，也处在一个解体的长期过程当中。9~12 世纪之间，农业劳役逐渐消失，领主把原来由农奴用劳役耕作的那部分土地，也就是领地，分割成小块，交给自己的农奴或者是外来人去耕作；相应地，劳役就由货币地租，但是更常见的是实物地租，尤其是分成租取而代之。之所以在法国，货币地租不像在英国那样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不稳定的生产造成了不稳定的物价，人们对于货币的信心不像在英国那样充分。对于法国、意大利这些继承了古代罗马的国家来说，对于货币地租的这种缺乏信任、对于实物分成租的依赖并不新鲜，它其实有着一个非常古老的渊源，这种实物分成租在罗马的时代就已经存在，在幸存的罗马法律和历史文献中，都可以找到有关于它的记载。

这种历史的变迁和延续，来自于农业生产的地域特性。受农业气候特点的影响，当地的收获不够稳定，在罗马时代，农业生产还不错，这种分成制就成为普遍的制度。后来，气候变化使得罗马农业衰退，农业剩余大幅度下跌，帝国在一片混乱之中崩溃。新的统治者需要加强榨取，才能勉强支撑自己的统治，可是加强榨取，就会带来更多的冲突和镇压，要为每一块土地上的每一粒粮食和农民争斗，那代价就太高了。怎么办呢？变通的办法，就是划出一块土地作为领地，让农民来耕作，收获提供给领主，而其余的土地交给农民作为份

地，自给自足。这样，虽然多了监督和管理农奴在领地上耕作的成本，但是总的来说，还是一种更合算的办法。于是，领主统治下的农奴制就盛行起来。

从社会变迁的角度来说，在这种农业衰退的时代，农奴制本身的形成，根据当地农业产出的确定性不同，也就有所不同。

英国农业产出稳定，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本身比较安定，内部并没有太强烈的冲突，最大的外敌是定居的丹麦入侵者，但是定居在丹法区的丹麦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一样，生活也相对安定。对双方而言，提高动员水平的需求都相当有限，搞封建制度的需求不是非常迫切，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对农民的压迫有限，农民本身分化也有限，农民迫于生存压力主动投身于封建主寻求庇护的史料几乎没有。可以说，英国的封建是一种来自国王的自上而下的“王命封建”，因此，以强化压迫的劳役为标志的农奴制在英国发展缓慢，迟至诺曼征服之后才成型。而在欧洲大陆上，由于社会动乱更加严重，农民向封建主委身投庇的记载是很多的，这里的封建更大程度上是自下而上的“自发封建”，以劳役为标志的农奴制发展迅速。

从经济角度来说，农奴制既可以等同于定额地租，也可以等同于分成地租。在英国，农业生产确定，领地和份地的份额，就粗略地确定了领主所能收获的实物，它就等同于定额租的变形。而在法国，领地和份地的比例，就粗略地确定了领主所能够收获的实物比例，它就等同于分成租的变形。

当中世纪暖期到来，耕作方式也有相应的改进，剩余增加了，榨取的强度可以有所降低，以减少管理和镇压的开支，同样的农奴制，在英法两国，就由于它们不同的历史渊源，而走回了不同的道路。在英国，它继承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那种长期租约和货币税收的特征，以定额货币租为基础的变态封建主义从同一个古老的根源上生长起来。在法国，它使实物分成租从罗马遗迹中复活，推动了罗马式城市生活与商业经济的复兴。

分成制这种有别于英格兰的地租特征，使以法国为代表的欧亚大陆上的经济社会道路与英格兰分岔了。这种分岔具体是怎么发生的呢？

分成制意味着农业生产的不确定，也就意味着物价的不确定。中世纪的欧洲大陆，和周秦制度下的中国一样，农民的生存被收成的不确定所威胁，经由物价的传导，社会中的每一个人，他的生存也都同样地受到这种不确定性的威胁。由此，这种不确定性普遍地激发了领主与农民之间，国王与臣民之间的冲突，使得社会中各阶层之间的关系，所有人之间的关系，都沾染上更多的暴力性质。生活在这种普遍暴力化的社会当中，对于臣民，国王和领主能够给予的救济是有限的，因为领主和国王本人也是这种暴力冲突的当事人和受害者，面对普遍化的暴力，他们既可能是没有能力救济，也可能是没有意愿救济。其结果就是，为了生存下去，每一个人都必须考虑以暴制暴以自救。每一个人，都有把生存资料转化为暴力手段的迫切需求，这就使得社会生活被捆绑到“耕战”这个古老的主题上来。关于罗马国家，有一种古老的说法，每一个罗马公

民，都既是农夫也是战士，正表现了“耕战”这个主题在欧亚大陆上的古老与普遍。

一方面，物价的不稳定，使得像租地农场那样，以一种扩大化生产的方式经营农业，出售农产品获利非常困难，正如我们前面讲过的，这是一个“久赌必输”的局面，所以在法国，即使有人发财致富了，他们也更愿意收购土地，分成小块出租给农民，而不是集中起来搞扩大化的生产经营，导致租地农场发展缓慢，农业规模生产水平低下；另一方面，更为暴力性的社会关系，促使农民们不是致力于经营赚钱，而是致力于多生孩子，因为人多力量大，能够在暴力争斗中占据优势。

这样一来，一方面缺少租地农场这种企业式经营的农场，家庭农场更愿意使用能够作为打架帮手的自家人，新增的人口很难在农业中找到工作；另一方面，不稳定的物价又使得脱离农业生产的人口难以获得生活保障，因为他们需要购买粮食才能生存，而粮食价格不稳定又给他们的生存带来了巨大的威胁。于是，不管是农业生产还是非农业生产，都不能创造出众多的工作岗位来安置没有土地的无产者，让他们求得生存。新增加的人口既然很难找到工作，也就不能不依赖于土地，不能不自己种田讨生活。这就必须不断地分割有限的土地，来安置日渐增加的人口。

由于这样的社会过程，随着农奴制的崩溃，分成制的日益扩张，法国并没有像英国那样出现众多的企业式的租地农场，培育出农业企业家式的富裕阶层，并且即使是家庭式的农场，与英国家庭农场的规模不断扩大相反，法国家庭农场的规模也在不断缩小。从16世纪到18世纪，作为英国农场主体的家庭农场，平均规模从30多英亩上升到了70多英亩，而与此同时，到了18世纪末的大革命时代，法国家庭农场的规模却已经缩小到了10英亩以下，加上耕作粗糙的因素，已经不足以维持一家四口的生活，必须要外出打短工来补贴家用。一方面，由于打工收入不稳定，他们不能离开土地，纯粹靠打工生活；另一方面，土地太少，他们又不能专心耕作来养活自己。家庭农场在规模不断缩小的同时，数目又在不断增多，法国农业就成为和中国类似的小农业生产体系。

这样一来，即使法国的农业物产并不贫乏，甚至可能比英国还更富饶，法国的农业技术并不比英国落后，甚至起点上可能比英国还更先进，它却没有英国农业那种规模化生产的可能。最终，法国农业没有走向英国租地农场那种以盈利为核心的企业化经营，成为工业革命的先导，而是像中国那样走向糊口式小农业经营，农业生产效率低，为非农业生产提供的粮食供应不足，粮食供应不足导致粮食价格的不稳定，粮食价格的不稳定进一步阻碍了非农业经济的发展，低下的非农业经济也不能反过来激励农业生产。这样一种糟糕的社会状况，就成为大革命以及之后一系列社会动乱的先导。

第六节：潜水艇三明治

“潜水艇三明治”，是史学家黄仁宇对中国传统社会权力结构的评论。上面是一块长面包，代表集权的上层集团，大而无当的文官体系；下面也是一块长面包，代表无权的底层民众，一盘散沙的万千农民；中间的蔬菜肉片，代表联络上下的中间层，也就是负责上传下达的地方政府则非常薄弱。与社会结构呈现为贫富尊卑的金字塔形相反，管理结构却是一个倒金字塔。上面一个大平台，日理万机，事事必统；越到下面管理人员越少，行政机构只到县一级，上面千条线，到这里就变成综合一切的“收发室”，穷于应付。中央政策由近及远，其信息的准确性与执行的有效性与距离成反比，距离越远越失真、越走样。虽然历代王朝权力高度集中，但是对地方的管理效率反不及中世纪欧洲的君主国。

随着时间的推移，传统中国这种软弱无力的地方管理并没有得到改善。相比之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各个君主国逐步走向现代化，国家对社会的管理能力不断增强，东西方之间差别越拉越大。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呢？要强有力地管理地方事务，最基本的前提就需要有效的官僚体系。没有人有三头六臂，而人是要吃饭的，而官僚体系由人构成，是需要开支的。要支付一个足够大的官僚体系，就需要足够多的税赋收入。传统中国地方治理软弱无力的背后，就是税赋能力的薄弱。

在所谓“漫长的 18 世纪”前后，英国中央政府的税收从 17 世纪末的 200 万英镑增长到了 19 世纪早期的 6000 万英镑（1 英镑约合中国白银 3 两），并在 19 世纪中前期长期维持在这个水平。在这个相当于康乾盛世的时代，清朝中央政府的税收长期徘徊在 4000 万两上下，约合 1300 万英镑，即使乐观估计，也不会高于 8000 万两，即 2600 万英镑。尽管双方的税收看起来似乎还在同一个数量级上，但是考虑到双方人口的悬殊，人均税负水平的差异是巨大的。18 世纪初，英国对中央政府的人均税负约 30 克白银，19 世纪中前期，这个数字上升到了接近 300 克白银。与此同时代的中国的人均税负则基本稳定，即使计入附加税，峰值不会超过人均 10 克白银，在最极端的高估情况下，也不可能超过 30 克白银。无论工业革命前后，英国个人税负与中国个人税负相比，长期保持着数倍乃至数十倍的数量级差异。

由于税赋不足，相比于广大地域上的庞大的人口数量，中国政府能够维持的官僚体系规模实际上是非常小的。在上述“漫长的 18 世纪”，清朝中央政府能够维系的官僚队伍，人员总数大概在两三万人，其中约半数留京，半数派往各地方。同一个时代里，英国政府的官员数量也有这么多，但是考虑到英国人口只有中国人口的二三十分之一上下，以官员在人口中的比例而言，英国与中国相比，和个人税负的情况相对应，也是数量级的差异。

正是人手不足的状况，造成了传统中国所谓“潜水艇三明治”式样的社会权力结构。中央政府只能把数量非常有限的官员派出到地方上，最低只到达县一级。那么，县以下的行政税收等工作该怎么完成呢？很大程度上，县一级的官员是政府工作的承包人。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带薪创业者，从官僚体系中领取一个地方上的外派任务，可能带上自己的幕僚伙伴，用地方上的创收作为激励，到该地方拉起一支“草台班子”，维持地方秩序，并上缴中央政府要求的税收。中央政府就依靠他上缴的税收，来维持他身在其中的官僚体系，并维持作为官僚体系之后盾的军队。他拉起的这支队伍，由专职或者是兼职的，没有官员身份的非正式人员组成，他们或者是由该官员指派，或者是由地方上的精英推荐，来协助完成他作为地方官的职责。

如果你对现代企业中的外包制度有所了解，那么对这种治理方式的利弊，也就好懂了。如果你有一个预算吃紧而又必须完成的任务，那么一种不得已的办法，就是将它外派给那些水平可能业余，但是成本也比较低的外包人。他们不占用你的人员编制，为你节约了开支，但是与此同时，你就必须忍受种种失控的可能，以及可能较为低劣的工作质量。一分价钱一分货，传统中国的地方治理水平低劣，就根源于这种预算不足的治理方式。

英国的状况则不是这样。由于预算充足，英国政府可以配备远比传统中国更为充沛的人手。正式官员在人口中的占比，会比传统中国高出二三十倍。这些人手都有明确的待遇，相应地，承担明确的职责。因此，相比于传统中国，英国官僚系统的工作效率和可靠程度，都要高得多。

进一步地说，预算充足带来的优势，并不限于更庞大、更有效的官僚系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官僚系统负责“祀”，军队系统负责“戎”，得益于充足的政府预算，相比于传统中国，英国军队也有着同样巨大的优势。

从18世纪初到19世纪中前期，英国陆海军从10万人左右，增长到了40万人左右。特别是在英国军队当中，有大约三分之一是耗费巨资来装备和训练的海军人员。与此同时，跟税收的稳定相对应，清朝的军队人数稳定地保持在90万人上下，以陆军为主，大约三分之一是八旗军，三分之二是绿营军，需要耗费巨资去装备和训练的海军规模很小，甚至不具备清剿近海海盗的能力，可以忽略不计。

悬殊的预算带给双方的差异是巨大的，与官员在人口中的占比类似，军人相比于人口的占比，中国也只有英国的二三十分之一，同样有着数量级的差异，甚至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差异变得更加悬殊。数量之外，充足的预算还给英国军队带来更好的装备和训练。由于清朝军队的装备和训练水平过于低劣，在纸面上的90万人当中，真正能够投入战斗的人员，可能只有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一，更不要说清朝那可以忽略不计的海军了。鸦片战争中，清朝军队在英军面前不堪一击，就是这种悬殊的力量对比造成的直接后果。

现在要问的是，为什么两国的税赋能力如此悬殊？

答案很简单，正是我们反复讨论过的，不同的农业生产环境给不同的社会带来了不同的经济社会道路。

英国确定的农业生产，带来确定的物价与和平的社会关系，交换和协作得以发展，繁荣的国内市场与国际贸易得以成长。同时，与欧亚大陆隔英吉利海峡相望，英国又获得了相对安全的国际环境。英国的税收，并不依赖于土地，它主要是消费税和贸易税，分别得益于繁荣的国内市场和国际贸易，随着分工的提高、贸易的繁荣，它的税基是无限增长的。

而传统中国的情况，和同为欧亚大陆国家的法国情况相似。不确定的农业生产，带来了不确定的物价与高冲突的社会关系，交换和协作受到阻碍，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的成长有限，消费和贸易都很低落，因此提供的税赋有限。税收对土地税的依赖度很高，而土地税依赖于有限土地上的农产品，有着天然的增长限制，因而税赋能力也是有限的。同时，高冲突的社会关系，刺激民众的耕战倾向，在有限的土地上聚集更多人口，导致更高水平的社会冲突，需要更庞大的官僚和军队维持社会秩序。这样一来，随着时间的推移，这样的社会需要更多的税赋来支持官僚和军队，但是与此同时，依赖于土地税的税赋能力无法提高，甚至还可能随着人均土地的减少而衰退。

因此，尽管有着巨大的资金缺口，传统中国和传统欧亚大陆国家，不可能像英国那样广泛地向民众发行国债来筹集资金，去支持军事社会的种种开支，因为发债就需要有良好的信用，良好的信用依赖于偿债能力。而这些国家本来就处于实质性的收不抵支状态，不可能有足够的偿债能力，欧洲大陆国家的王室向商人借债，屡屡不能清偿而只能破产逃债，就是这种困境的呈现。退而求其次的办法，不是面对民众普遍地发行国债，而是向少数人卖官鬻爵，这个迫不得已的办法，对于欧亚大陆上的国家都不陌生。中国历史上的“鬻爵”的明确记载，可以追溯到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始皇四年）十月庚寅，蝗虫从东方来，蔽天。天下疫。百姓内（纳）粟千石，拜爵一级。”灾疫之下，政府得到了收入，给出的爵位实质上是免税特权，相当于是抵偿未来若干年的国债利息。对于入不敷出的政府来说，出售免税权仍然是债务性质的收益，当然，这个免税权的可靠程度比英国国债利息要差很多，何况民众本来也穷，因此销路销量也都有限，与政府开支的巨大缺口相比，只能是杯水车薪。进一步的办法，就是卖官，出售官职。前面我们已经讲到传统中国基层政府的治理逻辑，对于买官的人来说，实质上就是购买了一个地方政府的创业股，收益多少不确定，要靠天靠命，收益可能很大，风险也很大。对于政府的困境来说，卖官鬻爵只是消极的维持或补救，并不会创造或扩大税基，它甚至是在破坏未来的政府收益，实质上是在饮鸩止渴。但是在债务收入难以依靠的情况下，出售地方政府的股权，有一点是一点，自然是逼不得已的最后出路。

最终，无论如何挣扎纠结，在传统欧亚大陆国家的社会条件下，对税赋的需求和税赋的能力，就会构成了越来越不可调和的一对矛盾。政府只能放纵社会治理的软弱溃烂，国家就必然走向悲剧性的动荡或衰败。

第二章：大分流³⁴

中国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正处于一场规范认识的危机之中。这里指的不仅是以往学术界的各种模式。所谓规范认识指的是那些为各种模式和理论，包括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已成为不言自明的信念。这种规范信念对我们研究的影响远大于那些明确标榜的模式和理论。它们才是托马斯·库恩

(Thomas Kuhn) 1970 年《科学认识革命的结构》中的"规范认识

(paradigm)"一词的真正含意。近数十年累积的实证研究动摇了这些信念，导致了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这一危机的发生使大家感到现有理论体系的不足并非通过对立理论间的争论就能解决。大家有一种需要新的不同的东西的感觉，但尚未明确地说出需要什么样的新东西。

我们应该系统地估量这一危机，并试图探求新的认识。我们不需要倒退到纯粹的考据，或次要问题的探讨，或"纯科学"的技术手段，或极少数人所热衷的政治争论。相反，我们应该把当前的危机看作是反思既有信念和探索新观点的极好机会。

黄宗智：《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

³⁴ 本文对黄宗智的引用，均出自（《中国研究的规范认识危机—社会经济史的悖论现象》黄宗智，1991）一文，文中的“当前”时间是 1991 年，文中所有著作的出版信息请参考原文为准。

第一节：中国研究的悖论与危机

“大分流”这个词，来自于美国学者彭慕兰出版于2000年的著作《大分流：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但是它所指代的问题，却是由来已久了。长久以来，人们就因着中国在近代被欧洲诸国侵略的“挨打”经验，直观地认为，近代以来，中国和欧洲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欧洲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日新月异，而中国则固守前现代的旧路，积贫积弱。科技史当中的“李约瑟问题”，中国历史研究中的“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等等中国历史经济问题的研究，也都和这个“大分流”问题殊途同归，形异而神一。而“大分流”这个问题成立与否，首先就在于，是否有一个“歧路”，发生在中国和欧洲之间。但是这个“歧路”是否存在，却不是凭着“落后就要挨打”就可以经验地确定的。

实际上，人类的文明史上，很少有哪个文明没有过这种“落后就要挨打”的体会。侵华的八国联军当中，就并不缺少这种例子，法国人在与英国的百年战争中遭遇了惨痛的失败，几欲灭国，正像抗日战争成为中国民族意识觉醒的刺激一样，英法百年战争催生了法国人的民族意识。德国作为一个政治上曾经支离破碎的地区，在崛起为民族国家之前也“饱受欺凌”。意大利，俄罗斯，奥匈帝国，作为欧洲的落后国家，同样不缺少耻辱记忆。远东的日本较少受到攻击，但是应该不会忘记近在眼前的“黑船”事件。八国之中，只有英美国家比较少有“落后就要挨打”的痛苦记忆，虽然英国的“文明”史节点，几乎总是罗马征服，盎格鲁-撒克逊入侵，维京入侵，诺曼征服这样的一些外来者入侵事件。

那么，应该来如何看待这个“大分流”呢？所谓“大分流”的实质意义，并不是经验性的“落后就要挨打”，而是现代文明的道路，与前现代文明的道路之间的分歧。从这个意义上讲，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从理论上所做的分析那样，真正的“大分流”，并不是发生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而是发生在英吉利海峡两岸的英国和欧亚大陆之间，尽管这个分流发生在地域上较小的英吉利海峡两岸，并由此被称为“小分流”。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大分流”，由于对比地域的广大，历史记忆的显明，“大”则“大”矣，但是称之为“分流”，却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误解。由于长期以来，对于现代经济的起源，或者说资本主义的起源，一直未有确切的结论，相应地，也就给中国与欧洲之间历史道路差异的研究带来了巨大的混乱。可以想象，如果我们根本就无法清晰地界定何为现代经济，何为现代社会，像中欧“大分流”这样的问题，自然也就会成为似是而非的一锅粥。早在1991年，美国学者黄宗智就以一篇刊载于《现代中国》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指出了“大分流”研究中，因为范式缺失而造成的理论困境。

现在，我们先来回顾黄宗智的总结：

在《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中，他首先回顾了二战之后，中国和西方几代人的学术研究：

一、中国的学术研究

当代中国的史学研究在五十年代开始时认为历代王朝统治下的中国社会是基本上没有变化的。主导的模式是"封建主义"，即与进步的近代资本主义相对立的停滞的旧中国。这一模式的基础是斯大林"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即历史发展必须经过原始社会、奴隶制、封建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五个阶段。

在"封建主义"的模式下，研究中国历代王朝史的学者主要研究封建阶级关系，即封建统治阶级通过地租、税收和高利贷形式榨取农民生产者的"剩余价值"。他们的研究成果见于编纂了大量记载这些剥削关系的资料集。（李文治，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北京：三联书店；章有义，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3辑：1912-1927，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严中平等，1955，《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一些学者亦将封建经济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他们认为中国这一生产方式的特点是家庭农业与小手工业的结合，即"男耕女织"。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结合得异常紧密的生产方式，阻碍了手工业从家庭中分离出去而形成集镇作坊，并最终阻碍了资本主义发展。他们收集了种种证据，证明"自然经济"在明清时期占优势，并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

早在50年代，上述模式已受到研究"资本主义萌芽"的学者的非难。这些学者认为，明清时期决非是停滞的，而充满着资本主义预兆的种种变迁，与西方国家的经历类似。一些研究者致力于收集明清商业扩展的资料，对当时的商品经济作出系统估计，以证明国内市场的形成，认为这标志着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另外的研究侧重于封建生产关系的松弛和衰落（尤其是土地租佃关系）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尤其是雇佣劳动关系）。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最初提出者并未关注到经济发展，他们认为一时阐明了商品化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就不言而喻了。然而随着80年代改革时的意识形态由"生产关系"转而重视"生产力"（包括技术、资源利用、生产率等等），新一代学者转向直接探讨经济发展。他们的主要代表尤其强调长江三角洲的新作物品种和肥料的应用（李伯重，1985a，《明清江南农业资源的合理运用》，《农业考古》1985年第2期：第150-163页；1985b，《"桑争稻田"与明清江南农业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历史》1985年第1期：第1-12页；1984，《明清时期江南水稻生产集约程度的提高》，《中国农史》1984年第1期：第24-27页）。

"资本主义萌芽论"虽然成功地冲击了"封建王朝因袭不变"的旧观点，但无论在老一代学者还是八十年代培养出来的新一代学者之中，它均未能广泛地为人们所接受。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十九世纪出现了工业资本主义的蓬勃发展，把这之前的三、四个世纪称作资本主义萌芽或向资本主义过渡是有道理的。然

而中国的十九世纪并无资本主义发展，有什么道理把这之前的时期称作资本主义萌芽呢？再者，经济的相对落后使中国受害于帝国主义。鉴于这一事实，把明清时期等同于近代早期的英国到底有什么意义？

"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企图从西方入侵打断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为由来解释这个问题。于是，把十九世纪中国经济的落后归罪于帝国主义，而不是自身的停滞趋势。这一说法虽很符合反帝情绪，却难以令人信服。西方的经济影响直到十九世纪末仍是有限的，而中国经济自数百年前的所谓"萌芽"以来却未显示出自己发展资本主义的动向。十九世纪中国经济落后的事实重新证明了先前的封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经济至少是部分正确的。

"封建主义论"和"资本主义萌芽论"的相持不下使中国的青年学者对两者都抱有怀疑，甚至不屑于再引用前辈们的这些模式。有的全盘搬来西方的一个又一个的时髦方法，进一步扩大了代沟，这一情况本身就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规范认识危机。

二、西方的学术研究

西方的学术研究虽然比较多样化，它的主要内容却出人意外地与中国的研究相似。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美国学术界同样持有传统中国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观点。当然，这里不再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模式，而是源自近代化理论的"传统"中国与"近代"中国的对立模式。研究的重点不是"封建"中国的阶级关系，而是"传统"制度与意识形态。在社会、经济领域则强调人口对停滞经济的压力。然而，研究的基本概念是中国在与西方接触之前是停滞的，或仅在"传统范围"内变化，这与中国同行的见解基本一致。

如果清代在本质上是无变化的，那推动质变的力量只能来自外部，因而简单地归结为"西方的冲击"与"中国的反应"（费正清，1958，《美国与中国》；费正清等，1965，《东亚：近代的变革》）。在这个"哈佛学派"倡导的"冲击--反应"模式之下，一些重要的著作阐述了西方在中国的出现及中国反应（芮玛丽，1957，《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费惟恺，1958，《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但是这一观点在六十年代后期受到挑战；先是政治性的攻击，"西方的冲击"被认为是为帝国主义和美国干涉越南辩护，继而在史实上受到论证明清之际发生重大变化的学者的批评。

后一倾向在近年来形成一个新概念，中国在受到西方影响前数百年的时期被称为"近代早期"，如同在西欧发生的那样。与中国的"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一观点的出发点是明清经济的大规范商品化。有的学者更进而把这一观点延伸到社会、政治领域中（罗维，1984，《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商业和社会，1796--1889》；1989，《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团，1796-1895》；韩素瑞与罗斯基，1987，《18 世纪的中国社会》）。

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那样，"近代早期论"学者动摇了过去的"传统中国论"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他们的实证性批评比激进学者对费正清的政治批评有效。然而，就像"资本主义萌芽论"一样，这个新的理论也因同样的原因而难以被普遍接受。如果自十七、十八世纪至十九世纪后半叶的中国那么像近代早期的西方，为什么在随后的世纪中中国的变迁这么不同？我们如何看待帝国主义和二十世纪的革命？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促进了以前就已在内部产生的早期近代化。但是真是那样的话，又如何看待共产主义革命的发生，难道它只是对近代化的一种偏离？另一个可能的论点是帝国主义使中国脱离了近代化的正常途径而导致了革命。目前"近代早期论"的学者尚未提出一个在逻辑上与他们的论点一致的关于帝国主义与中国革命的有说服力的观点。

学术界于是陷入了当前的理论困境："停滞的传统的中国"的旧观念及其派生的"冲击--反应"模式已不再具有影响力，而"近代早期中国"的新观念尚不足以成为支配性的模式。其间，中国史研究领域采用了似乎中立的"中华帝国晚期"来称呼明清时期，尽管此词过分强调了皇权在中国历史整体中的作用。

接下来，黄宗智指出了中国和西方几代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的理论模式：

中国学术的主要模式源自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范畴均出自马克思对西欧，尤其是对英国的分析。资本主义萌芽论则是中国特殊的模式。如果中国在帝国主义入侵之前是单纯的封建社会，那么就必须肯定西方帝国主义为中国带来了近代化，但这是任何爱国的中国人所不能接受的。资本主义萌芽的公式解决了这一问题：在西方帝国主义到来之前，中国已开始了自己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西方帝国主义打断了这一进程，使中国沦为"半殖民主义"。如此，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协调了斯大林的五种生产方式的公式（以及列宁的帝国主义学说）和基于民族立场的反帝情绪。

在另一方面，尽管没有普遍的认可，也很少明白的表示，西方学术的主导模式主要得自两个理论：先是马尔萨斯，后是亚当·斯密。一开始，停滞的"传统中国"被看作是一个其资源受到马尔萨斯式的人口压力困扰的社会。这一看法是建立在传统中国是前商品化的社会的假设之上的。后来，明清普遍商品化的史实得到证明，马尔萨斯式的观点便受到亚当·斯密理论的诘难。

斯密的设想是由市场推动的资本主义发展。自由贸易会促进专业化、竞争、更新、高效率，以及随之而来的资本积累的发展。在城乡商品交换的推动下，城乡会进入螺旋形的现代化发展。（**亚当·斯密，1775-1776，《国富论》**）。这一设想相当程度地在英国得到体现，从而赋予其有力的史实依据。这一设想也得到了现代经济学界论说的支持：它们多以抽象、简单化了的斯密理论出发。

明清时期果真出现了斯密所想象的那种发展，便不会存在人口过剩的问题。劳动力会像其他生产要素一样根据自由竞争市场的逻辑而达到最合理的使用。这样，马尔萨斯理论便为斯密理论取代而形成了"近代早期"模式。

中国与西方学者争论的焦点首先是中国经济落后的原因是封建阶级关系还是人口压力。中国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中的资本形成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阻碍，封建统治阶级盘剥直接生产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并用于自己的奢侈消费而不投资于生产。西方学者则认为资本的形成是为人口压力所阻碍，人口压力减少了消费之余的剩余。争论也涉及了究竟是通过社会革命，还是通过人口控制（以及其他改革）来使中国摆脱落后，走向近代化。

然而，在"近代早期中国"模式向"传统中国"模式的挑战中，以及"资本主义萌芽"模式对"封建主义"模式的批评中，争论的焦点转移了。在反对"传统中国"和封建"自然经济"模式时，"近代早期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是站在同一边的。问题的焦点变为：明清经济到底是已经呈现出近代早期发展（或资本主义萌芽）的高度整合的市场经济，还是仍然处于前商品化时期的、本质上停滞的，处于人口压力重负下的经济？

至于帝国主义问题，中国的"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萌芽"两个模式当然都强调帝国主义的破坏性作用。"封建主义"学派强调帝国主义如何使封建剥削关系进一步恶化，而"资本主义萌芽"学派突出了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

在西方，首先是用"冲击--反应"模式出来反驳上述观点。例如有的学者争辩说，中国"近代化的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西方的破坏性冲击，而在于中国传统的顽固存在（芮玛丽，1957，《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一战：同治中兴，1862-1874》；费惟恺，1958，《中国的早期工业化：盛宣怀（1844-1916）与官办企业》）。随后，有的学者转用斯密的模式：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是有利于中国经济的。如果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失败，其原因不是西方的影响太强，而是太弱，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邓伯格，1975，《外国人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墨菲，1977，《外来人》）。

这一观点最后归结为新近的公式，它直截了当地以"市场"代替了旧有的"西方冲击"。不象"帝国主义"概念带有种种政治现实和含意，"市场"可以被视作纯粹是良好的客观现象：只要市场得以运行，它会赋予中国像西方那样的发展。这个"真理"见证于种种"事实"：国际市场刺激了中国的工农业发展，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市场的冲击不像以往研究所讲的那样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而是实际上深入到中国的农村和内地，带来了广泛的发展。照这一观点来讲，中国的不幸在于市场推动的发展被战争、灾荒和共产主义革命等畸变所打断。

然后，黄宗智指出了中国和西方几代人对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之演变之共同历程，以及支持这一历程的，隐含的，贯穿于斯密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之共同范式：

尽管中国与西方的学术研究有着种种不同，但两者明显有许多共同点。认为中国历史基本上无变化的一代学者均受到强调中国传统本身有着明显变化的一代学者的挑战。中国经济是个前商品化的、本质上停滞的经济的主张，受到了认为中国经济是高度商品化、蓬勃发展的经济的主张的挑战。两个学术派别均把停滞与前商品化经济相联系，把近代化等同于商品化。中国的"封建主义论"学派之所以认为封建经济是停滞的，是因为把它等同于前商品化的自然经济。与"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一样，他们也认为商品化必然会导致资本主义。与此类似，西方"传统中国论"学派认为明清经济基本上没有商品化。例如何炳棣 1959 年的人口著作基本上无视商品化，珀金斯 1969 年对明清农业的研究也把低水平商品化作为一贯前提。而威廉·罗 1984、1989 年的著作以"近代早期"模式对过去的著作提出挑战，则从种种蓬勃商品化的证据出发。

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

这样的信念一般不为学者讨论。学术界所注意的主要是不同理论、模式间的争论方面。于是我们争论明清商品化的程度、或是帝国主义和阶级革命的是非功过。然而我们不去注意那些共同的认识，认为那是再明白不过的了，乃致无须再加以讨论。

正是这样的信念，我称之为规范信念。当前学术界往往过分简单地把规范认识这一词等同于有影响的模式。这一用法其实抹煞了这个概念的分析力量。若用于存在着众多模式的社会科学领域，尤其如此。本文把规范认识性的信念定义为不同的或对立的模式和理论所共同承认的、不言自明的信念。这样的信念比起任何明白表达的模式和理论来，有着更广泛、更微妙的影响。它们的影响不仅在于引导我们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

于是，我所指的规范认识的危机并非针对某一理论或模式，并非针对学术界的这一代或那一代，亦非针对中国模式或西方的学术研究。把当前中国史研究中的危机解释为老一代研究的衰微，或认为只发生在中国并意味着斯密理论战胜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是误解了这个危机的真实含意。当两个理论体系长期地各以对方来为自己下定义时，一方的危机便足以提醒我们去考虑是否是双方的共同危机。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要从两代人和两种表面对立的模式和理论体系的共同危机的角度来理解。

如黄宗智所指出的，“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是贯穿"封建主义论"与"资本主义萌芽论"模式，"传统中国论"与"近代早期中国论"模式的规范信念的一个

例证。它贯穿了大洋两岸学术界的两代人，也贯穿了斯密理论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这样一个“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资本主义起源）”的共同的“规范信念”（“范式”），也就是艾伦·M·伍德在《资本主义起源》一书中所指出的，早期马克思所继承自斯密的“商业化模式”。在这样一个“范式”下，诸多悖论无法避免：

我（黄宗智）认为在过去实证研究积累的基础上所证明的一系列悖论现象已经使我们领域的规范信念濒于分崩的边缘。悖论现象指的是，那些被现有的规范信念认定有此无彼的对立现象在事实上的同时出现。悖论现象对那些信念的挑战首先在于相悖现象各方的存在的确实性。例如：商品化和经济不发展这对相悖的现象确实并存。在更深的层次，悖论现象则对既有的因果观念提出怀疑：商品化是否必定会导致经济发展？明清时期蓬勃的、持久的商品化与糊口农业长期持续的事实，反悖于“资本主义萌芽”和“近代早期中国”模式的断言，也反悖于“自然经济”和“传统中国”模式的认定，这一对悖论现象向为所有模式共同认可的“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的不言自明的规范信念发难。

但是，实证研究揭示出的悖论现象与它们否定的规范信念一般没有在论著中清晰地披露出来。学者们通常不会讨论未诉诸文字的潜意识信念，即使想讨论的人，也可能由于认为道理过于明显，而觉得不必加以讨论。于是这些实际上已为事实所否定的规范信念继续影响人们的思想，尽管许多人已久有怀疑之心。本文的一个主要意图，就是列举一系列实证研究已经披露的悖论现象，进而揭示被这些现象所否定的“不言自明”的信念。

首先，黄宗智指出悖论之一，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明清时期蓬勃的商品化已是无可怀疑的事实。在 1350 至 1850 年的五个世纪中，几乎所有的中国农民都改穿棉布了。这反映了商品化的一个最大的组成部分：棉花经济的发展及伴随而来的地区内部和地区之间的贸易。棉产品的交易也意味着粮食商品化的扩展，出现了棉作区与粮作区之间的商品交换和棉农与粮食剩余产品的交换。随着这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出现了相当多的为棉、粮提供加工和交换服务的商业市镇。把明清时期说成是前商品化显然是不对的（吴承明，1985，《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 1 卷，北京：新华书店）。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尽管有五个世纪蓬勃的商品化，农民的生产仍停留在糊口水平。无论生产跟上人口增长水平（珀金斯，1969，《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或是落后于人口增长水平（何炳棣，1959，《中国人口研究》；艾尔温，1973，《中国过去的形式》），农村中没有发生近代式的经济发展是毋庸置疑的。

同样，类似资本主义关系的雇佣劳动的出现也无疑问。当时已出现了不少农村雇佣劳动，包括长工和短工。土地租佃关系也在松弛下来，分成租的旧方

式让位于定额租，实物租让位于货币租。这些变化进一步肯定了农村经济的商品化（李文治等，1983，《明清时代的农业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

然而，我们知道，在当时的农业中几乎没有大规模的资本主义式生产。许多长工、短工只是为一般农户雇佣，以补充家庭劳动力的不足。在全国各地，包括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小农家庭农业仍占压倒的地位。同时，少数使用雇佣劳动的大农场比起小农户来并未获得更高的亩产量（黄宗智，1985，《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1990，《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简言之，商品化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于糊口水平两个现象的同时发生是悖论现象。这就对马克思与斯密理论的共同认识--商品化与近代化有着必然联系--提出了疑问。马克思与斯密的理论主要基于英国的实际状况。在世界其余的多数地区，近代化发展来自其他因素（如政权的中坚领导作用）与商品化的结合，并迟于英国。纯粹由市场推动的经济发展的模式是基于英国的经验，它被后来建立的许多经济分析模式作为前提，但不应混同于世界其他区的历史真实。

与"市场推动经济发展"理论相联系，人们认为在近代化的过程中，产量与劳动生产率会同步发展。在斯密和马克思所熟悉的英国确实如此，他们因此均没有把产量与劳动生产率加以区分、并没有考虑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量）增长的可能。

以往的研究已揭示明清时期的情况正是如此。这一时期产量的增长一方面来自耕地面积的扩大，扩大了将近四倍；另一方面来自亩产量的增加，通过提高复种指数及对某些作物增加肥料与人工投入（珀金斯，1969，《中国的农业发展，1368--1968》）。然而，尽管"资本主义萌芽论"学者致力于论证经济发展，到今日为止尚无人能够证实单位工作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提高的只是土地的生产率，主要由于劳动力投入的增加。单位工作日的收益仍是如此之低，小农生产仍处于糊口水平，而中国人口的大部分仍束缚于粮食的生产。

区分增长与发展对理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史至关重要。尽管有着引人注目的产量增长，缺乏劳动生产率的发展乃是中国大多数人直至本世纪八十年代仍困于仅足糊口的食物的生产的原因（珀金斯和优素福，1984，《中国的乡村发展》）。与之对比，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发展，使其百分之四的人口就能满足其他所有人的食品供应。劳动生产率的发展是近代化的核心含义，但它并未在明清时期出现。

斯密和马克思的另一个共同信念是近代经济发展必然是一个工农业连同发展、城乡一起近代化的过程。这又是根据英国的经验而来。他们均没有考虑到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的可能。

然而，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正是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的经历。当时中国的工业发展是没有疑问的。自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投资近代机器工业和交通运输的资本每年以高于百分之十的速度增长。上海、天津、无锡、青岛、汉口和广州等城市的兴起便是这一进程的例证。小城镇也有了蓬勃发展，特别是长江三角洲，甚至城镇中的小手工作坊也有了增长。

这些发展发生在商品化的加速过程中。这过程的首要内容是小农家庭植棉、纺纱、织布三位一体的崩溃。机制纱，先是洋纱后也包括国产的机纱，大量取代了土纱。棉农出售棉花给纱厂，而小农织户买回机纱织土布。这导致了乡村贸易的大量扩增（吴承明，1984，《我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内市场》，《历史研究》1984年第2期：第110-121页；徐新吾，1990，《中国自然经济的分解》，载吴承明编《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第258-332页；黄宗智，1990，《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不过，我们同时也知道中国经济中的新资本主义部分从未达到国民经济总产出的百分之十。当时也出现了传统手工业的衰败，尤其是手工纺纱，并因此导致长江三角洲不少市镇的衰亡，乃至完全湮废。最重要的是，即使在相对繁荣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农民的收入仍处于仅够糊口的水平，随着三十年代的衰退就更陷于困境。中国乡村人口的大多数仍束缚于土地，从事仅够糊口的食物生产，经济发展主要是在城市，乡村仍然是不发展的。

然后，黄宗智指出其他悖论：

下面我打算进而广泛地考察一些为以往学术研究揭示的基于实证的悖论现象。我不准备对过去的学术加以全面的转述，而只打算讨论一些特别能说明问题的研究。我的讨论将主要集中于这里所要提倡的研究方向。这就不可避免地忽视了许多学者为突破旧模式和寻找新途径所作出的贡献。

一、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大洋两岸的学者近年来在运用微观经济学方法探讨中国历史上作了一些努力。过去的研究主要是宏观经济的研究，新的研究从总产出转向市场、价格和企业、家庭抉择等被忽略的方面。

新的研究成功地证实了明清经济中市场的整合趋势。在稻米、棉花、茶叶等商品交换中无疑存在着“民族市场”。我们可以明确地看到各地区间商品流通的路线，并估计出大概的流通量。此外，可以证明不同的地区之间价格同步波动。在民国期间，上述趋势的加速扩展，中国的市场进一步连接于国际市场。

然而，我们还知道明清期间的棉纺织生产并不在城镇作坊进行，而是在小农家庭中进行，与农耕相结合（徐新吾，1981，《鸦片战争前中国棉纺织手工业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吴承明，1990，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258-332）。不仅如此，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直接满足家庭消费。最新的系统研究表明，直至本世纪二十年代，小农为家庭消费的生产仍超过为市场的生产（吴承明，1990，《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北京：人民出版社：18-19）。换句话说，乡村经济相当程度地仍处于"自然经济"状态。

进而，要素市场的运行尚处于种种约束之下，离完全自由竞争的市场的理想模式很远。土地转移同时受到习俗和法律的约束，必须让邻近田块的亲友优先购买。同时，在广泛使用的典卖交易方式之中，卖主几乎拥有无限期的赎回权（杨国祯，1988，《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雇佣交易中讲究私人关系和中间人，从而限制了劳动力市场的空间范围。村内亲友间的贷款（无论个人贷款还是合会），讲究感情和礼尚往来，而未形成脱离人际关系的信贷市场逻辑。小农借贷反映了糊口经济中的为生存而借款的逻辑，月利高达百分之二至三，远高于任何盈利企业所能承担的利率（费孝通，1939，《中国的小农生活：长江流域乡村生活的实地研究》；黄宗智，1990，《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50--1988》）。

我们当然可以再一次陷入以往的论争。新斯密学派会坚持说，根据某些商品价格同步变化的事实，他们理想中的整体化市场经济的其他因素也肯定同时存在：在中国小农经济中，充分竞争的，教科书式的要素市场如同在先进的资本主义经济中一样存在，小农就像资本主义企业家一样，在市场上为寻求最大利润而作出经济抉择（舒尔茨，2006，《改造传统农业》，商务印书馆；布兰特，1989，《商品化与农业发展：华中与华东 19 世纪 70 年代-20 世纪 30 年代》）。有些人更从这样的简缩性推理出发，进一步得出乡村质变性的近代化必然会由这样的市场发展而来的武断结论。按照他们悖事实的逻辑，他们不在乎历史真实不是如此，同样可以坚持要不是战争和革命打断这一进程，迟早会有这样的发展。

与此对照，"自然经济"论学者会坚持封建经济只可能是"自然经济"。在正常的历史进程中，资本主义和完全整合的市场会发展起来，但这种可能性被帝国主义排除了，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阻碍了这一进程。要是西方没有入侵，情况就会不同了。这样，我们又回到了老一套基本政治意识的争论。

"经济二元论"（侯继明，1963，《经济二元论：中国的实例，1840-1937》；墨菲，1977，《外来人》）把纯竞争性的要素市场模式与自然经济模式合并为一个具有两个不同部门的经济体系模式。但这个模式贡献有限，因为我们可以看到两个部门实际上是紧密相联的，最明显的例子是影响到每家每户的棉花经济。把两种经济想象为分隔的部门是没有道理的。

这三种模式没有一种能勾划出近几个世纪来市场在中国经济中运行的实际情况。在这个论题上，就像在中国社会经济史和其他论题上一样，我们面临着

概念上的困境，这正反映了当前规范认识危机的一个部分。打破这一困境所需的第一步是改变过去的由理论到史实的做法，而立足于实证研究。面对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市场并存的悖论现象，我们如何解释这两者的同时出现和长期并存呢？还有，我们如何解释不带近代发展的整合市场的形式过程呢？我认为，作为第一步，我们可考虑商品化有不同的动力，从而导致不同的结果。这一设想也可延伸到市场是否按照既定模式运行的问题。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对象是商行，处于传统的和近代的市场体系的交接点，可以启发我们两种体系是如何运行的，以及它们如何相互渗透和不渗透。

二、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美国的清史研究者的另一个新的重要研究是关于公众社会团体的扩张，尤其是在长江三角洲，诸如会馆、行会、书院、善堂、义仓等诸如此类的组织，均有了扩展。这样的非官方的公众团体的兴起使人联想到哈伯马斯研究的关于近代早期欧洲的"公众领域"的概念，并把这一概念运用到明末清初的研究之中。表面看来，两个历史过程似乎十分相似。

然而，借用哈伯马斯 (Jurgen Habermas) 的词语和定义会带来无意的结论先行和简缩化。在西欧历史上，哈伯马斯研究的"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是对民主起源的探讨（以及随后的"结构转型"）。他所涉及的不仅是公众领域和私人领域间的不同，而且更是两者在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对立面中的地位。就他来讲，公众领域与私人领域，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这两组概念是相互渗透的。事实上，正是这两组概念的交替使用加强了他"公众领域"概念的分析力。从民主起源的角度来看，人们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展只属次要，关键在于与其同步扩展的公民权力。我们必须在这一历史背景之下来理解哈伯马斯的"公民社会中的公众领域" (哈伯马斯,1989, 《公众领域的结构转型》)。

近代城市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持续扩张，但这一扩张并不一定为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事实上，我们可以设想公众领域是一块近代国家政权与公民社会争夺的地盘。在民主国家的近代史上，公众社会成功地占领了公众领域，而在非民主国家中则正好相反。革命后中国的政权对公众领域的全面控制便可以说明这个区别。

由此，哈伯马斯的要领如果用于中国，它所突出的应不是类似西欧的公众领域与公民政权的同步发展，而是两者的分割。当然，在中国随着城镇发展和城市生活中村社生活方式的解体，公众领域有了扩张（我们只要考虑一下城乡日常生活的不同：乡村居民与家庭成员、亲戚、村邻有较密切联系，而与外界较少联系；而城镇居民对亲友保持一定距离，但与近邻之外的外界有交往）。然而，中国不象中世纪晚期和近代早期的西欧，城镇并不处于政权的控制范围之外，城镇的发展并不意味市民政治权力的发展。在 1600--1700 至 1840--1895 年间的中国，市民公众团体确实有了相当的扩张，但并没有相应的独立于国家

政权的公民权力的发展。不带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的悖论现象，进而提出了问题：推动明清与近代早期西方公众团体扩展的动力究竟有何异同？

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当前美国研究中国的又一热门是法制史。老一代研究者指出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没有司法独立和人权保障。司法当局只是行政当局的一部分，法律主要意味着惩罚，为了维护官方统治思想和社会秩序，因此，在民法方面几乎毫无建树（瞿同祖，1961，《传统中国的法律和社会》；范·德·斯帕伦科尔，1977，《清代中国的司法组织：社会学的分析》；伯弟和莫里斯，1967，《中华帝国的法律，以 190 个清代案件为例》）。与当时中国研究的总体情况一样，他们的研究注重中国历代王朝与近代西方的不同之处。

晚一辈的学者则强调中国的法制传统的规范性和合理性。事实上，司法并非诉诸专横的惩罚和拷问，而具有一定的作证程序，即使按今天的司法标准来看也是行之有效的。同时，这个制度系统地、合理地处理了民事纠纷。这批学者几乎与“近代早期论”学者是在同一时期纠正前辈的偏向。

两代学者运用的不同分析框架响应了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工具主义（“卡地”法）和规范主义（理性法）的一对对立概念（马克斯·韦伯，1954，《马克斯·韦伯论经济与社会中的法律》）。对一个来讲，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法律服从于统治者的意志和愿望。而对另一个来讲，法律基于规范化的、正式成文的原则，并导向司法的专业化、标准化和独立化--这些特性被马克斯·韦伯认为是近代的理性主义的表现。

两种不同的情景在比较法学家罗伯托·安格尔 1976 年的著作与他的批评者威廉·阿尔弗德 1986 年的著作中得到充分反映（安格尔，1976，《近代社会的法律：对社会理论的批评》；阿尔弗德，1984，《砒霜与旧法律：中华帝国晚期刑事法制的重新考虑》）。对安格尔来说，中国代表了不具备近代自由主义法律和保护个人人权的法制传统。对阿尔弗德来说，安格尔对中国法律的看法正反映了前一代学者西方本位主义态度的错误。

我认为两种观点均有部分道理。我们不能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已经高度规范化，而且相对地系统化和独立化。但我们又无法否认中国的王朝法律仍受到行政干预，尤其是来自皇权的干预（孔斐力，1990，《偷窃魂魄者：1768 年中国的巫术恐慌》）。直至民国时期和西方影响的到来，它并没有向保护人权的自由主义发展。规范主义和自由主义在近代早期和近代的西欧是得到结合的。中国的明清时期并非如此。

争论的双方若只坚持自己一方更为精确、重要，结果将会像关于明清时期是“传统的”还是“近代早期的”、是“封建的”还是“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一样。我

们的研究出发点应是已经证实了的悖论现象，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的法制。

我们需要去探讨这个法制的实际执行情况，尤其是关于民事纠纷的案件。当然，清代的刑法与民法之间并无明确分界。这表明民事司法缺乏明确的划分和独立的领域，与近代的自由主义传统的法律不同。但是，清律明确载有相当多的具体的、有关民事的正式条文（诸如关于继承、婚姻、离婚、土地买卖和债务的条文）。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大量案件记录现已可见到。这些记录所载有的微观性信息，使我们可能详细地探讨一系列问题。例如，就一个地方行政官而言，民事案件的审理占多大比重？他在何种程度上根据法律条文来处理案件，或专断地根据个人意志来处理案件？从普通人民的角度来看，在何种程度上，以及出自何种目的而求诸诉讼？在解决民事纠纷的过程中，司法系统与当地社团的调解如何相互关联？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可以给我们一个较坚实的基础来分析中国和西方法制传统的异同。

进一步的，黄宗智讨论了中国革命中的结构和抉择问题：

过去对中国革命的研究在结构和抉择的关系问题上划分成不同的营垒。中国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是直截了当的：长期的结构变化导致阶级矛盾尖锐化，尤其是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关系，而中国共产党是被剥削农民的组织代表。结构变迁与人为抉择的因素在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中汇合成同一个运动（毛泽东，1927，《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毛泽东选集》第1卷：207-249页，日本东京：北望出版社；1939，《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3卷：93-136页，日本东京：北望出版社；李文治，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1辑，1840--1911》，北京：三联书店；章有义，1957，《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2、3辑：1912-1927，1927-1937。北京：三联书店）。

这一观点与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研究是相互呼应的。"封建主义论"学派强调封建生产关系下地主与佃农之间冲突的中心地位。帝国主义加剧了阶级矛盾，从而引起了反帝反封建的阶级革命。"资本主义萌芽"论学派尽管强调帝国主义如何阻碍了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充分发展，对于革命的结构基础得出的是同样的结论：封建自然经济的阶级关系仍占统治地位，从而确定了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革命。

保守的美国学者的观点则相反：结构性的变化与人为抉择在中国革命中是相背的。在本世纪50年代的冷战高潮时期，最保守的学者甚至坚持中国革命仅仅是莫斯科控制和操纵的少数阴谋家的产物（迈克尔与泰勒，1956，《现代世界中的远东》）。其后，保守的主流观点演变成强调共产党组织是造成革命的主要动力。农民的阶级斗争只不过是革命宣传机构虚构出来的，真正重要的只是高度集中的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工作。

这一观点也得到研究社会经济长期变迁的学者支持。"停滞的传统中国论"强调人口压力是近代中国不幸的源由，而新斯密派则强调市场促进发展的作用。无论哪种观点均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阶级革命是与结构性变化的趋势相背的：人口压力要求控制生育或其他改革，市场推动的发展要求资本主义，两者均不要求革命。

两套观点显然各有可取之处。没有人会否认共产党比国民常远远获得人民的拥护，而人民的支持对内战的结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中国北方的战役中尤其如此。同时，我们也无法否认列宁主义型共产党组织在民主的一面之外，还有集中的一面。解放后中国农民在相当程度上仍旧是共产党高度集中的政权所统治的对象，而不是理论中所说的那样。

在六七十年代美国政治气氛下，学者们极难摆脱政治影响而说明上述两点事实。试图论证中国革命的群众基础的著作常牵带着整套阶级革命的论说（萨尔蒙顿，1971，《革命中国的延安道路》）。而关于共产党组织重要性的讨论则带着一整套保守的观点（霍夫海恩斯，1977，《断裂的波涛：中国共产党的农民运动，1922--1928》）。即使小心地避开政治争论的学者也无法避免受到政治攻击。于是，费正清被雷蒙·迈尔斯和托马斯·梅则格攻击为传播"革命范例"，"他的政治观点迎合了北京的历史观点，阻碍了许多美国学者公平、清醒地分析两个中国政府"（迈尔斯与梅则格，1980，《中国研究的阴影：美国现代中国研究的状况》：88）。

研究这一领域的大多数学者其实并不相信上述两种观点的任何一种。头脑清醒的学者则冷静地从事于实证研究，以期建立有说服力的分析。（例如陈永发，1986，《创导革命：华东和华中的共产主义运动，1937--1945》）然而，迄今未有人提出能够得到广泛承认的新的解释。

我认为要使这一领域的研究进一步发展，关键在于突破过去关于长期结构变迁与革命之间关系的规范认识。结构变迁不一定导向自由市场资本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而有着其他的可能性。我本人已提出了过密型商品化的看法。在这个过程中，阶级矛盾并没有尖锐化，农民并没有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商品化所起的作用主要是增强了小农家庭和村庄社团再生产的能力。

另一个关于长期结构变迁的不同看法的例子是：太平天国起义后的一百年中，江南地区最突出的结构性变迁是地主势力的衰落，其导因是政府的压力、税收的提高和租额的徘徊不上。土地租佃制未必像正統的革命模式估计的那样，必定要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它也可能只是在长期的结构性变迁下自然崩溃，未必通过农民的革命行动，至少在长江下游地区是如此（白凯，即将出版，《地租、税收与农民的反抗：长江下游地区，1840--1950》）。

此外，我们需要把结构与抉择的关系看作既非完全相应又非完全相背的。我们的选择不必限于美国保守派认为的没有人民支持的党或中国共产党的阶级革命浪潮的两种观点。真正的问题是：结构与抉择如何相互作用？

把结构和抉择看作既分开又相互作用是一个重要进步。这使我们把二者间的联系看作是一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结论。在裴宜理关于淮北地区革命运动的研究中（裴宜理，1980，《华北的造反者与革命者，1845-1945》），长期的生态不稳定和共产党的组织活动两个因素得到暂时的协调，体现在共产党利用农村的自卫组织（联庄会）。在詹姆斯·斯科特的“道义经济”模式中（斯科特，1976，《小农的道义经济：东南亚的叛乱和生计维持》；马克斯，1984，《华南的农村革命：农民与海丰县历史的创造 1570-1930》），传统的村社一贯尊重其成员的道义性“生存权”（例如歉收时地主应减租）。在革命过程中，党组织和农民在重建被商品经济和近代政权摧毁的道义经济上找到共同点。再举一个例子，周锡瑞对义和团的研究表明（周锡瑞，1987，《义和团的起源》），农民文化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农民思想和行动上的倾向。

要真得出新的观点和分析，突破过去几十年在分析概念上的困惑，我们需要大量与以往不同的资料。中国研究革命史的学者主要局限于组织史（党史），部分原因是缺乏它种性质的资料，极少有关于革命运动真正接触到乡村社会时发生状况的资料。然而，我们现在有可能通过地方档案和当事人（他们的人数正在迅速减少）的回忆获得能够解决问题的微观层面的资料。有的美国学者已在积极从事这样的研究。

最后，黄宗智简述了49年以来的近代史思考：

当代史的研究同样为上述两套理论所左右。革命源于阶级斗争的分析延伸到当代便成为“社会主义”模式。根据这一观点，中国共产党是代表中国劳动人民的组织，社会主义革命是中国社会长期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革命后的政权与中国社会是相应的整体。作为对立美国保守派的观点，革命全由共产党组织制造的，延伸至解放后的中国便成为“极权主义”模式。¹⁷ 根据这一模式，党政机器通过对人民的极权主义来进行统治。政权与社会是对立的，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才是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应有产物。

至于农村变迁，社会主义模式预言生产资料的集体所有制会克服小农生产的弱点而导向经济的现代化，同时可以避免资本主义不平等的弊端。资本主义模式则预言集体所有制会因缺乏存在于私有制和自由市场内的刺激而受挫，集中计划会导致过分的官僚控制，社会主义经济会陷入效率低下。

中国的决策层自身也长期就此问题争论，而反映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所提的“两条道路的斗争”中。随着官方农村政策的每一次转向，这个或那个模式就被用来为政策变化作解释。于是“大跃进”和“文革”期间强调平等和集体化的成就，而大跃进后的调整时期和“文革”后的改革期间则重视市场和物质刺激。

这一争论在某种程度上也进入了西方的学术界。一些学者更同情“毛主义者”，而另一些则赞成刘少奇和八十年代的改革者。而两模式最虔诚的信奉者则从抽象的观点批评中国的政策：如指责毛政策下国家机器仍然凌驾于劳动人民之上（利比特，1987，《中国的经济发展》），或八十年代的改革中市场经济发展仍然受到过分抑制（杰弗逊与罗斯基，待刊稿，《中国工业中的城市就业：就业不足与就业政策》）。

随着八十年代中国放弃集体化农业，新斯密学派认为在改革中看到了对自己信念的认可。就他们而言，中国转向市场经济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崩溃和资本主义的胜利；改革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几十年失常的社会主义革命之后，最后回到了市场推动发展的正确途径。如果问题仍旧存在，那只是因为改革还不彻底，还没有实行彻底的私有制和价格放开，也就是资本主义。

我认为中国近几十年历史给我们的真正教训是两种理论共同的错误。就相对解放前中国的研究一样，当代中国的研究也为两种理论、一个共同的规范认识所左右。学术界的争论主要集中于两种理论间的不同点，但它们共享的规范信念实际上具有更大的影响。

这里规范信念仍指那些两种理论共同认可的地方，双方均认为明确得无需加以讨论的地方。在这样的一些认识中，双方均认为城市工业化与乡村发展、产量增长与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发生，形成同一的现代化发展过程（不管是资本主义的还是社会主义的）。

双方认可的另两个规范信念也影响到我们如何看待解放后的中国。由于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模式均来自西方及苏联的经验，它们都没有考虑到人口过剩的问题。两种估计均认为随着现代经济发展，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还是资本主义的，人口问题会轻而易举地克服。双方均未考虑已经高度过密化的农业，单位面积的产量已经如此之高，已无可能再大规模提高。两者均认为产量可能无限提高。两者都没有去注意在一个过密化的乡村经济中，工副业生产对于小农的生存是何等重要。两者均认为乡村生产基本上仅是种植业生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模式通常都认为自己是对方之外的唯一选择。受这一规范信念影响的人很多，包括对两种模式本身都持怀疑态度的学者在内。在这个规范信念的影响下，乡村发展要么走资本主义道路，要么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可能走两者的混合，或第三、四条道路。

一、集体化时期的城市发展与乡村过密化

城市工业化与乡村过密化并存的悖论现象在解放后的中国比起解放前的中国来甚至更为明显。以往的研究清楚地论证了工业发展与农业变化间的巨大差别：在 1952 年至 1979 年间，工业产出以 11% 的年速度增长，共增长了十九倍；而农业产出年增长速度仅 2.3%，略高于人口的增长速度（珀金斯和优素

福，1984，《中国的乡村发展》）。这一工业发展与农业不发展的悖论现象直接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模式关于城市与乡村同步发展的预言相抵触。

当然，乡村集体化赋予了中国农业以个体小农无法提供的基本建设的组织条件。通过这样的建设，本来可能提高劳动生产率。然而人口的压力和政府政策迫使对单位土地面积投入越来越多的劳动，迫使其边际报酬递减。最后，乡村产出虽然提高了三倍，投入的劳动力却扩增了三到四倍——通过全面动员妇女参加农业劳动，增加每年的工作日以及乡村人口的近倍增加。这造成了单位工作日报酬的递减，亦即是乡村生产没有（劳动生产率）发展的（产出）增长。

集体化农场与解放前小农家庭农场一样具有某些基本的组织性特点。不同于使用雇佣劳动的资本主义农场，它们的劳动力来源是固定的，不能根据需要加以调节。也不同于资本主义农场，它们都是一个集消费和生产为一体的单位，而非单纯生产的单位。于是，它们有可能为消费需要而高度过密化，而无视单位劳动的收益。此外，解放后的政府政策进一步强化了过密倾向。从政权的角度来看，在劳动力富裕的中国增加劳动投入远比增加资本投入便宜。另外，政府的税收和征购与总产出挂钩，不涉及社员的单位工作日收入。其结局是我称之为集体制下的过密化，是中国乡村几个世纪来过密化趋势的继续。

二、八十年代的乡村工副业

对照之下，八十年代出现了大好的乡村发展。乡村总产值（可比价格）在1980至1989年间猛增2.5倍，远远超过15%的人口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3、335、56-57、258、263）。随着这一跃进，出现了中国乡村几个世纪以来的第一次真正的发展，表现在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受益的提高和糊口水准之上的相当的剩余。

我们如何看待这一进步？一些研究者忽视人口压力和认为乡村生产主要是种植业，把注意力完全放在种植业产出上，指望市场和利润刺激会像资本主义模式预言的那样带来大幅度的增长（倪与苏，1990，《中国的组织变化与经济发展：来自乡村的看法》）。种植业产出在1979至1984年间确实曾以平均每年7%左右的速度增长（《中国统计年鉴》，1990：335）。这一事实更促成直观的期望。事实上，中国改革的设计者们自己也把种植业生产看作乡村发展的标志，并自信地预言可能以同样幅度继续提高（发展研究所（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1985，《国民经济新成长阶段和农村发展》）。从1985年开始，增长实际上已经停止。但是新斯密学派成员一度继续坚持他们的看法，并以有悖事实的逻辑声称：只要中国领导人不半途而废（进而实行私有化和价格完全放开），还会有更进一步的发展。

事后看来，种植业生产在最初的跃升后停滞并不令人奇怪。在中国这样高密度的和过密化的农业经济中，单位面积产量早已达到了很高水平。除了在后

进地区因为中国化肥工业的成熟而得以更多地使用化肥外，其他地区早已使用了易于应用的现代投入。在土地没有这样密集使用的美国或苏联，大幅度的增长是可能的，但指望中国如此是没有道理的。

在注意力主要集中于种植业，到底应该以资本主义还是以社会主义的方式进行的问题上，很少有人关注到乡村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工业与“副业”（包括手工业、畜牧业、渔业、林业）。在生产资料分配的市场化和政府政策的鼓励下，乡村两级组织积极开创新的企业。工业的增长尤为惊人，自 1980 年至 1989 年间增加了五倍，远远超过种植业的 0.3 倍。到八十年代末，乡村工业已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一半以上，而副业占了另外的五分之一。

这些部门对农业社会总产出增长 2.5 倍的贡献远远超过了种植业生产(比例约为 9:1)。到 1988 年，九千万乡村劳动力在农业外就业（《中国统计年鉴》，1990：400，329）这一变化使数百年来第一次有可能在中国的某些地区移出种植业生产中过分拥挤的劳动力，出现了反过密化。通过减少参与分配的劳动力，反过密化带来了作物生产中单位工作日收入的提高。连同来自新工业和副业的收入，在中国农村的许多地区第一次创造了真正的发展和相对繁荣。

最后，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当作仅有的可能选择的规范信念，使许多学者忽略了八十年代发展的实质内容。其中占最重要的比例是市场化了的集体企业（《中国农业年鉴》，1989：345-346）。它们是两种生产方式的混合体，是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式运行机制的混合产物，既非纯资本主义亦非纯社会主义。我们今日不应再固执于两个简单的旧模式中的任何一个。

三、没有“公民社会”的市场化

在城市中，八十年代中国经济的市场化，伴随着中国政治生活的开放和民间社团的相应兴起。这些发展使一些美国学者用“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概念来形容改革时期的政治变化（怀特，1990，《中国城市：形成中的公民社会？》）。这个概念指出政权与社会间权力关系的问题，比起以往的极权主义模式来是种进步，因为后者简单地把政权对社会的全盘控制不加分析地作为前提。

然而，就像使用“公众领域”(public sphere)去描述明清时期一样，“公民社会”也容易使我们混同西方与中国的经历。在西欧近代早期的历史上和最近的东欧历史上，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是从国家政权独立出来的民权和公民个人的人权）伴随着自由市场的发展。“公民社会”包含着各种关系的复合体：伴随着早期资本主义发展而兴起的市民团体，以及民主政治体制的开端。因此，使用这个名词而不去明确注意中国不同之处，会造成相同的复合体也在中国出现的错觉。

这一提法对八十年代的中国来讲，就像对清代一样不适当。它夸大了八十年代市场交易和市民团体扩张的民主含义，也进而夸大了 1989 年春天天安门广场示威者的公民权力组织基础。它重复了过去一些人的习惯，用简缩化和结论先行的推理，把西方的理想模式套到中国头上：如果一个复合体的一两种因素出现了，那整个复合体必然会，或马上会出现。

我们应当离开源自西方经验的模式，从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的悖论现象出发。八十年代中国的市场化非常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经验，而市民团体也同样出自不同于西方的动力。如这些不同能得以分析，将有助于理解市场化带给中国的可能不同的社会、政治含义。

四、一条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外的道路

当然有人会继续坚持单一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模式，并运用这样或那样的旧有的简缩化、结论先行或有悖事实的逻辑。根据那样的推理，市场的出现预示着资本主义的其他部分，如私有制和民主的接踵而来。要是其他部分没有出现，它们至少是应该出现。至此，只差一小步就到了有悖事实的结论：只要中国领导人不顾固地拒绝放弃社会主义和转向资本主义，预想中的发展必然会到来。

中国反对改革的保守人士使用同样的逻辑得出相反的结论。随着市场化，资本主义的其他不好因素必然会接踵而来：阶级分化、资本主义剥削、社会犯罪、诸如此类。因此，必须坚决拥护彻底的社会主义，来反对资本主义萌芽。改革遇到的一些挫折，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化还不够，而是过了头。要是计划经济、集体经济没有因改革而被削弱，情况会好的多。

时至今日，我们应把这些争论搁置一边了。中国农村在五十年代之前经历了六个世纪的私有制和市场经济，但仍未得到发展，人口的绝大多数仍束缚于糊口水平的种植业生产。中国农村如果退回到五十年代以前的经济组织，会面临比以前更大的问题：人口增加了两倍，来自化肥，电泵和机耕等现代化投入的易实现的进步已经都有了，很难想象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发挥它的魔力。

五十年代至七十年代的集体化途径也应放弃了。在这一途径下，农作物产出确实上升很快，但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工作日报酬是停滞的。农村人口的大多数停留在仅敷糊口的生活水准。坚持这一途径与退回五十年代前一样，也是不合理的。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学术研究的第一步应是解释为什么乡村经济在八十年代得到蓬勃发展，而在拥有自由市场、私有财产的 1350 至 1950 年以及计划经济的集体化的五十至七十年代都没有这种发展？为什么乡村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却推动了充满活力的乡村工业化？

中国革命史上的一个突出点是乡村起了很大作用。乡村曾是共产党组织和革命根据地的所在地。通过五十年代的集体化，村、乡变成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所有的基本单位。由于五十年代后期以来的极严格的户籍制度，使村、乡下属的人员长期稳定。接着，村、乡又成了水利、公共卫生和教育等大规模运动的基本组织单位，在这些过程中扩大了它们的行政机器。这些变化给予这些组织在农村变迁中特殊的地位和作用，有别于一般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最后，在八十年代扩大自主权和市场刺激的双重激励下，它们成为农村工业化的基础单位。它们在中国农村发展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中国出现的这一历史真实是否代表了一条新的农村现代化的道路，一条既不符合社会主义，也不符合资本主义单一模式的道路？

正如前文中黄宗智所表述的那样，中国社会经济研究中诸多“悖论”，意味着原有的“范式”已经崩溃，不敷使用。现在，让我们考虑一种替代性的“近代化（现代化）范式”。

第二节：在新范式下反思中国研究

第一章的理论分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源自马克思，并初步表述在《资本论》当中的“规范认识”。它在马克思的思想历程当中出现较晚，不同于黄宗智所谓的，贯穿于斯密理论和早期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商品化会导致近代化的构想”，它的核心思想，体现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所谓原始积累”当中，并且在《资本论》第三卷第四十八章，“三位一体的公式”当中有所表述：“资本不是物，而是一定的，社会的，属于一定历史社会形态的生产关系，它（生产关系）体现在一个物上，并赋予这个物以独有的社会性质”。并且，在第一章的分析当中，我们推进了这一“规范认识”：

“资本”是一种基于高度的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的生产关系，进一步的，“资本”是一种基于低风险农业生产的社会关系。

具体地说，关于（相比于英国的，资本主义的）前现代社会，在第一章当中，我们已经借由布伦纳的分析，知道了如下结论：

（英国以外的欧洲农民）在“农业收成的不可预测性”的压力下，为了避免专门化的危险，必须致力于“安全第一”的“生存型生产”，早婚，多生育和细分土地，由此导致边际效益递减的人口扩展。而人口扩展导致更高的人地比和更差的土地质量水平，最终导致劳动生产率的下降，表现为食品价格上涨，工资下降以及工农业产品贸易逆差。

这是一种与自足式增长（发生在英国的，斯密所谓自然顺序的财富增长）截然相反的发展模式。由于农业人均产出的减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就会受到严格的限制。进一步的，随着劳动生产率的下降，当人口的增长越过某个临界点之时，就会导致饥荒，疾病并限制家庭规模。这就是所谓“农业大循环”：长期的人口增长和人均边际产出的下降，接下来就是以长期的人口停滞，衰减直至衰竭为特征的相反趋势的出现。（《从历史到理论：欧洲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布伦纳，见汉译布伦纳论文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第五章）

这个分析针对（排除了英国的）欧洲大陆，但是与传统中国的社会经济根本特征并无二致。这其中的差别，只在于这样一个历程在中国开始的很早：欧洲大陆在中世纪晚期才开始展现的历程，在中国的公元前后就已经初步完成了。此后的中国，就只是在一个又一个以朝代兴衰为标志的“农业大循环”当中，把这样一个人口扩张，人地比上升和土地质量水平下降的趋势反复深化，进而固化。于是，这样一个源自农业风险的行为模式，反复地推动了粮食危机的进一步恶化，人的生存危机更加深重，人与人的竞争更加成为生死之争。这个进程表现在社会关系上，就是阶级冲突日益激烈，社会分层日益极化，中间阶层日益消退。表现在社会形态上，就是从中世纪封建制为代表的贵族分权，

到法国式绝对主义为代表的官僚贵族同盟，再到以中国式官僚集权为代表的官僚地主同盟等各个阶段的变迁。在阶级冲突激化的极端上，地主阶层完全退化，社会形态由单纯的官僚和小农两个阶层构成，这就是史学家秦晖所表述的“关中模式”。“关中模式”这样的“终末”社会形态，已经运行在崩溃的边缘上，继之以必然到来的粮食危机，它必定走向社会解体³⁵。

由于欧亚大陆上各地的生产条件不同，文明的兴起有早有晚，演进有快有慢，相应的，它们的社会形态也就散布在这个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上，因此在有记载的文明史上，可以找到以上各种阶段的呈现。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呈现，这样的一种社会关系，在根本上都是背离资本主义的。越是靠近这个进程晚期，社会形态越是由极化而对立的阶层构成，距离作为“资本”之本质的，基于低风险农业生产的，弱对抗的社会关系也就更加遥远。我们在现实中看到的欧亚大陆近代史，不表示传统社会向资本主义发展的诸阶段，而是传统社会诸阶段与移植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相结合而造成的各种“混合态”。总而言之，那就是：

“欧亚大陆上没有资本主义”，或者说，那是各式各样的“假晶”资本主义，镶嵌的，外来的，无根的，表象的而非本质的资本主义。

只是在二战之后，随着绿色革命的深入发展，欧亚大陆各国才跃过了农业资本主义缺失这个障碍，真正进入到现代经济当中来。

在这样一个“规范认识”之下，我们来考察黄宗智所谓的各个悖论。

关于所谓的悖论一，没有发展的商品化。

首先，我们来重新解释商品化与现代经济的关系。

现代经济意义上的发展，或者说，起源于英国的，资本主义意义上的发展，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按照杨小凯的经济学理论进一步地澄清，它是分工演进的自我加速。因此，发展和商品化，并没有必然的等同关系。高风险农业生产基础上，人口扩张和人地比上升的同时，土地质量水平在下降，农业劳动生产率将会下降，劳动者最终只能维持一种生死边缘的生活水平。为着求生的必须，劳动者在农业生产之外从事“副业”生产，补贴勉强维生的“主业”，这就为“商品化”提供繁荣的推动。但是正如布伦纳的分析，由于高水平的农业风险，如果这些农民脱离土地而从事专门化生产，那么他大

³⁵ 史学家王家范告诉我们，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顾炎武来访关中，对当地状况推崇备致，认为这是江南社会的救赎，这完全是搞颠倒了。关中不是救赎，是末世。推演到极致，“关中模式”也可能不是高风险农业下社会形态演进的“终末”，因为它仍然在中央政府的直接控制之下，进一步的，它也可能崩溃解体而退化为类似于柴明达尔制的某种“间接”统治模式。

概率将会因为粮食价格的波动而落入这种困境：一方面要花高价在市场上购买食物，另一方面又不得不低价出售自己的非食物产品。当这样的食物与非食物产品的价格剪刀差趋于极端，他就要面对饥饿甚至死亡。因此，农民不能脱离土地去从事专业化的非农业生产，而只能是把非农业生产当作一种“副业”来从事，这就阻碍了分工水平（生产力水平）的提高。进一步的说，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衰退，由这种商业化所造成的生产力水平（分工水平）提高是不可持续的，也就更谈不上自我加速。由此，繁荣的商品化和非资本主义的，低水平的农业与非农业生产力可以互为一体，并行不悖。这种“繁荣的商品化”不是“资本主义的萌芽”，而是前现代经济的病入膏肓。它必定是昙花一现而不能累积进步的，因为它必定在即将到来的农业大循环末期被摧毁。

其次，我们来重新解释工农业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的一致性问题的。

农业生产力的提高，推动城市工业化，这是斯密所谓的“财富增长的自然顺序”。但是正如第一章已经引述过的那样，在《国富论》第三篇里所记载的欧洲诸国的“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也是存在的，在这些国家当中，脱离了农业“进步”基础的“精”制造业，为远地贸易而生产的制造业也可以“繁荣”，但是，这些国家以工商为基础，而不是以农业进步为基础的财富增长是“迟缓不定的”。十九世纪后期以来，中国所发生的“没有乡村发展的城市工业化”，是欧亚大陆上高风险农业之下的通则，中国的情况是欧洲情况的重现，虽然更加“迟缓不定”，但并不是例外。反过来，面对欧亚大陆上的这一“通则”，倒是英国的“自然顺序”的，基于农业进步的，迅速的财富增长，才是“例外”。也就是说，工农业发展，城乡发展，彼此之间没有一致的必然。这种相一致的“自然顺序”是英国的特殊情况，欧亚大陆上则是作为其对立面的“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前者是现代经济的特征，而后者是前现代经济的特征。

关于所谓的悖论二，分散的自然经济与整合的市场

对于中国的所谓（整合的）“民族市场”，需要强调的是，它不等同于英国式的“本地市场”，或“国内消费品市场”。尽管看起来诸如“稻米，棉花，茶叶”这样一些产品也是日用消费品，但是小农生产主要仍然是自给自足的，也就是说，小农生产的大部分仍然直接满足家庭消费，而不是专业化的商品生产，这种“民族市场”，不是像英国那样，是脱离土地的劳动者和农业劳动者之间那种本地的，或者说（地域上不大的英国）国内的市场。由于中国的地域广大和整个的欧洲大陆相似，这种“民族市场”更多的是此地和彼地之间的交换，它更多地是斯密所谓的“远地贸易”，或“（欧洲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的中国版本。欧洲大陆的情况不同于英国，前面我们已经引述了斯密和马克思来说明它，它的进步是“迟缓不定的”，“死人拉住活人”，“既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也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这些来自斯密和马克思的，对于欧洲大陆情形的观察与记述，也都适应于中国的情况。正如整个欧亚大陆上的小农向我们所展示的那样，理性，首先是生存理性，相比于生死抉择，在市场上追求最大利润是次要

的。在高风险农业生产下，高度不确定性的社会产品价格会阻止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这个前提之下，任何贸易的扩张，市场的整合，都不会导向现代经济的发生。更不要说，正像前面一段所分析所推断的那样，它必定在即将到来的农业大循环末期被摧毁。

关于悖论三，没有公民权力发展的公众领域扩张

黄宗智的经验性表述是正确的，“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张，不一定和公民权力的发展相伴随”。并且，这种“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公民权力的发展”之间的不一致（悖论）不限于中国。事实上，即使是西欧，这种一致性也只能在英国确认，而在整个欧亚大陆上，这种一致性都不能成立。之所以如此，原因在于所谓公共领域的扩张，与公民权力的发展之间没有必然性的关系。为什么这样说呢？

“公共领域”这个概念，来自于哈贝马斯对民主起源的研究。按照哈贝马斯自己的理解，“公共领域”这个概念的核心，即是所谓的“资产阶级（bourgeois）公共领域”。它起源于从宫廷中分离出来的贵族社会，也就是以一套所谓“高贵”行为的繁文缛节为特征的“代表型公共领域”，而后才逐渐演变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资产阶级”，典型地存在于欧洲大陆上的城市中，正因为如此，“bourgeois”这个词也在汉语中被翻译为“市民阶级”，它是在高风险农业的推动下，欧洲大陆上的贵族分权制度向官僚贵族同盟制度演化的伴生物，也就是说，正如埃伦·M·伍德告诉我们的那样，“资产阶级”，“市民社会”，这些概念和存在无关于资本主义。而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是在谈论罗马公民权的话），并无疑问地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伴生物。资本主义的发展，以低风险农业推动下的租地农场的繁荣为起点，正如马克思所说的那样，只有在英国，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扩张和公民权的发展没有必然性关系，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分属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源流不同的两个历史过程的产物。

在经验历史中，也不难在中国之外的欧亚大陆发现这两者之间的不一致。法国大革命作为一场“资产阶级（bourgeois）革命”，少不了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巴黎的沙龙和咖啡馆之类推波助澜，但是作为一场强化了官僚集权和小农制度的大革命，它究竟和公民权力的发展有多少正向关系，是可以存疑的。而一个不健忘的人，更会记得魏玛共和国的啤酒馆这样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如何催生了纳粹，这岂止是和公民权力的发展不一致，干脆就是背道而驰了。

总而言之，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公民权力的发展，本质上是低风险农业生产带来的，社会关系之对抗性质的弱化。没有低风险农业生产这样一个前提，社会生活中公众领域的扩张，就不会和公民权力的发展建立起实质性的关系。

关于悖论四，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

这个所谓悖论的根源，在于韦伯对法律的两分，卡地法和理性法³⁶。不同于马克思从资本主义角度来解释和分析现代社会，韦伯把现代社会出现和发展的动力解释为理性化的发展，在这种理论之下，自由主义（现代社会）的发展和规范主义（理性化）的发展是一致的。在韦伯看来，英国虽然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国家，但是作为一个普通法国家，它的陪审团制度只能被认定为理性化发展的例外。由此，这一悖论不只存在于中国，更存在于英国。这不是经验历史的问题，而是韦伯理论的问题。韦伯把现代社会出现和发展的动力理解为理性化的发展，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错误。从这种理论出发，不仅会有英国的普通法是现代性例外的奇谈³⁷，还会有两千年前的秦制就已经进入现代性这种怪论，因为秦汉以来的中国法律就是成文的法典，比起习惯法，判例法要“理性化”的多。

回到本文第一章的理论分析，依据这种从马克思主义，从《资本论》而来的“规范认识”，现代社会的出现和发展，其动力是由于低风险农业生产而造成的分工演进的自我加速³⁸。现代社会的本质规定性，是一种基于低风险农业生产的社会关系，是一种基于一切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的，弱对抗性的社会关系。法律，作为社会关系的呈现与调整，它是人对生存环境的适应，它的本质规定性，是社会关系之对抗性质的强与弱，而不是“理性化”与否，或者“理性化”的形式如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不是相反，由此，法律的理性化（规范主义），并不是社会确定性的来源，相反的，它是社会确定性的衍生物。韦伯认为英国普通法理性不足，不能够给社会带来“足够”的确定性，而经验历史告诉我们的正相反，现代社会之所以起源并发展于英国，正是因为这里有着最高程度的社会（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也正是这种高度的社会确定性，英国法律才缺少向着理性化演变的刺激，好比你在夏威夷生活，穿上草裙子也足以御寒。相比之下，高风险农业生产破坏了欧亚大陆上各文明的社会（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由此刺激了大陆国家的法律对于这种不确定性做出补偿性的反

³⁶ 韦伯对于司法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判断，所谓卡地法与理性法的区分，就是值得怀疑的。在初民社会中，对于神谕和取得神谕过程的信仰，当然是“非理性”的，但是神谕是需要解释的，而解释者和他的解释，当然是“理性”的，我们对于神道设教这个词都不陌生。而在中世纪司法当中，依据道德伦理，政治权衡，意识形态，人情世故等等实质性理由而审判，当然也是一种理性过程，因为这种种理由自身也是有规则或逻辑可循的。任何法律，只要它是法律，它就不会是“任意”的或“武断”的所谓卡地法。法律之间，只有理性之表现形式的区分，而不存在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分。

³⁷ 英国法律的“非理性化”，不限于陪审团，还在于它是非成文的判例法。

³⁸ 低风险农业生产造成普遍的社会产品价格确定性，维持了普遍的低交易成本，依据杨小凯，这将造成良好的交易条件，从而推动分工演进的自我加速，这就是现代社会生产力水平持续提高的根源，也就成为围绕现代社会的一切发展变化的动力。

应，这也就是大陆法系国家，无论是罗马法传统，还是秦制传统，都有着法律的形式理性化（规范主义）早期发展的原因，好比你是个爱斯基摩人，那么皮袍必不可缺。但是，理性化的法律，并不能解决社会确定性的根源问题。正如皮袍不能使北极变赤道，欧亚大陆也并不因为法律制度的这种理性化之“早熟”而走进现代社会。相反，正如前文所分析的，欧亚大陆各文明的“自然”趋势，是循着农业大循环的往复，在前现代社会所固有的道路上演变，不是走向现代化，而是远离现代化。

总而言之，无论是拥有“没有自由主义的规范主义法制”的中国，还是拥有“没有规范主义法制的自由主义”的英国，都不是什么“悖论”，它们正表明了自由主义和规范主义法制之间，并不存在必然性的一致。虽然，在高度发达的现代社会，它们正在走向合流，但是，在起点上，它们甚至是背道而驰的。

进一步的，我们在新的“规范认识”之下，来考察中国革命的结构和抉择问题：

前文已经分析了，由于高风险农业长期推动下的这种社会变迁所导致的密集人口和低农业生产率，和高风险农业自身相结合，农业产品的价格是高度不确定的，整个社会产品的价格也是高度不确定的。由此，这种长期社会结构变迁并不导向资本主义，农民并没有，也不会分化为资本主义农场主和雇农。但是，这并不意味着长期结构变迁就没有导致阶级矛盾的尖锐化，它只是不表现为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下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而是仍然表现为传统社会下官僚与小农之间的阶级矛盾尖锐化。

因此，尽管北方和南方的社会结构在长期演变下已经走进了不同状态，它们的阶级矛盾尖锐化表现也有所不同，但是，阶级矛盾尖锐化这个趋势，在整个中国范围内仍然是成立的。正如前文所分析的，在高风险农业的推动下，欧亚大陆社会形态的变化趋势，是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中间阶层的消退，社会日益极化为官僚政府和自然小农的两极。在太平天国之后的江南地区，地主阶层的衰退就是这种长期结构变迁的表现。而以史学家秦晖所谓的“关中模式”为典型的北方，自耕农的比例原本就比南方为高，地主阶层衰退已久，长期结构变迁所导致的矛盾尖锐化，主要的并不是表现在地主和佃户之间，而是表现在官僚和小农之间，事实上，这种矛盾激化的状况只是比南方更为极端，社会更加接近于解体边缘。

在这样一种长期结构变迁之下，生存权，而不是发展权，道义经济，而不是商品经济，才是人民的诉求。越是阶级矛盾尖锐化，社会趋于解体的地方，这种诉求就越是强烈。但是，这种生存机会的诉求，并不可能通过计划生育来实现。因为，正如布伦纳所分析的那样，高生育率本身即是高生存风险所推动的，并且，在一个传统社会当中，也不存在足够的动员能力，去执行“计划生育”这样一种政策。而期望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救济，也同样不可能，在绿色革

命之前的欧亚大陆上，以低风险农业生产为前提的农业资本主义不可能存在，农业生产率无法实质性地提高，而农业以外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使它存在，作为一种“假晶”，一种外来的，无根的，表象的而非本质的存在，它也无法改变所在社会这种高风险农业带来的生存危机。社会必然走向解体。

在这种社会走向解体的危机之下，一个建基于现代技术与思想资源的高度动员的体制，是唯一的救济。土地佃租制度的确不是必定被佃农积极的阶级革命所摧毁，但是这只是表示佃农制度广泛存在的江南地区还没有达到社会危机的极端。而地主阶层早已衰退，长期结构变迁走在了江南前面的华北，社会危机更加深重，在世界性的“二十世纪总危机”当中，华北社会已经走向解体，在内战中，北方人民对革命做出了超过南方人民的支持，也正说明了这一点。

革命，是必然的。

最后，在新的“规范认识”之下，我们来考察黄宗智所谓的当代史问题。

在农药，化肥和杂交良种这样的绿色革命要素得以实现之前，农业生产率没有太大的提高余地，更多的农业劳动投入，配合集体生产的体制，带来了更多的农业剩余，为工业积累提供了可能，为维持社会分工合作提供了基础。在这种发展模式之下，尽管工业得到了持续发展，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农业生产率的持续低下，农业生产仍然处在高风险状态下，粮食危机的威胁无法摆脱，城市经常性地需要向乡村疏散人口以缓解供应压力，社会化大生产无法充分展开。

幸运的是，早期工业化的积累，带来了农业机械与水利运输等基础设施的进步，带来了石油天然气等工业能源与化工原料的发展，最终为绿色革命的到来铺平了道路。

绿色革命三要素，农药，化肥和杂交良种，随着二次大战后世界范围内的技术进步，逐步扩展到了中国。现代农药行业，始于1945年的DDT产业化制造。在随后的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种种现代农药相继出现。中国的农药工业仅比领先国家迟到了五到十年左右。从五十年代初到六十年代，这些现代农药在中国也相继进入了工业化生产。化肥工业在世界上起步较早，但是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早期发展不算快。中国的化肥工业在五六十年代得到初步发展，遍地开花，但是绝大部分是初级合成氨产品，作用有限。随着七十年代以尿素为主要产品的大化肥工业的引入，从七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化肥在农业生产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玉米，水稻和小麦等粮食作物的杂交良种，经过几十年的培育发展，也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得以在全国普遍推广。至此，绿色革命三要素在中国得以齐备，加上早期工业化带来的农业设施和交通运输的进步，农业生产率得以大幅度提高，中国终于摆脱了从自文明发生以来就深陷其中的农业困境。

尽管中国和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国家一样，由于高风险的农业生产状况，无法实现农业资本主义从而重走英国式的现代经济之路，但是绿色革命的最终到来，使得中国，像欧亚大陆上的各个先进国家一样，都能够跨越农业资本主义缺失这个障碍，达成了农业生产率的决定性提高，由此，中国不再有压力向乡村疏散城市饥饿人口，而是有能力在城市中接纳乡村劳动人口，绿色革命替代农业资本主义，完成了劳动与土地的分离，把大量人口从农业生产中解放出来，为社会化大生产的稳定和进步创造了可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迅速展开，这是三千年未有的历史性进步。

尽管绿色革命使得中国跨越了农业资本主义缺失这个障碍，但是它不完全等效于农业资本主义。长期以来的高风险农业留下了大量的密集人口，居高不下的人地比，这些都是无可避免的历史遗产。在迄今为止的科技水平下，农业生产的潜力仍然是有天然限制的，中国的农业生产率和安全边际都不可能达到西方先进国家的水准，期望中国的农业生产效益持续增长，赶超西方先进国家，这是没有道理的。中国的成功不是要在农业生产上超越西方，而是重走斯密所谓的“自然顺序”的财富增长之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乡镇企业的兴起，就是资本主义在英国乡村起源的快速重演。

进一步的，把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状况，归结为“没有民主发展的市场化”和“没有民主政治发展的市民团体兴起”这样的悖论，也是没有道理的。中国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从一个持久的高风险农业生产状态所造成的困境中解脱出来，考察它的民主发展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尤其应该是一个趋势的考察，而不能是状态的考察。它的状态根源于过去，而不是当下，和“市场化”或“市民团体兴起”都没有关系，并且，政治的发展，也相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存在滞后，因此，在其根本上，这些所谓的“悖论”是视角偏差和时间错位所造成的。历史地看，即使是英美国家，它的“民主化”，“民主政治发展”，也不能和“市场化”，“市民团体兴起”完全同步，更不要说欧亚大陆上其他国家历史进程上的各种反复。这种所谓的“悖论”在欧亚大陆的历史上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绿色革命已经永久性地改变了欧亚大陆上的农业风险状况，这才是政治发展根本而可靠的保证。

马克思告诉我们：“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历史道路是不能任意选择的，中国，和欧亚大陆上的其他国家一样，没有机会选择从农业资本主义走向现代经济这样一条“自然顺序”的财富增长之路。在绿色革命带来的历史性跨越之下，他们必须带着历史给予的遗产，来创造属于他们自己的现代社会。这必然不同于英美国家式样的“资本主义”，但是，殊途而同归，它仍然是一条现代社会之路。

作为本章的总结，这里要强调的是，黄宗智表述的所有这些理论困难，都不专属于中国，而是属于整个欧亚大陆的。进一步的，在新的“规范认识”下，

也都是可以解决的。中国的历程，是欧亚大陆上一个高风险农业生产所推动的前现代社会的演变典范。它既是特殊的，也是普遍的。但是，就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之间的“分流”而言，这种“分流”在欧亚大陆内部是不存的。所谓中国（东方）与欧洲（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就只能是高风险农业生产条件下，各国移植资本主义大工业的次第差异，是“小分流”的所带来的溢出效应，尽管它借助于欧亚大陆的广土众民而突显出来，甚至于遮蔽了“小分流”这一本源性的道路差异。

第三章：分流

扩张，收缩，停滞，敌我，我对卡师所讲的三五有一些理解了，那我试试用类型论的视角来看三五。卡师前面说过，三五是什么？三，三百年，轴心，兴起，五，五百年，大一统，盛极而滞。这其中大致就是一个欧亚大陆上的 R 系属性文明，从初兴到第一个人口波峰而后衰退的历程。前面我们讲到过，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的变化，是社会演化的两类重大动力。古代历史上，这样的重大动力出现的机会并不多。农业的出现，可能是最重大的一次生产能力进步的起点，使文明成为可能。青铜器的出现，是动员能力的一次重大进步，带来古典文明的兴起，但是青铜稀少，主要用于武器礼器，很少用于农业生产，对生产能力的进步影响不大。然后铁器出现了，和青铜器不同，它能够大批量地生产，普遍地用作武器和农具，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就同时造成了生产能力和动员能力的重大进步，由此引发了欧亚大陆上各古代文明的第一波高潮，所谓轴心时代，这也就是早期的三五之三，循着 R 系道路的宿命，在高环境风险下的人口迅速增长，社会斗争日趋激烈，社会结构日趋两极化，内部矛盾外部化，这就是轴心时代推动兼并与扩张的根本力量，最终中央集权下的大一统也就随之到来了，这就是早期的三五之五。但是铁器时代的动员能力终归是有限的，兼并与扩张达到了支撑能力的极限，随着粮食生产波动的而来的社会震荡之下，收缩将会到来，在此之后，就是一个 R 系古代文明漫长的颠簸历程，在颠簸中陷入停滞，在内与外的敌我之争中困守。当然，这是抽象的模型，真实世界中的变化远比抽象的 K-R 模型要复杂的多了。世界各地农业条件不同，随着气候的变化与联动，比如影响欧洲的中世纪暖期与唐宋之际的降雨带南移，和随之而来铁器农具的变化，比如西北欧的重犁与中国南方的曲辕犁，西北欧与中国南方这些区域在较晚的时候才进入农业繁荣期，由此带来一波有别于轴心时代的次级三五，造就了中世纪文明的高峰。中世纪以来的这一波次级三五，虽然它们自身仍然走在 R 系社会秩序的老路上，但是它们引发了不同的附带效应。唐宋以来，中国北方农业衰退，新开辟的南方水田稻作农业，由于对于季风降雨的依赖和边际劳动投入的增加，带上了更强烈风险性质，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中世纪暖期使欧洲阿尔卑斯山以北农业兴起，除了这一区域自身风险性质较弱之外，更进一步的，在承接了来自欧亚大陆各古代文明的成果之后，英格兰这一完全的低风险农业区兴盛起来了。现代社会的道路，就是由伴随这一波次级三五而产生的，英格兰这一边缘但却是异质的 K 系社会秩序所开辟。过去的五百年中，以英格兰为代表的 K 系社会秩序在全世界日渐兴起，由此带来了以工业革命为开端的动员能力的飞跃，也带来了以绿色革命为标志的生产能力的飞跃，轴心时代以来的旧三五正在消亡，工业革命以来的新三五正在兴起，至今我们仍然身处这一历程之中。

上卷，《国家为什么繁荣》，终章，第二节，“土豆对谈录：从秩序演化看普遍历史”

在前面两章所提出和运用的源于马克思的“规范认识”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作为地理因素之集中表现的农业风险水平，是怎样决定性的影响了现代社会与前现代社会的道路分歧。在本章中，我们继续深入这一范式的内涵，在更加广泛的意义上，考察文明的历程。

首先，我们来思考文明的起源。传统上的看法，文明起源的标志，被认为是“三要素”：

- 1) 城市
- 2) 青铜器
- 3) 文字

现在，又有很多学者认同“七要素”：

- 1) 较大规模的定居点
- 2) 劳动力的分工和专门化
- 3) 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集中
- 4) 社会分层和阶级的形成
- 5) 国家组织的出现
- 6) 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现
- 7) 文字的使用

文明的要素标准，随着学术的进展发生了变化，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些要素的内核仍然是一样的。我们把这些要素抽象为两条：

- 1) 人口密集。
- 2) 分工发达。

没有密集的人口，就不会有大规模的定居点（或者，更进一步的，城市）。而劳动力的分工和专门化，剩余产品和剩余劳动力的集中，社会分层和阶级的出现，国家组织这些要素，都是分工发达的表现。进一步的，大型公共建筑，青铜器和文字，一方面是这种分工的产物，另一方面又是维系这种分工的设施。

那么，这密集人口和发达分工的根源又是什么呢？并无疑问的，它们都是农业革命的产物。种植农作物，能够在一个较小的地域上收获较多的食物，这

是密集人口的前提，靠渔猎采集为生的部落，在一平方公里土地上的收获可能不足以养活一个人，这是不可能形成大规模定居点的，更不要说供养一个城市。如果一个人种植农作物的产出，除了养活自己，还有剩余，那么就有了分工的可能，反之，如果没有剩余产生，那么即使有了密集的人口聚集在一起，也只能人人种田以求糊口，所有与分工相关的现象或产出，都将不可能存在，维护分工的设施也失去了用武之地。因此，结合前面两章的分析，我们给出以下观点：

文明的产生与发展，就是人类社会达成人口集中化与分工复杂化这样一个二阶目标的历程。

达成这样一个二阶目标，依赖于农业的发达与稳定，进一步的，依赖于剩余的充裕与稳定。

而文明进程的这两个前提，农业的发达与稳定，剩余的充裕与稳定，都决定性的受限于地理因素。特定的地理环境下，土壤地貌，气候类型，与农作物的自然属性相结合，造成了农业生产的基础。土壤地貌与农作物的自然属性是相对稳定的因素，气候变化则是三者之中最大的变数。气候的长期变迁，是农业存在能否稳定的关键变量，而气候的短期变化，则是剩余存在能否稳定的关键变量。

接下来，让我们在具体的人类社会及其历史中考察其例证。

第一节：文明起源的农业门槛³⁹

文明的起源，以农业发展为前提。从欧亚大陆到美洲，古文明起源地是屈指可数的，而各种文字记载和考古遗存告诉我们，相比于这为数不多的文明起源地，农业能够存在的地域，却要广大得多。那么，为什么不是所有这些地域都走上了文明起源的道路呢？尽管文明源流众多，历史文献所凸显的古代文明与西欧和北美次生文明，仍然是文明历程中的典型。我们就以这些文明为例，来考察文明起源中的农业门槛。

东半球的欧亚非三大洲，有我们中国人所熟悉的“四大文明古国”，埃及，巴比伦，印度和中国，这些古文明所起源的地理位置，有着明显的相似性。前三者均位于所在大河（尼罗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印度河）的冲积平原上，而最后的中国起源地则位于黄河支流河畔的台地上，也因此都被称为大河文明。这些起源地也都处于北半球的北回归线以北，属于温带气候，前三者位于北纬30度线附近，最后的中国则起源地则向北偏移了5度，位于北35度线附近。在西半球的南北美洲，则有墨西哥，玛雅，印加三地的古文明起源。这里的情况与东半球有所不同，这三个文明起源地都处在高原地区⁴⁰，而不是大河的河畔平原上，也都处在南北回归线之内，属于热带和副热带气候，而不是温带。

东西半球的文明起源地如前所述，虽然它们的地理与气候特征初看上去有所不同，但是，这些特征都适应于当时当地的农作物的自然属性，都导向了早期农业的发达。在这七个文明当中，埃及，巴比伦和印度这三个文明的起源地都在大河的冲积平原上，这里的地理和气候特征比较接近，都适应于小麦的种植。中国文明的起源地在黄河支流河畔的台地上，这里的地理和气候特征，适应于粟和黍的种植，而西半球的墨西哥，玛雅和印加三地，则适应于玉米的种植。

小麦是两年生作物，头年秋播，第二年春末夏初收获，它源自地中海东岸的土耳其高原，适应于夏季干旱少雨，秋冬春多雨的地中海气候。埃及单就气候特征来说，炎热而干旱，降雨较少，并不适合小麦种植。但是幸运的是，尼罗河每年6月至11月定期泛滥，在人工沟渠的控制下，洪水缓慢流动进入农田，为小麦种植提供了适宜的冲积土壤。并且，小麦8月播种，次年6月前收割，这一时段尼罗河仍然依靠能够上游来水保持一定流量，在避开了洪水泛滥同时，当地还是能够通过各种设施，从尼罗河水以及洪水期的蓄水池引水灌溉，这样，冲积土壤与引水灌溉相互配合，就保证了小麦种植的成功。巴比伦

³⁹ 本节的早期农业资料，引用自《文明起源的地理分析》，王恩涌，1995年。

⁴⁰ 其中的玛雅文明虽然在中后期转向了平原地区。但是它和墨西哥文明，印加文明一样，起源于高原地区。

和印度的情况与埃及类似，这两地也比较干旱，虽然降雨略多，但是仍然不能满足小麦的需要，不过，它们也和埃及一样，位于大河的冲积平原上，既保有冲积土壤，也可以利用河流引水灌溉。类似的地理环境，适应于类似的农作物品种，促成了类似的农业发展，带来了类似的文明兴起。同时，这三地的交通距离也比较近，地理障碍较少，便于农作物和技术发明的传播，因此这三个地方的文明起源在时间上接近，相比其他文明也是最早的。

中国的情况略为特殊。黄河支流上的早期农业种植，以粟和黍为主，其中黍比粟更耐旱，但粟的产量较高，分布面积也大于黍。它们都是旱地作物，一年生，春播而秋收，与降雨季节同步，依靠雨水而生长，因此这些早期农业并不依赖于黄河的灌溉。春季雨水少，因此降水和土壤水分含量（所谓墒情）非常重要，而作为季风气候区，夏季降雨集中往往有余，这一状况下，黄河支流上早期农业区域的沟渠只是便于排水，秋季降水迅速下降，有利于作物结实，但是如果雨水多而气温低，就会影响作物产量与收获。在中国早期文明起源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夏商周三朝的都城核心区域，从安阳到郑州，再经过洛阳到西安，成为一个马蹄形。这个马蹄形之所以成立，有赖于当地的土壤地貌以及气候所构成一种巧合，这里是黄土高原的边缘，黄土质地疏松，便于耕作，又和 600 毫米-650 毫米等雨线一致。粟和黍是旱地作物，但是农作物总依赖于水，低于 600 毫米的降雨量，会使粟和黍缺水，而高于 650 毫米的降雨，又容易引起夏季洪涝，或者秋季降雨较多，因此，降雨低于 600 毫米或者高于 650 毫米的地域上，它们的产量都会明显下降。在文明早期，人类抵御洪涝，克服灾害的能力非常有限，因此夏商周文明区域的这些黄河支流上的山麓和河谷高地，就是这一时期对于农作物的最佳适应。地中海沿岸的中东地区，是古代文明的十字路口，两河，埃及和古典文明在这里交汇，印度相距也不远。中国与这些欧亚大陆上的早期文明之间，地理远隔，对于农作物和技术发明的传播都是很大的障碍，而这种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与埃及，两河与印度的大河流域的灌溉农业相比，也较为薄弱。因此中国文明的兴起，与前面三个小麦文明相比，时间上要明显的晚一些。

相比于欧亚大陆，美洲文明的历程是独特的。自从末次冰期人类迁移到美洲之后，气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海平面上升，美洲和欧亚大陆的交通基本上断绝了，因此两边的农业文明可以说是独立起源的，墨西哥，玛雅和印加，这三个文明都依赖于美洲本土作物玉米。玉米生长所需的条件是较多的光，热和水，这点超过了所有的旱作，另一个条件是通气，在玉米的基部有通气根，如果被水淹没时间稍长，玉米就会因根部窒息缺氧而死亡。较多的光热需求，使玉米分布趋于低纬度，使得玉米文明出现在南北美洲的回归线以内。较多的水需求，需要多雨地区，通气条件则要求有良好的地形条件，便于排水，而较多水份和良好的通气，往往是互相排斥的条件，由此进一步限制了美洲文明的具体区位。

三个美洲文明当中，墨西哥文明位于墨西哥高原南部，这里阳光充足，温度适中，年最低温出现在1月，平均气温12摄氏度，年最高温出现在5月，平均气温18摄氏度，降雨集中在6，7，8和9四个月，年降雨600毫米，其他各月较干燥，对于玉米种植来说，雨量与季节分配略有不足，需要灌溉，但是地势良好，通气不是问题。玛雅文明出现在危地马拉西部高原的山麓地区，此地环境条件与墨西哥高原条件类似，后来玛雅文明转向东部平原，这里是季风雨林，雨季降水多，而旱季缺水，常规情况下，平原上雨季多雨则易于积水不利于通气，而旱季缺雨，又不利于玉米生长，但是这里有特殊的地貌条件，属于石灰岩地区，漏水严重，因此雨季多雨却不易积水，而旱季缺水则依靠灌溉系统加以弥补（玛雅遗址蒂卡，位于危地马拉中部平原上，这里是玛雅文明中期的中心地区，就发现了这样的水利系统），由此满足了玉米种植的要求。印加文明主要位于秘鲁的安第斯山地的河谷地区，当地山脉海拔4000米以上，山气温低，不适合农业生产，但是河流深切的河谷盆地，则由于接近赤道地区而气温较高，这里降雨不足，依赖于山地上部的水流来灌溉谷地边缘上开辟的梯田种植玉米，谷地上部地势较高，温度不足以种植玉米的地方，则用来栽种马铃薯，由此玉米和马铃薯构成了印加文明的主要作物。墨西哥，玛雅和印加，它们所处区域的地理状况是不同的，但是都因为当地的具体土壤地貌和气候条件而适应了玉米的种植，构成了文明起源的前提。

相比于中低纬度的古文明，西欧北美文明这样一些次生文明发生在高纬度地区。古文明进程之所以没有在这些地区发展起来，原因比较直观，少有争议或误解。在前面关于古文明起源的讨论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农业发展对于文明起源的意义，而高纬度地区由于气候较为寒冷，森林密集，在农业发展上有着天然的障碍。这里远离农业起源地，在气候温暖的历史时期，高纬度地带的农业有机会因文明传播而得到发展，但是也容易被长期气候变迁所打断。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北欧文明史，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在气候较为温暖的罗马时代，罗马的势力达到了莱茵河一线，在不列颠岛中部修筑了哈德良边墙，莱茵河以西和不列颠岛南部被带入了文明时代，但是在随后的罗马冷期当中，当地和罗马本土的农业生产都处在衰退之中，日耳曼人南迁，不列颠岛南部被放弃，这些地方也随着罗马的衰落而衰落，在历史记载中再次沉寂了。在长时段上不稳定的高纬度农业生产，不容易支持文明起源所需要的长时间积累，需要在中低纬度古文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承接来自古文明的各种文化与技术成果，配合温暖时期的气候条件，来促成农业提升，这里的文明才能够快速成长起来。在中世纪暖期这样一个契机下，来自欧亚大陆上的古文明积累，带动了重犁这样的农业技术进步，阿尔卑斯山以北的西北欧就发展起来了。美洲大陆北部的印第安文化区，处在类似的状况之中，正如贾里德·戴蒙德所指出的那样，美洲大陆是一个南北走向的大陆，在南北方向上，土壤地貌气候变化明显，而美洲古文明集中在低纬度地区，本地农作物传播因土壤地貌的南北差异而受限，降低了它们对高纬度地区的影响力，再加上美洲大陆又和欧亚大陆交通断绝，缺乏交流，大航海时代之前，也没有来自欧亚大陆的农作物和技术进

步，多种因素之下，使得美洲古文明势单力薄，发展缓慢，美洲大陆的北部地区没有进入早期文明时代，是可以想象的。

以上这些古文明和次生文明的例子表明，地理因素对文明起源的作用，主要是通过它对农业发展的作用而实现的。否认地理因素作用的观点，往往忽视了这一点，而用同样的地理环境并不一定产生类似的文明起源作为举例，比如汤因比就用这样的思路来检验“大河与文明”之因果关系的合理性，他说：

“格兰德河流域（在美国与墨西哥的边界上）和美国科罗拉多河流域同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环境条件是完全一样的。……却没有让它们两岸原有的居民创造这种奇迹……。”“安第斯文明是在一片高原上出现”，相比之下，“在非洲东部的高原”并未能“创造”文明“社会”。“中国文明有时被称为是黄河的产物，因为它正巧是在黄河流域出现的，但是多瑙河流域虽在气候特点、土壤、平原及山地面貌上同黄河非常相似，它却没有产生相似的文明。”（《历史研究》，第二部，文明的起源，阿诺德汤因比，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

基于这些论述，汤因比认为环境在文明起源上“不足以成为积极因素”。不过，这样简单化的否定是不足以成立的。我们前面已经说到，美洲与欧亚大陆交通断绝，那里的农业生产是独立起源的，而中国做为远东古文明，与地中海这样一个文明的十字路口相距甚远，它的早期农业也是相对独立起源的。格兰德河流域和科罗拉多河流域地处美洲，这里即使有埃及与两河相近的环境条件，却没有小麦这样的农作物，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也没有通过传播而得到此类农作物的可能性。同样的，非洲高原即使有着类似安第斯山的文明的环境条件，在地理大发现之前，这里也没有得到玉米或类似作物的机会。而多瑙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的农业环境还有着较多差异，并且和中国文明东西远隔，同时也远离粟的野生种分布区。因此，与其说这些事例论证了环境在文明起源上“不足以成为积极因素”，还不如说，它们反而是确认了环境在文明起源上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农作物的分布与传播，以及农作物属性与各地土壤地貌气候等农业条件的配合，这些都是地理因素，也都是文明环境的组成部分。正是特定的地理因素所构成的环境条件，决定了农业发展，也就决定了文明起源。同时，农业发展对于多种地理因素之间彼此配合的要求，抬高了文明起源的环境条件门槛，构成了文明历程上的第一道“窄门”，欧亚大陆和美洲大陆上的古文明和次生文明，都是通过了这一道“窄门”的幸运者。

第二节：夭折的文明源流，农业的脆弱性⁴¹

“窄门”之下，不是每一个文明种子都是幸运者。我们以中国为例，来看一下早期文明历程的复杂性。末次冰期在距今一万年左右结束，气候回暖，使农业存在成为可能。今天的中国文明，它的起源地主要在中原地区，但是考古发掘告诉我们，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发源地远不止于此。在距今8000年前后，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密切的中原地区，海岱地区，甘青地区，西辽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长江下游地区等六个新石器文化区已经出现，距今8000年到6000年期间，气候处于较为稳定的暖湿时期，随着农业的进步，古人类的活动范围由山地逐步向河谷平原或冲积平原扩展。这些早期文化区，构成了一个东西南北的跨度都超过了2000公里的广大区域，区域内气候，地貌和土壤条件都有着很大差异，南方长江流域的年平均气温比北方的西辽河地区高出10摄氏度左右，东南方的长江下游年降雨量为1000~1500毫米，相比之下，西北方的甘青地区降雨量只在500毫米左右，甚至更低。不同的地理环境条件，造成了不同的早期文化特征，南方的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多雨，河湖密布，在这一时期已经成为稻作农业区，而北方的黄河流域和西辽河流域，降雨较少，依赖于以粟和黍为主的旱作农业。干旱少雨的西北部甘青地区，畜牧业的重要性就要更高一些。尽管这些各具特色的区域文化最终都汇入了中国文明，却只有中原地区成了中国文明的主源。这是为什么呢？

长期的温暖气候下，各文化区域农业进步，人口增加，造就了文明起源的基础条件。在距今5500年左右，这六大文化区域都先后启动了文明化进程。但是这种“满天星斗”的多元发展进程，在距今4000年前后被终结了。中原文化区成为文明进程上的幸存者，从此一枝独秀，其中的关键，是长期气候变迁所导致的大范围农业衰退。距今5000年前后，气候逐渐干凉，对各文化区域的原始农业带来巨大影响。甘青地区的仰韶晚期社会发展陷入停滞，虽然在距今4000年前，这里的齐家文化已经有了较为发达的青铜冶炼技术，但是并不能挽回文明进程，随着时间推移，甘青地区整体性的农业文化消失，破碎成为多个以畜牧为主的地方文化。西辽河地区的科尔沁沙地扩张，文化遗址数量锐减，分布地域缩小。中国地区的季风气候特征中，存在着北旱南涝的跷跷板，随着气候逐渐干冷，降雨带南移，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增加了。距今4000年前后，长江中游显著淤积，这一时期的大溪-石家河遗址已经被发现，它位于江汉平原北部，被掩埋在厚达数米的淤泥之下。位于长江下游，已经出现了都邑性质的古城，有着灌溉与防洪系统的良渚文化，在距今4200年前后，它的农田和聚落也被洪水淹没了，比长江中游的衰落还要早200余年。位于黄淮下游的海岱文化，早期以粟的旱作农业为主，在气候温暖期，这里引入了稻作农业，并且成为稻作农业向北传播的中间站，但是在这个气候干冷化的时期，海岱地区不再适合稻作农业，被认为已经进入了邦国时代的海岱文化，也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一

⁴¹ 本节的早期农业资料，引用自《文明起源的环境因素》，魏一平，2012年。

样，随着稻作农业的衰退而衰退了。相比之下，从海拔几十米的平原到海拔1000多米的黄土高原，中原地区存在着多种多样的为黄土所覆盖的地形，高度不同的地形上，有着不同的农业生产条件，使得粟和黍的旱作农业可以在不同高度的地形上转移，从而得以保全。同时，差异化的地形也保全了较为发达的畜牧，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补充，进一步提高了中原文化在气候变化打击之下的生存能力。因此，正是气候长期变迁所导致的筛选效应，使得那些农业生产不能够保持稳定的文化区域，中断了它们的文明起源进程。在分布于东西南北各达2000公里的广大地域上的早期文化中，只有抗风险能力强，农业生产能够稳定发展的中原地区幸运地躲过了夭折的命运，成为中国文明的主源。

第三节：迟滞的文明源流，社会分工的剩余条件

“幸运的（文明）种子都是相似的，不幸的种子各有各的不幸”。我们在前面讨论了中国地区的早期文明源流，它们的农业发展或有中断，但是都伴随着明确的分工现象。而农业区域是广大的，在这些古文明或次生文明的起源地，或是被它们所吸收的早期文明源流所在的历史区域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农业发展与分工演进相脱节的其他早期文明进程。在低纬度热带区域，比如赤道西非，太平洋上的几内亚高地，在非常久远的年代里就已经独立驯化栽培了当地独特的农作物，但是，尽管这些地域上的农业文化持续存在，并未因为寒冷等原因中断，这里的文明进程却因为分工演进的迟缓而落后，并呈现出各种不同的早期文明状态。

总体而言，低纬度热带区域的自然环境并不适合农业发展。赤道非洲有少数平原和盆地，属于热带雨林气候，再往南北两侧走，则是热带草原气候。热带高温多雨，雨林尤其如此，腐败物分解也快，雨水结合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和地面上的腐败物而成为酸性水，对土壤当中的钾钠钙镁等盐类，铁铝氧化物和有机质造成显著的淋溶作用，亿万年的雨水冲刷，使得这里的土壤多为有机质含量低，粘度高的酸性红土，非常贫瘠。这样的气候与土壤，对农业生产非常不利，只有从美洲引入的玉米和木薯能比较好地适应这种状况，不过这是地理大发现之后的事情了。在非常早的年代里，生活在赤道西非的森林边缘地带的人们就独立培育了非洲薯蓣，数千年以来，班图人从这里扩散到了整个南部非洲，带去了西非本地起源的非洲薯蓣，沿途得到的各种香蕉，亚洲薯蓣，以及高粱和谷子等谷物，但是由于撒哈拉以南农业生产条件的薄弱，班图人最终未能在这块广大的土地上造就突出的文明进程。

南部非洲之后，我们再来看太平洋上的新几内亚岛。它是世界上仅次于格陵兰的第二大岛，靠近赤道，这里在数万年前就有人居住了，甚至比美洲还早，它的农业起源也很早，可以追溯到将近一万年前，考古发现，大约在七千年前，新几内亚的高山谷地区就独立驯化并种植了芋艿和香蕉。尽管这里面临着赤道非洲类似的不利的农业环境，当地居民还是以其聪明才智发展出了精巧堪比文明世界的集约农业。由于这些高山谷地与世隔绝，这里直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才被“文明世界”所知，当外来者乘飞机俯瞰群山，发现这些高山谷地时，他们为眼前这像荷兰一样的农业风光而感到惊讶。因为出现在人类学研究中而为人所知的马林人就居住在这里，相比于渔猎社会，马林人是“进步”的，他们生活在定居的村庄和部落社会中，群体内常常会涌现出一位起到领导作用的“大人物”，某些部落还建有专门而精致的房屋来举行仪式。但是，同样引人注目的是，相比于“文明”的标准，他们又是“原始”的，尽管由于独特而精巧的集约化农业，他们有着相当高的人口密度，但是他们没有文字，也没有组织为酋长管辖地，更不用说组织为国家，也就是说，相比于农业发展，这里的政治进程等分工演进现象是严重滞后的。

在进一步讨论新几内亚高地的这种状况之前，我们首先来检讨一下社会分工得以成立的机制。在农业发展产生密集人口的同时，也就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作为生命，我们人类的存续能力是有限的，对于任何一个农业社会，农业产品做为最重要的生存资料，决定性的影响了其个体的存续机会，正如前文所述，农业生产有赖于作物的属性与土壤地貌气候等等地理因素的配合，无论在长时期上还是短时期上，都是有风险的，对于处于这种风险之下的社会个体而言，追求存续机会最大化，就需要在合作与斗争之间做出种种权衡。我们概括这种生存法则如下：

面对农业风险，对任何个体来说，合作有助于对抗风险，但是如果遭遇背叛而承担了其他个体的风险转移，就可能导致存续机会的重大丧失。在饥荒等农业风险之下发起背叛行为，比如拒绝分享食物，甚至是进一步的发起攻击，对于遭遇背叛者来说，都可能是致命的，“久赌必输”，这种形势下，坚持合作策略者必将在重复博弈下丧失生存机会。由此，个体之间将会陷入围绕风险分担的囚徒困境之中，也就不存在维系高水平合作策略的可能，只能依靠血缘关系，把个体之间的合作维系在一个较小的群体之内，群体之间只能互相背叛而无法达成合作。文明进程中的发达分工，是一种大型的群体间的合作形式，要达成这种分工，就要把各群体从农业风险所导致的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就需要权威的政治机构作为群体间的第三方仲裁，但是，建立和维持这样的政治机构是需要资源和军备的。因此，一个农业社会有没有资源和军备来建立政治权威，就会成为该社会能否推进其文明进程的决定性因素。

回到新几内亚高地的社会状况，这里生活着众多互相独立的族群和部落，每个群体都只有几百人，无论语言，血缘是否相通，彼此都互相凶狠的斗殴，生活在一种断断续续但并不休止的战争状态之中。美国人类学家拉帕波特研究了属于新几内亚高地马林人的一个名为策姆巴加人的二百余人群众体，并记载在他的著作《献给祖先的猪》当中。另一位美国人类学家基辛根据这一研究对策姆巴加人的生活做了如下简述⁴²：

拉帕波特的研究一开始就注意到养猪在策姆巴加生活中的重要性。在通常的情况下，当饲养的猪为数不多时，白天任由它们自由觅食，晚上赶回到饲主家喂以劣等甘薯。当族群间发生战斗或有人生病时，便杀猪来做牺牲以告祭祖灵。拉帕波特发现这些牺牲具有生理适应的后果，虽然当事者本身或许并不知道这一点。当杀猪告慰祖灵以救治病人时，病人（和他的近亲）同时就得到大量蛋白质的补充（在正常饮食中，蛋白质的供应比所需略少）。人在生理紧张时特别需要蛋白质的补充。战斗前做牺牲用的猪对战士也有同样的效用。

⁴² 在拉帕波特考察的时代，马林人总共有七千余人，分为二十多个群体，最大的群体不超过一千人，居住在新几内亚马当省。

生态适应上所产生的更有趣的细节就是繁复的仪式循环了，这种循环可以促使猪的数目远远超过正常需要的程度。马林人的地域群体就是生活在战争与和平彼此交替的状态当中。通常领土比邻的群体之间会发生战事，战事一旦爆发，零零星星的战斗可能会持续好几个星期。常常双方势均力敌，也就很难有所谓决定性的胜负。但有时也会有一个群体完全溃败，幸存者就投奔到其他群体的亲戚家里；战败者的家屋，园圃以及猪等财产则往往被敌人夷平。但在那个阶段，胜利者还不能完全占领战败者的领土，因为败方的祖灵还继续护佑着这块领土。

当战争结束时，还保有家园的群体就举行一个仪式，种植一种叫做轮柄（rumbim）的神圣灌木。除了仔猪之外，所有的猪都宰来祭供祖先。大部分的猪肉都分赠给曾经助战的邻近群体。战时施行的各种严苛禁忌已有部分解除，但对盟友和祖先所缺乏的物质和精神债务还没还清。这种在休战之后仍然存在的负债和危险状态一直继续到轮柄长到能被连根拔起，并足以举行一次猪宴“慨阔（Kaiko）”为止。慨阔仪式要用很多猪，也许五年或十年的时间才能养出这么多猪。

有了猪群，就得开垦很多园圃，投下很多精力来喂养它们。拉帕波特的民族志记载显示，在慨阔猪宴即将举行之际，策姆巴加的猪群高达169头，可以吃掉54%以上的甘薯收成和82%的木薯。这时的园圃面积比猪宴之后园圃的面积要大36%。

拔轮柄和宰猪的压力可以预想得到是来自妇女，因为她们负担着饲养越来越多的猪群的大部分工作。这种压力也来自猪闯入园圃所引发的争执甚至打架的事件；为了将这种争端减至最低限度，聚落模式也变的越来越分散。

慨阔猪宴开始时，首先要在边界竖起木桩。如果隔邻的战败者四处逃逸之后还流落他乡，在这许多年之间仍然无法重返家园种植自己的轮柄，那么战胜者就可以吞并其领土，因为没有种轮柄就表示那是无主之地。而且战败者一旦因为寻求庇护而加入了别的群体的仪式生活之后，尤其是在他乡开始种植轮柄时，也就等于把祖先和群体渊源迁移到别处去了。

当轮柄被连根拔起时，就开始大量杀猪（在拉帕波特看到的例子中，169头猪中共杀掉了32头之多），并且把肉分给其他群体中的盟友和姻亲。慨阔活动继续了差不多一年，在这段时期内，在做主人的群体一次接一次地宴请邻近友善的群体时，每次都举行跳舞并分配食物。拉帕波特猜测这些舞蹈的功能时一种“求爱的表现”；但更重要的是，这些舞蹈将可能的盟友结成一个团体，用来向外面的世界显示当战争爆发时可能联盟的力量。就好像现代国际社会中国盟国的政治协商会。拉帕波特注意到舞蹈是由个人招引其他群体中的血亲，姻亲，朋友等而扩展开来，遵循着邀请助战时同样的路线：

“就某种意义而言，舞蹈和战斗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这种对等性主要表现在作战和跳舞之前的某些类似的仪式上，马林人说凡是会来参加跳舞的人也就会来协助作战。做主人的群体和可能的敌人双方面都会以来参加舞会的人数作为衡量下一次作战时会来协助的可能战斗力的根据。”

在通宵达旦的狂舞之后，参与者就开始交易，因此慨阔提供了和平地交换贵重货物的机会。这些货物包括食盐和石器，以及象征性的财富。

慨阔以主要的牲祭结束，宰掉所有剩余的大猪，猪肉根据亲属关系和联姻关系分给其余群体的成员。拉帕波特观察到，策姆巴加的慨阔猪肉分配一共分给了17个小群体中大约2千至3千个马林人。慨阔也是在婚姻关系群体间分配财富的场合。

当慨阔猪宴结束时，战斗又可以爆发了，并且通常就真的爆发；但如果和平维持得足够长久，第二轮的仪式循环终于也可以实行时，原先交战的两个群体就得以继续维持长久的和平。（《文化，社会和个人》第五章，“文化如何变迁”，R·M·基辛，1988）

拉帕波特给了我们正确的知识。猪肉可以提供蛋白，提供疾病和战斗中的营养补充，提供巩固盟友关系的契机。喂养日益增多的猪只，在耗费劳力的同时，也激化了群体内部的矛盾，导致了居住上的疏散，这既削弱了对内团结，也削弱了对外防卫。慨阔猪宴结束了伴随着养猪过程而来的生产强化，也结束了群体在团结和防卫上的自我削弱，随之而来的战争则破坏了失败一方的田园，猪只和房屋，进一步削弱了在前一阶段上发展起来的生产强化。但是，应该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以养猪杀猪为线索的生活周期呢？

拉帕波特从“生态适应”的角度解释马林人的这一生活周期，认为这种周期性发生的战争抑制了过度的农业开发，对当地脆弱的农业环境起到保护作用。这种解读或有其洞见，但是，任何一种生命都必须服从演化的法则，选择压力是永恒的，唯有对于存续机会最大化的追求，才是所有生命行为的根本原则。用所谓的“生态适应”来看待这个养猪杀猪的循环过程，只能是一个来自现代社会的外来者才会有的视角偏差，用一句俗语表达，这就是“想多了”。这种“生态适应”即使真的存在，也只是高地马林人追求存续机会之行动的偶然和暂时的溢出效应，它既不是必然出现的，也不是必然持续的，因为在任何意义上，它都不能压倒生命行为的本质，那就是追求存续机会的最大化。现在，让我们从“存续机会最大化”这样一个视角，来重新解释策姆巴加人，以及他们的其他马林人邻居的这样一个生活周期。

在高地上，不存在一个比村落群体更高的政治力量，可以把各群体整合在一起，使他们和平相处。高地群体之间的关系，等同于文明世界中那种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差别只在于高地这个“国际社会”的构成单元，并非文明世界那种政治结构发达的地域国家，而是还没有形成政治分化的，数百人大小的村

社族群。但是撇开这种内部构造与体量大小的不同，高地群体和文明国家在各自“国际社会”中的外部行为是高度相似的。无论是出于有意识的精心规划，还是无意识的文化继承，高地马林人，也就是拉帕波特所考察的策姆巴加及其相邻群体，用经过了适应筛选的“最佳实践”，向我们展示了这种无政府状态下的生存之道。

赤道太平洋上的生活是不确定的。由于正处在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现象的核心地域上，准周期性的降雨变化，多雨或干旱，会给赤道居民的生活带来很大的困扰。人类学家告诉我们，在新几内亚地区，由于当地气候的影响，在一代人成长起来的二十来年当中，总会遇上一两次严重的往往是导致饥荒的农业歉收。由于特殊的历史路径与农业条件，高地农作物主要是甘薯，甘蔗，薯蓣，芋头这类块茎类作物，当地气候下的块茎类收获物，并不适合于长期储藏，因此积累收获以对抗歉收是无法实现的。由此而来的生存困境，加上高地上不存在村落群体之上的政治权威这一事实，使得群体之间的冲突不可避免。冲突中的失败者，将会失去财产，土地，乃至生命，那些没有为冲突做好准备的群体，面对那些备战上更胜一筹的群体，必然在冲突中失败乃至毁灭，一言以蔽之，疏于备战者的存续机会将被削弱。为了避免这种削弱，最大化存续机会，备战是一种必须。从这一视角上看，高地马林人从养猪到杀猪的生活周期，就是一个从军备到战争的循环过程。

在高地马林人的物质条件下，战争是一种原始形式的冲突，装备水平有限，组织程度有限，所有能够战斗的男性都是士兵，身体上的力量和技巧是最主要的战斗资源。慨阔猪宴上的猪肉，既是营养补充，更是“战斗力”的强化，为办好一次慨阔猪宴而喂养更多的猪只，就等同于平时积累更多的备战物资，为的是战时释放更多的战斗力量，用现代人的话语来说，更多的猪，就是军备竞赛中的胜利。在群体成员参加之外，慨阔猪宴还广邀盟友并分发猪肉，在动员自身并释放压力的同时，也拉拢了盟友关系，动员了盟友的战斗力量，由此更加充分地转换备战物资为战斗力，并向敌方展示。慨阔猪宴以拔“轮柄”为先导，这就相当于文明世界里的宣战文书，慨阔猪宴既是内政，也是外交，但终极意义上，它就是军备的完成和战争的起点。美国人类学家道格拉斯·奥列弗考察了新几内亚布干维尔岛上的西瓦伊人，他们比高地马林人更进一步，猪宴有了一位主办人，被称为“姆米”（大人物），通过主办猪宴，他在邻近的盟友群体中招徕追随者，成为战争中的群体领袖，西瓦伊人回忆殖民当局压制械斗行为之前：

古时候有比现在更伟大的“姆米”，那时的“姆米”是凶猛无情的战争领袖。他们使田野变得一片荒凉，他们的俱乐部里摆着一排排刀下死鬼的头颅骨。

（《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原始国家的起源”，马文·哈里斯，1988）

西瓦伊人留下了对“姆米”的赞歌，“人和猪的杀星”这样的颂词，让我们对这种与猪宴相伴随的战争气息有更好的体会：

你如雷电行空，你摇撼大地

多少次宴席靠你主办

当你离开我们

处处的锣鼓暗哑无声

战士，英俊之花

人和猪的杀星

当你离开我们

谁将能为家乡带来荣誉？

（《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原始国家的起源”，马文·哈里斯，1988）

由于到这种永无尽头的军备与战争所带来的辛劳和苦难，一个能够维持和平秩序的权威的政治机构是有益的，它将使高地群体从这样一个关于军备与战争的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但是，为什么没有这样的政治权威呢？

对于冲突的双方而言，政治权威是一种第三方仲裁。正如我们在前文所表述的那样，它的建立和维持，是需要资源和军备的，但是对于高地马林人来说，不幸的是，没有可以长期储备的收获物，也就不存在有效的剩余。一方面，这削弱了他们对抗歉收的能力，激化了群体间的斗争，推动了他们对于权威的政治机构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就没有可能去维持一个第三方仲裁者的存在，这又使他们失去了建立权威的政治机构的可能性。一言以蔽之，缺乏有效的剩余，既推动了对政治权威的需求，又阻碍了政治权威的供给，在这样一个需求与供给的悖论之下，社会分工成为不可能，不可解脱的军备与战争循环成为生活的主线，高地群体的文明进程由此而停滞了。

剩余是分工的基础。似乎一直以来，人类学家都未能充分理解这一常识的重要性。没有剩余，人们就只能在狭路相逢的战斗中杀死对方，失败者唯一的结局，就是成为敌方所陈列的“一排排刀下死鬼的头颅骨”，彼此之间只有不共戴天，而不存在分工的可能。对于文明进程而言，有效剩余的重要性，在新几内亚高地和布干维尔岛的猪宴循环之外，另外两个比较案例能够给我们更多启示。

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交界处的赤道雨林地带，奥里诺科河和里奥内格罗的源头，生活着一支名为雅努玛莫的印第安人。大约十九世纪中后期，他们获得了铁器和香蕉，改变了过去的游猎生活，转而成为种植香蕉的定居者，他们被认为是凶残无度的“悍民”，几乎是无休止的打仗，三分之一的成年男子在战斗中死去，成为文明道路上的一个另类样本。

战争是雅努玛莫人生活方式的基本表达形式。雅努玛莫人与（新几内亚高地）马林人截然不同，他们似乎无法建立任何稳固的和平局面。他们与附近村落建立了一系列同盟关系，但是家族之间的关系，却由于没完没了的猜疑，恶毒的谣言，以及各种狡诈的背信弃义行为而屡遭破坏。我们说过盟友们如何通过宴会来相互款待对方，这种场合是巩固相互友谊的大好时机，不过即便是最好的盟友，也会表现得凶猛强悍，咄咄逼人，以便不致于使人怀疑各个家族对同盟关系所做贡献的价值。在这种友好的宴会上，尽管人们个个趾高气扬，神气活现，自我炫耀，但最终的结局再最后一个客人离开村子之前却无法预料。所有的人都十分清楚，主人会有意安排庆祝活动以便除掉那些宾客，或者，如果宾客已有所察觉，会利用这种机会干掉主人。1950年，（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哥诺所记载的某个）主持拳击胸部角斗的村落的许多亲属，最后都成了一次臭名昭著的背信弃义的宴会的冤魂。他们长途跋涉两天之久，来到另一个村子以便与那里的人结盟为友。主人们邀请他们尽情欢歌狂舞，气氛十分平静，之后，他们回房就寝，入夜时分，一群人手持铁斧，棍棒闯了进来，十二个人丧命，侥幸逃脱的人冲出村子，返回途中，又遭遇埋伏，数人死亡，多人受伤。（《母牛，猪，战争，巫妖——人类文化之谜》第四章，“野蛮的男性”，马文·哈里斯，1989）

这种战争行为的频繁程度令人瞠目，事实上，相比于高地马林人从养猪到杀猪这一从军备到战争的十余年的周期，人类学家的观察告诉我们，雅努玛莫人的生活中，根本不存在军备阶段：

（美国人类学家）拿破仑·查哥诺在那里逗留期间，一个村落十五个月内竟被偷袭了二十五次。在这种情况下，查哥诺竟能幸免于难，真是奇迹——这充分展示了他作为人类学家的高超技艺和勇敢无畏的精神。（《母牛，猪，战争，巫妖——人类文化之谜》第四章，“野蛮的男性”，马文·哈里斯，1989）

对于如此频繁的战争，人类学家做出了各有千秋的解释，但是对比高地马林人的情况，这其实不难理解。雅努玛莫人获得了铁器和香蕉，在赤道雨林地带砍伐丛林建立香蕉种植园，相比于过去的游猎生活，这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收获物数量，提高了人口密度，和高地马林人相比，他们同样要面对赤道气候带来的农业（香蕉）歉收，但是作为可储藏的剩余，香蕉还不如番薯，同时他们也不能像高地马林人那样，把产出剩余拿去喂猪，把猪只当作一种退而求其次的“储藏”，“武器”，没有剩余，就没有对抗风险的能力，相比高地马林人，雅努玛莫人更深地陷入了生死相搏的囚徒困境，面对必定到来的冲突，雅努玛莫人唯一可用的资源和军备就是人力，因此他们只能把所有的产出都尽快转化为人口，尽快投入到战斗中去，才能求得存续机会的最大化。这种生活是残酷的，但却是环境条件与演化法则所强加于他们的无法逃避的命运。

相比于雅努玛莫人，同样位于赤道地带的非洲布尼奥罗王国，则向我们展示了有效的剩余能给文明进程带来怎样的推动。布尼奥罗据说由三个历史不同

的民族所组成，原来的农业民族，侵入的游牧民族胡马族（Huma），最后侵入的原居尼罗河流域的比托族（Bito）。为现代人所知的国王就是比托族的后代。虽然殖民地政府大大地改变了这里，但是传统制度的主要轮廓仍然可以被描绘出来。

布尼奥罗位于今天乌干达境内的东非中央湖区，地域约为5千平方英里，人口约10万，由一个称为“穆卡玛”的世袭统治者统治，布尼奥罗人主要靠种植小米（珍珠粟和指黍这两种作物）和香蕉（象腿蕉？）为生。布尼奥罗人被组织成实行分封而又仍有权威性的国家社会。他们的穆卡玛是国王而非仅仅是负责再分配的族长。穆卡玛把所有土地和自然资源的使用权分配给十几个族长，族长再进一步把这种使用权分配给普通老百姓。为偿答这种分配，大量的食物，手工制品和劳役通过权力等级系统汇集到穆卡玛的总部。穆卡玛相应以国家事业的名义指导这些物品和劳役的使用。（人类学家）约翰·贝蒂告诉我们：

“国王被视为物品和劳役的最高接受人和施舍者……大族长们从其属民那里接受贡品，他必须将其属地产品的一部分，如粮食，牲畜，酒和女人献给穆卡玛……但所有人不仅要向族长进贡，也要向国王进贡。国王相应也必须充当施舍者的角色。国王的许多特别名称都强调其宽宏大量的气度，依照传统，他应以宴会和赏赐的形式广泛向人施舍。”

……

只有穆卡玛具有凭好恶进行予夺的权力，有人若不向穆卡玛进贡，就可能落个失去土地，遭到驱逐，受到肉刑毒打的下场。尽管穆卡玛大开盛宴，有着“大施舍者”的美名，但他仍用许多收入来加强其对强制力量的垄断。他靠着对中央谷仓的控制，维持着一支常备宫廷卫队，对于那些作战勇敢，忠于他个人的战士则不吝重赏。穆卡玛还将国库中相当的财富用于当代所谓的“建立形象”和公共关系的活动中。他的周围有许许多多官员，巫师术士以及保管王家物品的人，如长矛，王家陵墓，王家用鼓，王座和王冠的保管人。还有专门给“戴王冠”的仆人，厨师，洗浴侍从，牧人，陶匠，造树皮布的工人以及音乐家。许多官员还有几个助手。其他的谋士，占卜者和侍从也泡在宫廷里，希冀被指定为族长。此外还有穆卡玛人数众多的后宫妻妾，他的许多儿子，他兄弟的多妻家庭以及其他皇亲国戚。为了保持完整的权力，穆卡玛及其一部分宫廷人员经常在布尼奥罗土地上旅行，住在由族长和百姓出资维持的行宫里。

约翰·贝蒂指出，罗马帝国之后的封建欧洲也具有布尼奥罗国王制度的若干特征。征服者威廉及其随从也和穆卡玛一样，经常在12世纪的英国巡视，对其“族长”进行监察并接受他们的款待。当时的英国国王们仍具有再分配系统的首脑和“大施舍者”的形象特点。例如，征服者威廉每年举行三次盛宴，在宴会上，他头戴王冠，款待许许多多的贵族和臣属。（《文化的起源》第七章，“原始国家的起源”，马文·哈里斯，1988）

布尼奥罗人建立了一个王国。国王和他的政府机构成为凌驾于众多小群体之上的仲裁者，小群体之间的“无政府”状态被消灭了，无休止的战争被制止了。与同处赤道地带的新几内亚高地和中美洲丛林一样，这里的农业条件也算不上好，为什么布尼奥罗人能够做到这一点，而高地马林人和雅努玛莫人做不到呢？比较一下他们的生活方式，关键的差异就是布尼奥罗人拥有小米（指黍，珍珠粟）这样的谷物。相比于甘薯香蕉，谷物可以长期储存，也便于运输，征集而来的谷物剩余，也就是国王控制的中央谷仓，可以有效地支持王国的政治机构，仲裁臣民之间的冲突，甚至是作为施舍来救济臣民，进一步降低冲突水平，而依靠甘薯和香蕉这一类作物的新几内亚人和雅努玛莫人却做不到这一点。

第四节：古文明的历程，囚徒困境与兴衰起伏⁴³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赤道地带发展迟滞的各早期文明。尽管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世界内部也有着巨大的差异，赤道地带这些仍然处于早期状态的文明，相比于欧亚大陆上的文明世界，彼此之间的差距仍然是显著的，但是，也正因为它们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的朴素，少去了许多使人迷惑的遮蔽，能够给我们更加直白显明的关于文明进程的启示。

在讨论赤道地带文明源流的时候，我们已经讨论了农业风险所加之于人类的囚徒困境。而农业生产依赖于农作物属性和土壤地貌气候等等因素的配合，因此，尽管农业风险是普遍的存在着的，但它的状况和它所加之于人的困境，却不可能是四海如一的。那么不同的风险状况所带来的影响会有什么差异呢？在前文讨论的基础上，我们首先做以下推断：

一个社会所面临的农业风险越大，行为主体（个体或群体）在遭遇背叛时所面临的后果（存续机会丧失）也就越严重，在“生存还是死亡”的囚徒困境之中陷入也就越深。而要解脱这种陷入更深的囚徒困境，就需要更加强大的资源和军备，来建立更加强大的政治机构。

现在，在这个推断之下，我们来考察文明的起源状况。

赤道太平洋上的准周期洋流变化，厄尔尼诺-南方涛动（ENSO）现象，是全球范围内气候短期变化一大动因，而气候的短期变化，是农业风险的一大动因，越是远离赤道，远离ENSO，农业风险越是减弱。同样种植甘薯和芋头香蕉之类难以储藏的作物，在新几内亚高地和布干维尔岛这些接近ENSO核心区域的地方，我们看不到政治机构的成型，但是在波利尼西亚群岛的南北两端，分别接近了南北回归线的汤加群岛和夏威夷群岛，虽然文明的进程依然迟滞，就有了酋长乃至国王的有限权威。回到古文明的起源地上，美洲古文明虽然处于热带区域，它们的核心区域，也像和夏威夷和汤加群岛那样，相对远离赤道线，分别接近于南北回归线。欧亚大陆上的古文明，核心区域在中纬度上，就要更加远离赤道，远离ENSO，在这些位置上，相比于赤道地带，作物土壤地貌气候等等农业条件大有改善，而农业风险虽然趋弱，但是存在感依然强烈。

《史记·货殖列传》中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记载，《旧约·创世纪》中约瑟为法老治理埃及，在七个丰年中储备谷物，在七个灾年中救济饥民的故事，都是古文明关于农业风险的经验或隐喻。人类学家告诉我们，新几内亚高地人的战争周期虽然不确定，但是平均下来在十二年左右，这其中的同源关系是可以想象的。

任何一个文明，在它的源头上，都是由新几内亚高地那样的众多群体汇聚起来的。传说中罗马最早的建立者来自台伯河以东的七丘联盟，又有北边萨宾

⁴³ 本节部分叙述引用自《失败者的春秋》与《战国歧途》，刘勃，2019年。

人的加盟，然后合并了台伯河西边的伊特鲁里亚人，可以把七丘联盟看作是高地马林人之间的联合，而萨宾人和伊特鲁里亚人作为七丘联盟的异族邻居，就类似高地马林人那些不讲马林语的邻居。七丘联盟，萨宾人加盟，吞并伊特鲁里亚城邦维爱，罗马的逐步壮大则是类似于布尼奥罗王国一样的族群融合过程。这个过程之所以成为可能，正是因为罗马这样的文明，它也是有谷物的，但是罗马的文明进程，在时间尺度和空间尺度上，又大大超越了布尼奥罗这样在历史进程上迟到的赤道王国。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不仅是有谷物的，而且处于中纬度较为良好的农业生产环境下，它的农作物就是以谷物为主的，它不像布尼奥罗人，高地马林人或者雅努玛莫人那样，要部分地甚至是全部地依赖于香蕉和甘薯这样一些在当地无法储藏的作物。进一步说，所有的古文明和次生文明，都处在农业生产环境较好的中纬度下，都是以谷物农业为基础的，谷物是有效剩余的基础，即使是印加这样部分地依赖于土豆的古文明，它的土豆也是可以通过一种发酵处理，在高海拔地区的仓库里较为长期地储藏的。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就涵盖了文明进程的根本动力和根本规律。

古文明农业以谷物为核心，谷物便于储藏和运输，提供了有效而且较为丰富的剩余，这些剩余可以在灾荒中用于自救，加上远离赤道和ENSO而趋弱的农业风险，相比于赤道太平洋上的新几内高地人，古文明地域上的农业社会在囚徒困境中陷入较浅。要在这样的社会中建立第三方仲裁，对政治机构的力量要求，进而也就是对资源和军备的要求较低，并且，谷物带来了有效且丰富的剩余，也更有能力建立政治机构以执行仲裁，救济灾荒以降低冲突水平。新几内亚高地上那种关于政治权威的需求与供给之间的悖论，在古文明地域上不复存在，于是，与罗马类似，乃至更加典范的政治权威，就普遍的建立起来。

在各古文明社会中，尽管政治权威可以对各群体的争端进行仲裁，对各群体加以救济，由此压制了围绕农业风险而来的囚徒困境，但是前现代的条件下，人类的力量有限，而农业风险并未解决，由此而来的囚徒困境总会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因此，进一步的，我们对古文明的历程做以下推断：

古文明地域上的农业风险，始终是存在的。围绕这种风险的囚徒困境，也是始终存在的，对于这一困境的解脱，以及这一困境在新条件下的重现，这两者之间的层层递进，就构成了古文明历程的主线。

围绕在地中海附近的埃及（北非）文明，两河文明，印度文明，以及随后的希腊罗马古典文明，波斯文明等等，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次第兴起，地域和历史互相交错，历程纷繁复杂，记载缺失也比较多，而远东的中国文明，则由于地理上的远隔而相对独立，历程较为清晰，记载更为详备，因此，下面我们就以中国作为例子，来进一步的讨论古文明的历程。

以今天已经知道的考古知识，龙山文化以来，黄河中下游就有了众多的设防城址，甚至附属有宫殿建筑，贫富贵贱的区分已经出现，这表明带有阶级区

分的政治共同体已经出现，其体量和复杂性已经超越了新几内高地人那种为数几百人的村落。建立政治权威，需要资源和军备，在这个历史时期，谷物就是资源，但是没有青铜武器的情况下，作为政治权威之后盾的军备还很薄弱，因此这个阶段上的政治权威所拥有的力量是非常有限的，所能够整合的群体规模以及相应的地域大小，也都是非常有限的。不过，与高地马林人这样的前文明状态相比，龙山文化已经踏上了文明进程的门槛，这个文明阶段也被称作是酋邦时代。在中国古书的记载上，这是夏商周之前的传说时代，《史记·五帝本纪》说尧的时代“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左传·哀公九年》记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于万国”，“万国”之“万”，是一个极言其多的虚称，“执玉帛”，是会盟之中对权威的认可，这些记载对于当时的酋邦体量之小，和政治权威之有限，都是直观的展示。一方面，村落小群体被整合进了体量更大的酋邦共同体之中，个体从旧的囚徒困境中解脱出来，在既定的阶级秩序下和平相处，分工劳作，囚徒困境在共同体内部被压制，不再表现为群体间的战争，而是表现为阶级矛盾。另一方面，这些酋邦共同体在更大的时空尺度上继承了村落小群体之间的无政府状态，以设防的聚居地为依托，互相攻伐，尽管有着较低的风险水平，也有着“尧舜禹”这样的“盟主”干预，酋邦之间不必像高地马林人那样，锁定在僵硬固化的冲突模式中，但是军备与战争循环依然存在，旧的囚徒困境在新的时空尺度上重现。这种共同体边界内外的不同关系模式，简而言之，就是内与外的敌我之分，也就是俗语所谓“窝里斗”和“窝外斗”，将会长期共存，互为表里，并且随着资源和军备的不断演变而演变。古文明的历程，就以这两者的共生共演为主线。

作为龙山文化的后续，夏商周三代相继而来。大型城邑，青铜器和文字的相继出现，标志着中原农业地带真正跨过了文明的门槛。一方面，青铜武器造就了前所未有的军队，军备的飞跃使得中原农业地带的政治权威强大起来，夏商周的“王”已经号称为“家天下”。另一方面，青铜器又是稀缺资源，不能够用来大量制作农具，因此这一时期的农具仍以木石为主，在没有农业生产飞跃的条件下，人口和武力仍然有限的，政治机构所能拥有的力量被有限的农业剩余和有限的军备所约束，夏商周的王朝权威始终是有限的，它更多的是诸多邦国中的首要国家，第一诸侯，“王”更多是“王畿”的国君，更少是“天下”的国君。对于“天下”，也就是王畿之外的邦国，无论是同姓还是异姓，更多的是盟约控制，而非真实治理。考古发现，夏末商初，和商末周初，都是气候变冷的干旱时期，《国语·周语上》也记载“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尽管气候的长期变化，带来了夏商周三代的更替，中国文明的形势也没有太大的改变。从夏到西周的史料很少，但是从平王东迁，中国文明进入春秋战国时代后，历史进程加速了，史料也丰富了。

春秋时代中国文明的进程加速，首先表现为文明区域的扩大和人口的上升。秦，晋，楚，齐，吴这些“新兴大国”，在春秋之前可以说是默默无闻的，除了秦占有了关中，晋占有了山西，其他几个国家所兴起的地方，并不在夏商

周三代的中原故地上。春秋初年称霸的齐桓公，一般认为他的军队规模为兵车八百乘，士兵三万人，而到了春秋末年，二等国家鲁国也有了兵车千乘，强国如晋国已经有兵车四千乘，军队有赖于各种物资支持，急速扩张的军队规模背后是迅速增加的人口以及伴随而来的生产能力。这一进程有赖于当时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而这一发展背后则是一系列农业生产条件的变迁。回顾本章第二节，从公元前3000年到公元前2000年左右，有一个降温过程，西辽河，甘青，中原，海岱，江汉，江浙这些早期文明源流里面，只有中原抵挡住了气候干凉化的考验而幸存下来。之后从夏商直到西周的一千多年中，中原以外的文明区域都未能完全恢复，长期处于落后状态，成为中国文明的边缘地带，尤其从公元前11世纪到公元前9世纪中期的西周前期，中国还处于一个特别寒冷的时期，《竹书纪年》中有记载周孝王七年“冬，大雨雹，牛马死，江，汉俱冻”，中国文明就更加局限于中原地带。随着气候的持续变化，这种状况在春秋时代改变了，气温上升，降雨带北移，北方降雨增加，南方降雨减少，这改善了长江中下游的江汉和江浙，中原地带沿西安-洛阳-郑州-安阳一线的夏商周故地，以及黄河下游的海岱等固有农业区域的农业生产条件，于是在文明源流曾经中断的地方，楚国，吴国，齐国兴起了，并且中原地带的夏商周故地农业地域也进一步复苏和扩大了，并因此兴起了秦国和晋国。但是，由于季风气候的固有属性，长期气候变迁带来的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并不能避免短期气候变化带来的灾荒，以及随之而来的囚徒困境。我们来看一下春秋时代秦晋之间的“泛舟之役”和“韩原之战”这前后相续的事态，作为这种困境的举例。

在中国文明的历史上，灾荒是一种经常性的情形。就在“泛舟之役”之前四年，前651年，齐桓公在葵丘大会诸侯，订下盟约，《孟子·告子下》记下了誓词，其中第五条是这样的：

五命曰：无曲防，无遏籴，无有封而不告。

这其中的“无遏籴”，即是在一国灾荒之时，未发生灾荒的邻国要提供救济，不要借机搞封锁。先后发生在秦晋之间的“泛舟之役”与“韩原之战”就是这样一种围绕灾荒和救济而发生的情形：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前 647 年，秦穆公十三年）晋早，来请粟。丕豹说缪公勿与，因其饥而伐之。缪公问公孙支，支曰：“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问百里奚，奚曰：“夷吾得罪于君，其百姓何罪？”于是用百里奚、公孙支言，卒与之粟。以船漕车转，自雍相望至绛。”

前 647 年晋国闹旱灾，此时的晋国国君是惠公，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当惠公还是个公子，流亡在外的时候，得到秦穆公的支持，在秦兵的护送下回国做了国君，曾许诺割让土地以感谢秦，但是做了国君以后就反悔了。“夷吾得罪于君”，指的就是这件事。惠公向秦国求购粮食救急，秦国君臣有两种选

择，“饥穰更事耳，不可不与”，推己及人，救济晋⁴⁴，或者，“勿与，因其饥而伐之”，机会主义，攻打晋⁴⁵。秦权衡利弊，选择了救济晋。

第二年，秦国闹旱灾，向晋国求购粮食，晋国君臣面临同样的选择问题，但是他们另有权衡，选择了“因其饥伐之”。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前 646 年，秦穆公）十四年，秦饥，请粟于晋。晋君谋之群臣。虢射曰：“因其饥伐之，可有大功。”晋君从之。十五年，兴兵将攻秦。缪公发兵，使丕豹将，自往击之。九月壬戌，与晋惠公夷吾合战于韩地。”

对于秦来说，幸运的是，饥荒虽然是一个不利因素，但是秦军战胜了，并且在韩地的战斗中生擒晋惠公，这就是“韩原之战”。此战之后，以释放惠公为条件，秦国取得了晋国河西的土地。

让我们从存亡利弊的角度来讨论这件事。前647年“泛舟之役”，秦救济晋，保全了晋的力量，前646年，秦为饥荒所削弱，但是在前645年的韩原之战中迎战并战胜晋军。一来一往，无论秦的考虑是什么，秦救助了自己未来的敌人，无论晋的考虑是什么，晋得到了一个有利的战机。只是这一次，力量与命运的天平并未倾向于晋，晋的图谋以败军割地而告终，但是，只要这种“饥穰更事耳”的局面持续下去，随着饥荒程度的波动起伏，幸运不会永远属于救济行动一方，而“因其饥而伐之”的策略只要成功一次，失败的一方就不会有机会再做选择。不幸的是，在中国文明地域上，“饥穰更事耳”正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地理事实，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各诸侯国的人口上升，武力增强，饥荒带来的破坏越来越大，“因其饥而伐之”造成的破坏也越来越严重，这就为强盛与衰亡的剧烈两分创造了可能。在这样的历史进程中，把生死存亡寄托于另一方的善意，其后果是任何一方都不能承受的。抓住一切有利时机打击敌方，“因其饥而伐之”这样的策略，是唯一的理性选择，因此也就成为普遍的选择。晋很快就有机会再一次将这种“理性选择”付诸实施，鲁僖公三十三年（前627年），像惠公一样被秦穆公扶助上位的晋文公重耳新丧，秦军伐郑不成，由郑返秦，崤山是必经之路。晋对于是否袭击秦军有了一番讨论：

晋原轸曰：“秦违蹇叔，而以贪勤民，天奉我也。奉不可失，敌不可纵。纵敌患生，违天不祥。必伐秦师。”栾枝曰：“未报秦施而伐其师，其为死君乎？”先轸曰：“秦不哀吾丧而伐吾同姓，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吾闻之，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谋及子孙，可谓死君乎？”遂发命，遽兴姜戎。子墨衰经，梁弘御戎，莱驹为右。夏四月辛巳，败秦师于殽，获百里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以归，遂墨以葬文公。（《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⁴⁴ 即是前文中所谓的因徒困境中的合作策略。

⁴⁵ 即是前文中所谓的因徒困境中的背叛策略。

秦穆公扶助晋文公重耳上位有功未偿，栞枝犹豫，而先轸毫不犹豫，“一日纵敌，数世之患也”。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浪费唾手可得的机会有绝对的非理性，于是晋起兵。这是一场残酷的伏击歼灭战，《史记》的记载是：

《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大破秦军，无一人得脱者。”

左传记载，三年后秦穆公伐晋，晋军避战，秦军绕路来到旧战场收祭战死者：

秦伯伐晋，济河焚舟，取王官，及郊。晋人不出，遂自茅津济，封殽尸而还。（《左传·文公三年》）

在依赖于季风降雨的特定农业生产条件下，春秋各诸侯国面对的是类似的局面，在反反复复的生死博弈之下，讲信修睦成为灭亡之道，“奉不可失，敌不可纵”，“因其饥而伐之”的机会主义策略就会成为主流，盟约誓词，都会成为虚与委蛇的表面文章。鲁成公十二年（前579年），晋楚两国会盟弭兵：

夏五月，晋士燮会楚公子罢、许偃。癸亥，盟于宋西门之外，曰：“凡晋、楚无相加戎，好恶同之，同恤菑危，备救凶患。若有害楚，则晋伐之。在晋，楚亦如之。交贄往来，道路无壅，谋其不协，而讨不庭。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队其师，无克胙国。”（《左传·成公十二年》）

约定晋楚两国不但休兵，而且要同心同德，有饥荒灾难要互相救济，共同讨伐一切对晋或楚图谋不轨的国家。要保证两国间使节的安全往返，道路的畅通。谁违背了盟约，就让神明惩罚它，让它的军队溃败，国家灭亡。然而仅仅三年之后，誓词言犹在耳，楚就发动了北伐，对于盟约责任，楚令尹子反的评论是：“敌利则进，何盟之有？”。这种“无信”的机会主义成为常态，三十年后，鲁襄公二十七年（前546年），晋楚两国再次在宋国会盟弭兵，盟会的时候楚国人违背惯例，内穿铠甲：

辛巳，将盟于宋西门之外，楚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诸侯之师，以为不信，无乃不可乎？夫诸侯望信于楚，是以来服。若不信，是弃其所以服诸侯也。”固请释甲。子木曰：“晋、楚无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左传·襄公二十七年》）

面对遵例释甲的要求，楚人的表现和三十年前一般无二，“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这也就是各诸侯国对于盟约信用的真实态度。于是，伴随着农业生产的进步和囚徒困境下的斗争，“焉用有信”的各诸侯国走过了春秋时代，当这一时代结束的时候，诸侯国之间的攻伐和吞灭，已经使得诸侯国的数量大为下降，根据《史记》，春秋初年的诸侯国有上百个，到了战国初年，这一数字已经锐减到了二十多个，而更加残酷的战争正在前方的战国时代，等待着这些已经壮大的幸存者。

战国时代，得名于这一时代里连绵不断的残酷战争。二十世纪才出现于西欧的“整体战”思想，在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就已经是事实，“教民耕战”，战争成为一切社会行动的统领。而这一时代特征的根源，则是生存环境和生产条件的变化。

铁器在商代已经出现，到了春秋末年，战国开端的前五世纪，铁器已经普及到各诸侯国，并迅速应用到了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广泛的用来制作农具和武器。但是，也同样是在五世纪，春秋时代以来的温暖气候结束了，在这个气候变迁的转折期，气温掉头下降。周敬王去世被认为是春秋战国两个时代的转折期，敬王在位44年，去世于前476年，以《竹书纪年》为例，在早于敬王的春秋时代，异常天象记录很少，如下：

《竹书纪年》

（前730年，周平王）四十一年春，大雨雪。

（前649年，周襄王）三年，雨金于晋。

（前622年，周襄王）三十年，洛绝于枿。

（前526年，周景王）十九年，冬十二月，桃杏华。

而敬王时代的记录总共只有八条，就有五条记载了异常天象：

《竹书纪年》

（前506年，周敬王）十四年，汉不见于天。

（前494年，周敬王）二十六年，晋青虹见。

（前492年，周敬王）二十八年，洛绝于周。

（前484年，周敬王）三十六年，淇绝于旧卫。

（前477年，周敬王）四十三年，宋杀其大夫皇瑗于丹水之上。（宋大水，）丹水壅不流。

在随后的记录中则更是不绝如缕，比如：

《竹书纪年》

（前470年，周元王）六年，晋汾绝于梁。丹水三日绝不流。

（前463年，周贞定王）六年，晋河绝于扈。

（前457年，贞定王）十二年，河水赤三日。

（前423年，周威烈王）三年，晋大旱，地生盐。

（前421年，周威烈王）五年，晋丹水出，反洁。

（前387年，周安王）十五年，大风，昼昏。

（前367年，周显王）二年，河水赤于龙门三日。

（前364年，周显王）五年，雨碧于郢。地忽长十丈有余，高尺半。

（前363年，周显王）六年，雨黍于齐。

（前346年，周显王）二十三年，绛中地桀，西绝于汾。

（前313年，周隐王）二年，齐地暴长，长丈余，高一尺。

（前310年，周隐王）五年，洛入成周，山水大出。

（前309年，周隐王）六年十月，大霖雨，疾风，河水酸枣。

（前307年，周隐王）八年，疾西风。

《竹书纪年》是魏国继承的晋国史书，天象记录主要是北方各国的，而对长江中下游的楚国和吴越情况记录很少。不过，得益于现代科学，我们可以利用多种手段补充有关情况。科学考察发现，从大约2500年前，也就是周敬王的时代开始，江汉平原东部的洪水水位在不断上涨。前面我们讲过，气温下降，降雨带南移，会造成北旱南涝，考察发现战国时代南方因多雨而洪水，这正和此时北方因降温而干旱一致。

铁器的发展，气候的剧变，带来了深刻的影响，共同塑造了战国时代的历史进程。一方面，铁普遍用于制作农具和武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也提高了军队的武力，导致更多的人口，更强的武力，另一方面，北旱南涝所造成的粮食生产困境，既推高了各诸侯国之间的冲突水平，也改变了各诸侯国的内部发展趋势，战国史就在这样的前提下展开。

从前2000年前后各文明源流夭折的情况看，在北旱南涝的气候变迁下，作为夏商周故地的中原农业区，它的抗打击能力是最强的。春秋时代，温暖气候下，农业生产环境改善，夏商周故地之外的早期农业区域上兴起了晋齐吴楚多个大国，战国时代，寒冷气候下，农业生产环境掉头恶化，相比于夏商周故地，这些新兴大国也遭受了更多的打击。

受益于春秋时代的气温上升，晋国在夏商周故地以北的山西兴起，这一地区在气温下降的时期，面对干旱打击也是较为脆弱的。发生在清朝光绪元年四年间（1875-1878）的特大旱灾饥荒，也就是所谓“丁戊奇荒”，波及河南，山西，陕西，直隶，山东各省，涵盖了战国时代的三晋，秦，齐等北方国家所在区域，而以山西，也就是晋的故地最为严重，虽然两千多年来的气候变化所造成的影响不会是一样的，但是地形地貌变化不大，可以由此粗略的判断各地对于气候变迁的抵抗能力。三家分晋后，魏国曾经致力于经营秦魏之间黄河沿

线，吴起以建立在黄河西岸的少梁城（今韩城）为基地，逐步推进，自少梁到阴晋（今华阴）建立了一系列据点，自北而南完全控制了黄河，但是最终魏国迁都大梁（今开封），而未能向西发展。《吕氏春秋》中记载，吴起离开魏国时曾说：“君诚知我而使我毕能，秦必可亡，而西河可以王！”，这不一定是历史真实，而是战国末期人的一种看法，也就是认为假如魏国坚持西进策略，是有可能灭掉秦国的，因为战国后期，六国伐秦很难闯过函谷关，而在吴起的时代，函谷关还未建立，魏国所掌握的黄河沿线都在函谷关以西，从阴晋沿渭河而上还可以直扑后来的秦国都城咸阳。那么，魏国为什么采取了东进策略，而非西进策略呢？其中原因可以众说纷纭，也可能永远无法准确解释，但是对于这种战略方向的选择，可以简单地考虑气候变迁的大背景所带来的两方面因素，一方面，夏商周故地对抗气候变迁的能力更强，东方夏商故地的繁荣和小国林立固然是一种吸引力，另一方面，气候变迁带来的三晋故地的衰退，更应该是一种推动力。《竹书纪年》作为魏国继承的晋国史书，记载了战国初年晋地的诸多异常天象，河水断流，地生盐，诸如此类，在这种情况下，向西发展，当时的魏国面对秦国固然不落下风，但是在晋国故地相对衰退的情况下，也谈不上有多大的把握，而向东发展，夏商故地上此时还是郑鲁宋卫等弱国小国的地盘，更容易立足。这样一种局面，对于三晋都是成立的，东进的并非只是魏国，三晋都是如此，魏国从安邑（今运城盆地）迁都大梁（今开封），韩国从平阳（今临汾盆地）迁都阳翟（今河南禹州），后迁郑（今郑州），赵国从晋阳（今太原盆地）迁都中牟，再迁邯郸。秦据有函谷关而相对于六国的地理优势，更大的可能是由于晋国故地的相对衰退而建立的。

被气候变迁所打击的另一个典型例子，是地处长江下游的吴越。吴国在春秋时代的舞台上兴起较晚，但是一出场就是强国，吴王阖闾向西击破了楚国郢都，吴王夫差向北击败了齐国，在黄池大会诸侯，俨然可以与晋国比肩而霸。但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正在巅峰时期的吴国，竟然十年间被越国破灭，此时正当春秋战国之际。吴国虽然在前 473 年破灭，吴越之地并未却就此衰落，而是由越国继承了吴国的力量，横行江东，越王勾践继吴而霸。墨子称此战国初年时的好战国家为“齐，晋，楚，越”，却没有秦，足见越国当时的地位。但是到了战国中后期，越国声势迅速转弱，终于在前 306 年越王无疆的时代为楚怀王所灭。两百年间，从破楚到灭国，吴越之地骤起骤落，因此留存资料不多，但是吴越骤起骤落的疑问，却可以从“历史经验”中得到启发。在本章第二节，“夭折的文明源流”中，我们已经知道长江下游地区的稻作农业区域，以良渚文化为代表，衰落于前 2200 年前后，相比之下，同为稻作农业区域的长江中游地区江汉平原在前 2000 年前后衰落，也就是说，面对北旱南涝的气候变迁，长江下游的吴越之地更显脆弱，那么，反过来，在温暖时期，吴越地方适于耕作的时间点也要来的更晚。这基于抗农业风险能力的一早一晚，与春秋战国期间的气候变迁合在一起，就非常简单地解释了吴越之地的骤起骤落。据考古所知，战国中期以后，吴越之地的墓葬上体现了楚越文化融合且楚文化占据主导地位，而兴盛了数百年的吴越习俗只见于级别较低的墓葬，并在秦汉文化

中消融，但是战国时期的楚文化遗存数量远远少于春秋时代的吴越文化遗存，表明灭越之后楚国并未大力开发此地，而原有的吴越之民也散失了。作为一个旁证，在急需战争资源的战国时代对此地不做开发，吴越之地此时已经因为稻作条件的破坏而衰落是一个最为简洁合理的解释。

相比晋故地和吴越之地，齐国和楚国所在的海岱区域和江汉区域状况会好一些，但是最终，还是分别占据了夏商周故地东西两侧的三晋和秦国展开了战国时代最残酷的厮杀。秦国虽然占据了对山东六国的优势，但是这优势不是压倒性的，即使长平之战大胜以后，秦国也还有邯郸之战与河外之战的大败。最终，在各国都已经拼杀到精疲力竭之时，郑国渠和都江堰这样的灌溉农业进步，成为秦国用来压倒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秦攻灭六国，“天下”一统，但是在诸侯国之间造成囚徒困境的农业危机并未消失，人与人之间的囚徒困境依然存在。失去了维系各地方秩序的诸侯国，“天下”秩序的维系，现在全部都成为秦的挑战。越是深重的农业危机，越是造成难解的囚徒困境，越是需要强大的政治机构来维系秩序，救济危机，而越是强大的政治机构，越是需要强大的资源和武力作为后盾。大一统的秦制，是最强大的政治机构，但是作为一种“税务-公务”体制，它更需要繁重的赋税来维系自身，也就是人数众多的官僚和军队，而“天下”各地所能给予这种体制的赋税支持是参差不齐的。

如前文所述，夏商周故地的农业生产相对其他区域更为稳定，更为进步，因此这些地域上需要救济的危机较少，秩序更为安定，能够供应秦制的赋税更多，秦制运行的更为顺畅。相反，在远离该区域的诸侯国旧地，农业更为脆弱，更为落后，秩序更为混乱，维系秩序所需要的强大的政治机构与该地能够为秦制提供的赋税不足构成悖论。这样一个以夏商周故地为中心，以齐楚（吴）燕赵为边缘的两分农业格局，就成为秦汉之际的大背景。

在百战之余的始皇帝时代，“天下”的农业进步仍然是有限的，而战国冷期仍在持续，于是农业危机依然深重，“天下”秩序依然不能安定。夏商周故地的赋税资源，可以勉力维持自身的秦制，但对其他区域的秦制支持有限，因此秦的大一统未能坚持太久，就迎来了秦末的秩序崩溃。秦末战争中，反抗最为激烈的，是离开中原较远的楚，齐，赵等地，夏商周故地的韩魏地方反抗较弱，而秦国故地关中并未失去秩序。这样一个反抗格局，就是齐楚（吴）燕赵等边缘地区对秦制支持能力不足的体现⁴⁶。

但是这样一个反抗格局中的两分，并不能改变农业格局中的两分。因此，在楚汉之争中，楚人出身，但是“承秦之地，承秦之人，承秦之制”的刘邦集团，战胜了同为楚人出身，以山东六国为力量基础的项羽集团，建立了汉朝，

⁴⁶ 燕地反秦斗争较弱，应该和吴越情况类似，作为离开夏商周故地较远的东北和东南地方，这里的力量在气候变迁之下，应较其他地区更为削弱。

成为关中力量对山东六国的第二次征服。汉初的分封制“复辟”，郡国并行，即对于这样一种农业生产格局的适应。但是，郡国并行，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分裂，这种隐性的战国形势，终于在七国之乱中显现出来。这样一种大一统力所不及，而因循封建又导致战乱的两难，最终是在西汉以来的农业发展中解决的。西汉时期，铁器农业更进一步，铁农具和牛耕，以及相应的耕作技术普遍推广，适应于新的耕作技术的农具种类增多，形制改善，加之以战国冷期的终结和水利灌溉的进步，普遍的农业进步为大一统的稳固奠定了基础。

“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从春秋战国直到秦汉，农业的风险和进步，推动了大一统的成型和稳固。但是，是否大一统之下，就能江山永固，战乱不再了呢？

事实是，不能。

大一统解决了诸国争雄的战乱，却不能消除推动了战乱的农业风险。大一统的政治机构，需要赋税的支持，前现代农业的生产水平下，赋税总是有限的，政治机构的储备和它供养的官僚和军队也是有限的，因此，无论它的仲裁能力，还是救济能力，都是有限度的，这一事实，就会带来对于大一统的多重挑战。

首先，短期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农业产出波动，将会带来多方面的后果。农业产出波动直接给农民自身带来生存危机，并且，农业产出波动造成粮食价格波动，粮食价格波动造成一切社会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波动，由此把生存危机传导给一切人，并造成无所不在的纠纷。任何政治机构，都没有足够资源对所有这些纠纷巨细靡遗地予以仲裁，也都没有足够资源给所有人的生存危机充分地予以救济，由此，一方面，人们普遍地需要在政治机构的仲裁之外，寻求额外的暴力手段以自保，无论是抵抗他人的暴力，还是以暴力打击他人，亲友团体“人多势众”都是最基本的生存法则，另一方面，人们也普遍地不能指望政治机构的救济，互助成为生存的必需，亲友团体“人多力量大”成为最基本的生存优势。于是，无论是自我保卫的需要，还是自我救济的需要，农业产出波动都将会刺激一切人，一切群体对于人口增殖的优先追求。而以人口的增殖为优先追求的社会，将会推动土地的开垦，推高人地比例，降低农业劳动生产率，造成相对剩余的减少，形成一个农业风险与人口增殖互相推动的恶性循环。

其次，长期气候变迁会给农业生产环境带来周期性的整体性变化，在每一个长期气候变迁的降温阶段，都会造成大范围的农业生产衰退，如果这种衰退和短期气候变化所推动的高水平人口与低相对剩余形成叠加，就会使得救济需要极大地超出救济能力，社会将因此而失去秩序，而恢复秩序又需要强大的政治机构，需要强大的官僚组织和军事力量，而衰退的农业生产又不可能提供足够的赋税来支持这样的政治机构，这就在对政治机构的需求与支持这种政治机构的赋税能力之间的矛盾趋于激化，在这种需求高涨与能力衰退之间的悖论作用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就会崩溃。

由此，在短期气候变化和长期气候变迁的共同推动下，大一统的政治秩序周而复始地崩溃和重建，所谓“合久必分，分久必合”，“两千年皆秦制”，就成为秦汉以来中国文明两千年历程的既定模式。

与春秋战国同时期的“轴心时代”，由于铁器的普及，造成了生产与武力的进步，受益于此，相比于中国，印度和地中海沿岸的各古代文明也都曾经有过集权程度不等的“大一统”。秦汉之后，在寒冷时代的压迫下，中国文明与罗马文明同期崩溃，在普遍的生产衰退下，中国文明无力支撑秦汉以来的大一统，向封建制后退，进入了皇权封建化，所谓“门阀政治”的时代，直到唐宋时代，中国文明向南发展，基于稻作的农业进步再次展开并深化了大一统的进程。与此相反，在罗马文明的废墟上，中世纪欧洲文明向北发展，从而获得了较低的农业风险水平，而其他文明，或者是长期气候变迁所造成的农业衰退未能恢复（中东），或者是由于短期气候变化推动的剩余贫乏更为强烈（印度），因而无力承担大一统的赋税支出。由此，种种原因，使得中国以外的各古代文明的盛衰循环不如中国典型，程度不等的“大一统”往往在崩溃后长时间不能重建，但是这两种因素的叠加作用，仍然是推动各个古文明历程的根本力量。

第五节：现代文明，远离 ENSO 的农业奇迹⁴⁷

现代文明始于英国。

英帝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的帝国，欧陆各国羡慕嫉妒恨之余，致力于像英国那样“现代化”。“大英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这曾经是普遍的发展信念，但是，回顾几百年来的历史变迁，人们会发现，除了美国的发展历程与英国差堪比拟，大多数国家都走过了与英国相当不同的现代化历程，人们也越来越意识到，以资本主义起源为标志的英国历史，是独一无二的特殊现象。对于这种特殊性的细节研究与表述，已经很充分了，但是仍未有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解释能够获得公认，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就从资本主义的农业起源这一新范式出发，“逻辑与历史相统一”，回顾和评论英国历史进程的特殊性质，来推进这样一种整体性的，根本性的新解释。

资本主义起源依赖于农业产出的稳定性，稳定的农业产出依赖于稳定的农业气候，这种气候特征是长期稳定的，因此，它对英国文明历程的影响，并不限于公元 1500 年以来的资本主义兴起时代，而是自古以来就存在的。对比古文明地区的早期历史，不列颠岛上稳定的农业产出，将会带来了稳定的生存预期，不会在人与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推动以互相背叛为理性选择的囚徒困境，因此，不列颠岛上的社会生活，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基调，这样的社会生活，对于作为第三方仲裁者的政治权威缺少需求，因此行政机构与司法机构，以及作为这些机构之后盾的武装力量的发展，也都会较为迟缓，由此赋予英国历史独特的属性与历程。

考古发现，英国拥有文明成长的基本条件并不太晚。新石器时代的特征是农耕和定居生活，不列颠岛的农业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4000 年到 3000 年之间，

从欧洲大陆移居到不列颠岛的人引入了驯化的牛和羊，种植小麦和大麦，并掌握制陶技术，他们砍伐森林以种植谷物和放牧，到公元前 3000 年时，这种农耕生活方式已覆盖了不列颠岛的绝大多数地区。英格兰的青铜时代开始于公元前 2150 年前后，不列颠岛西南部今日称为康沃尔郡和德文郡的地方，锡矿蕴藏丰富，到公元前 1600 年代，当地的锡作为制造青铜的原料，已被大量输送到欧洲，考虑到这种交换的双向性，不列颠是不缺少青铜的。与欧洲大陆不同，新石器时代的人们较少生活在聚落中，穴居则更为普遍一些，直到青铜时代早期，人们开始生活在很少设有重防的敞开聚落中。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早期，不列颠和临近的爱尔兰地貌中最突出的变化，是出现了众多庞大的纪念性建筑，其中最知名的是位于今天英格兰威尔特郡的巨石阵，它占地 11 公顷，考古学家认为，它的建造分为几个阶段，延续了至少 1500 年，第一阶段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晚期，从大约公元前 3100 年开始，先是修建了环形的沟渠和土台，

⁴⁷ 本节部分叙述引用自《英国通史》（六卷本），钱承旦主编，2016年。

用蓝砂岩排列出由两个圆环构成的巨石阵的雏形。第二阶段从青铜时代早期的公元前 2100 年开始，到公元前 1900 年左右，又修建了通往石柱群中央部位的道路，规模庞大的巨石阵也在此期间落成，石柱顶上还有横卧的巨石为楣。而其后的 500 年间，这些巨石的位置被不厌其烦的重新排列，直到青铜时代中期的公元前 1400 年左右，形成了今天的格局。它的功能或用途迄今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但毫无疑问，它是一种持续而有规划的社会行动，表明了一种基于人口与合作的社会力量。尽管巨石阵为代表的众多庞大的纪念性建筑表明，不列颠岛并不缺少人口与社会力量，但是这一时期并没有广泛出现设有重防的聚落，这种对比正表明了前文推断的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社会生活状态。有考古证据表明，青铜时代晚期的公元前 1200 年前后，对应于同一时代近东大帝国的瓦解，不列颠岛乃至欧洲大陆上的文化也出现了较大规模的断裂，不列颠岛上的早期历史被打断了。

尽管在青铜发明后的 1400 多年中，青铜取代了石头，成为了工具和武器制造的主要原料，但是不列颠岛地处西北欧，森林繁茂，青铜工具的出现，在这样的地区对农业推动力不强，因此，青铜时代的农业发展仍然是有限的，考古发现，到了青铜时代晚期，被清除的林地主要还是位于不列颠岛南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了公元前 750 前后，当时来自欧洲大陆的铁器文化开始影响不列颠岛。铁器的优势是明显的。硬度更高，更耐用，数量更大，与木犁头或铜犁头相比，铁犁头犁地更快，更深，铁斧砍伐森林，开辟耕地业更迅速有效，由此给农业带来了巨大的推动。在铁器时代早期，威尔士的主要清除工作已经完成，而到了铁器时代的晚期，英格兰北部的林地也被大量清除了，全岛的大部分地貌已适合务农，岛的北部和西部也有了大量的谷物种植，整个不列颠岛已经普遍进入铁器农业时代。在凯撒的《高卢战记》中记载，在罗马征服之前的铁器时代晚期，公元前 1 世纪时的不列颠岛沿海一带，农业人口已经相当密集⁴⁸，随着铁器时代的展开，在不列颠岛中南部地区，层层设防，占地约为 1~6 公顷的山寨式聚落大量涌现，在公元前 6 世纪和 5 世纪早期达到了一个高峰，在公元前 400 年前后，一些山寨被弃置，而仍被使用的少数山寨则地位更加突出，其中一些直到了公元前 1 世纪。在早中期的山寨式聚落衰落之后，不列颠出现了考古学家称为“奥皮达”（oppida）的聚落⁴⁹。考古学家所称的“奥皮达”占地庞大，通常有坚固而不连续的土墙，它是地区中心，是聚集和交换的场

⁴⁸ 《高卢战记》：住在不列颠内地的人，据他们自己的历代传说，是岛上土生土长的，住在沿海地区的人，则是为了劫掠和战争，早先从比尔盖迁移过去的，通常就用他们原来出生的那个国家的名字称呼他们，打完仗后，他们就在这里居住下来，并且开始耕种田地。居民很多，简直难于计数，他们的房舍建得很密集，大部分跟高卢的相像。

⁴⁹ 这个词借自拉丁文，凯撒曾用这个词来形容不列颠人的聚落，但是他明确地说“oppida”在不列颠人那里指的是“用壁垒和壕塹防护的枝叶繁密，难于通行的森林地区”，听起来更像是避难所，或者就是遗存的“山寨”聚落。

所，甚至有造币功能在这里发展起来，表现着社会规模的放大。设防山寨的衰落，和地区中心奥皮达的兴起，表示不列颠社会的一种往复变化。从新石器时代直到青铜时代，生产发展缓慢，而铁器时代，带来了生产力的跃升，不同的族群因为不同的机缘，发展有快有慢，原有的社会平衡被打破，冲突水平上升，这一时期所涌现的设有重防的山寨式聚落表明了这种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社会生活状态被打破。但是，随着铁器时代的展开，稳定的农业生产使得新的社会平衡再次被建立起来，设有重防的山寨式聚落逐渐衰落，那些带有地区中心性质的，用于聚集和交换的“oppida”逐渐发展起来，这种性质的“oppida”，可以视作是早期那些众多的纪念性建筑的回归，表明铁器时代晚期，罗马征服之前，不列颠社会生活中那种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基调已经再次呈现出来。

随着罗马征服的到来，才有了“文明世界”对于不列颠状况的文字记载。在凯撒入侵不列颠南部沿海时，当地还有许多彼此不睦的独立部落，正是靠着这些部落之间的内讧，凯撒才能够依靠有限的军力，臣服了当地人。凯撒之后，对不列颠的征伐沉寂了一段时间，到了克劳狄的时代，罗马再次征伐不列颠，和训练有素组织精密的罗马军队相比，当地人的武力仍然主要由战车贵族及其率领下的民兵组成，战场上的效能较弱，也不能长久作战。正如凯撒的记载，此时的不列颠东南部农业人口已经相当密集，因此，在“oppida”这样的地区中心之外，政治和军事上的涣散状态，也从另一角度表现了不列颠社会生活的和平性质。

开始于克劳狄时代的征服活动，把哈德良长城以南的不列颠中南部纳入了罗马版图，成为罗马的不列颠行省。从罗马征服直到盎格鲁撒克逊入侵，这一时期的不列颠历史，更多地为罗马帝国史所遮蔽，因此较少呈现它自身的独特之处。

在四世纪末，五世纪初，罗马军队撤离不列颠行省，哈德良长城以南的罗马不列颠失去了罗马的保护，陷入北部蛮族入侵带来的混乱之中。五世纪中叶，在无法得到罗马庇护的困境之中，罗马不列颠人邀请来自大陆的撒克逊人定居，帮助他们对付北部蛮族，却为自己树立了新的敌人。撒克逊人，以及他们的日耳曼同族，盎格鲁人和朱特人不断从大陆来到不列颠，并占领了英格兰的东部和南部，经过一个多世纪断断续续的争战，公元 577 年，在今天格罗斯特郡的德哈姆之战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取得了对罗马不列颠人的最终胜利，罗马不列颠人只有生存在威尔士山区，或者已经撤往英吉利海峡对岸的布列塔尼，罗马不列颠作为罗马帝国的一部分，随着罗马帝国一起衰亡了。

盎格鲁撒克逊人在占领英格兰的过程中，建立了可能多达三十多个小王国。在从六世纪到八世纪，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这些断断续续地互相争战的小王国互相融合，成为七个较大的王国，并达成了盎格鲁撒克逊人在文化上的统一。在这样一个历程中，不列颠岛上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社会生活基调再次呈现出来，正如罗马征服之前的不列颠人那样，与罗马这样的古典国家相

比，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社会组织并不严密，直到8世纪末9世纪初，维京人入侵的时代，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队仍然像罗马征服之前的不列颠人那样，以农闲作战的民兵为基础。在维京入侵的打击下，9世纪初还保持独立的四个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王国之中，只有霸主威塞克斯王国幸存了下来。在维京人的压力下，9世纪末的威塞克斯国王阿尔弗雷德大王进行了军事改革，使民兵交替轮流作战，耕作与作战能够并行不悖，并且以世袭的授土贵族为职业军人，组织常备军。贵族军与民军相结合，大大提高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军事动员水平。新的军队组织方式与筑堡防御相结合，盎格鲁撒克逊人挡住了维京人的进攻，把维京人限制在了名为“丹法区”的英格兰东部，中部和北部地区，在随后的反复争夺中，盎格鲁撒克逊人最终臣服了丹法区，丹法区的维京人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逐渐融合在了新的英格兰民族之中。

十世纪末，正当新的英格兰民族成型之时，丹麦人再次大举入侵，并在征战之中建立了丹麦王朝。在围绕王位继承的纷争中，诺曼底的威廉入侵英格兰，战胜了英国国王哈罗德，结束了盎格鲁撒克逊时代，建立起了诺曼王朝。史称“诺曼征服”，这也是英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外来征服。诺曼征服移植了来自欧洲大陆的封建制度，封土和城堡覆盖了英格兰全境。但是在英格兰，封土和城堡这样的封建制度特征并非毫无本土渊源，在阿尔弗雷德大王的军事改革中它们就初现踪迹了，在西欧当时的生产状况下，相比于早先来自农民公社的民军，或者是来自部落民的武装小团体，这种更大范围的以封土为代价的军事服役制度带来了动员能力的大幅度提高，而阿尔弗雷德大王时代已经出现的筑堡防御，也升级为更加雄伟的石筑城堡体系。

在诺曼王朝初期的震荡之后，英格兰迎来了金雀花王朝。通过继承和联姻，原本的跨海领土更加扩大，在不列颠和诺曼底之外，还拥有安茹，缅因，布列塔尼，阿奎丹，波瓦图 and 加斯科尼等地，形成了一个北抵北海，南达比利牛斯山的所谓“安茹帝国”。不列颠岛孤悬海外，是一个地缘相对安全的所在，但跨海而治则使得不列颠岛和欧洲大陆这海峡两侧上的事务无法切割，金雀花王朝的第三位君主，约翰王，一方面因为与法王腓力二世在大陆争夺领地而战争不断，另一方面又为了使苏格兰，爱尔兰，威尔士等地真正臣服而征讨其地，迅速增加的战争开支使得约翰王不断地向贵族，教会乃至城市进行金钱榨取，使国王和贵族，教会与市民的矛盾不断加深。约翰王在大陆对法国的战争中屡遭失败，背上了“软剑”，“失地王”的名声，又在与教会的冲突中先扬后抑，被开除教籍后向教皇求和，政治形象的迭次受损，更加刺激了教俗贵族的反抗之心。1215年，不愿意为对法战争缴纳费用的教俗贵族在伦敦开会，向约翰王递交《佚名英国特权恩赐状》，要求恢复“古代习惯的自由”。在约翰王的拖延之下，贵族公开武装反叛，他们在部分市民的支持下控制了伦敦，各地特别是东盎格利亚的部分贵族，市民和教士起而响应。贵族武装与国王的军队在伦敦对峙，在教廷支持下的大主教兰顿尽力调停双方，最终国王和贵族代表在《大宪章》（Magna Carta）上签字。这是一份既肯定国王权威和君臣关系，

又明确写入教会与贵族特权的政治文件，它包含了 63 个条款，涉及教会事务，贵族权利，市民特权等等内容，力图将国王的权威约束在封建习惯之下，重建维系国王与臣民既有权利边界的传统秩序。为了确保履行，《大宪章》第 61 条提出了妥协的原则和措施：为了王国的和平，为了平息国王和贵族的争端，双方应达成一致的妥协，为了能够相互遵守，要从王国中选出二十五位男爵来监督国王及任何贵族。如果发现国王违背规定的条款，应当要求国王在 40 天内改正，否则，这 25 名贵族组成的委员会，可以号召整个王国的臣民行使武力来迫使国王改正。

《大宪章》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本身是清晰的，但是对它的评价，则众说纷纭。在“辉格史观”影响下，《大宪章》一度被看作是开天辟地的立宪主义奠基性文件，彰显了自由与人权，但是也有人认为，《大宪章》并未提出什么新内容，只不过是重申既有的封建习惯，并以成文法律的形式作出规定。也有人指出，《大宪章》“既有封建性质，也有立宪性质，即是倒退的文件，也是前进的文件”，而它的制定者“既不是向前看，也不是向后看，而只是对于当时争论的即时应对”。

如果我们认识到不列颠社会生活的独有特征，那么这些争议观点虽然看起来互相矛盾，却并不是不能调和的。《大宪章》的产生，与英国特殊的历史地理条件是分不开的。不列颠岛上的社会生活，自古以来就有着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基调，与欧洲大陆隔海相望的地理位置，对这种社会生活也产生了一种地缘上的保护。除了铁器时代初期这个生产力剧变的时代，从青铜时代的文化断裂，到罗马征服，再到盎格鲁撒克逊入侵，最后是维京入侵和诺曼征服，对于这种社会生活状态的冲击和破坏，一直是外来的，“飘风不终日，暴雨不终朝”，每当剧变过后，不列颠岛上的社会生活又会恢复固有的平静。这种社会生活的基调，对于一切既有的“习惯”，“契约”，都有着支持和保护的作用。英格兰内部的和平，给予国王与臣民之间的既有利益格局以强大的惯性，乃至惰性，这就是所谓“习惯性的权利”，“古老的自由”。约翰王继承了诺曼王朝直到金雀花王朝的大陆遗产，而相比于不列颠岛，欧洲大陆是纷乱不安的。一方面，欧洲大陆这种跨海争战的负累，牵动了英格兰国王和臣民之间既有的利益格局，破坏了英格兰固有的和平，另一方面，英吉利海峡作为屏障，也给英格兰提供了与欧洲战乱切割，保持其固有和平的便利。在这种地理因素和地缘因素的双重作用下，《大宪章》的产生有着牢固的社会基础，虽然《大宪章》本身很快就被废除，但是它所代表的那种力量和趋势是根深蒂固，累世不移的。而立宪主义的成立，以英国这种妥协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个人契约式的封建习惯，也同样以这种妥协性的社会关系为基础。这种妥协性的社会关系，所谓“英国人长于宽容而不走极端”，正是自古以来的这种社会生活基调的表现。而《大宪章》作为一个妥协性的法律文件，它既是对当前事态的妥协性处置，也是重申过去的，同样为这种社会生活基调所支持和保护的封建习惯，又是对于未来的，同样基于这种基调的立宪主义的预示。就《大宪章》而言，立足于不

列颠社会生活自古以来弱冲突的，较为和平的基调，“向前看”（立宪主义），“向后看”（封建习惯），和对于当下争论的即时应对（当下的妥协），三者并行不悖。

在《大宪章》所代表的独特社会轨道上，英国的封建主义持续演变。诺曼征服带来的，以军事服役为代价而领有封土的典型封建主义逐渐衰败，从12世纪末到13世纪末，已经出现了不同于典型封建主义的契约扈从制，到14-15世纪，所谓“变态封建主义”，也就是领主对附庸，仆从和扈从的义务支付工资而非授以封土的制度盛行起来。历史学家对于变态封建主义的起源，范围和演变都产生众多的分歧，而前文对于《大宪章》的分析，可以给予我们一个另类的视角。相比于封土换取军事服役的典型封建主义，变态封建主义以工资换取家内服役，它的灵活性（动员效率）是高一筹的，这是它能够取代前者的优势所在。而这种取代能够成功，其根基在于以货币支付服役的可行性，而这种可行性，依赖于币值的稳定，而币值的稳定，仍然立基于前文所述的，英格兰社会生活之所以成立的基础，农业产出的稳定性，正是粮食价格的确定性，造就了一切社会产品的价格确定性，由此，以工资支付，而非封土授予来换取服役，并且使服役者可以离开封土，以家内役代替军事役，才成为可能。在这样一个角度上，变态封建主义对于英国历史的意义凸显出来，在诺曼征服再次带来外部影响之后，它是不列颠岛固有社会生活特征的再次呈现，作为“杂种”的封建主义，它是独属于英格兰这块土地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的前导和孕育。

从16世纪开始，“变态”封建主义的衰亡，和“纯粹”资本主义的兴起相始终。16-17世纪，是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资本主义生产的特征，率先在以租地农场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农业中呈现出来，租地农场主一方面以定额地租得到土地使用权，另一方面以工资获得雇工劳动，并在市场上出售粮食获利。这种生产方式，和逐步兴起的资本主义大生产下，企业家一方面以工资购买劳动使用权，另一方面以利息购买资本使用权，并在市场上出售产品获利，两者是相同的。英国起源的这种以资本主义农业为先导的“纯粹”资本主义，和“变态”封建主义一样，都是在英国自古以来农业产出稳定的条件下，由高价格确定性的社会生产过程，弱对抗的，相对和平的社会生活所支持和保护。在这种一脉相承的历史演进中，人类社会的种种文明创造在英格兰沉淀，融汇，孕育出了全新的现代文明。

终章：百川归海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礼记·礼运》

1993年，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美国政治学会会长塞缪尔·亨廷顿的一篇文章，名为《文明的冲突？》。从理论角度看，这篇文章乏善可陈，但是由于隐藏在西方文明 vs 非西方文明这一两分之下的种族主义底色，而激起了来自各个大陆和许多国家的巨大争论。2019年，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斯金纳照搬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宣称美国对中国的竞争是“与一种真正不同的文明较量”，并一语道破：“这是我们第一次面临一个非高加索人（白人）的强大竞争对手”，把“文明冲突论”的种族主义底色更加彰显无遗。

本卷中，我们已经回顾了人类文明史上的种种分流，而分流的根本，即在于人类在不同生存环境下不同的合作（冲突）方式。解释过去，为的是了解现在，更是为了预见未来。接下来，我们就接续本卷对文明分流的讨论，树立“文明合流”，而非“文明冲突”的视角，对世界秩序的“变迁”，而非“重建”，做出新的解释和判断。

第一节：和平秩序与繁荣

在一篇 1755 年的演讲中，斯密提出过一个财富增长三要素：“除了和平、便利的税收，以及过得去的司法之外，把一个落后国家变成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这句话流传已久，一直以来，这三个要素被认为是互相独立的，三者之间的一致性没有被充分认识，一个落后国家走向繁荣，似乎是一个“集齐宝珠，召唤神龙”的寻宝故事。但是，从历史经验来说，从政治经济秩序的合约本质来说，我们认为并非如此。

斯密的论述，以英国的兴起为背景。和平，便利的税收，过得去（还算公平）的司法，都是斯密对当时的英国状况的描绘，更是与英吉利海峡对岸的欧洲大陆的对比。斯密语境下的“和平”，不单是通常所理解的国与国之间的“和平”（无战争），它也是日常生活中的“安宁”，这种安宁，不仅仅来自于宏观的，外部的国与国之间的无战争状态，也来自于微观的，内部的人与人之间的弱冲突状态。英国历史上，人与人之间的私斗，包括贵族和贵族之间的私斗，被宣布为违反了“国王的和平”（“Peace of the King”），要以王权加以约束和调解，负责地方治安的官员，早期被称作“治安官”（“Keeper of the Peace”），后期被称作“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这些用语中的“peace”一词，都表明了“和平”的这一层含义。

在本卷的历史叙述当中，我们也讲过了，英国，不列颠岛这个地方的社会生活，自古以来就有着一种弱冲突的，相对和平的基调，并且，加之以英吉利海峡所带来的，与欧洲大陆相对隔离的地缘特点，英格兰社会与欧洲大陆上的冲突也是相对隔离的。英国历史上的“和平”，曾经间歇性的被来自外部的征服所中断，但是由于英国社会生活的固有特征，征服运动之后，这种“和平”又会迅速的重新建立起来。而且，十一世纪的诺曼征服之后，这种外部征服也未曾再次出现，英国的“和平”得以长久的持续。同样，在本卷的历史叙述中，我们已经用春秋战国的举例，讲述了农业生产的不确定性，也就是所谓的“饥穰更事耳”《史记卷五·秦本纪第五》，对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冲突的推动作用，与此相应，也正是 不列颠岛上农业生产的确 定性，推动了英国社会生活的弱冲突的，相对和平的基调，而农业生产的特征，相对而言也是长期稳固的。所以，无论从历史上来看，还是从逻辑上来看，对于不列颠岛上的社会生活来说，“和平”不是一种偶然发生的，转瞬即逝的状况，它是“日常”的，渗透和表现在英国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农业生产的确 定性，也表现为农业产品，以及各种社会产品的价格确定性。一种持续和平的社会生活，一种各种产品交易价格持续稳定的社会生活，对于各种社会的，经济的冲突的仲裁，它的需求既是较弱的，也是稳定的。

要执行仲裁，也就是要维系“国王的和平”，就需要有官僚和武力作为工具，作为后盾，而供养官僚和军队，都以征税为前提。一个对仲裁需求较弱的社会生活状态，对赋税的需求也就较低，这样一种持续的价格确定性较高的生

活状态，同时还意味着分工结构得以发育，分工水平较高，也就意味着劳动生产率较高，社会成员的生活相对富足，更提高了赋税潜力。赋税需求较低，而且是持续较低，社会成员的缴税能力较高，而且也持续较高，那么征税的规则更易确定，而征税的过程更少暴力。“tax”之“easy”，即由此而来。在斯密的语境下，它是一种征税规则的明确性，征税过程的简单性，与“和平”一样，它根植于基于农业生产确定性的英格兰社会生活状况之中。

如前所述，英国这样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状态，它的冲突水平低，需要仲裁的状况不多，代价也不高，相应的，政府征收所需的赋税也不难。于是，无论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冲突，还是政府与社会之间的冲突，都可以长期维系在低水平上。换一句话，维系“国王的和平”，在英国这块土地上，自有史以来，一直以来都较为容易。本卷中，我们曾举例说明普通法和理性法的区别，在夏威夷，围上草裙足以御寒，而在阿拉斯加，身穿皮袍仍然可能被冻死，草裙和皮袍，正是气候的象征，相应的，普通法和理性法，也是不同社会生活的象征。如同草裙代表着温暖的环境，代表着不需要对抗寒冷那样，英国盛行理性和条理不足和普通法，也正是英国特殊社会生活状况的表现，这里的司法所面对的任务并不繁难，而所需资源也不缺少，于是，像夏威夷草裙一样简陋的普通法体系也足以应对。和英吉利海峡对岸相比，欧洲大陆上社会生活是高冲突的，维持秩序所需的工作是繁重而困难的，需要的巨量的赋税支持，而高冲突的社会，又阻碍生产的发展，不足以供养这样的赋税需求，于是司法的需要，与司法的能力形成悖论，与英国相比，它的司法状况必然是糟糕的。在这样的对比之下，英国的司法状况自然也就“过得去”（“tolerable”）了。

在本卷的开头，我们已经说明了，英国的长期定额土地租约，与欧洲大陆（法国）的短期分成土地租约，分别来自英吉利海峡两岸不同的农业生产确定性。税负和司法，都是政府与社会成员之间的“约定”，也就是“与万民立约”，与土地租约一样，它们都有着合约本质。英吉利海峡两岸这种税负便利性的对比，司法状况的对比，正和英吉利海峡两岸土地租约的对比一样，都是农业生产环境差异的合约表现。斯密所表述的繁荣国家的三要素，“和平，便利的税收，过得去的司法”，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呈现着同一根源：英国农业生产的高度确定性。

第二节：绿色革命，从分流到合流的转折

在人类的文明史上，英国有着独一无二的历史道路。

相比于英国，人类历史上的各个文明，都深受高风险农业生产的困扰。离开 ENSO 最近的，位于赤道太平洋上的诸岛屿，虽然也是早期农业发源地之一，有着长达近万年的农业史，但是以城市和青铜器为衡量标准的话，它们甚至没有跨进文明的门槛。赤道沿线的其他文明，无论是位于非洲或是美洲，受制于糟糕的农业生产条件，发展都相对迟缓，进展有限。中东，印度，和中国，作为古代文明的高峰，都曾经盛极一时，但是受制于不稳定的季风降雨和长期气候变迁带来的农业困境，无法拥有和保持内与外的和平，作为人口稠密的地区，在高对抗的，暴力水平较高的社会生活状态下，有史以来，古文明社会中的分工演进都受限居高不下的交易费用水平，并周期性地陷入秩序崩溃，使得有限的分工水平遭遇进一步的破坏。尽管有着辉煌的早期历史和众多的人口数量，但是由于缺少生产力高度和持续积累的能力，中东，印度，中国这些古文明在近代历史上普遍的落后了。而相比于其他地域，欧洲大陆的状况要好一些，中世纪以来，在罗马文明的废墟上，欧洲文明向北发展，尽管这里的农业风险比英格兰为高，但是和中东，印度，中国这样的古文明地域相比，远离了季风区，受惠于地中海和北大西洋暖流，农业风险的水平又是较低的，因此，西北欧地区在中世纪后期以来，率先发展起来，“大分流”作为一个历史名词，描述了欧洲相对于中东，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之兴起，欧洲作为一个整体，对于农业风险更高的其他古文明区域呈现出了它的优势。

面对这种的优势，当时代的人已经有所感知，尽管中世纪以来的人们，已经下意识地习惯和接受了古文明那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兴起和衰退的循环，不再像古典时代那样，相信一个和谐与均衡的世界，而是更加冷漠甚至略带蔑视地看待现实，或者是寄托心灵于来世，或者是盼望即将到来的末日审判。在这种精神氛围下，被认为是现代历史哲学先声的《历史绪论》的作者，生活在十四世纪北非的伊斯兰学者伊本·赫勒敦注意到：“在我们的时代里，文明似乎是从南向北移动的”。法兰克人和突厥人的王朝已经得到了权力，“人们敬畏的不是埃及，而是奥斯曼人”。并且，他带着一些不安地注意到了欧洲在知识上所取得的发展。“我们进一步的听说在罗马人的土地和与其比邻的北岸，那里的欧洲基督徒在哲学的学问上发展良好。据说他们再次学习了哲学，有许多的课堂教授哲学，现存的对哲学的阐述很广泛，有许多人知道这些学问，他们有很多学生”。他推测文明中心的转换，可能是由于太阳的力量越来越大，或者其他某种星象方面的因素。但是无论如何，他仍然相信，“未来和过去的相似比两滴水的相似程度还要高”。在当时人的眼光中，北方的权力崛起，大概也只是又一次变幻莫测的人世起伏，并没有什么特殊之处，值得有智慧的心灵对它另眼相看。

伊本·赫勒敦所代表的这种看法，既是对的，也是错的。一方面，欧洲的兴起，正如赫勒敦所推测的那样，的确是由于“某种星象方面的因素”，对于地中海以北的欧洲，尤其是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日耳曼西欧，的确是“太阳的力量越来越大”，因为西北欧的兴起，的确和“中世纪暖期”相关联。另一方面，欧洲的兴起固然没有摆脱古文明循环往复的崛起与衰落的宿命，而作为低农业风险所造就的特例，英国正是在欧洲兴起的这次浪潮中，从众多的欧洲国家中脱颖而出，开拓了全新的文明道路。像是“未来和过去的相似比两滴水的相似程度还要高”这样的论断，不再成立。

独特的地理位置，使英国远离赤道，远离 ENSO，从而远离农业不确定性，同时，又因为北大西洋暖流的恩惠，使它在高纬度的地域上获得了良好的农业生产条件。英国与古代文明的中心，欧亚大陆之间，只隔着并不宽阔的英吉利海峡，这给它带来了幸运的双重影响。一方面，海峡两岸交通并不困难，早在青铜时代，英国与欧洲大陆就不缺少文明交流，罗马时代，不列颠岛更成为了罗马的属地，进一步卷入了欧亚大陆的文明进程，这道海峡从未阻止英国对于欧洲大陆古代文明的吸收。另一方面，这道海峡虽不宽阔，却又相对隔离了来自欧亚大陆的战争风云。因此，基于低风险农业生产的“和平”，虽然间歇性的被打破，却又从未远离英国，正是这样一种和平基调与持续积累之间的正向反馈，开拓了全新的文明道路，使得英国的力量越来越强，使它从一个罗马时代的边疆之地，最终成长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的帝国。

“走大英的路，让大英无路可走”。在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世界性帝国的强大示范作用下，竞逐富强的冲动，带动了整个的现代史。但是，正如我们在前文中所讨论的那样，每一个文明，都有它独特的社会生活基调，加之不同的文明相互作用，就决定了每一个文明独特的历史道路。与英国竞争的其他欧洲国家，正像斯密所观察到的那样，并没有走上以资本主义农业为先导的“纯粹”的，英国式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些欧洲国家，以其自身的独特条件为基础，在英国的示范和压力之下，卷入了工业化的浪潮，在造就了古文明的风险农业的基础上，移植资本主义大生产，形成多种多样的“假晶”资本主义。在社会生活条件与地理位置都更接近于英国的西欧地区，这些“假晶”资本主义率先成长起来。它们既不是典型的古代文明，也不是典型的现代文明，而是兼有古代文明的小农业和资本主义式的大工业，成为一种混合体，来自古代文明的小农业特征，“土地细分”下的贫困农民，和来自现代文明的特征，“工业区”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两种特征混杂并存。卷入了工业革命浪潮的各个国家，依其地理地缘的因素，以各种方式表现着这种混杂，来自恩格斯的《在爱北斐特的演说》中，恩格斯描述了这种混在在德国社会状况中的表现：

我们先来考察一下德国目前的社会状况。我国有大量的贫民，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事件本身就说明了这些地方的状况。摩塞尔和埃斐尔两地区的贫困状况，“莱茵报”已经详细地报道过了。厄尔士山区自古以来

就被可怕的贫困笼罩着。在捷涅和威斯特伐利亚的麻纺业区情况也不见得好些。德国各地都怨声载道，这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的无产阶级人数众多，这也不能不是这样，即使我们极其肤浅地考察一下我们的社会状况，我们也一定会相信这一点。工业区一定有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工业要是没有大批全力为它效劳、为它工作而且不再从事其他任何行业的工人，就不可能存在。只要竞争存在一天，工业劳动就使工人不可能从事其他任何行业。所以在所有的工业区里我们都可以看到无产阶级，他们这样多，这样引人注目，要否认他们的存在是不可能的。许多人断言：农业区刚刚相反，那里一定不会有无产阶级。但是，这是否可能呢？在大土地所有制占优势的地方，农业无产阶级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农场需要男女雇农，没有无产者，大农场就不可能存在。在土地分散的地方，同样也无法避免产生一无所有的阶级，因为土地分散有一定的限度，它不可能超过这个限度再分下去，而且因为那时土地只为家庭的一个成员所有，所以其余的成员就不得不变为无产者，变为一无所有的工人。同时，土地的分散通常总是要分到土地小得不能养活一家人为止。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个阶级像城市小资产阶级一样，形成了由有产阶级过渡到一无所有的阶级的阶梯。土地不让这些人去另谋生计，但同时又不能供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资料。这个阶级也是极端贫困的。

一方面，这种混杂使得欧洲部分地获得现代文明带来的巨大力量，取得对于东方古文明国家的巨大优势，使欧洲在过去的几百年中，征服或控制了亚非拉的广大土地和人民，所谓中国（东方）与欧洲（西方）之间的“大分流”，即由此而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前文中曾经讲过，大分流不是一个独立的，本源性的问题，它是小分流的产物，是资本主义大生产在欧洲扩散而带来的溢出效应，是小分流发展历程中的一种早期呈现。

另一方面，早期工业革命的发展，并不能改变当时的农业风险状况，因此这种混杂并不能使欧洲不能免于风险农业所带给古文明的盛衰循环，欧洲国家在新的生产力水平上重复着春秋战国式的冲突与厮杀。在这种新旧之间的摇摆和颠簸之中，古代文明的周期性衰退和资本主义大生产的直线式发展相叠加，现代文明的道路和古代文明的道路在它们身上融汇交错，使欧洲成为一战和二战这所谓“第二次三十年战争”的策源地，历史学家心目中局限于欧洲的“十四世纪总危机”和“十七世纪总危机”在二十世纪重演，在大工业的助推下，成为祸及全世界的“二十世纪总危机”。

在这一“二十世纪总危机”当中，美国代替英国，成为新的，更强大的世界性帝国。在中世纪以来地中海文明向北发展的浪潮中，英格兰这样一个低风险农业区兴起，成就了英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同样的，在近代以来欧洲殖民扩张的浪潮中，新英格兰地区这样一个低风险农业区兴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以新英格兰为核心的北美殖民地，美国，在广阔的北美大陆上极大地扩张了它的领土和力量。在“第二次三十年战争”所造就这场“二十世纪总危机”中，和历史上就已经被秩序崩溃所屡屡破坏的中东，印度，中国等古文明一样，循着风险

农业所造成的宿命，在新一轮的秩序崩溃中，欧洲也失去了它刚刚获得的文明“中心”的地位。面对和古文明一样束缚于宿命而崩溃的欧洲，以美国为核心的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成了新的文明“中心”。在被欧洲与其他国家之间的东西方“大分流”遮蔽了数百年之后，英吉利海峡两岸的“小分流”得以充分彰显，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欧亚大陆拉开了距离，成为文明世界中高风险农业区与低风险农业区之间的“第二次大分流”。以核大战阴云笼罩下的美苏冷战为标记，文明分流在大工业的助推下，走上了它的历史顶点，也把人类带到了毁灭的边缘。

幸运的是，在毁灭的阴影下，绿色革命，作为工业革命的延伸，以农药，种子和化肥等技术进步极大地提高了农业产量，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化与绿色革命相结合，给各文明区域带来了农业剩余及其稳定性的快速提高，由此释放了数千年来不曾被撼动的农业风险，使得欧亚大陆上的工业化大生产不再是一种“假晶”式的存在，而是得到了稳固的农业基础，这使得工业化的深度与广度都大幅提高，原本局限于英美国家的弱对抗的，较为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迅速地向着全世界扩散。

在所有的古文明国家中，西欧各国由于较低的农业风险，以及相应地，更好的工业基础，成为绿色革命成效最快，也最大的地区，率先实现了这种弱对抗的，更为和平的社会生活秩序，也因此成为经济上迅速恢复与发展的地区，在历史上就与西欧社会结构接近的日本，也成为其中的一员。这第一批实现了道路转折的国家，因为二战秩序的历史原因而附属于英美，成为战后“西方文明”的一部分。

相比于西方国家，东欧和苏联等国家，农业风险较高，工业基础都较为逊色，实现这种转折更晚一些。中国，作为古文明的代表国家，也在绿色革命的浪潮中，也扭转了几千年来居高不下的农业风险，获得了新的和平秩序，走上了现代文明发展的快车道。东欧，苏联，乃至中国，作为历史上农业风险水平较高的文明区域，尽管它们实现绿色革命付出代价较高，获得和平秩序的转折也来的较晚，但是这种转折一旦实现，它们在现代文明道路上的进步即可自我加速。中国经济今天所表现出的巨大力量，既是这种进步的成果，也进一步巩固了这种进步。

相比于“西方文明”和欧亚大陆上的东欧，俄国，中国等“北方国家”，南亚国家，中东国家和非洲国家，或是由于居高不下的农业风险水平，或是长期气候变迁所带来的农业衰退，工业化和绿色革命的进展更为缓慢，但是即便如此，过去几十年中，这些国家也在走向现代文明的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

尽管在绿色革命开启后的最初几十年中，在“泛西方”和平秩序的保护下，欧美地区与工业革命积累较弱，绿色革命进展较慢的其他地区曾经再次拉开距离，但是，随着绿色革命的不断深入，分流的时代已经结束，合流的大门已经开启，作为数百年来东西方“大分流”的最后回响，战后再次拉大的东西方发展

鸿沟已经是强弩之末。由各种农业风险特征所造就的众多文明道路，从此决定性地趋同，贯穿整个历史的文明分流最终走向了文明合流。

第三节：和平秩序的扩展

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中国的迅速兴起，成为震动世界的大事。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在 1994 年预言道：

“中国参与世界地位重组的规模，使得世界必须在 30 年或 40 年的时间内找到一种新的平衡，假装中国不过是另一个大的参与者是不可能的，它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参与者”。

面对已经成为新现实的世界变局，人们总是在匆忙中向着过去的历史寻求启示。哈佛大学的历史学者，尼尔·弗格森把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格局称作“新冷战”，另一位哈佛大学的历史学者，格雷厄姆·艾利森在他的著作《必有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提出：历史上的守成大国与新兴大国，正如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所描绘的雅典与斯巴达那样，往往由于互相猜忌而走向无法挽回的冲突，中美是否能够最终避免一战，就取决于美中是否能够逃这样的—个“脱修昔底德陷阱”。

是这样吗？中国与美国的竞争，固然是新兴大国与守成大国的竞争，但是，中国与美国的关系格局，果然能够等同于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争霸战，等同于苏联与美国之间的冷战吗？

看来某些哈佛学者们的确是这样想当然的。我们来看—看另一位哈佛大学的政治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中对中美之间的竞争所做出判断：

1，在最广泛的层面上，盛行于众多亚洲社会的儒家精神强调这样—些价值观：权威、等级制度、个人权力和利益居次要地位、—致的重要性、避免正面冲突、“保全”面子、以及总的说来，国家高于社会，社会高于个人。

此外，亚洲人倾向于以百年和千年为单位来计算其社会的演进，把扩大长远利益放在首位。

这些态度与美国人信念的首要内容形成了对照，即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以及美国人倾向于不信任政府、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倾向于忘记过去、忽视未来、集中精力尽可能扩大眼前的利益。冲突的根源是社会和文化方面的根本差异。

2，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上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室。

3，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规模、经济活力和自我形象，都驱使它在东亚寻求—种霸权地位。这个目标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自然结果。所有其他大

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和苏联，在经历高速工业化和经济增长的同时，或在紧随其后的年代里，都进行了对外扩张、自我伸张和实现帝国主义。

没有理由认为，中国在经济和军事实力增强后不会采取同样的做法。两千年来，中国曾一直是东亚的杰出大国。现在，中国人越来越明确地表示他们想恢复这个历史地位，结束屈辱与屈从西方和日本的漫长世纪，这个世纪是以1842年英国强加给中国的南京条约为开端的。

和前两位学者的想法一样，一眼看上去，亨廷顿的“头头是道”也饱含着智慧和学识。但是，“历史总是惊人相似，却永远不会简单重复”。在绿色革命这一农业时代以来“五千年未有之变局”面前，历史岂止是不会简单重复，历史根本就是彻底的改变了。

二战以来，从西欧，东欧直到俄罗斯和中国，欧亚大陆北部的主要国家，都已经次第完成了绿色革命，今天世界舞台上的主要国家，都已经获得了建基于低风险农业的和平秩序。对于后冷战时代的现代国家来说，国家强大，经济繁荣与和平秩序，是不可分割的三位一体，能够站上世界舞台的，都是同时拥有了这些属性的同质化国家，反之，没有完成现代化进程，缺少这些属性的国家，也不会有机会在世界舞台上发挥重大作用。尽管每一个文明的历史道路，都给它留下了独特的文化遗产，但是，对于今天每一个世界舞台的主要国家而言，这种文化遗产更多的代表了过去的文明路径，而不是今天的社会生活。新教，天主教，东正教，儒教，神道教，这些文化遗产并不能够界定出各主要国家之间的异质性，建基于和平秩序之上的现代文化，才是隐藏在表面性的文化遗产差异之下的，实质性的一致所在。

今天的世界秩序，是同质的，建基于和平秩序之上的国家之间的世界秩序，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现象。

任何时候，文化不是人类生存的目的，而是人类生存的工具。文化差异不是冲突的根本，文化差异背后的生存环境，进一步的，生存环境带来的生存压力，才是冲突的根本。而今天决定世界秩序的主要国家，包括中国在内，都已经拥有了和平秩序，都已经从农业风险中解脱出来，不再受困于生存环境。对于这些国家来说，不存在对外冲突的必然压力。表面化的，文化遗产上的差异，并不构成对冲突的必然推动，从宗教，文化等角度去猜想的，亨廷顿式的“文明冲突”，是对历史的误读，是刻舟求剑式的虚假想象。

因此，中国与美国之间的，所谓的“文明冲突”，如果要向历史中去寻求先例，唯一可资对比的，就是和平落幕的，发生在美国与英国之间的“新兴国家”与“守成国家”之间的竞争，那是世界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两个“现代”国家之间的竞争。

进一步的，今天的中国与美国，无论它们之间的竞争有多么重要，它们也仅仅是众多现代国家中的一部分。甚至，有极大的可能，未来的力量对比将会表明，它们不能成为决定性那一部分，因为随着绿色革命的深化和扩展，世界上还有众多的国家已经，并且将会继续在现代文明的道路上迅速发展，今天所谓的“主要国家”的份量，已经被这种发展所稀释，在未来的世界格局中，还将继续被稀释。

中国将会成为新的重要国家。但是，即使中国的发展超越了美国，它也没有机会成为美国那样的霸权国家，因为它将要面对的，将是众多的同样建基于和平秩序之上的现代国家。这些国家，无论是现代文明道路上的先行者，“西方国家”，还是这条道路上的后来者，其他亚非拉国家，都将会和它一样，强大，繁荣，而且稳固。对于所有这些现代国家而言，对于和平秩序的追求，既是内部需要的必然，也是外部压力的必然。无论有多少路径上的具体差异，它们之间的竞争，都将会在一条和平的道路上得以解决。

存在即是合理，而合理的必将存在。以欧洲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大分流”为历史根源，以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与欧亚大陆国家的“第二次大分流”为基础，以“PAX AMERICANA”为核心的旧秩序，曾经是合理的，但是在绿色革命以来的“五千年未有之变局”下，已经不可持续。亚非拉后发国家所追求的，以“国际关系民主化”为核心的新秩序，成为后绿色革命时代的新合理而必将到来。

百川东到海，奔流不复回。人类文明的命运共同体，就此发端。

(下卷终)

附论：自由主义理论的范式缺陷

从前后一贯的伯克式达尔文进化主义立场来看，哈耶克这种激进的经济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狂妄自大。

约翰·格雷：《哈耶克与古典自由主义的消解》

第一节：驳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

很大程度上，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是基于自生自发秩序和人为设计秩序的分与对立而建立起来的。但是，这种自生自发秩序与人为设计秩序的分与对立是虚假的，它只是存在于哈耶克的臆想之中，只是由于哈耶克对于演化理论和历史经验的双重无知所造成。

哈耶克认为自生自发秩序是“人的行为之产物，而非人为设计的产物”，而与之相对的，则是各种各样的人为设计秩序。相应的，哈耶克也把理性主义分为演化理性主义和建构理性主义，在哈耶克看来，演化理性主义是自生自发秩序的形成基础，建构理性主义是人为设计秩序的形成基础。实际上，他心目中的自生自发秩序，就是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而人为设计秩序的终极代表，则是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

问题在于，哈耶克并不理解演化理论。演化理论的最简核心，就是“物竞天择”。人类是有理性的动物，人类行动中总伴随着理性的参与，即使这种参与是下意识的或者非逻辑表述的。人类以行动维持自身生存，也就是“物竞”，而环境压力则以生死成败对人类行动做出选择，也就是“天择”。社会秩序，也就在“物竞天择”的过程中成型。演化过程中的环境选择是人类所不能控制的，社会秩序的成型是“物竞”与“天择”的合力。演化与人的理性并不是同一层面上的概念，无从互相对立，演化也无从排斥人类行为中的任何理性因素，无论它是“演化理性”还是“建构理性”。也就是说，演化是普遍的，任何社会秩序都不会由于“建构理性”参与其中而失去它演化产物的属性，不存在非自生自发的，人为设计的社会秩序。

深入历史经验，也会发现这里并不存在哈耶克意义上的，与自生自发秩序相对立的，由“建构理性”所主导的“人为设计秩序”。任何一种秩序都离不开人类行动，因为任何社会参与者都会以积极或消极的行动在秩序中表达和争取自己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秩序都有人的理性参与其中，或者说都是人为的，但是同时，没有任何社会成员能够把自己的“建构理性”强加于整个社会，任何一种现实的秩序，总是社会成员之间多方博弈后的妥协与均衡，它的存在超越了社会成员中任何一方的“建构理性”，最终由该社会所在的生存环境约束和决定，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一种秩序也都是演化的结果，或者说是自发的，而不是设计的。

综上所述，在个体事件的层面上，社会秩序可以是建构的，在历史社会的层面上，社会秩序总是演化的。建构与演化，可以一体两面，但绝不可能实质对立。哈耶克意义上的自生自发秩序与人为设计秩序之间的分与对立，在理论和经验两个层面上都没有存在的依据。

进一步的，让我们回到 Todd 图来检讨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矛盾之处。这位法国人类学家 Emmanuel Todd 发现的是什么呢？即国家或地区的意识形态与其历史上的家庭组织结构和婚配策略高度相关⁵⁰。从 Todd 图上看，为数不少的国家或地区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应的政治经济秩序），毫无疑问会被哈耶克归类为所谓由“建构理性”而来的人为设计秩序，而这些国家或地区历史上的家庭组织结构与婚配策略，远在这些现代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秩序出现之前就存在了，又显然不可能被归类为任何一种所谓由“建构理性”而来的人为设计秩序。那么这两者之间的高度相关又意味着什么呢？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哈耶克所谓的“人为设计秩序”，本身就是各个国家或地区历史上的“自生自发秩序”之延续与发展，是继起的自生自发秩序，是“历史的选择”，而不是某种与自生自发秩序相对立的，由“建构理性”创造的不合理存在。

各个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秩序差异，并不在于它们是由所谓建构理性而来的人为设计秩序，还是由所谓演化理性而来的自生自发秩序。这种差异，从 K-R 模型的角度看待，是由环境风险对社会秩序的选择造成的。哈耶克偏爱的所谓自生自发秩序，是在风险水平较低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社会秩序，而哈耶克批评的所谓人为设计秩序，则是在风险水平较高的环境下演化出来的社会秩序。也就是说，毫无例外地，它们都是自生自发秩序，差别只在于它们分别适应于不同水平的环境风险，仅此而已。

⁵⁰ 参考本卷第四章第二节《Hajnal 线&Todd 图新解》。

第二节：驳波普尔《历史决定论的贫困》

在《历史决定论的贫困》一书中，波普尔认为：

- 1) 人类历史进程受人类知识增长的强烈影响，
- 2) 而我们又不可能用合理的或者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
- 3) 由此，我们不能预测人类历史的未来进程，
- 4) 也就必须放弃理论历史学的可能性，
- 5) 进而历史决定论也就不能成立。

K-R 模型所指出的是，波普尔的论述中，2) 是不能够成立的。

科学知识的增长，来自于科学知识的产生与积累，而科学知识的产生，本质上是一个劳动分工现象，科学知识的增长，则是人类社会分工演进历程的一部分。让我们引用斯密的一段话来表明这一点：

可是，一切机械的改良，决不是全由机械使用者发明。有许多改良，是出自专门机械制造师的智巧；还有一些改良，是出自哲学家或思想家的智能。哲学家或思想家的任务，不在于制造任何实物，而在于观察一切事物，所只他们常常能够结合利用各种完全没有关系而且极不类似的物力。随着社会的进步，哲学或推想也象其他各种职业那样，成为某一特定阶级人民的主要业务和专门工作。此外，这种业务或工作，也象其他职业那样，分成了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又各成为一种哲学家的行业。哲学上这种分工，象产业上的分工那样，增进了技巧，并节省了时间。各人擅长各人的特殊工作不但增加全体的成就，而且大大增进科学的内容。（国富论，第一篇，论劳动生产力增进的原因并论劳动生产物自然而然地分配给各阶级人民的顺序，第一章，论分工）

如果说远古时代的人类分工水平长期非常低下，科学知识的增长有着很强的偶然性，还看不出什么规律的话，那么自斯密时代以来这几百年的历史中，科学知识的爆炸式增长和分工演进的加速深化这两者之间的一致性关系，已经被充分地展示出来了。

局部不等于整体，不能够把握微观事物，不等于不能够把握其宏观涌现，了解一些物理学的发展历史就会知道，远在能够观测微观的水分子热运动之前，人们就已经知道如何测量水温了。我们确实可能永远无法用合理的或者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科学知识的增长中偶然性的具体进步，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能从宏观上把握科学知识的增长。波普尔所表述的五段论之二，“我们不可

能用合理的或者科学的方法来预测我们的科学知识的增长”，只表示波普尔对科学活动作为一种分工演进现象的本质缺乏认识。

K-R 模型已经指出了不同的环境风险水平下将会形成的不同社会秩序，进一步的，不同的社会秩序中分别存在着不同的交易条件，决定了分工演进的速度与限度，决定了分工演进持续深化的可能与不可能，从而也就相应的指出了科学知识增长的宏观图景。在这样一个宏观图景的存在下，波普尔对历史预测，理论历史学以及历史决定论的否定是不能够成立的。

第三节：论柏林《两种自由概念》

柏林对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所做的区分，不具备普遍的现实性意义。对于前者的推崇和对于后者的拒斥，只是突显了柏林历史视野的狭隘。

否定性自由是保守派的追求。他们处在相对优越的社会地位上，在其认知中，对于自身地位感到满意，甚至有望进一步提升，因此抱团的欲望较弱，他们的权利诉求更多是从个人行动不被干涉出发的否定性自由。肯定性自由是进步派的要求。他们处在相对劣势的社会地位上，在其认知当中，自身已经处于不利境地，甚至面临进一步损害，因此更需要抱团取暖，他们的权利诉求更多是以群体利益为表现的肯定性自由。

其实，严复把密尔的《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就已经包含了这层意思，这个群己权界的界，就可以被视为两种自由斗争的结果，它并不是一个可以被固定的边界，而只能是不同地位上的社会成员之间不断博弈下的妥协。随着社会变迁，人们对这个边界的认识和接受都是不断变化的，也就是说，具体且历史地看，何为否定性自由，何为肯定性自由，是没有固定含义的。

用一句不严谨的话来讲，否定性自由是富人所关注的，而肯定性自由是穷人所关注的。由此，由柏林启发的对否定性自由的推崇和对肯定性自由的拒斥，就并不成其为有现实性意义的思想，而只能是一种心理上宣泄，于解决现实世界中的问题无补。

围绕群己权界如何界定的斗争，它所能达到的妥协是随着社会风险的变化而变化的，正如过去的历史所显示，现代化进展迅速，社会风险得到释放的国家和地区，否定性自由得到了保障，肯定性自由得到了扩张，而现代化失败或者曲折，社会风险累积不散的国家和地区，往往在否定性自由丧失的同时，肯定性自由也没有多少进步甚至是在倒退。综上所述，否定性自由和肯定性自由的对立，是更一般的自由与平等之关系的一种表达，这种对立并不是绝对的，而在更根本的层次上，两者则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真实的自由之路，不是对否定性自由的推崇和对肯定性自由的拒斥，而是要通过释放社会风险，使得两种自由能够相容，使群己权界在不断调整的同时，得到不同阶层社会成员的共同尊重而屹立不倒。

附录 1：主奴辩证法，英雄与末人，科耶夫

灰衣主教

作者说明：这是我 2014 年在洞见与发现微信群的讲演。踢星星辛苦整理了录音。这次他要出书，希望我出文跟随。我把这个交给他，就不欠他的人情了。这也算共同成果，星星整理录音过程中费心对许多哼哼哈哈的含糊其辞做了修订。为了阅读方便，我花时间大量挤走口水词句，希望能精炼又不失口语的生动。

另外，四年多到现在，我对文中所涉主题又有了新的理解和感悟。为了保持原文的一贯性，也没有过多的修正或添加。希望星星的书里能有我的联系方式⁵¹，招来同好是我最大的愿望。

大家好，开讲座是每个发小的义务，一直没有讲，因为我胆怯，更因为这个题目和内容实在是太庞杂了。所以今天不是讲课，是作为读书会的成员把一些读书心得与大家分享，替大家做个书童。

大家可能注意到，我微信自称“灰衣主教”。“灰衣主教”是形容躲在幕后的，出谋划策的高人。本次讲座的核心人物，科耶夫先生就是一个灰衣主教。叫这个名字的意思不是我就是他，有他的能耐，只是表达对他的崇拜，偶像和粉丝。好多年前，SARS 之前，我请当年风入松书店的老板王炜吃饭。王炜北大哲学系，好像 77 级的，和甘阳研究生同学，师从熊伟先生。席间我向他请教，读哲学读什么，他推荐了列奥·施特劳斯的《自然权利及历史》。他说，老外的研究已经远远走在前面了，他们一直在发掘人类的社会，人类的行为准则后面的基本的东西是什么。那时小布什如日中天，这本书很热门。书拿回去看得一头雾水。翻译得挺好，每一句话明明白白，但是看不进去。原因是孤零零的一套说法，前后左右都没有呼应，看得非常慌乱。于是我广泛地收集施特劳斯的信息，前后左右，where, what, when, how, 老师，学生，为谁服务，与谁为敌，等等。一件悬空的东西很难对它产生真正的认识，摸到边界才踏实。摸索过程中我发现一件很奇怪的事，一个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名字，亚历山大·科耶夫。我不算学问家，深刻不足，但是博览有余，未曾听说的事情非常少见。在生活中别人这么调侃，自己也这么认为，百科全书呗。什么都碰碰，什么都知道个皮毛，起码知道个摘要。但是科耶夫这个人居然没有听说过，于是又开始收集科耶夫的信息。好在现在手段确实非常丰富，谷歌，百度，亚马逊。书容易买，消息也容易打听。慢慢地我形成了一些概念。首先知道了他的故事，人生故事。结果就是特别感兴趣，非常非常着迷。痛苦的是，在国内，对科耶夫有发言权的学者比较少，也就有两个人。一个是北航的高全喜，早年以研究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作为博士毕业论文，贺麟先生的学生。还有刘小枫，作为一个学者非常活跃非常有名。我与二位分头联系上，吃饭喝茶喝咖啡，进

⁵¹ 本文作者微博：<https://weibo.com/u/3950752868>。

入到科耶夫氛围，通过科耶夫又反过来再了解了施特劳斯，然后又找到卡尔施密特。清华的刘瑜说他是希特勒的姚文元。

为什么要讲科耶夫，一个遥远的人物？为什么大家会感兴趣呢？首先，他是个读书人。在座各位基本都是读书人，不管是什么学科出身，做学问还是在社会上实践。而科耶夫则是读书人的典范。其次他非常类似中国的读书人，学以致用，读书并实践。或者说科耶夫非常非常王阳明。读书，讲学是大家，理论上有创新，实践中有辉煌的战果。科耶夫起码有两件事情值得在座各位崇拜。第一，他是大师中的大师。当时他在法国讲习班的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学生，就是他讲课大家听，并且听得如痴如醉的，非常崇拜他的，牛人云集，比如萨特。萨特自己并不完全承认是科耶夫的学生，但他的思想极其深刻地受到了科耶夫学说的污染。福柯，思想脉络基本上由科耶夫的思想中派生，不过是科耶夫思想某一个方面的发展发挥。雷蒙·阿隆，自由主义的著名人物。六八年法国文革期间，坚定不移地站在学生运动的反面，被左派认为是积极的右派，自由主义右派。还有拉康，德里特，梅洛庞蒂，巴塔耶，格诺。这些人是二战后法国思想界所有的顶尖人物。这些法国人的思想挺难懂，但它是上世纪直到现在，人类思想的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后现代主义的发源，就在法国，就在他们中间。每一个都是导师，科耶夫就是导师中的导师。导师中的导师并不鲜见，例如我们中国的胡适，大多数做学问的人都认可他的导师地位。仅仅这点，还不足以科耶夫。大师如黑格尔柏拉图康德，苏格拉底，如老子墨子孔子，毫不逊色。但科耶夫除了是思想导师，还是一个和在座各位日常工作生活紧密相关的人，影响非常大。二战后，他参加了法国政府，成为核心人物，法国政府当时政策的制定者。他是 WTO 和欧盟体系的原始设计人之一。

科耶夫战后的革命实践和战前的革命理论紧密相关，前后一贯。马克思说哲学家不仅要解释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科耶夫改造了世界，我们迄今还在他改造后的世界工作和生活。不但而且，他还指明了未来，一个无可避免的傻乎乎的幸福同时也是无趣灰暗的未来。所以，把科耶夫比作马克思也不太过分。接下来，我们拐个弯，先了解一下科耶夫的生平，然后再重点推介他的思想和作为。

科耶夫，俄国犹太人，1902年5月11日出生，母亲大家闺秀，来自银行家实业家家族。父亲弗拉基米尔科耶夫尼科夫。所以科耶夫大名叫亚历山大·弗拉基米洛维奇·科耶夫尼科夫，到法国后简化为科耶夫。叔叔兼好朋友康定斯基，赫赫有名，奠基性的艺术家，抽象画的鼻祖，我年轻时的偶像，和科耶夫有相似的特质。大多数艺术家，如梵高，是纯粹的艺术。但康定斯基既是一个开创性的艺术家，同时还是一个实践家。他在世界各地经营大量的艺术馆，当过苏维埃人民教育委员，是非凡的艺术组织家。康定斯基是艺术界的科耶夫，科耶夫则是哲学政治领域的康定斯基。翻手为云学问家，覆手为雨实践家。总而言之，科耶夫出生贵族家庭，受过良好教育，精通拉丁文，法文，德文，英文等。但是十月革命后生活开始动荡。他父亲很早离世，与中国有关，

日俄战争死在满洲里。母亲和父亲的战友结婚。父亲死时科耶夫三岁，基本上他是继父养大的。但是继父在十月革命中也惨遭不测，动荡中在乡下被游民，小偷和强盗这样的人杀死，他家是有钱人。科耶夫则因为贩卖肥皂被抓，运气还好，旋即释放，时年十八。科耶夫的家庭受到了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冲击，但依然心向革命。总之到老依然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苏联是混不下去了，释放后他和朋友经立陶宛穿越边境到达波兰。在波兰又被当做间谍逮捕。波兰与苏维埃政权非常对立。这是保尔柯察金的时代，托洛茨基的红军正准备干掉波兰地主。红军不是以民族斗争的形式解放波兰，而是以阶级斗争的形式解放波兰。好在同行的哥们乔治维特有德国血统，科耶夫又重获自由。之后他们又到达柏林，海德堡。海德格尔在那里，不过他跟了雅斯贝尔斯，成了东方哲学博士。他精通梵文，藏语，还懂中文。后来到中国秘密访问，直接用中文和领导人交流，怪怪口音。在柏林的时候，他结识了第一任妻子，科瓦雷的弟媳。科瓦雷对科耶夫的人生影响巨大，科耶夫的人生充满了传奇。科耶夫和科瓦雷弟媳要好，家人知道后很愤怒，委派科瓦雷去找科耶夫交涉。交涉结果是科瓦雷兴高采烈地告诉家人科耶夫比自己的弟弟更优秀，更配得上自己的弟媳。科耶夫最终如愿以偿，一边读书，一边有了个太太，博士学业后定居巴黎开始生活工作。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像个上流社会人物一样在巴黎混，住大房子，雇佣人。直到28岁那年，当时他在索邦的法国高等实验学校做科瓦雷的助手。1930年，他用自己所有的财产买了一家食品公司，股市大跌，破产了，搬出贵族公寓。两年后离婚。接下来又到了的一个转折点。

1933年，希特勒上台。是年科瓦雷受邀到开罗主持一个大学的哲学系。留下一个哲学讲习班，向法国人介绍黑格尔哲学。科耶夫从在下面听课的助教，成了台上的教授。科耶夫开始了人生中重要的一段时间。讲授非常成功。雷蒙阿隆回忆说，下面的听众，在科耶夫古怪而又极其标准优雅的俄国口音法语的催眠下，如痴如醉，醍醐灌顶，像是被雷劈了一样，浑身冒汗，酣畅淋漓。讲习班持续了几年，讲课记录后来由雷蒙格诺，RAYMOND QUENEAU收集整理出版。这就是大名鼎鼎的黑格尔导读——精神现象学课程。讲习班的一个学生——马罗兰二战后当了法国政府的经济部长，这是后话。马罗兰在听课的时候，也已进入法国内阁。讲座期间，科耶夫娶第二任妻子——安吉利娜伊万诺娃，流亡法国的白俄。二战爆发，科耶夫应征入伍，由于法国军队战争一开始就投降，所以科耶夫也没打过什么仗。但是在法军投降后科耶夫进入了游击队。1944年，科耶夫谋划策反一支德国军队，一支鞑靼人的军队，穆斯林军团。但是策反不成功，人多有人告密，科耶夫被德军逮捕。战争中策反敌军，恐怕是要被枪毙的。但是戏剧性的是，科耶夫在说服情敌家长科瓦雷之后，又一次成功运用语言天才，说服德军司令释放了自己。德军司令战前是一位画廊老板，艺术商人艺术爱好者，和科耶夫兴趣相投，聊得很投机。司令官觉得他们之间的共同点，要高过战争中的敌对关系，所以放了他。可见科耶夫极有语言天赋，有纵横家的天赋。战争期间他完成了《法权现象学纲要》。书未在他生前出版，缘于其性格有类似施特劳斯的一面，并不热衷于和广大人民群众分

享自己的观点，更愿意在小圈子里和他愿意交流的人分享。这本书基本主题是“普遍均质国家”。他后来参与实际政治，用行动推动历史车轮，推进了走向普遍均质社会的历史进程。

1944年，战争进入尾声。戴高乐组织战后政府，马罗兰入戴高乐第四共和国内阁，任对外经济关系局局长。科耶夫到马罗兰手下工作。科耶夫一个俄国人，进入法国政府的核心，值得探究。有一些不那么主流的意见，怀疑科耶夫是克格勃。毕竟官员和教授不一样。一个人有污点，在民主社会当教授没问题，但进入政府核心决策圈，就是另外一码事情。爱因斯坦很早就进普林斯顿，但最后始终未能参与曼哈顿计划。很多人把计划的起源归结到爱因斯坦给罗斯福的那封信，这是对的，然则始作俑者未必就是毕成大功者。科耶夫的这一例外疑点重重。也有人认为科耶夫进入政府核心顺理成章，没有阴谋诡计，与科耶夫起草《法国国事纲要》有关。纲要确定了戴高乐政府未来的走向，以此进入法国政府核心也不奇怪。科耶夫高屋建瓴，这篇东西不亚于我们的隆中对，并且他不但诸葛亮而且苏秦张仪，在列国势力之间拉来扯去，纵横捭阖。总之，进入法国政府之后，科耶夫如鱼得水。虽然他不懂经济，未有相关经历，但这并未妨碍科耶夫。科耶夫说，不懂经济没关系，一个礼拜读一读经济学著作，也就懂了。有人说别的国家是一群人干活，法国则是科耶夫一个人。接下来他接手了《马歇尔计划》，这事当时对欧洲非常重要。计划体现了美国人，体现了马歇尔本人的特点，厚道。大笔钱一股脑给到欧洲，希望欧洲恢复正常，对自由世界有利，对美国也有利。但钱的具体分配，美国人没法弄，应该让欧洲人自己来搞。法国最适合，法国人实力不如德国人不如英国人，又一直不听美国话，比较倔。但美国人就是怕法国人。这是历史因素，美国独立时，法国给予了很大的援助，直接派兵支持他们。类似于朝鲜战争，华盛顿就是金日成。金日成打败美帝国主义等于华盛顿干跑了英国佬。曼哈顿外的自由女神也是法国人送的。所以美国人对法国人有一种奇怪的情感，脾气非常倔的舅舅，无可奈何。当然二战后德国战败不行，意大利不行，英国不怎么“欧洲”。顺理成章法国接手了马歇尔计划。科耶夫抓住机会，借此成了处理欧洲跨国事务的核心人物。短短几年时间里（44年-50年）他完成《马歇尔计划》，并签订了《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GATT一开始就是WTO，因为美国人反对，所以只签了一个协定。关贸总协定受合同法管辖，WTO就有公司的味道，起码是卡特尔，有联盟性质。同时法德签订了《法德钢煤协定》，法国国事纲要的重要对策。这个协定演进为欧洲共同市场，欧洲共同体，演化成欧盟。

文革时，科耶夫到中国秘密访问。这件事科耶夫传记里没有记载。前段时间上海办过科耶夫在中国的摄影展览。据说科耶夫见过刘少奇周恩来，说不定还见过毛主席。他对文化大革命是有反对意见的，这个有机会再讲。他和文化部长马尔罗一起来，作为团队的成员，不知他是否有意识隐藏身份。由于情报的关系，科耶夫应该在中国还是有地位的。科耶夫的《法国国事纲要》使法国

在东西方之间持有中立偏西方的立场。法国退出了北约的军事组织的，是北约成员但不和其他人协同作战的权力。法国也是最早和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科耶夫 1968 年去世。在欧洲共同市场一个会议上，讲了一段话后，心脏病发作去世了，时年 66 岁。这一天也很好记，6 月 4 日。

下面我们进入科耶夫的思想，先讲务实部分，从务实讲到务虚。

科耶夫的务实观点，先要提《法国国事纲要》。这是战后科耶夫给法国政府的国策建议，是科耶夫思想最鲜明的反映。核心有两点，第一，如何处理法国与德国的关系，第二，如何处理法国和东西两边的关系，如何与苏联东欧集团，与美国英国集团打交道。

第一点，法国决不能像一战后那样愚蠢地挤压德国人，这非常危险。德国总要恢复并成长，如果德国恢复之后和法国没有关系，法国会迅速沦为欧洲二流国家。所以必须跟德国搞在一起。那时没有 INTERNET，没有 IT，最重要的战略物资是钢铁和煤。国事纲要的基本建议是两国经济混在一起。于是有了《法德钢煤协定》。迅速地丹麦，比利时，卢森堡也进来了。德国的铁矿石进口必须经过法国，德国没有采购权。这不是制裁，是合作。钢铁是最重要的战争物资，把生产程序在法德两国来回倒腾，谁也不能形成独立的钢铁产业。没有钢铁就没有武器就不能打仗就没有战争。这种思路并不鲜见。改革开放前，中国就批判东亚四小龙是殖民地经济。殖民地经济就是参加国际大分工，没有独立的工业体系。赫鲁晓夫倡导的社会主义大协作也是企图阉割中国，让你没有能力对抗，硬不起来，只能依附。总之，法国必须和德国绑在一起。科耶夫还认为民族国家之间战争的时代过去了，今后的战争是帝国战争。战争手段的进化也意味着战争的组织形式和战争成本的变化。最初是部族对部族，然后公国对公国，再然后民族国家对民族国家。现在民族国家已经负担不起战争，依赖一个民族国家去争雄必然失败。这被二次大战所证明。科耶夫认为希特勒的失败，与他企图只依靠德意志单一民族去统治一个帝国紧密相关。

第二点，科耶夫认为，西边是新教的英美帝国，而东边是以俄罗斯为主体的东正教帝国。法国处于两个帝国的中间，东西双方有可能大打出手。法国不管站哪边都会成为战场。无论战场是在法国的领空还是领地，法国都会损失惨重，永无翻身之力。怎么办？必须中立，但中立是有条件的。法国只有一个民族国家，力量有限，要建立自己的帝国。帝国平衡帝国换取中立的条件。科耶夫认为首先要和德国绑在一起，建立欧洲轴心。其次沿地中海，依托法国人自己的拉丁文明，天主教文明，拉住天主教的德国，建立拉丁帝国。德国是一个重要的天主教国家，有出身德国的教宗。拉丁帝国的思想没有按照科耶夫的想法往前走，但依然是法国政治哲学的核心。萨科齐就企图建立地中海联盟。政策的思想来源就是科耶夫的《法国国事纲要》，拉丁帝国纲要。戴高乐政府迅速接受了这个观点，战后法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似是而非，作为西方民主国家，立场总是和美国人不大协调。也有人说，美国人最恨谁？最恨科耶夫，因为他不断地和美国人作斗争。科耶夫是克格勃的说法可能是美国人散播出来

的。

凭借《法国国事纲要》，凭借在国内国际政治事务中的所作所为，科耶夫已经是个牛人。他在长相上很像基辛格，大鼻子，大眼镜。但他的所做所为，对世界的影响远远高于基辛格。如果基辛格是名人，科耶夫就是名人中的名人。基辛格在国际政治领域短暂地起了作用，作为尼克松的助手影响了当时的国际局势。而科耶夫的工作更有坚实的理论基础，直到今天还在发挥作用，奠基性的工作。

下面讲科耶夫的思想贡献，对黑格尔思想的解读。有很多人质疑科耶夫，质疑他曲解了黑格尔的理论，通过黑格尔表达他自己，弄出个科耶夫版的黑格尔。前面提到科耶夫接管了科瓦雷在法国高等实验学校的黑格尔哲学讲习班。他在很短时间内，一个月左右，抓住两点，阐发了属于他自己的独特的东西。首先，他把主题浓缩到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的第四章的主奴辩证法。同时，又抓住黑格尔对拿破仑的耶拿—奥厄施泰特战役的论述。就此展开科耶夫式的黑格尔思想。他认为主人和奴隶辩证法是历史前进的发动机。大家可以联想到阶级斗争。在座各位对阶级斗争应该都熟悉，张春桥说阶级斗争是历史的火车头。科耶夫对马克思的哲学是有所继承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德国古典哲学，就是黑格尔的辩证法。

主人和奴隶的辩证法是怎么产生的呢？这就要讲到 First man，人类社会的历史的开始。人类历史就是人与人关系的历史，就是阶级斗争的历史。这一套联共布党史兮兮的理论大家都考过。历史怎么来的？要从人性开始讲起，西方人是一层一层地讲的，先要讲最原根的东西。讲经济学，讲需求价格，要从效用讲起。效用以后，才是价格。张五常和汪丁丁论战，张五常说你讲价格为什么非要讲效用呢？诸如此类。总之，人性是历史分析的一个源头。按照科耶夫的黑格尔讲法，人性的一个非常重要特点，是人有欲望。没有欲望，人就没有办法感觉到他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高级欲望，是人区别于动物的高级欲望，是需要得到他人承认的高级欲望。动物有吃的欲望，有交配的欲望，但只有人才有被别人承认的欲望。这个欲望如此地重要，以至于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人性的第一需求，就是被别人需要。比如说我讲，你们听，你们需要我，那么我就感觉到我是存在的。进一步的说，这个需要还是被认可的被尊重的需要。我要像模像样的，被当成一个人物来被你需要。如果你们是我的领导，需要我帮你们提鞋，帮你们打杂，这就不是人之所欲的那种被需要。而我作为老师，给大家讲课，你们发出鲜花和咖啡，我被你们尊重地需要，被你们承认，我的人性的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需要”，有几种翻译，有“认可”，有“承认”。我觉得承认比较好，比较顺口。被别人承认，在人性中非常重要。这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最主要，最核心的一点。原始状态下的社会是这样，现代社会也是这样。你不认可我，我就生气。你认可我，我就高兴。你不给我钱，但是尊重我，那我也可以为你卖力地干活，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如果我需要你的认可，但你不尊重不认可我，那么就打架，就斗争。我打败了你，我就争取到了你的尊重，认可。First man，主人就在这样的斗争中产

生的。黑社会，无政府状态下“大哥”的产生也类似。科耶夫的社会政治理论核心在福山的《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里面有淋漓尽致的描写。这本书是科耶夫思想的拥护版通俗读物。而《科耶夫：后现代政治的来源》则是自由主义立场的批判版。

回到为承认而斗争的主题。很多问题都不只是经济问题，比如恐怖活动的问题，比如颜色革命，很大程度上，不是吃不饱，是你不拿老子当人看，老子就跟你拼。我要赢得我固有的光荣，要为了承认而斗争。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决定论并不能解释一切。大量的革命，风起云涌的激烈斗争，很多时候与面子有关系，并不只是经济问题。为了一枚勋章，为了一面敌人的旗帜，人愿意去抛头颅洒热血。产生主人的人与人之间的斗争，是有代价的。不怕死的人，才能成为主人。斗争有三种。一种是同归于尽，主奴都死，既没有主人也没有奴隶，没有用。另一种，是一方干掉另一方，打死了，白打了，只剩下一个，形不成主奴双方，也没有用。把对方打趴下，打服低头求饶才有用。让对方趴下，承认自己，并不一定要打对方，打自己也行。像电影里黑社会，你丫不服吗？你不服我一把刀插在自己大腿上，对方一看傻了，大哥，算了算了，我听你的，大家都听你的。

主人，要赢得对方尊重，让自己成为一个“人”，他一定要冒自己的生命危险。这是非常非常核心的概念。人怕死是人的动物属性，自然属性。所以要在斗争中让对方信服自己，首先自己得是“人”。是人就要有能力把自己的动物性自然性干掉，征服自然。自然除了山山水水，天地以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自己的肉体。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也会碰到。比如修行啊，修佛啊，讲来讲去，就是让自己的灵魂能够独立存在。灵魂的独立存在，就必须藐视自己的肉体，灵魂的对立存在。科耶夫和西方大师们，比如霍布斯，都会讲到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人性就诞生了。通过这种方式，我向我证明我是一个“人”，同时对方看到这一点以后，怕了，也就趴下了。关于藐视自己，藐视自己的生命危险，藐视自己的生命存在，让自己的精神得到升华这一点，在和平时期的某些活动中，比如登山，冒险，从高空跳下去啊，横渡大洋啊，穿越沙漠，都有这种味道。通过藐视自己得到精神的升华，从而得到对方的承认。同时另外一方也就歇菜了，你都把刀插进自己大腿，我也就退缩，怕你算了。当年科耶夫把这个故事讲得极为动人，台上眉飞色舞，台下如痴如醉。台下有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主奴辩证法的工具好，科耶夫的口才，科耶夫的创造力也了得。

我碰到过一个实际案例，与一群朋友去看了一个舞蹈剧，《洛神赋》。舞蹈剧，非常抽象。讲曹植曹丕两人在曹操死后的关系。两人都是曹操的儿子，曹丕是长子，但曹操并不是很喜欢他，而曹植很聪明，很得曹操喜欢。但曹植在继承权的斗争中失败了。舞剧让曹植直接形象地在舞台上趴下。趴下并且穿上了女人的衣服。曹丕以此侮辱他。一起看剧的搞舞蹈的朋友调侃我说，老陆你这么有思想，你发表发表意见。当时我突然灵光一闪，想到了科耶夫的主奴辩证法。想到了“苟活”。在生死考验面前你贪了生怕了死，你就成了奴隶。过

不了生死关就不是真正的人。曹植的故事很好地解释了奴隶的所作所为。人类社会的最初经过无数次碰撞以后，形成一个结构，一个主人和奴隶的结构，贵族和奴隶结构。历史演绎过无数这种结构的故事。

但是这个结构不完美，有缺陷，有遗憾，有不安定感。但科耶夫的说法是，由于不完美，由于有差距，那么才会产生动力。大家学过自然科学都知道，运动的前提是有落差，电位差，水位差，压力差等等。各向均衡就不运动了。落差在哪呢？先讲主人。奴隶先不说，大家容易想象奴隶是不满意的。主人为什么也不满意呢？主人当初斗争的原始动力，是希望得到承认，他人对他的承认。但前提是什么呢？是得到他所尊重的人的承认。但是奴隶就不是人，不是完整的人。被他打趴下的人对他的承认，他是不满足的。这就是问题，他赴汤蹈火，冒生命危险把对方打趴下，得到承认。但他的内心不满足，因为对方是低下的奴隶，不是高贵的人。这个好理解，比如一个看不起的人来拍马屁是没有意义的，只能令人反胃生厌。比如那个小国独裁者，得到如海人潮涕泪欢呼，他是不满意的。美国总统一个人肯跟他吃个饭比几百万属下的欢呼更加让他满意。这样一来，要么打来打去，继续找别的主人去打。很多战争都是这种没有利益诉求的无厘头战争。如果不打呢，那么当主人了，在视线以内当主人了，一来没有得充分的承认，他不满意。二来他也无事可做。无所事事的主人的生活是没有意义的。贵族是堕落的。因为他们没有了继续奋斗的愿望。

另一面，奴隶不满意，做奴隶谁能满意呢？但是辩证法导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结果，奴隶的不满意，最后推进了历史的前进。这个推进历史前进的动力来自什么呢？奴隶他不满意，又打不过主人，就去和自然斗争，改造大自然。回到哲学家的说法，回到黑格尔，就是说开始“否定”，“否定”大自然，高考时背的那个历史唯物主义，改造大自然。毛主席也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广大的奴隶，对自己的状态不满意，就参加三大斗争，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研斗争。科耶夫着重讲后面两点。奴隶变成奴隶后，被迫劳动，心里不痛快。但是他在劳动中发现征服大自然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之所以成为奴隶，是因为在斗争中怕死。怕死也是一种屈服于大自然，只不过这个大自然是躲在他身体内部的动物本能，保存自己的本能。由此被大自然所屈服。奴隶在劳动中重新赢得大自然从而得到了快乐。人类就是通过奴隶的劳动，对大自然的改造，对大自然认识的升华，推动了人类历史向前进。所以虽然主奴辩证法，主奴斗争中胜利者是主人，但是黑格尔，或者说是科耶夫，把奖状发给了奴隶。主奴斗争以后，真正推动历史前进的是奴隶。真正在精神上充实的，恐怕是奴隶。但是，除非阶级斗争，奴隶造反，否则作为奴隶，毕竟还是有缺陷的，是被人奴役的。所以奴隶在生产斗争，科学实验，改造大自然的同时，发展出自己的意识形态，科耶夫认为这个意识形态是一个不好的意识形态。比如斯多葛学派。

斯多葛学派的思想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基本上承认现实是合理的。以赛亚柏林说自由主义有两种，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柏林认为真正的自由，是消极

自由。消极自由是不受干涉的自由，积极自由则是自我实现的自由。积极自由通俗地讲就是想干什么的自由。想，做到了，就自由了。这是有意义的，让我们有积极进取的人生态度。但是，想，然而达不到，于是不自由。想发财，挣不到钱，财务不自由。于是就有人卖迷幻药，很多的宗教就卖这种迷幻药。他们说，你不想，那么就不会达不到，于是不就自由了吗？就比如说，你让我受苦，我就认为受苦是正常的。你把我关在黑屋子里面，那么我就想像我自己是一个最喜欢在黑屋子里待着的人，那么你就拿我没办法了，我依然是自由的。印度教对于贱民的教诲就是这样。让人从非常恶劣的状况里找到快乐。积极自由主义的思想变成愚弄人民的工具。很多思想家批判斯多葛主义是一个卑微的，奴隶的法则，奴隶的思想。

科耶夫还认为，奴隶在常年累月的奴隶生活中，一定会在精神世界中找到一个出路。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基督教。科耶夫认为基督教是奴隶的思想意识，基督教最反动的一点，就是宣称人们可以在彼岸寻求幸福和快乐。有意思的是，即便如此，它也在推动历史的前进。原因在哪里呢？科耶夫认为基督教为他所推崇的“普遍均质社会”提供了一个最基本的思想依据。简单地说，就是科耶夫黑格尔他们所赞同的拿破仑法国革命推崇的一个思想，来自卢梭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平等，主要的来源就是基督教。人都是平等的，不管他是谁，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只不过，不好的地方，就是这些幸福只能在彼岸实现。

插一段闲话，以上这些在我没有接触科耶夫之前，是当成一个反面典型去说的。我以前推崇哈耶克，还有卡尔波普。后者有一本很重要的书《开放社会及其敌人》，它批判的就是刚才讲的那些思想，核心点就是历史主义，所谓历史是有规律的，按照规律往前走。卡尔波普认为这些都是骗人的，历史没有人格，历史也没有规律。或许这不过是文人相轻，卡尔波普在犹太圈子里是受人排挤的。卡尔波普曾经想从剑桥，从英国到美国，到芝加哥大学去谋职。科耶夫的朋友，列奥施特劳斯就说，卡尔波普不是思想错误，是没有学识，是混混。他罗列了一大堆种种古代的思想，其实一知半解，总之是个混混。如果这个混混要来芝加哥，那么我就走。最后学术专家委员会觉得还是得留下施特劳斯，结果卡尔波普终其一生只能呆在英国。维特根斯坦也曾经想拿烧火棍去揍他。自由主义的另外一位大师，以赛亚柏林，则非常看重科耶夫，施特劳斯，虽然他在理论上不赞成他们，但认为他们都是有学识的大师。文本和资料的占有，思想的深度都很了得。他也不是很待见卡尔波普。卡尔波普在世的时候非常有名，死了就无人提起。我的学识不足以去居高临下地批判卡尔波普，或许是因为他的思想中，fashion的东西，流行成分过多，而学术功底不扎实。

回到正题，基督教这些思想，被科耶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重要的思想来源。我们现在认为，法国大革命是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思想前提。布尔什维克革命，又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前提。这些都给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不好的东西。翻烧饼，翻过来翻过去，革命来革命去。历史前进应该是改革。法国大革命最根本的问题就是卢梭提出的要把彼岸的目标和愿望搬到此岸来实现，然后就开始

腥风血雨。总之，奴隶的思想情感，被压迫人民的思想情感，导致了基督教的产生。基督教的思想又被法国大革命所改造所继承，产生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这就是拿破仑的胜利，黑格尔认为历史从此可以终结了。大家可以不同意科耶夫说法，但是我看到的所有对历史终结这个说法嗤之以鼻的人，可能都是对这个名词的定义没有理解准确。他们所谓的历史，是指人类社会形态的演变。实际上是说法国大革命所提出来的，人们彼此人人平等，通过民主协商来生活的形态，可能是人类最终的一个社会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历史走向了它的终结。End of history 就这么产生了。

以法国和美国为模版的这么一种社会制度，战胜了一个又一个的敌人，成为最后的模版，所谓的普世价值，全世界都在往这个上面靠。到达了这个阶段，历史就不再往前走了。这不是说时间停止，而是不再变化了。有个说法，中国没有历史，这里这个“历史”就跟上述“历史”类似。中国经历过的王朝，张三，李四，王五不断的换，其实都是一模一样的，超稳定结构，是没有“历史”的，这个不等于说事件不产生，而是说新事件老事件都是一样的。所以当初科耶夫不受毛主席待见可能也有这个原因。按科耶夫的想法，你从辛亥革命到四九年革命，这些东西也就是当年拿破仑成就的翻版而已，没有什么了不起，历史没有前进。简而言之，历史辩证法，主奴辩证法，辩证到了法国大革命为模版的普遍均质社会，历史就不再辩证前进了，到此为止了。很多人批判，很多人不屑。

历史的终结，历史不再前进的说法，即使在他们“自己人”圈子内也有批判，科耶夫的好朋友，卡尔施密特，他认为普遍均质社会是扯淡的。民族国家，民族政权将依然存在。卡尔施密特最有名的一本书是《政治的概念》，书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附件，《游击队理论》。过去有左派游击队，日本赤军德国意大利红色旅，现在有恐怖主义 911，也是某种意义上卡尔施密特的“游击队”。我认为科耶夫施密特可能都对，要看边界划在哪里。把所有东西都框在一起，卡尔施密特是对的。文明的边界有文明的冲突，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文明，儒教文明，亨廷顿就这么说，也在印证卡尔施密特的理论。卡尔施密特说政治的首要点是分清敌友。毛主席也说，凡事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事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如果不把边界划清楚，不分清敌友，政治就毫无意义。但是看小范围，科耶夫的理论也在取得胜利，欧洲的民族边界正在消灭，西方民族国家之间也很团结。当然历史不终结，在我们中国来看更正确些，我们在提制度自信，在提世界上没有一个单一最好的制度，我们的制度是独特的。

下面要讲到科耶夫思想和尼采的关系。科耶夫的思想或者设想，除了有别人反对，理解不理解的反对。他自己也并不高兴。“不高兴”很确切。科耶夫在战前的讲习班里面，已经预见到了历史的终结，这个并不是共产主义所说的大同社会。为了解释，举一个不大确切的例子，不知道多少同学对佛学有过研修。大家修佛，修呀修，最后并不是修一个极乐世界，到处都是仙女啊，祥云

啊，音乐啊，无忧无虑啊。修行的正果是涅槃，涅槃即是寂静，是 silence，不是进到一个天堂去。天堂是没有意义的，时间长了没有意思。老没有肉吃，吃一次很高兴。天天吃肉，就麻烦了。没有音乐听，听听可以，天天听，音乐就变噪音。科耶夫也是基于这一点，对世界大同，普遍均质社会，历史演进到终点感到深深的悲哀。他发现一旦到了那个时候，大家都是主人了。历史终结的特点，就是不需要再去征服别人，每一个人都是主人，人格独立的，互相尊重。他发现这个社会变得没有意思，再也没有宏大的，可歌可泣的奋斗，都没有了。大家都关心家里有没有车，房子大不大。这些本质上不应该是一个“人”应该追求的幸福，一个“人”追求的，应该是脱离现实的，脱离动物本性的。人去挣钱，去买个好看的车，大房子，追求漂亮姑娘，无非就是高级动物。所以科耶夫发现，历史的终结令人悲哀，实际上是重新让人变成动物，是一个黑暗的终结。特鲁利的书里有一个调侃科耶夫的，生动的例子。历史是人构成的，人们前赴后继，几代人的努力，最后得到结果是什么呢？安徒生有一个童话小杉树，小杉树从小梦想成为一棵圣诞树，它觉得这是个了不起的梦想。它慢慢长大，经过无数的努力，被砍下来，成了圣诞树，最后发现结果并不美好。成为圣诞树之前，被砍下来很痛苦。成为圣诞树之后，蜡烛滴下来烫在它的树枝上非常痛，也很痛苦。圣诞节过后被放到阁楼上，最后成为燃料，被消灭掉。这就是历史的终结，一个灰暗的终点结局。

科耶夫的思想在这里结出了另外一颗果子，当初教育过的那帮法国人，吃饱了没事干的思想家们，成了后现代主义的主要的思想来源。法国因此成了后现代主义大本营。福柯这些人搞的都是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的特点，就是对现状不满，就是特别反对现代性，特别反对全球化，特别反对科学技术主宰一切。总而言之，反对一切。占领中环，占领华尔街。无所事事地造反，发发牢骚，都是后现代主义。他们通过科耶夫的教诲，知道了现代性，历史发展的终点是一种无意义的状态。于是挣扎，要奋斗，要干嘛干嘛的。我认为他们没有想好要干嘛。为什么尼采在后现代主义当中非常受推崇，原因在哪里？原因是尼采曾经在科耶夫之前，早早地就描绘过，不是预言，预言是科耶夫做的，他是非常精确地按照历史辩证法一步步地去推导过来，推导历史的进程。尼采是看到了，洞察到了。他生活在拿破仑之后，生活在俾斯麦时代，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看到了现代社会，会把人变成 last man。最早翻译成“最后一人”，应该翻译成“末人”。末人们不伟大，不浴血奋战，不做高尚的高大上的事情，天天像小爬虫似的过自己的小日子，是没有任何生机的一群人。尼采说现代性的根源要往前追溯到古希腊的苏格拉底。尼采认为天底下他最讨厌的就是苏格拉底。苏格拉底怎么惹恼了尼采呢？苏格拉底把理性带进了古希腊社会。尼采认为，来世这个想法最早就是苏格拉底这个烂人带过来的。这点我也认可，苏格拉底英勇无畏地赴死，前提是相信有来世。更重要的是尼采认为苏格拉底把理性传给了古希腊人，然后用理性分析来分析去，唧吧的唧吧的，最后让很单纯很健康很阳光很高贵的古希腊人突然间觉得自己是有病的，有问题的。从苏格拉底开始，理性开始战胜本能，知识战胜信仰。所以祸根就在他那

里。最后就产生了基督教，继承了苏格拉底的一些东西吧。比如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啊，对真理和正确性的热爱，等等。科耶夫的历史前进到终点时，产生了尼采描绘的末人。这个末人用安全替代了冒险，用年迈来替代了青春。历史很悲哀。

附录 2：参考书目

1. 《物种起源》，[英] 达尔文著，苗德岁译，译林出版社，2013
2. 《社会生物学：新的综合》，[美] 爱德华·O·威尔逊著，毛盛贤、孙港波、刘晓军、刘耳译，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8
3. 《自私的基因》，[英] 理查德·道金斯著，卢允中、张岱云、陈复加、罗小舟译，中信出版社，2012
4. 《自达尔文以来》，[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著，田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5. 《生命的壮阔》，[美] 斯蒂芬·杰·古尔德著，范昱峰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
6. 《复杂》，[美] 梅拉妮·米歇尔，唐璐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3
7. 《蝴蝶效应之谜：走近分形与混沌》，张天蓉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
8. 《科学革命的结构》，[美] 托马斯·库恩著，金吾伦、胡新和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9. 《科学发现的逻辑》，[英] 卡尔·波普尔著，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08
10. 《枪炮、病菌与钢铁》，[美] 贾里德·戴蒙德著，谢延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
11. 《文化的起源》，[美] 马文·哈里斯著，黄晴译，华夏出版社，1988
12. 《文化唯物主义》，[美] 马文·哈里斯著，张海洋、王曼萍译，华夏出版社，1989
13. 《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法] 埃米尔·涂尔干著，渠东、汲喆译，商务印书馆，2011
14. 《艺术哲学》，[法] 伊波利特·丹纳著，傅雷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15. 《人口论》，[英] 托马斯·马尔萨斯著，郭大力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16. 《压力下的生活》，[瑞典] 托米·本特森，[美] 康文林、李中清等著，李霞、李恭忠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17. 《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王学泰著，同心出版社，2007
18. 《我的帝王生涯》，苏童著，作家出版社，2009
19. 《共有的习惯》，[英] 爱德华·P·汤普森著，沈汉、王加丰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0. 《英国个人主义的起源》，[英] 艾伦·麦克法兰著，管可秣译，商务印书馆，2008
21. 《冲突的战略》，[美] 托马斯·谢林著，赵华等译，华夏出版社，2006

22.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美]托马斯·谢林著，谢静、邓子梁、李天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
23. 《国富论》，[英]亚当·斯密著，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2015
24. 《企业，市场和法律》，[英]罗纳德·H·科斯著，盛洪、陈郁译，格致出版社，2014
25. 《佃农理论》，张五常著，商务印书馆，2000
26. 《经济解释·制度的选择》，张五常著，中信出版社，2014
27. 《现代经济导论》，[英]琼·罗宾逊，约翰·伊特韦尔著，陈彪如译，商务印书馆，1982
28. 《农业与工业化》，张培刚著，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02
29. 《新兴古典经济学与超边际分析》，杨小凯，张永生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30. 《贫穷的终结》，[美]杰弗里·萨克斯著，邹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31. 《基于实践的微观经济学》[美]赫伯特·西蒙著，孙涤译，格致出版社、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德]马克思、恩格斯著，人民出版社，2012
33. 《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著，人民出版社，1991
34. 《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英]G·A·柯亨著，段忠桥译，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35. 《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新解》，[美]罗伯特·布伦纳著，张秀琴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6. 《资本主义的起源》，[加]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著，夏璐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
37. 《巨变》，[英]卡尔·波兰尼著，黄树民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38. 《古代法》，[英]亨利·梅因著，沈景一译，商务印书馆，1959
39. 《论法的精神》，[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商务印书馆，1961
40. 《辩论：美国制宪会议记录》，[美]詹姆斯·麦迪逊著，尹宣译，译林出版社，2014
41. 《美国宪法的经济观》，[美]查尔斯·A·比尔德著，何希齐译，商务印书馆，2010
42. 《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美]巴林顿·摩尔著，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
43. 《国家与社会革命》，[美]西达·斯考切波著，何俊志、王学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44. 《国家、经济与大分流：17 世纪 80 年代到 19 世纪 50 年代的英国和中国》，[荷] 皮尔·弗里斯著，郭金兴译，中信出版社，2018
45. 《欧洲奇迹：欧亚史中的环境、经济和地缘政治》，[英]埃里克·琼斯著，陈小白译，华夏出版社，2015
46.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古希腊]修昔底德著，徐松岩、黄贤全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47. 《一六四零年英国革命史》，[法]弗朗索瓦·基佐著，伍光建译，商务印书馆，2001
48. 《中国土地制度史》，赵岗、陈钟毅著，新星出版社，2006
49. 《中国的土地和劳动》，[英]理查德·H·托尼著，安佳译，商务印书馆，2014
50. 《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黄宗智著，中华书局，1886
51. 《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黄宗智著，中华书局，2000
52. 《封建社会》，[法]马克·布洛赫著，张绪山译，商务印书馆，2005
53. 《法国农村史》，[法]马克·布洛赫著，余中先、张朋浩、车耳译，商务印书馆，1997
54. 《西欧封建经济形态研究》，马克垚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
55. 《英国封建社会研究》，马克垚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6. 《封建经济政治概论》，马克垚著，人民出版社，2010
57. 《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唐加龙、曾培耿等译，商务印书馆，2017
58. 《15 至 18 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法]费尔南·布罗代尔著，顾良、施康强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 年
59. 《经济通史》，[德] 马克思·韦伯著，姚曾廙译，商务印书馆，2021
60. 《从下往上看：英国农业革命》，杨杰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61. 《历史哲学》，[德] 黑格尔著，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
62. 《西方的没落》，[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著，吴琼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年
63. 《中国历史通论》，王家范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64. 《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德]卡尔·洛维特著，李秋零、田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